

吴葆朴 李志英 朱昱鹏 编

博古文选·年谱

当代中国出版社



博古文选·年谱

吴葆朴 李志英 朱昱鹏 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博古（秦邦宪）

新華日報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電話：二二二二
零售每份五分

新華日報一年來與共
作的職員與官的經驗，
深刻的認識抗戰民族救
亡的偉大事業，他的情
感與思想，他的文章與
辭，愛國與責任感的方法，
第一他從他物理其今
抗戰與之關係，是十分
清楚的。

抗戰民族救亡戰線的
特點與偉大的革命，表
現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之生命，他的不
可摧壞性，他的巨大的
前途，他對中華民族的
無上高貴。

代論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 困難及其前途

博古

抗戰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民族救亡戰爭中，最偉大的戰線。它的發展，是決定中國民族存亡與否的關鍵。在抗戰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它的發展是充滿着困難的。但是，只要我們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這些困難，使抗戰民族統一戰線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抗戰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是與抗戰的進程相聯繫的。在抗戰初期，由於敵人的殘酷進攻，我們被迫採取了退讓政策，這使得抗戰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但是，隨著抗戰的深入，我們認識到，退讓政策是錯誤的，我們必須採取積極的抗戰政策。只有採取積極的抗戰政策，我們才能動員全國人民，形成一個強大的抗戰力量，從而使抗戰民族統一戰線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在抗戰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團結。團結是抗戰民族統一戰線的生命。只有堅持團結，我們才能克服各種困難，使抗戰民族統一戰線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在抗戰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堅持進步。進步是抗戰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動力。只有堅持進步，我們才能克服各種困難，使抗戰民族統一戰線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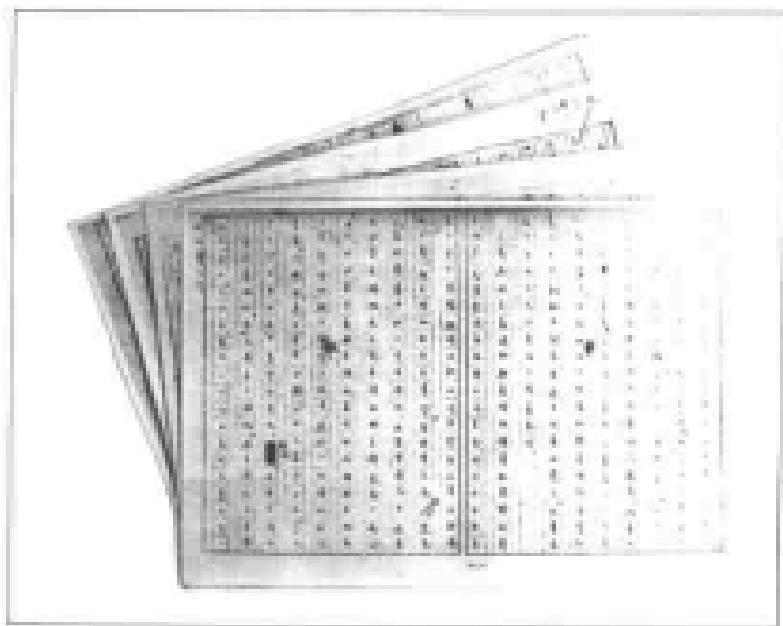
總之，抗戰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是充滿着困難的。但是，只要我們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這些困難，使抗戰民族統一戰線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7 博古為《解放日報》撰寫的社論（部分）



8 博古簽發的記者採訪介紹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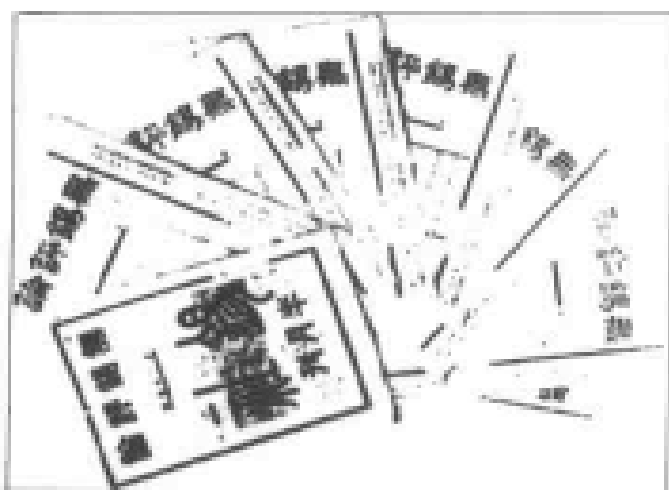




2 博古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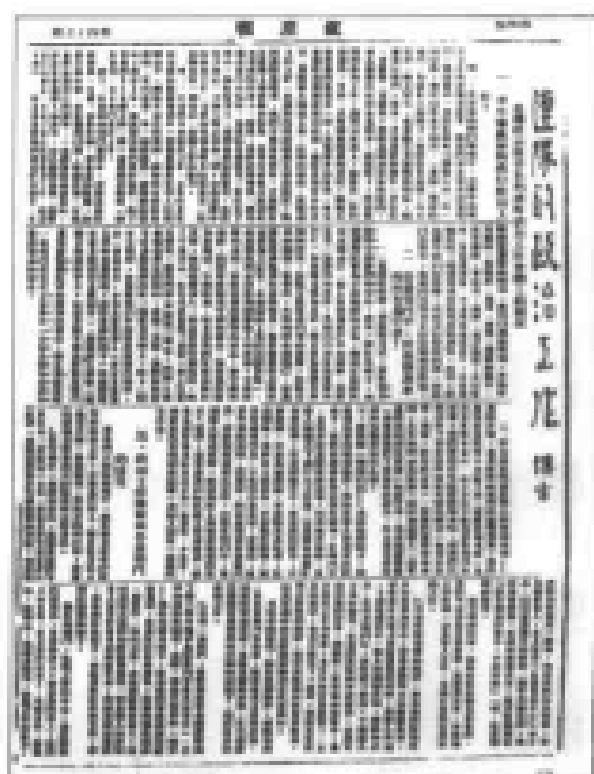
1 延安清凉山新闻纪念馆



3 秦邦宪主编的《无得评论》



4 博古发表在《解放》杂志第36期上的文章(部分)



5 博古发表在《红星报》第43期上的文章(部分)

编 辑 说 明

博古（秦邦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之一，卓越的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他十八岁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直到三十九岁罹难，为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担任中共党的总负责人的时候，犯过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过严重的损失。但是他为人真诚磊落，从善如流，知错能改，在党内仍享有良好的声誉。他为建立和推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党组织作出重大贡献。特别是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将马列主义办报理论及毛泽东新闻思想与《解放日报》的实际相结合，系统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闻理论，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编辑出版《博古文选·年谱》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和研究博古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需要。

全书共收集博古的文章五十九篇，文章按时间顺序编排。

第一部分（1925—1926年）共选作品十三篇，是博古青少年时代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当时中国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博古这时是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他从一个爱国青年学生，经过五卅运动等革命斗争的实践，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文章笔锋锐利，鞭挞社会的黑暗腐朽势力，对促进和鼓舞青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部分（1931—1935年）共选作品十四篇。1930年5月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在“左”倾思想盛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1931年底，博古被推上中国共产党总负责人的位置。为了尊重历史，使读者能全面了解博古的思想脉络，特别收集了这时期的几篇有“左”倾思想的代表性的文章，便于对博古的功过是非及其思想变化的过程，进行历史地、客观地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1936—1940年）共选作品十七篇，1935年10月，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全国处在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和抗日战争的头几年，博古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以后去南京、武汉、重庆历任长江局、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战争。他的文章、社论、报告着重于分析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鼓舞中国各族人民投入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第四部分（1941—1944年）共选作品十五篇。当时全国处在抗战艰苦年代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博古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那时《解放日报》刊登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与国民党斗争的社论，大部分都是博古执笔撰写，且多不署名。后来蒋介石进攻延安时，底稿遗失，这给我们现在选定博古文稿带来一定的困难，虽多方请老同志帮助认定，但因时过久远，最后确认的文章仍不多。这时期博古文章的特点：一部分是针对时局的分析，另一部分是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都是十分宝贵和精辟的。他关于苏德战争的几篇社论，实践证明，他的预见性与论断都十分准确。他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与观点在今天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本书附有比较详细的博古年谱，尽可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历

史状况，可以帮助读者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了解博古一生的实践活动与思想境界。

本书所选的文章，凡已经公开发表的，按最初版本排印，未曾发表的按其原件排印。原稿中的错字、漏字分别用〔〕号和〈〉号进行校正，原稿无法确认的字用□号标出，原文标点有明显错误的作了校正。文章日期一般为写作日期，写作日期不清的按最初发表的日期。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原文的历史背景，有些文章对时代背景作了简短说明，对文章中涉及的部分人物、事件，也作了少量注释。由于编者水平与资料有限，所以在选材、注释等方面未必都很恰当，有的也可能有错误，仅供读者参考，并希望读者给予指正。

本书的编选工作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帮助，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卫元理、万京华等同志，对博古在新华社工作期间的年谱，作了校正与补充，在这里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者

一九九七年二月

责任编辑 解希林
复 审 刘鲁风
封面设计 李 姮
版式设计 王树敏
责任校对 常 虹

010000

目 录

编辑说明

博古文选	1
我们应当觉悟的(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3
美妙的音乐(一九二五年四月)	10
病榻琐记(一九二五年六月)	12
上海惨杀之最后决胜点(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18
什么是锡社会主义(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	20
论军事教育(一九二五年七月)	28
爱国与互爱(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	32
一九二五年的王敬轩(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35
读薛南溟致商会书以后(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39
选举活剧中邑中舆论界(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	45
杨千里先生来锡后之感想(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49
为加薪运动敬告全邑小学教师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56
世界中国与无锡(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	59
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64
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四日)	66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 国民党投降卖国(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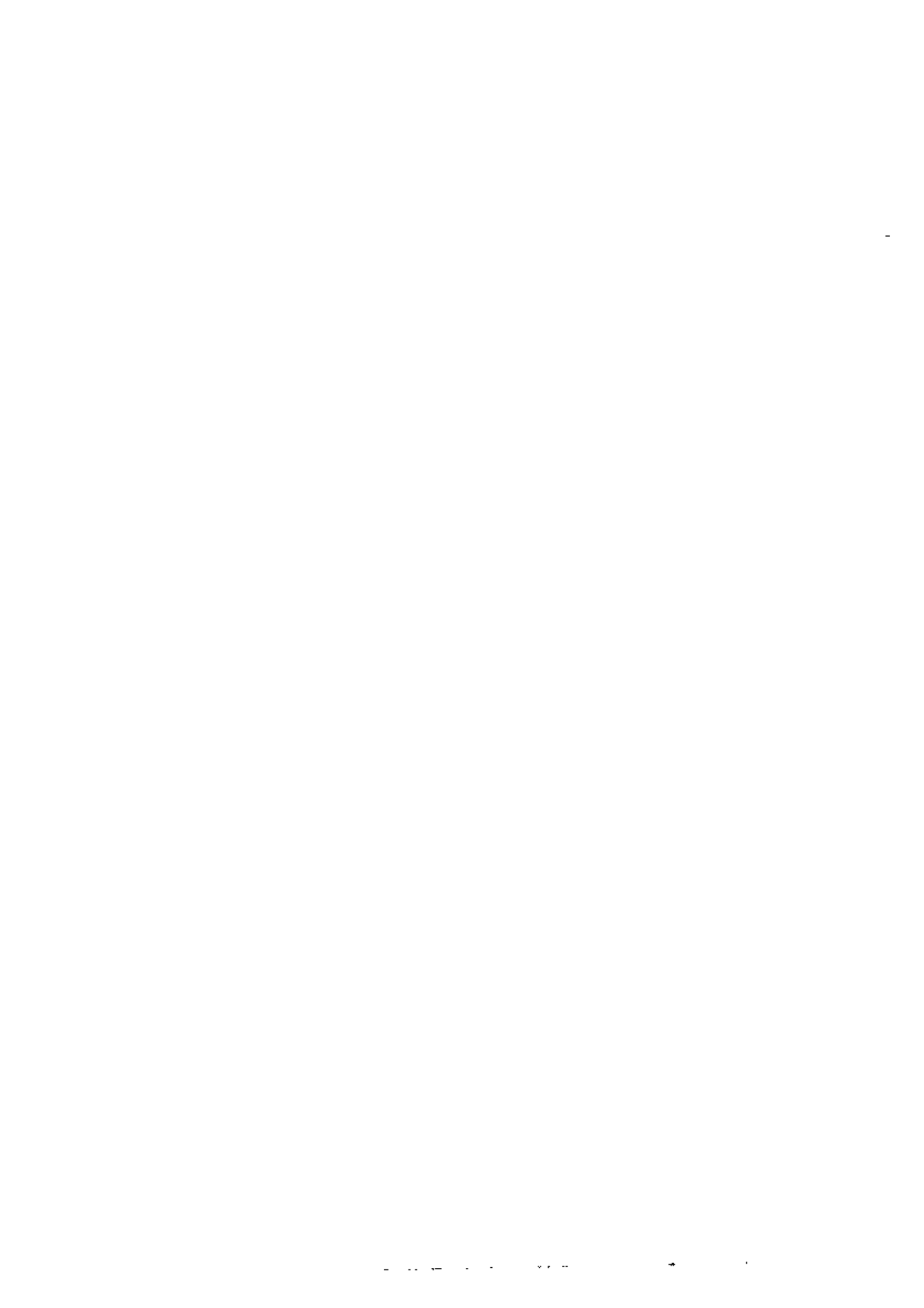
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	80
把劲发着的群众劳动热忱组织起来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	83
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85
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 苏维埃中国而斗争(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88
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92
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94
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97
连队的政治工作(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105
给×××同志的信(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110
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 做了些什么和将做些什么?(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	116
白区学生的反日斗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42
红军在山西(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144
“协同剿共”还是一致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153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	163
西南事件之教训(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168
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一九三六年九月)	171
国内时事杂论(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	202
抗战形势与抗战前途(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	214
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	221
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	232
答复××先生的一封信(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	243
抗战一年(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246

世界和平力量团结起来！中止法西斯野兽的屠杀！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248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及其前途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日）	251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264
抗战二周年纪念献词（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283
加强敌后游击活动以粉碎敌寇以战养战之阴谋案 （一九三九年九月）	285
祝新华二周年（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	287
党报工作者对党报重要性的认识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	290
谣言与烟幕（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291
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295
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斗争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297
苏德大战第一个月（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300
如何写文章（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	303
致读者（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304
论领导与检查（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	308
反对党八股，建设新文风（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310
党与党报（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312
如何开展宣传战（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	317
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报导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	319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	321

4 · 博古文选 · 年谱

本报创刊一千期(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	326
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一九四四年)	331
注 释	334
博古年谱	347
一九〇七——一九四六年	349—514

博·古·文·选



我们应当觉悟的^{*}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固然，我们应当把我们热烈的精神，勇往直前毫无反顾的，向污秽的社会施以总攻击。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内部，也应当时时刻刻反省改善。因为我们倘是有一些什么小小罅隙，就要受我们敌手方面密集的弹雨，非但足以破坏我们的团结，挫折我们的意志，就是社会事业的前途，也将受莫大的打击。同志们！多重大的任务呵！留意着罢！

倘若反省着我们往日的行动，默察着我们社友的言论，我们会得到怎样一种结果？我们还当得起这样任重道远的事情么？同志们！恕我愚直！我要说，不但担当不起，而且我们若长此以往，不把内部好好地振刷一番，我们或者竟将……唉！我们怎得不急起直追，努力改革我们的内部呢？我爱世界，我爱中国，我爱故乡，我更爱我休戚相关的小团体，所以怎容我不在这儿写这几句我们应当觉悟的〈话〉呢？虽然，我的呼声是这样的渺小微弱；虽然，我不希望全社同志一朝顿觉，但是只要有几个热烈一点的同

-
- 此文是秦邦宪特为锡社写的。锡社系进步社团，1924年1月29日，由无锡旅沪学生缪斌、王启周、许广圻、陆定一等人发起组建，宗旨为“提高邑民常识，促进无锡社会生活”，并出版《无锡评论》、《锡钟》等刊物。同年7月，秦邦宪亦加入锡社，后被推为该社执行委员、编辑部主任，做了大量社务工作，颇有影响。秦邦宪鉴于锡社成立以来，社员中存在的问题，在此文中指出锡社内部反省改善革新的必要性，就社内不容存有党团、派别等问题，唤醒社员应当觉悟。文章发表于《无锡评论》第十三期上。

志，能够受我底呼声的警醒和激动，未〔来〕做革新内部的工作，然后负上我们的责任，以期达到我们的目的，我将怎样的欢欣呀！

现在我谨谨诚诚把我所感觉到的，写在下面，求诸位社友的反省！

第一，我们应当觉悟的是：我们这团体，是一个为社会而牺牲而努力的团体，并不是争权夺利的团体，所以不容我们有什么党、团、派别的作用存于其间。我们都是赞成本社宗旨、行动，恪守本社简章、信条的。那么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那么在我们团体里面的同志，谁不是和我们像家人兄弟一样。那么哪个人，或部分，或某派，或某团的自私的见解，权利的目光，岂容存有一些微些的成分？要知道一个团体的分裂，不是在爆发之后才发现的，是老早就埋伏着的了。国民党因为有了许多未曾了解三民主义的党员，就给人家挑拨出来一个左派和右派，而他们自己也承认了他们各自的派别。唉！一个团体有了派别和党团，这是团体的幸，还是不幸呢？何况我们这基础未固的小团体呢？我们一事未成，一策未行，而放在我们前的工作是这样的繁多和重大，岂容我们再自存派别，以相残杀呢？同志们！请你除下你那老花和近光的眼镜，祛除那争权夺利的妄念，一心一意地来做改造社会，打倒绅阀的工作罢！

第二，我们应当觉悟的是：地方与国家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切政治、文化、教育、交通……上，不容我们只做地方的改造，而忘却国家的改造。所以我们应当改造地方，尤其应当改造国家；我们应当注意地方行政，更加应当注意国家行政。锡社，锡社，顾名思义，当然是无锡青年，改造无锡的结合。我不是锡社的发起人，我不能知道锡社发起时的情形怎样？但是依着我的推测，和听几个发起人口里，是由几个旅外青年，环观着国家现状，险象

志，能够受我底呼声的警醒和激动，未〔来〕做革新内部的工作，然后负上我们的责任，以期达到我们的目的，我将怎样的欢欣呀！

现在我谨谨诚诚把我所感觉到的，写在下面，求诸位社友的反省！

第一，我们应当觉悟的是：我们这团体，是一个为社会而牺牲而努力的团体，并不是争权夺利的团体，所以不容我们有什么党、团、派别的作用存于其间。我们都是赞成本社宗旨、行动，恪守本社简章、信条的。那么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那么在我们团体里面的同志，谁不是和我们像家人兄弟一样。那么哪个人，或部分，或某派，或某团的自私的见解，权利的目光，岂容存有一些微些的成分？要知道一个团体的分裂，不是在爆发之后才发现的，是老早就埋伏着的了。国民党因为有了许多未曾了解三民主义的党员，就给人家挑拨出来一个左派和右派，而他们自己也承认了他们各自的派别。唉！一个团体有了派别和党团，这是团体的幸，还是不幸呢？何况我们这基础未固的小团体呢？我们一事未成，一策未行，而放在我们前的工作是这样的繁多和重大，岂容我们再自存派别，以相残杀呢？同志们！请你除下你那老花和近光的眼镜，祛除那争权夺利的妄念，一心一意地来做改造社会，打倒绅阀的工作罢！

第二，我们应当觉悟的是：地方与国家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切政治、文化、教育、交通……上，不容我们只做地方的改造，而忘却国家的改造。所以我们应当改造地方，尤其应当改造国家；我们应当注意地方行政，更加应当注意国家行政。锡社，锡社，顾名思义，当然是无锡青年，改造无锡的结合。我不是锡社的发起人，我不能知道锡社发起时的情形怎样？但是依着我的推测，和听几个发起人口里，是由几个旅外青年，环观着国家现状，险象

环生，民生憔悴，债台高筑，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弄得国将不国了。眼看得神州大陆，将要沉沦到亡国奴的地位了。因是一腔热血热烈沸腾，要想救国，改造社会；要想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但是谈何容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众，谈改造，谈革新，几乎没有可以下手之处。因此就想到登高自卑，行远自迤，要改造国家，还是先来改造故乡。而回顾所谓故乡的，却又污秽淫糜，机诈百出，魅魍横行，声闻过情；这种环境，这种现状，更不容不急起直追，拚命一干。所以锡社一年来的目标、计划、策略，一向是以改造故乡，提高邑民常识为标榜。这原是极皇堂正大的理由，不过经过了一年的行动和宣传，现在只得以改造故乡，提高邑民常识为锡社最终目的，而忘却发起时，目的以上的目的，所以现在要向社员提到干预国政，那就没有一个不具一付“掩耳闭目策马疾走过之”的态度，或者还有摆着一付冷笑轻讥的神气，以谓锡社是地方团体，不应该干预到国家行政。实在这是一个极错误的思想！我们固然要改造地方，但改造地方不是我们最终目标，不过是我们走上目的地的途径，实在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改造国家。但是我们因为人微言轻，与其说那国民革命、国家改造等那些大而无当的话，还不如切切实实得步进步的改造地方。若说我们因为要改造地方，而忘却改造国家，就像谈世界主义，而忘了民族主义一样的错误。因为国家和地方，是息息相关的，不容我们有鸿沟界石存于其间的。若说只要改造地方，不必管什么国政，固然无论地方是不是能够不受一切国家的政治、文化、交通……上的影响。即使退一步说，牛粪里生得出鲜花，猪圈里养得出白羊，污秽的国家里产得灿烂的地方文明，那么我们苦心坚卓，费二三十年心血造成了的地方文明，给齐军二三小时的蹂躏以后，现在又成一付怎样的状态？总之：改造国家与改造地方，是

平行前进的双轨，不容我们有轩轻其间的。朋友们！醒醒罢！

第三，我们应当觉悟的是：锡社是一个青年的结合、做民众的指导者的革新团体，我们不该和已失悼〔掉〕血气和天良的绅士、时代的落伍者接近和结合，不惟不可去接近和结合，并须出死力去反抗他。锡社是什么样的团体？绅士是怎样的东西？岂容我们奋发有为的青年，和那些行将就木的恶绅接近！关于此点，吾社有识之士，辨之甚明，自用不到我来多言。不过日久玩生，近来社员的日趋绅士化，日离平民队伍，又岂是可讳的事。同志们！试一反省平日果有这种倾向、这种现状么？果若有这种情形、这种现状，那就请诸同志试读剑平君^①的信：“……所以锡社要在故乡略尽一点指导与改造社会的责任，而想发展地方事业。我是极主张有独立精神的，倘是心念上，要有一点依草附木阿谀〔谀〕绅阀的微些成分，我就觉得前途狠〔很〕是危险。南通有了一个绅阀，一根老竹头，东南半壁，闹到妻散子哭，鸡飞犬奔。倘使我们锡社将来几百个同志，因与鲜鲜活死人源头相和，大起其绅士化，霎地间起了几百根大竹头，这不是把好好的绵〔锦〕绣无锡送到太湖里陆沉去么？后世的子孙，要改造社会，斩我们的竹头，也苦于斩不胜斩吗？而我们要改造社会，反给后世子孙来改造，我们要斩竹头，我们自己反成了竹头，这是什么话！……”

同志们！看了觉得说〔的〕怎样？但是我想我们的行动，决不能仅止于自拔于鲜鲜活死人的源头，总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驱除这鲜鲜活死人的源头。换句话说：就是要做番斩竹头的工夫。关于此点，启周君^②在《绅士与军阀》篇里说得狠〔很〕详，此地也不必多引。不过我总觉得我们同志们，总是能说不行，岂但不行，且多从而效之，唉！这真不得不怪我同志们毅力的单薄，信仰的不坚定了！所以我在此地要诸同志们自拔于鲜鲜活死人之间。

并须打倒恶劣的绅阀，要驱除改造队伍里的劲敌！

第四，我们应当觉悟的是：团体生活，纯粹艺术的生活，何况以主义信仰相同而结合的社会改造团体呢？所以团体之内，不应该存有什么其他一丝一毫不纯粹的妄念。团结即势力，这一句话想已为世人所共悉的了。不过对于团体的意义，怕有十之七八不明了罢！团体是什么？可简单地讲几句：一个集有多数的共同目标意见和信仰上的个体，组织成一个有能力、系统、意识的法人，或有机体，那就叫做团体。所以团体的势力，不在人数的多寡而在主义、目标、信仰的坚固与否。所以倘若集几千个共床各梦的人物，使成一个大团体，与集三四个真正纯粹信仰结合的小团体，其间势力之差异，殊堪令人惊异！（就拿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例可知）所以要求团体势力的伟大，决不在滥收同志而在精选同志。换句话说：决不要那些依草附木、存有别图的蠹贼。因为如以团体为进身之阶的人物，将来遇有做顾问咨议的机会，未尝不会买〔卖〕掉团体。空话不说，且回过头来看看锡社是成一个怎样的情形，有心的同志，怕已先我知之了！你看有的呢，以团体为进身之阶。有的呢，以团体为饭碗之护符。有的呢，以团体为交接异性的场所。有的呢，想利用团体势力，以图一逞其私欲。纯粹的主义结合，能有几个。即使有几个，也几乎于人笑视为阿瑟木林。唉！世风至此，怪不得老先生要喊江河日下了！更怪不得有心人要放声一哭了！我在此鞠躬捧心地劝告诸同志，快把种种不纯粹的野心放下，同来做主义上的工作，不然同床各梦，一盘散沙似的团体，就像日出后的春雪，一时就会消得无影无踪了。那么诸位一腔热血的幻梦，岂不随之消逝。所以社友们啊！醒醒罢！不要痴心妄想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③。社友呵！努力记着吧！

第五，我们应当觉悟的是：团体的组织，固然全仗人治，但是要组织永远的垂久，“德谟克拉西”精神普编〔遍〕的发展，决非仰仗于法治精神不可。团体生活，是群众生活，志同道合的结合，众人的结合，非有法绳之不可。单仗着人治的精神，那将来就会弄得人去政亡，将来就会弄得成了一个偶像，将来就会弄得团体成为领袖人物的团体，而不是群众的团体。惟有法治的精神，可以维持“德谟克拉西”精神的普编〔遍〕发展。可是中国人一向抚育在专制政体下面，一向受人治制的统治，所以我们的团体，也免不了有独断独行的嫌疑，免不了重视人治而轻法治的嫌疑。所以我要请诸同志注意着法治的精神，特别要请诸位领袖的同志，要“奉公守法”，不要“我自为政”！

第六，我们应当觉悟的是：锡社是一个幹〔干〕社会事业的团体，不是个人修养的团体，所以我们不因〔应〕当干涉到各社员个人在我们宗旨信条范围以外的私事，（如恋爱问题，家庭问题等）。我很不明白我的同志，为什么对这点〔么〕小小的一点（团体和个人的关系）都分辨不清，以致弄得去年除严、徐两同志名，而近来社中常闻有一部分号称明渐〔晰〕而热烈的同志底怪论，说：“某君私德不检有如害群之马，应该请委员会提出警告，或除名。”这种语调，随处得闻，不一而足。他们的热诚，他们的嫉恶如仇，都足以使我十二分佩服。但是他们对于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一点，都不经意地忽略，觉得十二分的遗憾。所以我在此地要大声疾呼的请诸同志认清团体与个人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锡社是社会活动的团体，社员只要在社会活动或平日的行为上，不违反本社团的规约、信条，就不当取干涉的态度。进一步说，我们所以要做社会运动，地方改革的原因，是要求实在的民权和充分的自由的缘故。若是为了进了社会活动的团体，而要牺牲或限止一切的行

动或意志的自由，岂不笑话？所以在规约和简章以内〔外〕的一切活动，无论其不道德与否，皆不当取干涉态度。

我已经把我感觉到的说完了。我这样的、坦白的、直率的指摘，我也顾不得同志们，是赞同还是笑骂。但是倘蒙赞成，就请你不要再因循了，因为我们这枝〔支〕孤军，已深入重地，万一内部再一懈怡〔息〕，就将受敌方枪林弹雨的攻击，使我们不得不俯首降心，奴颜婢膝地降服了。同志们，我们还得不醒来么？还不起来做刷新内部的工作么？所以我最后的几句是：

一、祛除个人或团体派的私见，和衷共济地向恶社会奋斗。

二、认清了目的以上的目的，不要自己先数典忘祖。

三、认清了我们的公敌，坚固着我们意志，向敌方攻击。

四、精选同志，祛除劣念，以期增进我们团体的势力。

五、固守法治精神，以求永远的垂久，普遍的发展。

六、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百事件，大度处之。切勿吹毛求疵，自起芬〔纷〕乱！

美妙的音乐^{*}

(一九二五年四月)

“任何美妙的音乐，总比不上鸟的歌唱来得亲切自然而有味。”这是一句确切不移的名言。

实在的，无疑的，这句简单而切实的话。你若不信时，试想到一个初春的早晨，日光还没有上升的当儿，雾气充满了这静恬的、沉默的大地，房屋树木都沉浸在白茫茫里，一切的东西都看不见，或者注意不到。假使你在这样的早上，从一条幽湿的灰径里，走到那清漪的小池近边，在那里满种了拂水的垂杨。这时天光渐渐红了，但在这将红未红的时候，你忽然听得一声清脆而悦耳的莺声，从那新绿色的柳条里传来，而冲破了这迷迷茫茫的自然界。你那时就会感觉自然界是怎样的美丽！你可以看见初升的红日是怎样鲜美！被朝旭拂刷着的柳条有着一种怎样难写的颜色，而柳条里几只黄莺儿的歌唱是怎样抑扬顿挫，疾徐有致！但是要没有这几只鸟儿在这里歌唱时，你总会感到自然界的寂寞，和上帝创造能力的缺乏罢！

或者你是个天涯飘泊的游子。那么，你经过了一个春雨之夜，而窗外的雨声仍旧淅淅沥沥的不止，就此引起了你思家情绪的时

* 这是一篇显露秦邦光写作才华的文章。此文荣获《妇女杂志》（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举办的《鸟的歌唱》乙种征文刊用，并排名首位。发表在《妇女杂志》上。

候，或在欲归不得，离愁充塞的时候，你蓦然听得一声“不如归去”的子规啼声，你将怎样？或者你在一个甜蜜而空幻的春梦里醒过来时，你想着现实生活的烦闷痛苦，和梦中的生涯的甜蜜温柔，你正厌弃你现实的生活，而想再过那空幻而甜蜜的生涯时，忽然一声报晓的雄鸡，喔喔高啼，你将怎样？或者你在“天气困人梳洗懒”的暮春，你正困于四郊的景色，懒洋洋地躺着，无聊地想读书或游散时，忽然一声“快快布谷”的布谷鸟声在你耳畔经过，你将怎样？

若在一个苦雨闷人的黄梅时节，你因为凡百无聊而走到一废园去，在那里你会惊讶雨后自然界的美丽，为你从来所没见的，你看那翠绿的树，正被微风轻轻地吹着，枝头正在裊裊的颠拜，像少女的跳舞；树头余滴，因为这颠拜而飘落，几乎会使你疑心天又在下雨了，或者联想到一个少女失恋后的涕泣。在这种环境里，你正在回想你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忽然听得一声凄厉的杜鹃声，或者阴惨的枭鸣声，那你怯弱的心弦怕会因为受不了刺激而破碎了。唉！你想鸟的歌唱是怎样地使你忧伤？但是要在同样的环境里，任何音乐总不会使你这样痛苦，就是凄凉的笛声，和呜咽的箫声，也没两样。

朋友，你信了么？“任何美妙的音乐，总及不上鸟的歌唱来得亲切自然而有味。”

病榻琐记*

——五卅惨案苏州运动中之几节片断回忆

(一九二五年六月)

康健活泼无碍无挂的我，好端端的忽然又害着什么吐血。桐影青翠，夏景清和，锦彩烂漫的杜鹃花篱边蓓蕾着将残未残的紫蝴蝶飘散零落着。一待落日西逝晚风轻拂，同学们又都一个个地披轻纱、执纨扇，到沧浪亭畔去歌濯纓濯足之章。或到沼溪之畔，去打一叶片舟，击楫中流嬉笑欢乐，好像一群太空飞翔活泼自由的鸟儿。而我呢，只能困坐在湫（隘）狭小的自由监狱里，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地上吐出的鲜血，对我发出惨怖的红笑。

更甚于此的，就是刚才忽然得到一个万分紧急的消息说：上海在今天下午六时忽然发生一个空前惨案，为国牺牲、肝脑涂地的烈士，有十余人之多。一条繁杂而华丽的南京路，也同我床前盈尺之地一样，遍染了血色。不过南京路的血色，是表显我中国未有之民族自决的色泽的，而床前的呢，至多表显着我个人对于我身体的不注意罢了。

电灯雪亮，懒洋洋地躺着，思潮上下，辘轳不定，忽然想到

* 五卅运动期间，秦邦宪为“苏工专”、苏州学联负责人，扶病投身于声援沪案活动，并积极在《血泪潮》小报（由锡社、中国孤星社出版）发表了《病榻琐记》、《论军事教育》、《狗与华人》等较多通讯、政论、杂文。文中深刻揭露沪案真相，记述苏州、无锡声援沪案活动情况，抒发他的反帝爱国情感，反映他的革命思想，起了宣传鼓动作用，颇有政治影响。

数百里的家庭，忽然想到远离的友人，忽然想到……。

想着了上海流血的惨事，帝国主义者的假面具一概打破了。轩辕黄帝以来的五千余年的国家，或将沦于真正殖民地的地位，《黑奴吁天录》中的苦况，我们将要身受之了。意想及之，热血如沸，披衣起坐，欲拔剑起舞，然身过衰弱，颓然复倒。

三十一日早，姜长麟君^④来述及上海惨案惨况，不觉潸然泪下。姜君拟召集学生联合会，然我体殊弱，不能起立。惟一念及上海惨况，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不愿赧颜借〔惜〕命于胡虏蹄下。奋然而起，嘱我的朋友仲芹、近仁、秉英三君分赴各校召集各校代表，集青年会开临时紧急会，并请各校同学来会听讲。时天微雨，然冒雨来者男女同学数百人。因为讲演厅给什么卫生会占据了去，无法可想，就在露天演讲毕，同学面上，都露着一副惨淡的面容。死灰之色，伤〔像〕送葬的时候所表现着的。同时“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革命万岁”之声高唱人云。

时代表大会亦已议定，分赴未到各校接洽，王高定赴桃坞、显道、萃英三校。回校后校中同聚一堂，吞声饮泣，见我回来，邀我演讲惨案经过。我力以病辞，惟诸同学辞意甚恳，义不容却，因昌〔冒〕疾作简单的报告。同学中痛国步的艰难，国势的凌夷，而放声大恸的极多。我更乘机说楚囚对泣，互相歔歔，是一种妇人女子的丑态，我们此时用不到这样的感情。这时任凭血枯泪尽，也见不得到什么大效。我们这时只有效着胡适之的手枪炸弹上去干干干！即为民族同决而死，死亦有荣！语至此，力不能支，赫〔赤〕块殷殷又复赤〔赫〕然目前。

席上议定，明日停课一日，分九组出发，演讲、所有传单等件，由各组自备，谁所备最多，即是谁的光荣，因是激〔彻〕夜

不眠的几十人。躺在床上的我，止〔只〕听得滴滴的檐流与凌杂的步声，相调和着。铁马丁东，冷风飕飕，似亦悲“弱国无外交”！

翌晨，天雨。冒雨赴三校，牛毛细雨，吹面欲湿。见桃坞校长，那位先生，他在十五分钟内，对我连说着了十七个“Red”（赤化主义），十个“Mop”（暴动），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仅派学生代表赴会，洋大人的心理，可谓六窍俱通！

赴萃英中学，他们的学生会会长陈芳秀君对我说：“这事各有主见的不同，代表的派不派，此时尚难明告！”说时带着一副冷酷的狞笑，同去的仲芹君怒色的对他说：“我想凡有人心，莫不愤慨，除非甘为洋奴顺仆的。”话不投机，奋然而出！

归途里，想着上海风潮，今日如何，可敬可爱的青年同学不知怎样了！觉得一副血染马路的惨状，像影片一般对我开展。临风袅袅的柳条儿，也洒着点点滴滴的同情之泪。云淡天黯，悲悼伤心之色，满罩着这古昔名都以上，而激昂慷慨，热血沸腾之情，又充塞了这过柔怯弱的吴侬胸中。

路遇友人近仁、共由，谈及顷向警察宣传，有几个警察说：“这事若在中国地界，便决定不会发生，岂有自相仇杀，看着青年同胞血肉横飞，而漠然不同〔动〕于中的么。”又一个说：“只要吴大帅出来，他们大家舍命去打，怕什么？”唉！天真童心，每于不自知中流露！

午后，仍在青年会开联席会，到二十三校，推东吴主席。议明日举行示威游行，但许多教会学校同学因为怕洋大人的缘故，竟将此案否决。时乐益女学代表程季如君，愤火中烧，慷慨陈辞说：“沪上风潮仍未停息，顷得消息，谓今日陆战队已上岸，戎装严阵，如临大敌。苏州若没有示威游行，怎样表现我们的民气呢？怎样

使洋大人闻而胆战呢？”意旨激昂，言语明晰，闻者动容。是议卒得翻案。

时苏州警察局恐怕我们有什么妨碍治安的议案，所以在上午先知照青年会不准假学生联席会开会。青年会不允其请。他们下午就在青年会四周密布哨探，抄录议案。唉！赤手空拳的学生，几有洪水猛兽的样子？

翌晨上午，集会公共体育场，到二十余校，学生二三千人。旌旗招展，精神磅礴，真苏州未有的盛况！最足以钦佩的，是乐益女子中学的同学，个个精神饱满，步伐整齐，而口中却不绝的喊着“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收回司法权”、“援助上海失业工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刺人耳鼓的精短演辞。革命态度的热烈，为国为民的精神，吾人睹之，亦觉多丑。若令我邑的小姐派少奶少太，羞答答地见着人儿面红的女学生见之，不知要羞愤到怎样？无锡女同胞呀？醒醒罢！不要叫苏州同学专美于前！（记者按：无锡也有一部分女学生很热心很能干的，不可一笔抹煞。）

最堪痛恨是教会学校的同学！（我知道此次东吴大学很热心的——记者附注。）他们只有静悄悄地随着别人走着，默着口儿，一声不作响。演讲呼喊口号呢，他总一管不管！而几个捣乱家却又乘机活动，妨碍我们的公共秩序。唉！国势累卵，知识青年犹瞠瞠乃尔，夫复何言！

这天，旭日临空，熏人欲昏，青草细柳，亦憔悴欲亡！而我们男女同学都能走几十里路不稍懈怠，民气的激昂，青年的热血，中国的复兴，其赖于是！

游行已罢，愤气稍息，惟奋斗初衷，固未或忘。因是更在星期六举行募捐。起初大家依着规定的地域，后来因爱国心驱使，虚荣心的鼓励，便各自为谋，不再依着什么区界地域了。这天男女

同学神通大显，因此笑语百出，略记数节，以志惨案中努力者的趣谈。

一高同学冯君，隔夜先将全城豪富、钱庄、银楼、典当……一切较大的居户、店铺的名号、地域抄就，预备明天按图索骥去挨募。晨，先赴绅豪家，所得尚佳。后赴典当，朝奉先生仅以二枚铜元应募。冯君大怒，因出“纪念徽”索当五元，不允。益以校片，并说：“我是某校的学生，明日决来赎，不信，有校片作证。”朝奉无如之何，就拿一元应募，打发着走。

又同学李君赴某家，一女郎出应说：“我们是信耶稣的，这里僧道无缘，请你多走一家吧！”李君应说：“那么，我们非僧非道，就是与你大有缘了！”女郎面赤惊走。

二中同学五人，同在玄妙观正山门口，遇有包车过，银角一声，四人兀立路中，以竹筒强募。“有了通行证——纪念牌——才得过去！”

其余，像东吴同学的追马车，乐益同学的守票门，某校同学的捐浴堂、妓院、茶楼、戏园，俱能不相侵犯，各出心裁。

星期日开罐，结果，俱能不相上下，殆亦由争胜斗奇之奏效欤？

游行已过，募捐亦罢，若令冷血如邑人，亦可稍稍休矣！而苏州同学，殊不稍懈，更努力联合工商军警诸界，同作示威游行，于星期日——募捐的来朝——游行。这次精神的磅礴，民气的激愤，更甚于则〔前〕次。一路军乐前导，步伐整齐，更停止口号的呼唱，以示表哀感！惟国民党同志，仍积极呼唱口号，以警昏愤！

是役，余因病困，未能再行参加，病卧床席，适天侠^⑤来访，惟时我已扶病往青年会，处理联合会一切开罐事宜，因遂参商，约

我下午往访，惟下午因青年会开罐事，未能如愿，晚方能往访。而天公不谅，雨如盆泼，混身上下，几如落汤之鸡，幸友石君，^⑥解〔解〕衣衣我。唉！青年热血的大侠魂精神，^⑦不图于此惨风苦雨之夜，湫隘昏暗之室中见之。

天侠力以旋里劝，余以苏务剧繁，遽难松手，未可。回校后病虽稍痊，而脑病益侵，同志均以暂回静养为劝。均谓救国非一时一日之事，而身体乃异日立功建业之母，不必以一时的刺激，而斲丧比重大的躯体。劝者谆谆，盛情密意，不能固却，遂束装旋里。

唉！“前仆后继，有望君等”。这不是一位烈士对着新闻记者的临终悲音么！唉！我为着区区微恙，竟抛下了重大的工作而回来。唉！愧惭……愧惭……

上海惨杀之最后决胜点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满球风雨，举国若狂的五卅案，这几天从我们方面看已经日趋和缓，而洋大人方面却是愈演愈激！

本来中国人的运动多少总是带着些爆发性的。受着一鞭或吃着一记之后，就没命的跑着几步，等到痛性一过伤痕仍然的时候，他已经忘掉他的创痛，依然是怠惰昏糊。所以，“打磨的驴子”，真是中国人的写真，而五卅案又是一切运动的缩影。

五分钟了，中国人也自然好息息了！“死几个后生小子算得什么！亡过把国家又算得什么？我们不是一样好穿衣吃饭生小孩子的吗？”“唉！朋友啊！”不要太热心了！这种冷血者的声浪，不是天天触我们的耳鼓的吗？

自然，若不是为了这民族存亡的运动，不是为了不愿为英奴的运动，不是为了不肯和印度人拜把子的运动，我们自然也安安逸逸去睡弹簧床上，坐着福特汽车，吃厌了鱼翅燕窝去吃西餐大菜去了！不过这已经是到了民族存亡的关键，主奴分辨的枢纽，不应我们不来过问。

许多老先生们还说：这不是玩玩的，不然，至多只是白死脱几条性命，现在给你们一闹或者倒要招亡国灭种之祸了。洋人好惹的吧！八国联军你们忘掉了吗？

先生们！你们的话是不差！不过你们太昧于事势罢了！我来对你说了罢！只要我们朝野上下同心协力的向外，一致抱着与国

共存亡的决心，任凭你天也不怕，何恐区区一两个外国赤佬英日呢？你若不信，我来给你几个证据：土耳其大家知道是一个近东病夫国，但是在基玛尔打败了英国保护国希腊之后，若说把〔按〕国势兵力而论，土耳其决非英国之敌，但是英国因为它各殖民地岌岌可危，就不敢和土耳其计较，让它封民会，逐学校，这是个铁一般的证据。我们要晓得英国其实也只是一只纸老虎罢了！它若一有什么举动，它的殖民地便会纷起扰乱。就是日本它也决计不敢和我们真的交战，它外有强敌——美国，内里又是革命之机四伏，一触即发。并且真正若是列强要来再演一次八国联军，也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了。因为各国的无产阶级和智识领袖都是十二分的同情于这次惨案。像俄法两国的慰问，英工党的赈济，英议员的质问，日本工人的捐输等种种表示。若说真要有战争爆发的时候，各国的阶级革命也因之爆发，各国的政府，将因之而倒。所以各国的情形是有一种同一的样子：就是“兔子不吃人，形状难看”而已！实在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只要我们自己努力自己不懈，最后胜利可操左券。若再五分钟热度，那么真正要陷于万劫不磨之域！

朋友们！记着吧！“吾耻未雪，吾民何日能忘。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什么是锡社主义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

“什么是锡社^⑧主义?”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锡社发起之初，并没有拿什么主义来号召；而现在社员中更没有像克鲁泡特金先生，或孙中山先生一般的人物，能够自己创造一个无政府主义，或三民主义，来引导我们。所以要我们立即回答什么是锡社的主义，是件难事。

那么锡社是没有什么主义的了，却又不然，因为一个团体，必定要有一定的主义，有了一定的主义，然后他的活动，才能有精神、有意识、有能力、有团结。若是没有主义的团体，那真叫做狐群狗党，那真违反团体的精神。因之，我们可以晓得锡社一定有个主义，不过这个主义只是神秘的、幽密的、印在社员的心上，社员们正在奉之不渝。不过你要问到什么是锡社的主义时，他却难立刻明明晰晰告诉你。正似一个诗人，在初春之晨，万籁静寂中，捉到了他的一种幽谧静秘的诗思一样，他自己很明白他自己的心灵之感，但是你一定要叫他写出来，却是不能的。

不过我们已经要在社会上立足，要向恶势力猛攻，我们岂可以不先把我们自己的旗帜鲜明地举耀起来呢？所以我们要把锡社是有一种怎样的主义，来明白地宣布给一切在我们联合战线或反对战线上的人们。

什么是锡社的主义，上面已经说过，这个主义是深印在每个社员的心上而恪守不渝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锡社社员的一

举一动，都是为主义而举动；一言一语，都是为主义而言语。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全社同志的言行，归纳起来，我们就可以晓得什么是锡社的主义了！

据我的观察，锡社的主义是：

一、扶弱锄强的主义。

二、除旧布新的主义。

前者可称侠魂主义，后者可称革新主义，总是两者合而名之，可谓锡社主义。

锡社的主义是什么，我们已经明白了。那让我们回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就是那深印在社员心弦上的主义？我们只要好好的观察一下，就可以晓得我的观察，没有误差。

试把《无锡评论》打开一看，第七期是“小学教员特号”，第九期是“妇女问题特号”，第十期是“市政特号”，第十一期是“工商界青年特号”，一年之内统共出了四个特号，而三个呢，却都是唤醒被压迫阶级的——小学教员、妇女、工商界青年——在每个特刊头上，“我们为什么要出这个特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被压迫阶级有一种怎样热烈的同情，而对于该阶级自己的昏糊（懵）懂，又怎样的可惜伤心？而在每一篇一段里，我都能够看得出他们对于被压迫阶级的唤醒和指导，是怎样热心，怎样的竭力？他如开办平民学校，鼓吹平民教育等等，我们已经可以明白他们对于弱者怎样的同情？扶弱的精神怎样地充满？我们试再回过来看他们对于侵掠压迫的强者，是怎样的厌恶？我们要明白这层，我们只要先看他对于侵掠民众利益，压迫民众言论的绅士，抱怎样的态度？《无锡评论》第二期祖宏君^⑨有一篇《无锡的绅士问题》，在这篇里列举了无锡绅士的十大罪状，这是锡社讨伐绅士的第一声。接着《无锡评论》第六期上有启周的《绅士与军阀》，

他说：

“……我们中国有了这许多军阀，弄得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地方上有了这许多绅士老爷，弄得七零八落，鸡犬不宁！军阀把丘八枪炮，当作武器，去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劫掠人民的生命财产；绅士以势利去做武器，去敲剥人民的脂膏，掠夺人民的幸福。他们以不同的武器，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方法，做同样的事业，结果同是祸国害民，所以我说绅士与军阀是同一性质的。”

又说：“中国现在有不少的社和会，研究怎样振兴实业，怎样振兴教育，但是军阀没有除掉，实业和教育便永远不能振兴。地方上有许多社和会，什么农会呀！卫生会呀！什么研究所呀！什么协会呀！倘使绅士的势力不打破，什么都做不成，所以我说救国运动，以‘驱除军阀为第一步’！改革地方，振兴各种事业，以‘驱除恶绅为第一步’！要吃饭，须除去了喉中的骨梗〔鲠〕方才可以狼吞虎咽，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所以他最后说：“——做了中国人，军阀是我们的公敌；做了无锡人，恶绅是我们的公敌。公敌是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的，请诸位仔细想想吧！”

在这里我们不是可以明明白白的知道他们已经向恶绅下了动员令了么？这不是明白地檄告天下说：绅阀与军阀是有一样罪恶的，我们应该共伸义愤，同时讨伐，我们应该双管齐下，不应该顾此失彼。而在《锡声》上剑平君接一连二的《论斩竹头》、《再论斩竹头》等篇，及在《锡钟》上我有一节《绅阀与军阀》，在那里我更明白地告诉大家，绅士的罪恶，过于军阀，若没有绅士这样甘心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军阀决计没有这般猖獗。所以我以为我们要想打倒军阀，必须打倒绅阀。在上面这许多文字里，我们已经足够去证明锡社对于侵略压迫阶级的绅士，是怎样的厌恶

和声讨的激昂了！

总上两者——扶弱、锄强——我们已经明白，侠魂主义是一向深印在社员心目中的。他如《无锡评论》第三期王启周君的评张桐：“……号称进步之无锡，竟日陷于臭气熏蒸、暗无天日之愁云毒雾中，吾安得不为无锡人抑郁而长叹耶？恨无除奸锄暴之剑侠者流，歼此憧憧群丑，一齧割其心肝而享之耳！……而甘冒昏官污吏之恶，撻妖绅流氓之怒，与邪恶凶狠〔狠〕者相搏战而不息，彼其作为，真令人可爱，吾以是服其刚勇，而敬其为人。盖张君具侠士除奸锄暴之风，所作所事无形造福乡里不少也。”

这里赞美张桐已达极点，为《无锡评论》空前绝后的赞美，岂是张桐交好于锡社，而锡社替他捧场么？那么我们没有那么下作，没有那般无赖。这种事不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为什么赞美张桐呢？实在因为“张君具侠士除奸锄暴之风”。换句话说，就是他和我们主义切合的缘故啊！这儿已经知道行侠仗义是我们锡社社员的标则。再若十三期《无锡评论》编辑委员会的启事里：

“……磨剑以待，除恶务尽，满腔热血，一点真情。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本社敢以此自励，以此号召！”

在这个很重要的启事里，他们已经明白把“侠魂主义”的真精神指示了大家。他们以为号召，以为自励的是什么！便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但是所谓“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者，是什么东西？便是大无畏精神，侠魂主义。

说到革新主义，更不必说，这是早已深印在社员们心上。我们碰到任何一个社员问到他，他总引打倒一切无锡种种黑暗腐败的恶势力，创造光明灿烂的新无锡为己任。这种态度见之文字的有：第一次宣言——《无锡评论》一期——里面说：“……空气中混杂着陈旧之腐气，街市上满露着腐败气象，社会上含藏着奸邪

淫恶的黑幕，我们没有一刻不感到一种深刻的刺激……。”

在草创之初的锡社，已经有了对于这种腐败社会，有深恶的态度。因为在初起的时候，基础未固，所以不敢十分明目张胆地向恶势力宣战。因之他接下去仅说：“……所以组织这锡社，依着真理的精神，先办这小小月刊，以提高邑民常识，促进无锡社会生活为宗旨。对于市政、教育、工业、商业、科学与社会问题等，都有提议批评的责任。”

以后他——锡社——天天的滋长，所以他的魄力也天天的增大。你看在《无锡评论》四期吴寿彭^⑩《告无锡的青年快来合作罢！》中有：

“……古板顽固，阻碍进行的东西，正待我们去打倒；污腐恶浊的空气，正待我们去清除；平原青青，肥沃的土地，我们怎样去开发？勤朴聪明、和善诚质的国民性，我们应该怎样去启导？我们要使无锡同他的山水一样地峥嵘伟秀，同他的流泉一样的晶莹清冽，我们使无锡成为一块庄丽的净土……。”

在这儿我们已经明白看出除旧布新的革新主义，是一向有着的，并不是我在这里胡说乱道。试看寿彭君说：“古板顽固……去清除。”这不是除旧么？“开发土地，启导民智，创造光明灿烂的新无锡，使他同惠山一样清秀，惠泉一样甘冽。”这不是布新么！如在羽毛稍丰的今年，我们的宣言说：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主张，把我们所有的真情，所有的热血，来打破这种‘陈腐残败’的现状，挽回我‘已失的光荣’，恢复我‘已死的人心’……。”

这里他已经从一年来的经历中，明白了与社会妥协，与社会苟安，是不对的。他们觉悟他们对于社会上，仅有讨论批评之不够，进而为打破和攻击了。余如本社宗旨里“提高邑民常识，促

进无锡社会生活”等，均可明白革新主义是锡社极早就存在着的。

依着上面的种种，我们已经明白了，锡社的主义的确是：

“扶弱锄强”的“侠魂”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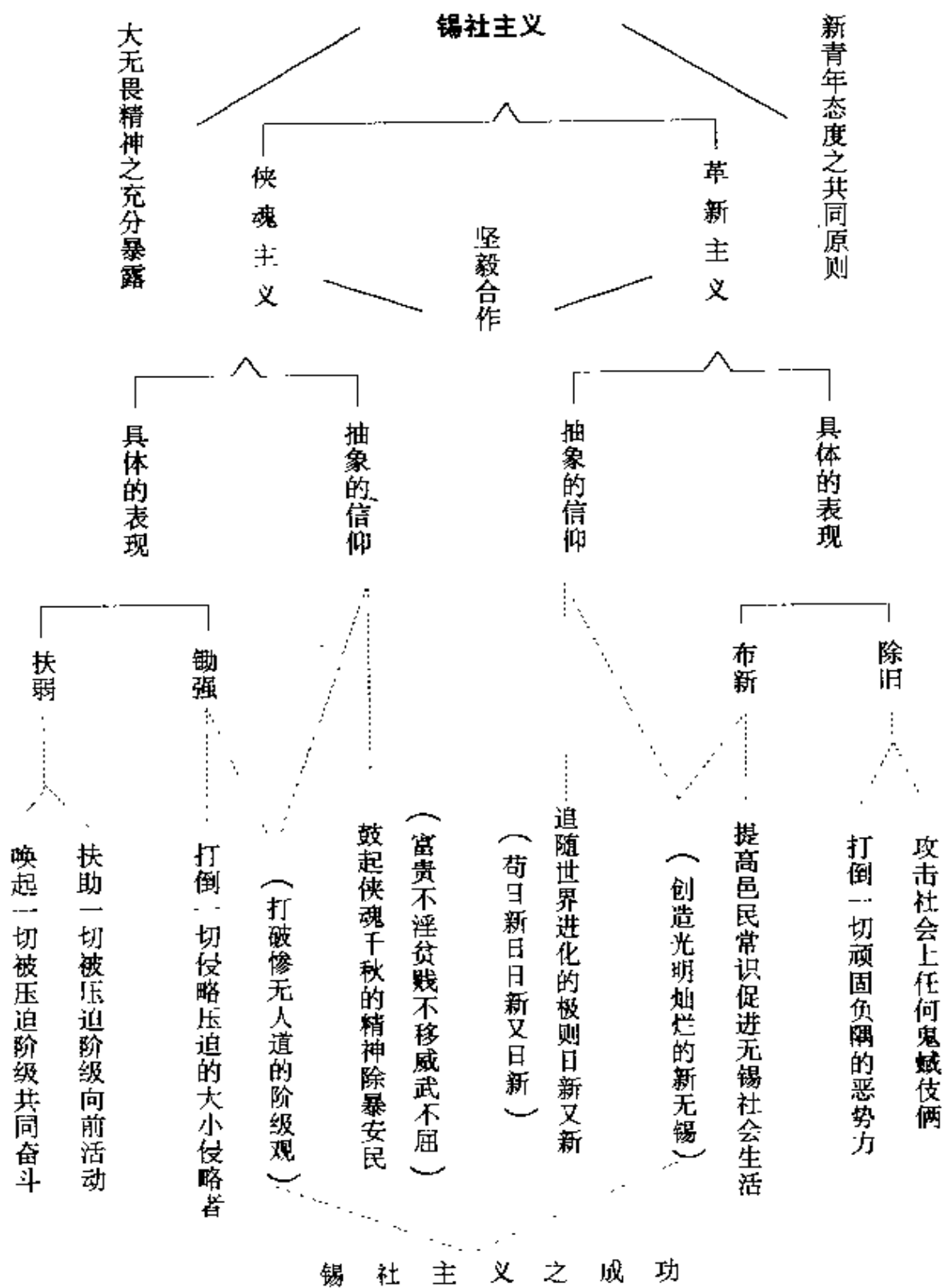
“除旧布新”的“革新”主义。

我的芜杂的文字也可以完了，不过在终了以前，我还有几节重要文字请大家一读：

“……锡社不怕危险，不怕劳苦，不怕威权，不怕任何困难；锡社不被威迫，不为利诱，不尚权利，不讲情面，不染私心，不因称誉而自满，不因攻击而自馁，凡是良心上觉得是的，都应当大刀阔斧的很很〔狠狠〕干去……。”——见《无锡评论》第八期《锡社的解剖》。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一步工作是：

“抱着一腔沸腾的热血，一种严肃的态度，一副公正尖锐的眼光，以及坦白的胸怀，来批评一切社会上的鬼蜮伎俩：‘顽固的头脑，污浊的舆论，离奇的形态，万恶的行为。’我们不知势与利，我们亦不怕势与利，我们不怕摧残，我们亦不怕牺牲，我们只知要把沸腾着的热血，一洗那‘陈腐残破’的陈迹……。”——我们的宣言。

下面便是锡社主义解剖的一张表：



（附白）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没有主义的不当。但是我很相信我们决计不会没有主义的，或者我们的主义隐而不显罢了！因此我很留心地读我们的刊物，我说觉得我的推测没有差误，忽然近来在一个朋友的通信里说要我做〔作〕篇《什么是锡社主义》，我便很乐意的承认了。把计划之中锡社的主义，从我们的刊物中考证出来，表解出来，再把他的精义及与社的前途申述一下，但草未及半，忽患咯血，因之文亦停顿。近者评论付印在即，病亦稍痊，因于百忙中草之，惟所作仅止于前项。精义及社务前途均未能涉及，亦缘于病务为累之故。所有后两项，异日更当草《锡社主义的精义》及《锡社主义与锡社》等以补足之！不过则民是曾受过主义洗礼的人，所见所录，不无偏过之处，若社内外同志有所指正或摘责处，我都十分乐意地同他讨论。

论军事教育

——军事教育非不可有，惟须有主义的训练

(一九二五年七月)

(上)

在这普遍而热烈的救国运动中，这是追随而发生着的一个重大问题。现在固无论一个热血的青年了，即使一个顽固陈腐的中学校校长和一二个在野军人，都急急的提倡着军事教育，以为除了消极的经济绝交外，这是救国的唯一良丹灵方。

我们不反对国民自卫，我们更五体投地的崇拜着国民有自卫之觉悟；我们不反对学生救国，我们更十二分的赞成学生能起来武装救国。但是先生们！请你不要忘掉了事实，而专尚空论。在你手舞足蹈，祭起你唯一的法宝时，你试回溯着过去的历史，你这件法宝是否成功。

“观古以知今”，由历史的事实可以推测将来之结果。请你在手足舞蹈得意忘形的当儿，请你翻翻已往事实：在民四之时，我晓得也有救国军、雪耻军的组织。但是现在所谓那时的救国军队员、雪耻军军人都到哪里去了，我看他们都捐枪去了！可惜捐的不是毛瑟枪，而是鸦片枪罢了！所以为一时的刺激的反动而发生的运动，无论依物理学的定律，生理学上的反射作用，及事实上的证明，都足以明白只是一时的冲动，而不能持之以久。若说靠一时冲动的组合，而足以保卫国民，达国民自卫的目的，我可以武断说是一种梦想！

老实讲：军营生活，不是好过的，不要说饱食暖衣的少年公子难耐，就是比较肯牺牲甘吃苦的学生也恐不能耐。兵士的所以这般起早起，上兵操，吃军棍，尝藤条，老老实实说，是为“四两二”，或“六块头”。换句话说：是“生活问题”压迫他，而愿意“饮鸩止渴”，“苟延残喘”。他明知上战场要送命的，明知军士生活是十二分困苦的非人生活！所以当朱熙^①在苏州办兵士工场时，凡自〔士〕兵能学得一技之长的，没有一个不告退行伍，这可知兵士之所以愿为兵士者，实在是为了“生计问题”的缘故。所以反而言之，没有生计压迫的一般当前的学生，要因着受一时刺激便能奋然而起，为国为民，保卫地方，达国民自卫之目的，恐亦梦想！

并且国人近来之提倡体育者亦日急矣！如蔡元培先生等，均以为学校中须加倍注重军事教育，但是现在的情形怎样？兵操成了睡觉钟点，上操只是应到点名的功课！还谈什么军事教育，做公子少爷要紧！先生们——热心行军事教育运动的先生们，请你们不要高谈空论，也请注意到这不可掩蔽的事实；若说因为南京路一些的血腥就会把我们学生的公子梦打倒，会使我们学生界彻底的改造能够甘于茹辛含苦的操练去达至国民自卫之目的者恐亦梦想！

余则军事教育之实施，必先有意想的敌人，则今日的敌人是谁？或曰英日，吾人试自测，以吾人不熟练之学生，而与英日数十年精练的海陆军较（量），熟〔孰〕胜熟〔孰〕负，固不待智者而知。若曰以保卫地方为目的，则学生时代之学生，是否可有此能力？保卫地方之重负，不付之于年富力壮之人民，而付之于此求学时代之学生，亦理无此理，情无此情。

且也少年时代，血气方刚，军械在手，难保不生事故。平日

之间既已具丘九之美名，则已有武器，或不难驾丘八而上之。况少年经历未富，主意不坚，容易受人利用，被人蒙蔽，或则助帝国主义者扑杀我革命势力，或则受野心者鼓动作乱犯上，此层亦足鳃鳃。

虽然，论断至此，读者将以为吾意谓军事教育不必或不可提倡于今日，其实非也。吾意实谓军事教育之提倡于今日，实为必要，而“急须国民自卫”之标语，断无可以反对之可能，但是要提倡军事教育，达国民自卫之目的，非将上论诸困难，驱除尽绝不可！

(下)

语云：“解铃还仗系铃人”，欲解除上述之困难，吾人必须先将上述困难之原因，寻出而推求其果。

总结上述诸困难而归纳其原因有三：一、一时之冲动不能持久，二、军事教育无准确之目的，三、青年轻浮恐受利用。但吾人进而问这三原因：一、是否即足以阻碍军事教育之前程？二、是否可有方法以补救之？三、补救的方法是什么？

上述三问题，如能将第三问题解决，则第一第二两问题自能迎刃而解。所以我说要有主义的训练，则军事教育可以达其国民自卫之目的，而解决上述的种种困难，种种阻碍。进而问：一、何以主义的训练便可以解决种种困难与阻碍？二、有了主义训练以后，是否不会有其他困难发生？欲回答以上两项问题，必须先要明白一、什么是主义？二、怎样叫主义的训练？

先说什么叫做主义，“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这是孙中山先生

对于主义的定理。我想大致不差的，便借来一用。

次说什么叫做主义的训练？主义训练就是把主义灌输到一般人的脑子里，使他们信仰主义，因着信仰而努力，由努力而达成功。

已经明白了主义和主义训练，我们就可以回答上而的两个问题：何以主义的训练可以解决上述的诸困难，此层可分三段答：一、因一时的冲动恐难恃〔持〕久，那么我们解决这层，只要如何把冲动改为运动、改为信仰，那么一定可以恃〔持〕久了。那么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所信仰的主义，时时在鞭策他叫他向前去！那么愁一时的冲动而不能恃〔持〕久的困难当然没有了。二、因军事教育无准确之目的，如果我们有了主义，那么我们军事教育是为主义而奋斗的军事教育，又何愁乎军事教育之无目的。三、青年轻浮恐受利用，这层亦不必过虑了，因为青年之所以易受人家利用者，就是为了青年的意志不坚，耳根太软。但是有主义训练的人却不然，他有了坚定的信仰，他只有为自己作战而死，决不会受甘言蜜语之迷惑，除非他的信仰不是真真的信仰。

答辩到此，我们可以明白，主义的训练可解决现在所有种种困难。至若问主义训练有无其他困难发生，这时我虽不能断定，但敢说一声“无”。

以上主义主义的说了不少，到底是什么主义呢？这个问题我却不能回答，因为我受主义洗礼的人说了出来，未免像牧师布道店伙叫卖一样地索然寡趣。还不如留给大家去体味，比较而定其信仰吧！所以我最末的结论是军事教育非不可有，惟须有主义的训练。

爱国与互爱*

(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

“爱国而出于抵制仇货，则诚是丁慕韩君^②之言，已属可怜。”这是麴庵君在七月十五日邑评^③中的话。的确，我们不能积极从事于收回海关权，以操纵外人商品之出入，而匍伏于外人奴隶关税之下，只得高唱抵制仇货以为爱国，固属可怜，但在这种“次殖民地”的状态之中，我们要求稍稍的使外人受创，使自己兴起，实在舍抵制仇货之外，无法可想。所以爱国而出于抵制仇货，虽属可怜，固亦没法！

可是已经经过了全国人士的敌忾同仇之心，无奈何中走上了这条末策，是否还可以任令奸商私运公卖，而致国人灰心，外夷冷笑？若此简单问题，则该提之意，亦必了然，岂料于后援会声言击毁所收没之汽水时，邑中舆论家，竟如这等评论。

“……若因抵制而有失同胞互爱之精神，于仇人货物转无所损，而不亦可怜之尤者乎……果使退还货家，收回成本，虽其办法不如击毁之痛快，然于抵制之中寓体恤商艰之意。……”

诚然，若因抵制而失同胞之互爱，是十分遗憾的事。不过爱而称“互”，必须有两面的，而不是一而的。盗入我室，劫我财物，

* 秦邦宪在声援沪案运动中为驳斥《锡报》、《邑评》非难无锡后援会和无锡县商会会长王克循对查禁英、日货物的谬论，在其主编的《无锡评论》上发表了此文。文中严正指出：“不过爱而称互，必须是两面的，而不是一面的。”“总不能拿互爱招牌来保护奸商，私运仇货。”文章发表在《无锡评论》第十七期上。

伤我父母，淫我妻女，我复恂恂然爱之，若非癫狂，宁有是理。而我想甦庵君若在缉捕获盗时，写这样一段：“……若因捕系而失同胞互爱之精神，于赃物反无所得，不亦可怜之尤者乎？……果使释放回家，收回赃物，虽其办法不及系捕之痛快，然于查缉之中，寓体恤盗贼之意……。”我想甦庵君亦必哑然失笑。但奸商与盗贼，其罪恶如何？我想甦庵先生一定说：“奸商非盗贼比也！盗入我室，劫我财物，淫我妻女，伤我父母，固罪不容诛，非重创之不足以为惩；而奸商者，仅私运货物，不损于你，无害于我，亦何必过于为难？”呜呼！若真作若是想，则其人非狂即癫。何则？我们试读亡国史里面流离颠沛的情形，较遇盗劫，还不知高出几千万倍。吾人遇盗，财物之劫，父母之伤，妻女之淫，自身之苦，仅受创于一二入之手；若为亡国奴后，则吾之财产，将供几千万人之自由运用，吾之妻女，将供几千万人之自由取乐！或有嫌吾言太过者，请读越南亡国史，黑奴篱〔吁〕天录，韩国痛史……当自知言之非虚也。是奸商盗贼，其罪恶之分如何？且盗贼之劫，仅劫我一人的财物，而奸商之卖，且卖我四万〔万〕同胞的财产。其间轻重大小，为如何也？若我狃于互爱，而不痛惩之，则利害的关系是怎样？而这般冷血为怀，金钱唯视的奸商，岂复足爱？耶稣博爱，墨子兼爱，释迦普爱，〈若〉是用在这里，我等为之掷笔！

至于说到体恤商艰之意，后援会亦未尝不有。因为汽水赎回已有四十八时，复有四十八小时的宽限，八折〔折〕原价取赎，其中已有体恤之意，早备受上海方面之责难，何图张某一请援于商会，复请援于邑绅，其藐视爱国团体，趋奉绅士之态，已须眉毕露，不须体恤，强与为难之状，又复路人皆知。后援会若不维持议案，将何颜立于无锡？

除却感情，再谈理性。若王蒋诸君^④所提出办法较后援会办法

为优，则后援会自当俯受长者之教，而全体恤民艰之意。惟蒋王诸君之办法，流弊万千，何以言之？若令无价收回，退归货主，表面似属公允，实则抵制之举，将成泡影。何则？奸商之心，八窍俱通，若云查得后，至多只是无条件退回，而偷漏后，则利益万千，何乐而不为？而吾人所持末策，所为可怜的爱国的运动者，亦将成效毫无。而外人货物反足畅销〔销〕内地。此种举动，若谓：“商民受惠之余，必能感激，则于其他爱国运动，必能多得商界之同情……”则不知何所见而云然？若真照王蒋诸君——即甦庵先生斤斤希望的办法而行，则后援会实可早日取消，勿徒戴“瘟生”衔而自耀于人啊！

总之，虽然我们对于后援会的处置汽水，也属万分不满，但甦庵君，总不能拿互爱招牌来保蔽〔包庇〕奸商，私运仇货。

我们平日看甦庵先生的评论，在邑中报界亦算得强差人意之作，何图今日竟昏糊至此，此中情由，竟属何故？呜呼！吾不欲言！

一九二五年的王敬轩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本来在这种反动的状况之中：自诩为爱国的绅士，竟会保蔽〔包庇〕奸商摧残救国团体；邑中舆论欲求举辕附辙的贤长官，竟会屈尊亲访上贩^①；城隍庙里的念佛婆婆，同善社里修道先生，一天天地增多；亦何怪乎一九二五年的王敬轩^②，会出现于无锡，而令王敬轩、林琴南、曹慕管等大叹其吾道不孤！

在今日而还倡言反对新文化，其人非狂即癡，一二声奇怪言论徒表示其个人常识的缺乏，思想的幼稚而已，决无丝毫损于新文化，亦不必吾人再费精神，和此辈狂癡的痴人来剖白。不过已处在这反动的局面之中，要求正在新生的萌芽，不给任何反动势力所摧残，故我们对于反动势力，实有扑灭之必要，而使这般狂癡之徒，不再胡喊于无锡，勿再灾及枣梨！

当二十七日晨，我读得杨怀英君的妙文，我不知是愤怒还是快乐？不知是流泪还是鼓掌？不知是痛哭还（是）狂笑？真所谓“甜酸苦辣一齐下，莫辨是何种滋味！”徒令我毛骨悚然，觉得墓碣山凹里的来客，居然能握笔为文，捣乱吾邑的思想界而重苦于民！陡觉我们两肩重量顿加，因在文化秀明的无锡竟容这行尸走肉之徒，肆其胡喊，实觉吾人的责任尚重，而我们所定少批评多建议的目标实难实现！

呜呼，诸君试读下文其感想为何如？“嗟乎，老古董式之文学，有吾国数千年之国粹，而藉以生存于世界之上者也！”再与吴稚晖

先生^①的《国故毒》中所说：“国故这臭东西，是与缠小脚吃雅〔鸦〕片，相依为命的！”——原文不在大约如是一——那么吾国古国之藉以生存于世界上者因为缠小脚吃雅〔鸦〕片之国故，羞乎否乎？以数千年遗下的古玩——即缠小脚吃雅〔鸦〕片相依为命的国故，而自眩于人说：“这是我们藉以生存于世界之上者也”，其脸上的荣光，想必光茫〔芒〕万丈！处此二十世纪之时代而不知势〔努〕力求世界的智识以求自存世界，而抱残守缺，以牛粪作金山者流，谥之曰高等游民——见四号《参观刺绣展览会纪》中之自道——尚属忠厚，直称之为井底之蛙可矣！

至若“国民苟无此新珍宝之文字，而研究老古董或古董式治齐修平之道，则辛亥革命之后正可蒸蒸日上，是万不致今日之屡受人欺，屡受人辱，一至于斯也。”这几句妙文，真令人读之，欲哭无泪。杨先生反昏愤一至于此，怎不令吾人戴模范县头衔之国民置身无地？他固不必论，虽论亦徒对牛弹琴，且论辛亥革命以前固未有此倒霉蛋的新文化，而吾国的纸老虎是否未曾戳破？大清国圣朝皇上圣明，大约只是四夷来朝，八蛮臣伏，朝鲜昌海，蹶角受化，英法德日，解辨〔辨〕清〔请〕职罢！上林未熟清史不知其详，仅见：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二——雅〔鸦〕片之战大败，于八月二十九日结江宁条约：一、赔款二千一百万元，二、割香港开五口，三、创协定关税之恶例。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对俄璦琿条约签定：失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河以东之地。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对英法北京条约签定：一、赔款英一千二百万两，法六百万两。二、割九龙于英。三、创领事裁判权之恶例。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对法越南条约签定：越南于是丧失。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中日战败马关条约签定：一、割台湾

琉球，二、赔军费二百三十兆两，三、航路权丧失殆尽。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八国联军辛丑和约成：一、赔款四百五十兆万〔两〕，二、拆毁炮台，三、使馆划归外兵保护。

凡此犖犖大者，其屡受人欺，屡受人辱，较之自有新文化以后如何？此时固无此倒霉蛋的新文化，此时之国民，固属日究其治齐修平之道者，其屡受人欺，屡受人侮也如此！则杨先生所云：“国民苟无此新珍宝之文字，而研究老古董或古董式之治齐修平之道，则辛亥革命之后，正可蒸蒸日上，万不致今日之屡受人欺，屡受人辱，一至于斯也。”不将适得其反而成：“国民苟无此新珍宝之文字，而研究老古董或古董式之治齐修平之道，则宣统皇上就朝以后——盖辛亥若有革命，则文化革命必随之以来，无可避免，故如是云云——必可江河日下，将大好河山奉送于帝国主义者（懂么）矣。”

我们深信不疑新文化，是救国的良药，若没有新文化，吾人今日能免披发左衽之祸者几希。此中明例只要拿庚子拳乱和五卅^⑩相较可知，没有新文化时之混乱及今日之循轨可知，至若：

“吾国清季，变八股文为散文，此是士子之觉悟，酿成辛亥革命之变，此正如齐一变至于鲁，不谓鲁一变而至于道，而道犹不如齐也。”那杨君的眷念故国，迷恋八股之情，亦已昭然若揭。我想去年御驾蒙尘出京，杨先生没有去伏阙上书，条陈重兴科举，再用八股，实在先生终天之恨罢！我正〔真〕不料有在大中华民国做了十四年主人（？）而犹以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而道犹不如齐也。”去怪那革命头脑，孙汶〔文〕那个“贼”，而以为让孙汶〔文〕那个“贼”的革命胡闹，实在是八股废掉之祸！因此为大清帝国皇上圣明，大哭其失策的！呜呼！是人耶否耶？或谓杨君作恕辞说：“杨某作此语，实因今日军阀政客，互相勾结，

水旱风火，屡见迭出，因此回首前清，觉民主尚能稍安，故作此怪语，然其辞虽拙，其意良苦。”实则亦属一知半解，盖有杨君般的主人翁，放弃主权在先，而后军阀政客能互相勾结，以苦我们小民，而后杨君再因世风日下，国是日非，而生其眷怀古国之情，此互为因果的啊。故民国十四年之祸乱^⑨相乘，永无宁岁，实可谓由这般“口吃南朝饭，心向北边人”的杨先生辈造成之。至于“长此以往，苟无中流抵〔砥〕柱之人，起而挽既倒之狂澜，吾恐老古董或古董式之文字，不日将陷于天演之列……”这是实话，老实说要有作中流之抵〔砥〕柱挽已倒之狂澜的人物，也只有像杨先生一般“口吃南朝饭，心向北边人”的遗少遗老。但这狂澜可挽得住？劣败优胜，新陈代谢，固进化的公理，故古董式文学的列入天演也无容疑异。蔡元培不早说过么？“至异日之古学，列入于艺术科，与美术图画同视可也。”（见蔡元培对女师大学生之演说，原文已忘，惟大约如是。）至于“……而国家之孱弱，外人之凌辱正不知伊于胡底也。”这真是杞人忧天。至论新文化足以亡国，前论早详不述。总之，杨怀英先生，我虽未〈见〉一面，但我想象起来，一定是个头盘小辫，身穿半截熟罗长衫，足登朝靴的遗老或遗少。将来如果大清皇朝中兴之后，一定配得上谥〔溢〕一个文正公的啊！哈！哈！

读薛南溟致商会书以后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八月十三日《锡报》载邑人薛南溟先生^②投函县商会，对于后援会检查仇货，颇致不满，而函中语多疵谬，读之令人慨叹！唉！在化日光天之下，模范声闻之邑，竟有这种函件出现，真令人愧恨交并！而况出之素号绅界领袖，“齿德俱尊，威信素孚”的南溟先生呢？兹特录而评之：

兹启者：五卅一役，纷扰遍天下，工商学三界，可谓热心已极。英日对于中国宜乎甘拜下风惟命是听矣。乃我则再接再厉，彼则不见不闻，经济绝交，有效乎？无效乎？无论贤愚想可恍然悟矣！后援会不思偃〔偃〕旗息鼓，虽商人按本购来之货，乱烧乱罚，不知凭何法律而敢如此妄作妄为。今幸商民渐有省悟如今日丽新公司启事，谅贵会长亦已阅过，应请于各业开大会时将后援会何人付与销毁惩罚之权，详细研究。一面备文请示官厅，依法遵行俾免突冲扰乱。地方幸甚！鄙人为此非不爱国也。实不敢祸国耳！诸希鉴原为荷！——见八月十三日《锡报》。

读此可以明白南溟先生这封信中有三个要点：

- 一、经济绝交，有效乎？无效乎？
- 二、后援会扣留仇货是否有法律根据？
- 三、后援会处置仇货之权是何人付与？今当一一论之。

二

在这封信里第一个是：“经济绝交，有效乎？无效乎？”的问题，的确——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若是无效，当然后援会可以偃旗息鼓，以免徒扰地方无利交涉。据南溟先生的观察是：

“……工商学三界，可为〔谓〕热心已极，英日对中国宜乎甘拜下风矣。乃我则再接再厉，彼则不见不闻，经济绝交，有效乎？无效乎？无论贤愚可以恍然悟矣……”

言下，颇有以经济绝交为庸人自扰之策，无补于交涉！但是我们试看：

- | | |
|----------|-------------------|
| 一、美国抵制英货 | 卒为美国独立运动之导源 |
| 二、中国抵制美货 | 而美国改变对华政策退回庚子赔款 |
| 三、中国抵制日货 | 而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缓进对华贸易锐减 |

除此以外“鲍爱考脱”运动国际间尚多先例，若法若比在风雨飘摇之际，而用之以抗强敌且收宏效！这些或者是年事稍远南溟先生年长易忘，那末：

- 一、《商报》载：英国货物船泊等直接损失达每日一千万元。
- 二、路透社：英工党议员麦克唐纳尔责问外长张伯伦谓：英国对华贸易已减去十分之七，外长何故仍不改对华高压政策。
- 三、七月十六日伦敦《泰晤士报》社论云：中国抵制仇货乃甚，有损于英国之工具，望英国派专员来华考察。

这几条还是我坐在家里捏造出来的，还是南溟先生未曾寓目？抑是英伦议员纷然自扰，报馆记者目光如豆，不及我们模范县的领袖耆绅来得凤鸣高冈、独具双眼？有效乎？无效乎？无论贤愚想可恍然悟矣！

三

就就南溟先生所引证的说：“工商学三界，热心已极，英日对于中国宜乎甘拜下风矣。”这里我们只要提一反证就可晓得南溟先生这个观察完全差误，就是南溟先生所津津乐引的丽新染织厂，尚复私进内外纱厂仇货，是否也可以算进“热心已极”之域的么？再如南溟先生不知算哪一界？工？学？商？还是绅（或者绅可以自成一界）？是工学商三界，那么也可以算是“热心已极”的了么？算绅界，那么绅界就可以不热心么？绅界的人物，就不是中国的人民么？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么？那么英日的不甘拜下风者，我们未“热心已极”之故！那么彼则不见不闻者，我们不再接再厉之故，而非再接再厉之罪啊！岂可以因吾人不知再接再厉的奋斗，而怪消极的抵制仇货，为无效？南溟先生不积极的鼓励邑人敌忾同仇，以同英日再接再厉的奋斗，反而欲借着法律招牌，来压制一切爱国人们的热心，是何意义？是何居心？岂真所谓领袖者皆冷血耶？

四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后援会扣留仇货，是否有法律根据？”但是则民未读法律，不敢未断，可是人云：王道不外乎人情，法律不外乎民意。再考法律者：是拿大部分人民的意见定之，而强制小部分人的遵守的啊！所以法律也随时随境而变，所以鼎革以后大清律例当然不可复用于今日之共和国中。段氏^②入京猪仔宪法遂即失效。那么处此非常之时，可以常法处理否？尚一疑问。即使可依常法处理，那么从前五四运动，扣留仇货，法庭究竟处以何种相当罪案，则民当时年稚未悉，南溟先生当时方

长市董，望赐明教！或嫌稍远，那么，五卅以后，后援会亦已妄作妄为之久矣，地方法官，奚不早自检举？此或有司之失职。但扣留仇货，本非锡邑所创，各处已有先例，岂中国六千百余县之法官，俱皆昏愎失职，而惟南溟先生洞明法理耶？即如上海戒严司令，一怒而封三团体，但于处置仇货，尚招学生代表，谈话约至两小时之久竟至相对泛滥，而未加干涉！固然扣留货物，为法律之所不容，但扣留仇货非扣留货物之可比，此事真如杀人固属法律所不容，而枪毙盗犯，即系奉公守法！况处此非常之局，亦非绝对的可以法律绳之啊！寄语，欲以法网森严，摧残爱国运动者，可以休矣。

且也，后援会爱国团体也，在爱国者的心目中，变出非常激于义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岂惧区区縲绁囹圄哉！故玛至尼的撞自由钟，华盛顿的谋独立，孙中山的倡共和，蔡松坡的讨袁逆，岂具挟法律而行！唉！法律，法律，徒为一二冷血领袖压迫爱国志士的法宝罢了！

五

明乎此两者：经济绝交为弱国外交惟一利器；扣留仇货正所以济法律之穷。那么当日丽新公司的启事，是否可以算商人的省悟？可以不复再劳笔墨矣。

至于第三问题，“后援会处置仇货之权是何人付与”一问题，这问题更是孩提之童亦均了然。就是说，后援会所有处置仇货之权，是全国人民所付与的，因为经济绝交，为全国民众所共同决定的政策。（冷血奸商自然不得共国民为伍）但是难保不无一二冷血奸商，从中私运公卖，而民众处理此事，当然要有一种机关，这机关就是各省、各县的后援会。所以若此简单问题，还要兴师动

众，请商会开会讨论，真可谓老成持重不厌求详矣——至商会讨论之结果，我们现在虽难知道，（因为会长先生亦所谓与南溟先生是沆瀣一气的）但是公正商人是一定照这样说的，假如不信，我给证据与你，本邑洋广货业当家声明说：

“永不再进仇货，惟难保无一二小人，务兹蝇头小利，所以本业亦组织调查员，四出调查，如本业调查所获，可由本业自己处理，若贵会如有查获，则凭贵会秉公办理。”

“凭贵会秉公办理”之语，那处置仇货之权，不是商人亦付与后援会的一个确据么？若一方备文请示官厅等文章，做来吓吓乡老欺欺顽佃尚恐有用，至若要用他摧残爱国运动，恐属徒劳心计于事无补！至爱国乎，祸国乎，明人自眼能办〔辨〕之。

六

上列三点已属明了，那么南溟先生的原函毫无理由，乃竟广登邑报，令吾骇而且怪。至其措词的顽强，语气的恫吓，与思想的腐败，简直令吾人置身无地羞见邻邑！吾今直言以正告之：

“先生年已耄耋，闭户有时，对于世界大势，国家现状，想已不能了熟了，更何必出头强干，以为宵小所利用？何不邀游山水，杜门谢客，赋诗把酒，以娱暮年，何必再行粉墨登场，供人傀儡，徒贻万世之羞，蒙众人之诮？别矣先生，好自为之！”

七

我们对于南溟先生的说话，大概已经完了。不过我对于代表全邑舆论的《锡报》也有一种商榷，因为头脑陈腐的老绅士或可闭目妄言，强辞夺理，报纸则断难推波助澜，指鹿为马。那么什么贸易自由，什么呈请省署，都是助桀为虐，为虎作伥之语。关

于其他种种不复再说，仅与《锡报》记者再一辨贸易自由。贸易自由，是一种承平时候的普通原则，待到危急存亡之秋，是否再可有贸易自由？这只要在两国宣战状况可知！何况我国现处何种地位？所持何种政策？岂可再借贸易自由以逞奸商欲壑。若说奸商私运仇货，可称贸易自由，那么国贼卖国，可称卖国自由；盗贼掠夺，可称与取自由。天下宁有是理？

嗟夫！《锡报》记者，前曾以爱国头衔，摧残爱国运动；今又以贸易自由，助人张目。吾不知是何居心？寄语《锡报》记者，勿再推波助澜，供人傀儡，厉引帝国主义者张目，致蹈《时事新报》的覆辙啊！

选举活剧中邑中舆论界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

一

我早以〔已〕在评论上说过：这种御用半片头的猪仔式的国民会议，要想用以解决国是，为孙中山先生所提倡国民会议一样，简直是梦想。而那一次只希望我们翘着大拇指，自诩如共和国第一代主人的，不要因为争军阀、官僚、帝国主义者的余沥，而想斗法，使轿夫价格……等美名，再喧传于“模范的主人”^②之口。可是可怜呵！仅仅这样最小限度的希望，还不能达到！共和国第一任模范主人竟为了这军阀、帝国主义者的“肉骨头”，而打架斗法，五光十色，清〔淆〕乱心目！呜呼！十四年来长生不灭的第一任国会，卖国拍卖所的安福议员，并此“国民”二字的国民会议，可以同传万世，流芳千载了！

也许是我幼稚，我总弄不懂这种“骨肉头的轿夫”有甚意味。据邑报所载这项竞争者，竟有什么吴侍梅、华子唯等许多热心家，在那里你抢我夺，然临场还加入了一个薛望曾买票、请客，乡城仆仆，好像像煞有件〔介〕事！这是为了什么啊！

二

这次的事，据我的意思，可由于吾友耕庸的文中看得：“我记得幼时，常看见一班顽皮的小孩子，时时大家邀集了邻家的小同伴等，在屋傍垃圾堆中的尿缸上，居中坐了，叫些小些、贫些的、

笨些的小孩子两旁站立着，而自己却手舞足蹈地大唱其‘威皇家，坐尿缸’的哼哼调……”（参阅本期耕庸君的《无锡这次的初选》）这“坐尿缸”式拿以作这次的选举观，恰是适中鹄的，而到底年龄大些“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不当如是耶”的观念多些，所以这“尿缸”却不是安安稳稳；无风无浪的可以“坐”得着的了！必要费一番手段，用一番心机，才“坐”得上这只“尿缸”！所以这次请客、买票、派监察员——监察写手不写别家主顾——的种种形形色色，都不过“抢尿缸”所用的“常套老戏法”而已！

同样，所谓这次污声四播中的邑中舆论，也不过是一两个较大的孩子们所发出的鄙夷声浪；或者几个老辈走过骂的“该死，该死”声；再不然，就是同伴的孩子，看见抢得着的，阴险刻毒而骂的“可恶混张〔帐〕”声！

三

话虽这么说，这次本邑的评论家，比较的还算有些新气。如相君的《做鬼戏》：“……选举事业之为绅阀包办，已为不可讳之事实。此次选举，明目张胆，开绅阀会议决定之可矣，乃必闹分区与不分区焉！杂报选民总数焉！印刷选举票焉！定期选举焉！定期开票，纷纭扰攘，起如评（许）无谓之忙头，果何故欤？最可笑者，开票结果，往往数万选民，心心相印，同选一人。而其人又为大多数选民所不相请〔识〕，且并其名而未之前闻者！最苦恼者，十数写票人枯坐凳上俯首疾书，历数小时而不辍！呜呼！做鬼戏！”（《无锡新闻》九月十三日）这段真说得痛快之至。呜呼！抢尿缸，做鬼戏之选举；呜呼！肉骨头猪仔之“国民”会议；呜呼国民！

四

余如含茹君在《神秘的选举》中说：“……投票不算数，居然认得素未谋面的初选当选人，居然会把初选当选人的姓名一笔不错的写出来，不是仙人做不到。昨日之曰，各市乡又循例演了出诸仙阵。一班仙人，一个个的抬出几个初选当人选来，不是具有指挥仙人的魔力者做不到，记者对于这种现象，无以名之，名曰神秘的选举。”（《新无锡》）又如雷君的《呜呼今日之遵〔选〕举》中：“……他日厕身议席，俨然代表民意，实则国民自国民，代表自代表，其间盖截然而概也！呜呼，此所谓今日之选举，此所谓人才问题之投票！”（《锡报》）读了以上几段使我们深感到模范县的舆论界，究竟还有生气，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可喜的事。

五

可是，有一个普通的误点，就是以为这种国民会议，是有福国利民之可能的，和段老^②招集这个国民会议，有征集国民公意的初心，所以请看：“诸君今日非为国利民福而来乎？夫使人人挟一国利民福主义以将事，虽包办也何伤……”（《无锡新闻》一鸣君的《国民代表投票感言》）“……在政府初意，原为征求真正民意，共谋国是。”（《锡报》雷君《呜呼今日之选举》）关于第一点，即一鸣君的几句话，容亦可加相对的承认。不过，这次来投票，是否为福国利民？在“盗匪巢中，究竟议得出太平也不？”在“流氓群中，究竟议得出治安也不？”在安福首领、军阀祖师段模瑞统治之下，究竟有福国利民之可能也不？再有无论军阀、土匪、流氓，总没一个肯说自己是祸国殃民的，总是说要福国利民的。那么，虽包办也何伤，岂容轻轻出口？诸君今日岂有为国利民福而来？请君今日直为一碗面、两角钱、四色一汤而来？唉！

至于第二点，雷君的说法，根本没有留心时事，弄清政局。段氏若是为了“征求真正民意，共谋国是”，那么老早就不应拒绝孙中山先生的预备会议，而〈开〉非驴非马的善后会议了。段氏此举，原不过再造猪仔，以延残喘而已，岂真欲“征求真正民意共谋国是”？雷君及一班读者醒醒吧！军阀政客，岂有愿意真正老百姓去过问国政的？老百姓，要自己不做猪仔过问国政，只有自己起来打倒军阀政客！！打倒军阀政客！！

六

此外更有一点，足为吾邑新闻家惜者，即谄谀绅阀，献媚绅阀，所以含茹君竟会有他：“特就耳之所闻，已足令人太息不置者已〔矣〕”之后，去恭喜恭喜八百八十吗〔码〕中跑得最力的无耻东西。唉！“华于唯识见卓绝，吴侍梅学贯中西，被选举为初选，当选人间足当之无愧，记者贺之宜也！……”我远客他乡，对于故乡父执，素少亲炙，华君之识见卓绝，因不得而知；但是吴侍梅君在救国储金会中自选为经理人！呜呼，新闻界！

即使退一步说，华吴二君果如含茹所言，那么轿夫是为人作嫁，岂有足贺之理？即使议员亦不过民仆，非中进士状元，那岂足恭喜？或者含茹君恭喜他们手段高，本领强，心机未枉用，四色一汤，见功效可矣，何必如是东扯西扯！

再如《锡报》魁庵《人才选举》中：“……大都不为情私，不为利诱，尊重个人之主张，而以人才为标准，然则，此届当选人之为谁，可不待开票为吾邑之人才也必矣……”（九月十日）在九月十日之时，国民会议初选之戏剧，早演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而魁庵君竟会充耳不闻，而说出这等话来！充耳不闻乎？抑有他故乎！吾不得而知矣！

杨千里先生来锡后之感想

——官僚果能铲除绅阀么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

只有痴人才相信今日之下会有不怕死的武人和不要钱的文官；只有空想派才会相信今日之下还会有昭苏民困的青天老爷；只有乡下人还企望着真命天子坐龙庭〔廷〕来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只有笨伯会说出军阀会和帝国主义者火併；同时也只有呆子会说出或想着官僚会来铲除绅阀！

可是可怜呵！在杨天骥先生^②有下宰本邑的消息时，有些呆子会说着这种疯话：“千里先生，是《民立报》的老记者，且听说和国民党有些香火缘的。这回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资格来宰下邑，想总可以游刃有余，吾邑一切倒或者会有像民元时的蓬勃气象了！”今时更不知哪里来这些流言：“省当局因无锡绅士太有神通，所以弄一介精明强干的长官以资镇治，并欲使绅士稍稍敛迹……”这样一般短视而笨蠢的鸟虫，居然会引着颈望着杨县长来发施仁政铲除绅阀！你们痛恨绅阀，而不敢沕〔彻〕底由我们自己的努力，推倒这妥协派的单相思，固属可怜益复可笑。可是预备着来锡接印的天骥先生——二十年前《民立报》的记者的杨天骥，和国民党有些香火缘的杨天骥——总概可以有些举动给他们，满足他们的企望之诚了！

可是不幸杨天骥先生此来的举动，只给我的文章下了注脚：就

是官僚永不会且不敢——动一动绅士先生的毫毛的，并且有时还只有讨好绅士趋奉绅士！呜呼，孟子不云乎：“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打倒绅阀，整顿民政，改善政举，启发实业，岂其时也！岂其务也！朋友，“要煮茶自己去寻山泉”，要打倒绅阀须自投身青年改造团体中去努力，决不是想真命天子坐龙廷式的企望可以成功的。企望绅士的悔过自新吧，上帝还没造下这般好人，天堂还没有开门！企望绅士的自残吧，实际上只有大军阀并吞小军阀，而使大军阀强断政局，鱼肉人民而已——绅犹军也，已详论屡矣！企望贤长官僚，官僚和绅阀直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耳，相与为命，狼狈为奸者也。不遇〔过〕帝国主义者，却还没有官僚那般“大胆老面皮”，所以还没有和军阀一同下水的心理。却不料官僚竟会和绅士拜起把子来！朋友，你还有什么企望！！不劳而获的先例，你在何处获得！！醒吧！！来，跑到我们的队里来，拥着“真情”、“热肠”、“无畏”大侠魂的旗帜上去打！打！打！打倒绅阀！！打倒狼狈为奸的官僚！！

二

读吾文者，或将嫌余鹘突，请细论之：在更换县知事的风声播来时，我们虽然不像那呆子、鸟虫，引头望着什么贤长官来发施仁政，昭苏民困。但是我们有些小小的乐观，这乐观并不是跟接着市上的流言和杨先生的资望来的。我们认定官僚和绅士是狼狈为奸的，官僚和官僚又都是一邱〔丘〕之貉，官官相护的。所以阿毛罢，阿狗吧，张三吧，李四吧，都是换汤勿换药，同样的作践小民，趋奉绅士而已！可是我们的乐观是根据我们的信念来的，就是：我们以为万事万物能变能动，即是好。无论变坏也吧，变好也吧，而林干才先生^②在此十月，到现在已弄得乌烟瘴气之

至，换个人来或者可能稍为破破这乌烟瘴气。比如阴郁沉闷的天气之中，总想有些变动来破除这阴郁沉闷，固无论疾风雷雨，或日暖风和，但有了一些变动，总比依旧阴郁沉闷好。所以我们的众视就是又有变了，又有动了，又有魔术可看了！

至于市上所传，一、什么杨先生负特别使令而来的呵；二、什么杨先生是精明强干的呵；三、什么杨先生是《民立报》记者，和国民党有些香火缘的，此来治锡必可大展抱负呵；这些在我们目光中看起来简直是童谣，毫无童识的。因为如一、杨先生所负的特别使命是什么？是铲除绅士吧！！老实说者当局决没有这种念头。不但不敢铲除——也许打起电报来要借重领衔呢（并且杨先生此来之举动已给我下了注解不必多说）！至若二、精明强干吧？杨先生容或有之，但在现在的中国，精明强干只有作恶之可能，已无为善之可言。顾维钧、徐树铮辈已证明吾言之不谬。所以精明强干吧，只有我们小民多受苦。三、更是笑话！若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党党员，在今日之下决没有会给一位省长大人垂青的。若是会给省长大人垂青的，决不是一个真正国民党党员。换言之，他对于国民党政纲决不愿意实行的。真正党员尚且如此，何况仅有些香火缘！？所以我对于这流言觉得可笑亦觉得可痛！如何一般国民的常识竟缺乏会到这等地步，益觉吾人所标之“提高邑民常识”不容稍缓矣！

三

不幸呵！我的话句句给我道着！杨先生此来，除更动大批衙员，给我当魔术看外，有些什么？至多且有一套变鸭戏法把第四科变成了实业局而已！至于那般呆于所希望的铲除绅阔的把戏，杨先生还没有这手法玩哩！试看：“……时后以私人名义，拜访邑绅，

杨翰西、孙鹤卿、王克循、钱孙卿等诸绅均循例挡驾……”（二六，九，《无锡新闻》）你看他在道途仆仆，征程甫息的时候，他遍访所谓邑绅，极意联络，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欲其铲除绅阀耶？呜呼，可以醒矣！！

或将曰：“县官知事上任，走访邑中长老，藉采舆论，用以治邑，亦事理之所有！且接事到差，循例必谒邑绅。杨君未能视俗，岂可以此为杨病？”善哉是言，且读下文：“杨君年约四十许，身材短小，精明机警，谈话颇为简要。略云……此次为郑省长委任来锡，勉任斯职，但本人来宰斯邦，并非为做官而来。故于昨日（即前日）分谒地方绅士，曾表示两种主张：一、此来非为做官，拟以绅士资格与地方人士共同办事，请勿以官长视余。二、……”（二七，九，《无锡新闻》）此来非为做官，说来何等漂亮？请勿以官长视予，颇足以表示民国公仆之精神！可惜杨先生转语为“以绅士资格”与地方人士共同办事！则我等未免引为憾事！

做官，非恶名也！战战兢兢，奉职不渝，上不愧夫鬼神，下有以对黔首，这不是叫做“做官”么？为甚么要避之不居！？或曰“杨先生之避名，盖有见乎今日之为官者惟搜括〔刮〕之是务，惟谄拍之是趋，泄泄沓沓，廉耻丧尽，欲有以别也，故避而不居！”然则杨先生之亮节高风，钦佩曷已！可是绅士难道又不是“惟搜括〔刮〕之是务，惟谄拍之是趋，泄泄沓沓，廉耻丧尽”！？为什么又居之不避！？杨君避去做官而为绅士，岂非半斤拿丁八两？并且杨先生是邦，也可曾一考此地的民情政教！？无锡之苦于恶绅之剥削压制也久矣！真正平民之要想铲除打倒恶绅也亦已久矣！就是那些企望真命天子坐龙庭〔廷〕式的企望杨先生能来代他们铲除绅阀，也是这种思想的妥协表现之一式！所以为杨先生者，力

能除之则除之，不能除之则去之！再不然，摆一付官长面孔，敷衍过去，自图糊口，又何必无聊到这等地步，去和绅士合伙拜把子而为虎作倀？力之胜己而不能与抗者，遂拜之为师为兄，这是江湖上的技〔伎〕俩，却不料为民牧的杨县长，二十年前服务报界的杨县长，竟袭此故智？我今正告杨县长：“杨先生若以平民资格，来与邑人士相固〔周〕旋，固为邑人士之最欢迎者！杨先生者（若）为做官而来无锡，尚复安之。若以绅士来长是邦，则邑人士惟有拒之。邑人苦于绅士也久矣！‘本厂货’绅士，已将无锡扰得六缸水混，岂再容‘舶来品’之绅士来火上浇油！”

四

好，让再谈一谈杨先生的“十成宝训”吧！什么十成宝训，请读：“……略云……二、以后对于地方一切事务拟分作十成，以五成为地方人民课幸福，以三成为县知事留余地，以免办事困难，以一成为省政府稍留面子，勿事操切，以免隔阂……”（二七，九，《无锡新闻》）

正在这儿写，忽然来了一位朋友，他看见了连声道：“妙！妙！妙！闻所未闻的‘微分法’！啊！宝训！宝训！真是宝训！可是我们用这个公式应用到最近的邑事上去试试看！嘎！实业局逐鹿的非凡之多，我们就拿来应用一应用！《锡报》载：‘昨闻耆绅顾子文、陶丹翼、钱祖耆等推举邑绅杨仁山充任实业局局长之职。’”（六，十）哎呀！这邑民——恕我拍〔拍〕卖全县公民人格，可是我不这般说，县长老爷心目中，也只有这般‘地方人民’。唉！——公意当然为邑人士谋幸福的，那么算五成；又闻杨知事已内定将陈湛如、孙如山、华少纯三君中择一而任（六，十，《锡报》）这是县知事自己的意识，当然三成；×××（这是省当局预定的人

物)当然为顾全省当局面子的二成了!这个局长倒不能把各方面的人物一拳打碎了,混和在一起,分析之下,再用比例法‘三成’、‘五成’、‘二成’的综合起来呢?……”他说着打一个哈哈。我也笑着道:“迂矣哉,迂矣哉,宝训之应用,岂黔首小民之所能解乎!”我这夹〈三〉缠二的朋友去了,我默想着,我对这宝训在思潮纷乱之中,找出了两点的怀疑:一、宝训所云:“以后对于地方一切事务拟分十成……”那么国赋田税,也得称到一切事务之中去耶否!?若可,那么岂税赋所入,亦以五成为地方人民谋幸福;以三成为县知事了留余地;再以二成酬宪台知遇之恩!?此怀疑之点一。二、百姓完租纳赋,以养“民仆”,是要他五成的精神心力来办理事务的呢!还是要他拿十成心力来办理呢!为民上者,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应当拿十成或十二成的力来报百姓呢?还是拿二成酬上司,三成★精神?②而五成即以塞责呢!?此怀疑之点二。善哉!社友济民君之言曰:“……反之,专要为自己留余地和给人家顾面子的,根本没有为人民谋幸福的心,什么‘五成’呀,原有别用藉以解嘲而已……”——见本期《我们所望于杨千里先生者》。《无锡新闻》记者一鸣先生亦有言曰:“……新知事之断断道白,二十年前服务报界,即记者亦深感此阅历之身世,非二十年前真老辈,亦不能有此精密之微分法……”——见二九·九《无锡新闻》:《新知事之十成宝训》。噫!其然,其不然乎!?

五

读者至此,想可以恍然矣!杨先生来未及旬,戏法已叫人眼福受用不浅!比之唱戏,仅闹遇〔过〕开场锣鼓耳,至多亦不过算跳过加官。开宗明义,已属如有兴,那么以后大轴压轴,连番演去,其热闹将不知胡底也。邑人诚有眼福哉,其拭目以待之!

可怜短视而愚蠢的妥协派呵！“依木附草”的心理去去掉吧！
“要煮茶，自己去找山泉！”朋友，到我们的旗帜下来！

为加薪运动敬告全邑小学教师*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自然，我们对于你们这项运动，只有赞成和促进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你们呢？我们可以说教〔小〕学教师应受生活不安的境况的，应该给人剥削的么？我们可以说：小学教师，不应该受较安定的生活的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剥削了小学教师而把剩余的金钱，去进贡给洋大人——帝国主义者，叫他们去买了枪弹在南京路再多打死我们几个同胞么？去进贡给军阀，叫他们去买了许多炮弹来互相残杀打死我们许多同胞么？让我们再多受几次携妻儿肩〔搨〕箱笼的逃难把戏么？去进贡给绅阀，叫他们去借给“顾问咨议批发所”去，仍旧给大帅们去买炮来打我们小百姓么？我们不能说出这些话头，那我们就不能反对你们这项运动。岂但不反对而且为你们的利益，和我们自己的利益——你们多拿几个钱，就是叫军阀少几个钱买枪炮开玩笑——应该积极的起来促成他！！

可是我们应得明白，为什么会使你们的生活不安定？怎样才可以使这个运动达到真正的成功？

我们先说为什么会使你们的生活不安定？最简单最简单的一

* 1925年11月29日，无锡小学教员200余人在省立第三师范礼堂举行集会，成立小学教员联合会。该会随即发起“加薪运动”，提出改善教员待遇的四项要求。秦邦宪为之撰写此文，满腔热情地赞成和促进它。文章发表在《无锡评论》第二十五期上。

句话回答，就是在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军阀之专横、绅阀之剥削。

第一，看我们现在每年入超数目，依十一年报告，洋货的进口超过土货出口的数目三万万，换句话说，我们便有三万万进贡给洋大人。每年要进贡如许大的款项，中国又安得不穷呢？哪得再有丰裕的钱办教育呢？不但如此，我们还有十九万万元的债务要清偿呢？这许多数目之中，是包含赔款和借债。赔款的最重大最多的是所谓庚子赔款，有九万万八千万元之巨。大家知道庚子赔款，是因为义和团之役而起的。义和团的确“野蛮”，他们只会用刀杀人，不像文明文〔人〕会用机关枪在南京路杀人！！可是南京路之变洋大人赔了几个大〔钱〕！？即退一步说：杀了人应该赔钱的。那么义和团是不是我们全国开会议决，而公举出来杀外国人的代表？不是，那么少数人闹的祸为什么要我们多数人受同样的罪呢？即使算我们“生不逢时”，和这班“乱党”生在同时应该受罪的，而我们的子孙何辜也要受同样的罪呢？（庚子赔款要三十三年才还清）再说外债而其中大部分是借给军阀开玩笑打人民的。因偿〔赔〕款和经济的侵略，我们办教育的钱当然没有了。

第二，军阀因为要争地盘而内战，因为内战而剥削加严，而把行政教育等费一一变为军费用了。因为这么连帝国主义者侵略所余的一些肉骨头式教育经费也给军阀攫了去。

第三，绅阀阶级本来是剥削人的，而现在因军阀要向他们要饷，他们也当然的向一般工农及小学教师等剥削，而把剥削所得者，呈缴〔缴〕于“顾问咨议批发所”，换取一官半职。教育经费经过了这三重掠夺，还有些什么？

我们已经明白你们生活不安定的原因，是在国际帝国主义者

之侵略，军阀之专横，及绅阀之剥削！那么怎样可以达到真正成功的区域？就是：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取消一切赔款和外债，取回海关权）

打倒军阀！！（严定教育经费之独立）

打倒绅阀！！！（清查及革除以往积弊）

换句话说就是走国民革命的大道。

末了我要郑重声明地说：我不是拿大题目来压倒你们的生活竞争，我十二分的同情你们的阶级联合的运动，我们更十二分的愿意为你们效前驱！但是敬爱的先生们！我们不要忘了国际情形，我们不要止〔只〕图苟安，我们要起来做正本清源之计！所以我们赞成你们的加薪的阶级运动，但并请你们不要忘了和各阶级联合起来做国民革命的工程！

世界中国与无锡^{*}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

近百年来，中国的一部外交史，是纯粹的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近百年来，国人所过的生活，是纯粹的一种殖民地奴隶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之苦痛。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要求民族独立的必要，每一个人都都有奋起反抗的决心。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订立了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侵略的根据地以后，帝国主义的资本势力遂如狂涛怒雨，席卷东亚。机器工业，打破了手工业的小生产，农村经济剧变至都市经济，因此破坏了很久的遗留下来的“老死不相往来”式的农村的安静，剧烈地引起农民生活上的不安，迫得农民跑上革命的道，激起了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之役，因为这一个运动，是乌合、无组织、无智识，所以只止于一个原始的暴动，不旋踵而失败；辛丑以后，各国协同步调的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日甚一日，使一般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亦感觉到生活的悲惨，压迫，屈服，堕落，种种的苦痛，于是有辛亥之役。可是表面上虽然辛亥是成功了，——大清帝国变成了中

-
- 此文是秦邦宪早年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表明其已接受了唯物史观，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社会问题。文中指出：“经济的变动，必然引起上层产物（政治、学术、文化、风习……等等）的变动；世界潮流，一定要促动中国的变动；中国的变动，一定要影响到其所包含的各处（无锡当然在内）。八十年的历史，便是其最好的例证。”还肯定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生力军。

华民国，而实际上政权依旧落在反动派的袁世凯反动军阀的手里，打倒了帝国主义的旧走狗——清廷，扶起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军阀。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一天天的强盛，对于中国过分的压迫，引起了感觉比较明〔敏〕锐的智识阶级的不安，遂有五四之役。但是因为缺少组织，缺乏共同的信仰，见解幼稚——当时只看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曾认清一切的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好手；当时只看见安福系的卖国，没有看见一切的军阀、政客、劣绅、土豪、买办等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参加者多是智识阶级，所以从热烈的民族运动，变成了蓬勃的新文化运动——于文化上极有意义的运动。——因为在欧战疲蔽〔蔽〕之际，中国有了新式的工厂，同时因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投资中国，更有帝国主义者榨取殖民地而设的工厂。这两种工厂里，都有了新式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中国民族运动的队伍里，便有了新加入的生力军，而同时因为军阀间的战争迭起，直皖、直奉、奉直、江浙……等大小战争引起了全体人民的不安与恐慌，厌恶、愤恨一切的斗争、战争的主帅，以及背后提线的帝国主义，震动全球的五卅遂于全国民众——不论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学生、商人、自由职业者一致奋起之中，发生〔动〕起来，直至现在其精神还在继续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集真正国民会”的口号，普遍任何地域——即使连邮政都不通的小乡村里。虽然因为缺乏训练、组织，一时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然若不屈不懈的努力，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里，可以明了八十年来的中国，是怎样婉转呻吟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八十年来的民众，是怎样之三翻四复的起来与帝国主义决斗。

无疑的，经济的变化一定要影响到一切社会、文化、政治、学

术与风俗习惯的。八十年来的中国已经经济上有了剧烈的变化——从十三四世纪的农村经济，蜕变至商业经济，以至都市工业经济——自然一切的思想、文化、政治、学术、风俗、习惯，都有一种同样剧烈的变化。即使乡村中的老婆婆，她也知道：从前以纤纤小足，二寸金莲为美的，现在已经不合时尚了，大足才是现在的时尚；从前非有不可的男子背后的辮子，现在有了——定要受人讥笑了；从前自纺自织的大布现在谁也不愿再穿了，而且价钱也不及洋布的便宜；从前跪下了褪了裤子听候打屁股的，现在可以堂而皇之的对着青天老爷站着回话了。许许多多，都表现着随着经济的变化，上层的文化、政治、风俗、习惯也剧烈的变动了！

从政治要求方面说：一九〇〇年的农民暴动的口号“扶清灭洋”，十足的表现农民思想。辛亥的“驱除鞑虏，光复汉室”，建设共和的要求，已经比较是进步，从甘受专制统治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变成了要求德膜克拉西的民主及民族平等的民族思想！五四时候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已经能够打破畏惧外人的习性，严肃主张“外抗强权”，而且同时要除去一切为外人工具的国贼，但是依旧是很笼统的糊涂的。在五卅时已经能够从“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他？桐城派的古文，林纾式的翻译，严复辈所介绍的西洋学说，现在有的也强弩之末，有的已经是过去的古董了。白话文的崛起，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学说的输入，新文学新艺术的产生，五四运动后的蓬勃发育，把整个中国的旧文化蜕变到新的文化。

从思想上说：自张之洞式的“强兵富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蜕变至康梁的“君主立宪”，再变为革命党的“光复汉室”，再变至李石曾、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梁启超、梁漱溟的“东方文化派”，章士钊的“农村救国”，胡适之的“文化革命”，曾琦的“国家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在这许多思想的变动中，最重要的我们应该知道并不是一个人的脑子里所能想得出的，也并不是可以随随便便把外货贩卖进来的，每一个思想的发现，都是因为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生的。举例，比如在五四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农村经济给资本主义破坏了，在上海天津等处产生了近代的都市，所以农村文化的古文不够用了。于是有文学革命主张，言文一致主张，就有了国语。再如因为有了许多工厂，就有许多产业工人，因此呢就有阶级斗争的发生，陈独秀方有共产主义之信仰。

从风俗方面：以吸鸦片缠小脚、纳妾做官为十足的风习，渐渐地不能避免青年的猛烈攻击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视为天经地义的婚姻观，现在已经给“无恋爱的婚姻，是有仪式的强奸”——爱伦凯语——之说所破。从前种种的磕头、作揖、打扞〔干〕、请安、祀鬼、敬神等仪式，在现在一般青年目中恶如死仇。“内言不出于闾，外言不入于闾”，“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女子，现在已经可以在大庭广众之间，与男子握手、跳舞、接吻、拥抱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名训，现在无用了，即使八十岁的老太太也知道，不给她的孙女上学是给不着好人家的。花翎、红缨、顶子、

朝靴的装饰现在除了赛会外不得一见。女子衣饰的变动更是剧烈，色色都变换——不论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

帝国主义的侵略，摇动了全国的经济基础，引起了全国上层产物（政治、学术、文化、风俗……）的变动，已经是无疑的了。那么全国的变动，是否要影响到无锡？其实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当然全国的变动是全国包含的各分子（无锡当然在内）的变动。难道现在无锡人，还可以尊宣统为皇上自甘臣仆与众独异么？江浙之战，难道无锡可不受影响么？

许多的农夫已经给资本家打破了自耕生活，投入城市里的工厂里去了——“到上海去”，“做厂去”，差不多已经普遍到一般民众间。因此产生了几十家新式工厂黑烟缭绕；小学抛了八股，读洋书了。十七八岁的妙龄姑娘，也在街上乱跑，同男子们一课堂上课了。三清殿，改建了图书馆。皇清圣上改变为中华民国。这许许多多是不是足以证明无锡的民众，一样也不能离开世界与国家，而异军突起？

我不再把许多例子一一列举，因为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的，只要他静静的闭目一想，全国与潮流，怎样的汹涌在四边。无锡人哟！我可爱故乡的民众们哟！醒来吧！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的变动必然引起上层产物（政治、学术、文化、风习……等）的变动；世界潮流，一定要促动中国的变动；中国的变动，一定要影响到其所包含的各处（无锡当然在内）。八十年来的历史，便是其最好的例证。

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些同志对于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表示着动摇和怀疑，他们以为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处在苏维埃的阶段之上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呢？这难道不是把革命拉向后跑吗？他们以为民族革命的阶段是过去了，现在是苏维埃的阶段。他们以为苏维埃的口号与民众革命、民众政权的口号，是对立的不能并容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就在：第一，他们忘了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与土地革命两巨潮的汇合，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及统一中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二，他们硬生生地将民众政权与苏维埃政权割裂、对立。实际上，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众政权，中国极大多数的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的政权。更确切些说：苏维埃是民众政权的唯一的形式。为民众的苏维埃政权而奋斗，不是拉革命向后跑，而是推动革命向前走到胜利的唯一道路。由于中国革命的民族的特点，由于反动统治的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与污辱民族，着重的指出：只有民众革命及民众自己的政权，才能达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着重的指出：只有苏维埃才是真正的民众政权；是十分必要的。这样，

* 这是博古在《红旗周报》第二十九期发表的文章，主要在于澄清对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口号的一些误解。

我们能够吸收更广大的劳苦群众及城乡小资产阶级，组织与领导已经开始的群众中建立民众政权的企图。

复次，关于民众的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的实质，自然，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忘记：他是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因为他是极大多数被压者被剥削者的政权，这极大多数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便是城市与乡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中农。放在这政权面前的任务是：彻底进行许多急切的民主的改革，以便走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上去。这政权是专政的，因为没有专政，便不能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的剥削者的反革命的企图争斗，没有专政，便不能够保证与巩固民众革命，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胜利。

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

——评我们对于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四日)

“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必须千百倍的加紧宣传苏维埃与红军。……最普遍地告诉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正在中国内地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血战着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目前反帝国主义最强有力与伟大的先锋力量，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与一切国民党派别，这样一致地把苏维埃和红军看做他们在中国统治的最大的危险，这样一致地向着苏维埃和红军进攻。”——中央为反帝运动致各级党部的信。

—

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坚决的英勇的战斗之中，又获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不管帝国主义者与其清道夫——反革命的国民党怎样用尽一切力量来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之进攻，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之下，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

在鄂豫皖线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去年年底消灭了白军第六十九师全部，活捉师长赵冠英，占领了黄安县城，逼近武汉门户的黄陂，击溃了李鸣钟、萧之楚、夏斗寅各部，在今年三月

中四军积极向着豫皖边进攻，在商城、潢川、固始击溃了白军第二、第十二、第七十六、第三十三旅，共二十四团，继又打溃七十六师，占领商城，围潢川、固始，在三月二十二日红四军移师六霍，击溃陈调元部队，并于四月初红四军继〔缴〕获敌人步枪八九千支、机关枪迫击炮无数。

在湘鄂西线上，红军第三军团，在汉水流域的积极行动，击溃了敌人第四师一旅，萧之楚一部，活捉了旅长，给敌人四十一师、四十八师与四十四师以重大的打击，缴获步枪数千支、机关枪几十架，占领了距武汉五十里的黄陵矶、皂市与湛江县城。

在赣东北线上不但恢复了旧的苏区（万年、乐平），而且扩大了许多新的苏区与闽北苏区联系一起，击溃了敌人五十师及刘和鼎部，曾一度占领婺源，现在还占领着崇安县城及浙江的华埠。

在湘赣及湘鄂赣线红十六军及独立三师，击溃了浏阳白军十五师之一旅，积极在平修、铜鄂南行动，与〔并〕恢复了莲花县城，占领了安福，向着吉安、樟树推进。

在中央苏区线上，中国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在积极的行动之中，扩大赣南、闽西苏区（上犹、崇义、信丰、南康、三南、宁化、清流、上杭、武平各县）给马昆旅与范德星（旅）重大打击，将范旅一团全部缴械。最近又占领了龙岩、漳州，消灭张贞、陈国辉部九团，苏维埃的红旗荡移在中国南海的边岸上。

新的游击区域在长江以北怒长起来，江苏海州游击队发动，与陕甘边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打破了“北方落后”论的胡说，成为黄河流域苏维埃运动烈焰的最初的火光！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一九三二年春季的伟大胜利的简单的不完全的叙述！这已经明白证明了最近红军的空前的伟大的胜利！这些伟大的胜利是全国劳苦群众的胜利，是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亦

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战胜国民党的进攻，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的打击，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因为国民党统治是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是国际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清道夫，而指挥与组织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是国际帝国主义。中国工农红军的战胜国民党的军队是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伟大的胜利。

正因为这样，所以红军的光荣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怖、憎恨、咒咀与新的进攻的组织！字林西报⁽²⁷⁾在四月十八的社论上说到红四军在六安的胜利时说：“有这样善于作战的十九路军，使我们不能不发生这样的意见，即在中国能够有效的进攻红军的军队是有的。过去的失败是由于政府方面还没有能够利用最好的力量去对付红军。不能消灭危害中国的和平秩序的这一咬着心脏的毒虫，中国在世界舆论面前要得到好评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医生，在“咬着心脏的毒虫”面前惊惶失措，帝国主义甚至要把“赤化士兵”的十九路军去进攻红军，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力量！帝国主义的老爷们还是安静些吧，十九路军的士兵群众将会与二十六路军一样全部到红军中去，而倒转枪来向着你们与你们的走狗——国民党的呢！

二

但是红军的光荣的历史意义的胜利，不仅引起了帝国主义与其走狗们的恐怖、惊惶、憎恨与新的进攻的组织，而且他最大限度地兴奋、激励、推进了中国工人、农民、兵士与一切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成了全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柱石，他们以自己的光荣的胜利给全国劳苦群众指出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革命的途径。因之非苏区党的组织的任务，应该是干

百倍的加紧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最广泛的解释中国工农红军及他们的最近的胜利的作用与意义，用一切力量来开展工人、农民的争斗组织响应红军行动的革命争斗的浪潮，与动员工人群众到红军去及组织他们对于红军的切实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这个任务已经不止一次地最清楚地最具体地提出（在）全国党的组织面前。

我们来看我们的各种出版品——报纸、传单等，怎样来进行这一个拥护红军的运动？

首先，我们的群众报纸，对于红军的光荣与伟大的胜利没有充分的加以宣传和散播。个别的报纸，甚至于没有一个字提高〔到〕最近的工农红军的空前的伟大胜利！这里最不可允许的例子是青年团出版的劳动青年在第一、第二两期上（四月七日与九日出版的，可惜我们所看到的亦只有这两期）没有一个字说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消息，而这时正是团的反对进攻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拥护红军周（四月七——十二日）积极进行的时候。也许这便是运动周完全没有任何成绩的原因之一。其他的报纸如法南的工报（三日刊）在二十二期到三十一这十期中，仅仅有两次红军消息一束，简单的几十个字的“消息”！沪东的前线报及东方新报在登载红军的胜利消息，是比较别的报纸来得经常些、多些、充分些。虽然，前线报在十一期上，曾经把许多红军的胜利的消息，放在轻描淡写、毫不令人注意的题目：“零讯一束”之下。

在这些消息的内容与质量上，常常仅仅是“消息”，而且仅仅是简单的转载中央斗争的红军消息一束而没有加任何的编辑的工作（士兵之语、工报等）。有时，这些消息，会变成莫明其妙的消息：譬如省委宣传部在“鄂闽红军大胜利”小传单上写道：“在湖北，孝感、盐城、鱼门一带红军与徐源泉军队进行过激烈的战

争之后，消灭敌人的四十师与四十一师，并与〔予〕四十八师以重大的损失，武汉动摇。”读者读了这段之后，将会到地图上去找盐城与鱼门在哪里，但是这是枉然的，盐城在江苏地图上或许可以找到，而鱼门则在中国地图上是不会有的！实际上所谓盐城和鱼门是应城和云梦。像这样的大意和疏忽，只有妨碍工人群众了解红军的实际的胜利的情形。只有个别的情形之下，我们的报纸将红军的胜利和号召工农群众拥护红军的行动联系起来，如前线第十二期写道：

“湘鄂西红军的活跃。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最近在汉水北岸一带活动，占领潜江、京山等县城，吓得国民党屁滚尿流，说要封锁汉水并派飞机七架去轰炸，但是这是枉然的，红军正在配合当地群众着着向武汉逼近发展。我们要大家起来拥护红军，组织‘红军之友’社，派人到红军中打炮〔仗〕去，派代表团到苏区参观去。”

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很少看到，而这样的例子是应该广大的采用的，我们的报纸不仅要经常的广大的传播红军胜利的消息，而且要成为拥护红军运动的组织者。每一个红军的胜利消息应该与号召群众拥护红军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群众报应该在读者中间进行收集“一个铜板的拥护红军募捐”，“动员工人加入红军”，及“组织‘红军之友’”等等的活动！报纸不仅是宣传者，他同时应该是组织者。

三

对于工农红军的作用及最近的光荣胜利的历史的意义的解释与宣传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有时是完全不了解这种意义的。在有些传单上曾正确的明白的说明，红军〈是〉反帝国主义的先锋，红

军的战胜白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如“苏维埃已经是脱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得到了解放的民众，在苏维埃区域，没有丝毫帝国主义的势力，红军是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但是卖国的国民党，不开兵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却派二十七师以上的兵，去围剿苏维埃红军，兄弟们！若不是国民党尽量围剿红军，红军早已在武汉、上海来打日本帝国主义了！国民党他还竭力压迫、屠杀反日民众，封闭反日团体，替帝国主义当清道夫，使他好来瓜分中国！”（见告华捕兄弟书）

但是在许多甚至极大多数的宣传品上对于这点是没有明白确切的向群众解释的，如上面提到过的江苏省宣传部的“鄂闽红军大胜”的传单上仅仅这样说：

“这是红军战胜白军，值得我们注意并庆祝的胜利！现在苏区工农红军劳苦群众正和敌人苦战苦斗的时候，我们在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也要团结武装起来，向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斗争！”

好的，红军的胜利是“值得我们注意庆祝的胜利！”但是难道只要告诉群众这句话就够了么？为什么在整个传单上对于红军是反帝国主义的先锋，红军的胜利是全国劳苦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胜利，不说一个字？！

极端的机会主义的轻视红军的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的先锋作用曾经表现在前线报的社论上：

“当国民党退兵，出卖上海的紧急关头，红军的出动是有极大的意义的。红军将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领导者，它将取国民党白军而代之，站在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最前线，扩大这一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见前线第九十期合刊：拥护红军动员）

照前线编辑看来，那末红军以前及现在还不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领导者，以前及现在还没有站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最前线，这不过是将来的事，而到今天为止，站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最前线的还是国民党白军，红军要到将来去“取而代之”！很明显的这是对于反革命的国民党完全的投降，这是绝不容许的轻视和抹煞工农红军的英勇的“站在最前线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争斗！中国苏维埃和工农红军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力与先锋；他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站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最前线的！正因这样，所以全国的劳苦群众看他的胜利是自己的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胜利，而无限的快慰、兴奋与加强着自己争斗的决心与胜利的信念。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的惊惶、愤怒、仇恨，与他们一致地把红军和苏维埃看做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危险——所谓“咬着心脏的毒虫”，而进行疯狂般地进攻红军与苏区。最广泛的解释这点是我们的报纸传单及口头宣传的不能延缓的任务。

四

一般的说来，正像我们上面所指的，我们的宣传品上，没有很好的来号召广大的工人群众来拥护和援助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常常仅仅限制在空洞的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口号中，而没有告诉工人群众怎样来拥护和援助红军的行动，特别是青年团的组织，说尽了一切最空洞与抽象的大的政治口号，而没有一个提到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怎样真正的去援助红军，拥护红军。譬如：团闸北区委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进攻苏区宣言这样的写道：

“劳苦青年群众们！我们要想解除自己的痛苦就应当起来反对

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进攻苏维埃红军。高呼我们的口号：

总同盟罢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武装保护苏联！拥护苏维埃和红军！打倒出卖上海的国民党！

青年自动武装起来成立青年自卫军，收回闸北！加入共产青年团！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这里除了李立三式的空喊总同盟罢工之外，一点具体的东西都没有！这是黄莺的歌唱，不是真正的组织青年工人去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团省委的宣言甚至劳动青年的社论都是同样的空洞，与一般的空喊！

其他的报纸比较的在这方面稍为好些。（如工报、穷人小报等等）譬如穷人小报写：

“可是，反对进攻苏区红军，拥护苏维埃红军，不应只是口头上的，我们应在行动上表现我们反对进攻苏维埃红军和拥护苏维埃的任务。

工人加紧一切斗争，用工人团结斗争，震撼国民党资本家豪绅地主的统治，夺取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以打倒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

农民武装起来抗租抗税，实行分田分粮，组织农民自卫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游击战争，联合城市工人、革命士兵、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

灾民贫民起来扩大分粮占屋运动。

一切革命学生民众起来，加紧反日反帝和争取自由的斗争。联合工人、农民灾民、贫民的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进攻苏区红军。

工农兵学生一切革命民众，用自己的力量加紧民众的各种斗争，在行动上反对进攻苏区红军，援助苏区红军。”（见该报第三期：“争斗起来，加紧反对进攻苏区和红军”）

但是这里还都是一般的叫喊争斗起来拥护红军，而没有具体地估计到区、地方、和个别工厂的特点，而提出特别的适合这些地方的工厂的特性的紧要明了的鼓动的口号，譬如对于兵工厂、海员、铁路工人的口号，“不替反革命军队造枪械去进攻红军！”“不替帝国主义运输一个兵一枝枪去进攻红军！”以及“拒付一切用来进攻红军的捐税！”“每人捐一个铜板来帮助红军！”“工人们，到红军中去！”“女工们！替红军士兵制草鞋来帮助他们！”“女工们！到红军中去当看护妇，帮助受伤的战士！”“炮手与机关枪兄弟们！到红军中去，帮助红军打弹开机关枪去打帝国主义国民党！”……应该提出一些最具体的口号来动员和组织工农劳苦群众而不是最一般的口号，譬如“拖枪到红军去”这个口号，在上海就变成抽象的无实际意义的口号，应该注意口号的适合当地情形。而同时在我们报纸上应该经常告诉群众，他们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本家的争斗同样是对于苏区及红军的直接帮助！

因为红军的伟大的胜利在群众间到红军中去参加革命战争的情绪是很快的增长起来，在群众间增长着极大的到红军中去的愿望，我们的报纸与宣传品应该最大限度宣传“工人们到红军中去”的口号，应该坚决地反对把这个口号改为“派专门技术工人到红军中去”（江苏省宣传部）的关门主义的办法。

我们报纸上一般的都没有反映上海的工人群众的拥护红军的争斗与热忱。没有一个字讲到在许多工厂与工人群众间存在着的红军之友之类组织的生活与争斗。没有一报登载过工人群众所通过的致苏维埃和红军的贺电，而这些贺电是很多的（如上海反日

工人代表会、女工代表会、沪西罢委等所通过的)。没有一个字讲到募捐的具体的情形和成绩，而这些成绩是有的，没有一字讲到那些工厂有多少工人愿意到红军去，或者已经去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在我们的报纸上看不到在上海工人群众增长着的拥护红军苏维埃的情绪，更说不上，我们的报纸对于这种运动的组织作用。应该即刻的消灭这种情形，应该在我们的报纸上反映一切工人群众间援助红军的热忱，并且组织他们的热忱，这里最主要的是使各厂的工人及劳苦群众了解其他工人群众的拥护红军苏区的活动，他们的方法，组织方式等等，给他们以好的先例和模范，使他们能够采用别人的经验来进行这个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运动。

工农红军的英勇的斗争和光荣的胜利责成我们的一切报纸和宣传品，要进行一个广大的拥护红军的运动与在这方面的彻底的转变！我们的一切群众报纸应该即刻的来完成红军的胜利所给他们的光荣的任务！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进攻与国民党投降卖国^{*}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用飞机大炮将榆关九门口轰炸毁灭之后，在血的屠杀了成千成万的工农及士兵群众之后，得着英法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机关——国际联盟^②的拥护及帮助之下，正在准备大规模地侵入华北、席卷热河与占领平津的军事行动。据我们能得到的不完全的电讯看来：

“日兵车二三两日由沈阳开锦州，共载日军一万一千四百人，热战日内恐将发动。”

“……据朝鲜司令部一月二十一日发表除去第八、第十、第十四师团之留守部队乘廿四列车赴满外，人数迄未提及，其实该项部队，并今年新入伍之新军在内，不下三万余人其积极侵华可知”，“武藤在锦州会议毕，已往绥中视察指挥三路攻热进兵计划”。

“通辽方面，五日晨又开到日兵车三列，载有步骑炮混合部队约二千余人，携有各种汽车八十余辆，轻重山炮迫击炮等百余门，日侵热形势似将分开鲁、凌南、朝阳三路并进”。

“连日宣传极盛之日军攻热事，恐日内即将实现，兹据可靠消

* 这是博古在《斗争》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号召在全国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反对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斗争结合起来。

息谓日军由北宁路南运向锦州集中，军队调动之忙碌军事布置规模之大，为沈阳所罕〔罕〕见，据云日军总攻击令日内可下，目的在占领热河全省，圈入满洲国”，“日海军部现拟派驱逐舰两艘潜水舰六艘及陆战队将由二月底出发，由海军少将小树卒〔率〕领开赴青岛”。

所有这些都极端明白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准备的紧张，而同时这个计划的另一端便是十分的增强反苏联战争的准备。

日本的军阀与政客最无耻的发表向苏联挑战的言论，如松岗在日内瓦说：

“……共产势力之深入中国腹地已成为日本当前之问题，中日两国中理应由任何一国与苏俄订立办法，制止赤化，此为国际未顾到之紧要问题，日本不欲赤化思想潜入远东，渠意中国未来之崩溃较目前状态尤为惨怖，日本之行动，即以此为立场……”。

这毫无问题是反苏联战争及直接干涉苏维埃中国的舆论宣传的步骤，同时在军事上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用大量的军队向着北满增兵：

“日驻满大使武藤奉该国命令预防对俄军事曾于一月廿七，密令伪奉山路及驻榆日军陆续抽调北满……”。

显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竭力准备极大的军事冒险来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及反苏联干涉。新的战争与武装干涉的危险性是空前的增涨着，流血屠杀死亡流离直接地威胁着全中国的劳苦群众。

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般的进攻与新的进攻准备之下，国民党政政府更加无耻更加露骨地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它坐视武装和物质条件十分贫乏困难的义勇军给〔让〕武装到牙齿上的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屠杀各个击破，而不给他们以任何的援助。即是国

国民党御用的新闻机关亦没有方法隐秘这个事实。譬如国民党机关通讯社国民社二月一日北平电说：

“九门口外义军与敌军激战迄昨止，长城沿近之民团参加，声势颇盛，日方传我有正式军队参加，不确，我军惟守长城要隘未出长城”。这个电报可以完全揭露国民党军阀们——即×××之流的“民族英雄”们的投降帝国主义阻碍武装抵抗，拒绝援助义勇军及采取失败路线的面目。试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英勇血战着的义勇军在近在咫尺之地作战，甚至炮声可闻，而国民党军阀却还是按兵不动，甚至禁止英勇士兵们去参加作战。这当然是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能够从容地消灭义勇军，而长驱直入来进攻长城要隘，到那时候再可以用“忍痛撤兵长期抵抗”之类的空话，来放弃中国的领土与将几百万的和平居民给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正在经过英国帝国主义——日本的同盟者——的驻华公使蓝浦生其〔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出卖中国的直接谈判而同时这个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却集中力量来向着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与率领全中国劳苦群众进行坚决的反帝斗争与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苏维埃进攻。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正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周围施行惨无人道屠杀轰炸的时候，中国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对日宣战的宣言，号召全中国的劳苦群众武装起来自动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帮助苏维埃和红军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回答我们的宣言是急速的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订立停战协定，出卖淞沪；而集中一切士兵在沪自动抗日的军队到江西、湖北、福建来进行向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群众进攻。并且无耻地散布蠢笨的谎话，说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存在阻碍了他们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现在正当着日本军阀已经占领了山海关，正向着热河平津作猛烈的军事进攻准备的时候，正

当着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军阀们无耻的愚蠢的谎话及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真正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部队，订立反日的作战战斗协定之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一宣言的回答是不把一兵一卒去抵抗日本在华北的进攻，而调动新的军队（第一、第四、第九、第十八等师）入赣大举进攻中央苏区，蒋介石更作本人第三（次）亲征的失败的尝试。甚至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与政府决定今年为“剿赤年”，难道还不明显么，国民党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和他们的侵略屠杀政策的清道夫。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正在国民党的不抵抗之下，在英法与国际联盟赞助之下，开展他们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全线进攻，并积极的准备反苏联战争！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取得他们军事上财政上的帮助，向对于中国工农及工农政府作绝望的进攻！战争是在我们眼前开展着！只有动员千百万的劳苦群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才能获得中国的民族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而推翻国民党的投降卖国的罪恶统治，才能够保证民族战争的胜利。在目前这样极端紧张与严重的关头，苏区与白区的党的组织必须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的群众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出卖投降、进攻苏区，只有最广大的开展国民党区域中的群众的反帝斗争与工农红军英勇的行动配合起来，才能够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出卖中国的企图。

在目前的情势下，开展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及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结起来应该成为我们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口号！

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

春天快到了，是怎样一个剧烈战斗的春天呵！一方面，革命战争走到决定胜负完全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大举进攻的紧急关头，英勇的工农红军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勇敢、敏捷、觉悟、坚强地同敌人血战着。另一方面，在流血的争斗中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来的苏维埃土地，正等待全苏区的劳苦农民群众，以革命的劳动热忱去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春耕。正因为我们处在革命战争严重紧急的关头，正因为在我们面前是长期艰苦的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战争时期，今年的春耕对于苏维埃与革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千百年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地主豪绅富农的奴役和剥削之下，终年忙碌勤劳的结果，只是供给地主豪绅的奢侈宴饮；而自己依然是饥饿着、冷冻着。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劳苦农民群众第一次能够耕种自己的土地，自由地吃自己的耕种的收获。这便造成了劳苦农民群众勃发伟大的耕种劳动热忱的基础。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在组织、激发、提高这个伟大的自发的群众的劳动热忱，提早春耕，扩大耕地，争取收获量的增加，要使得没有一寸苏维埃的土地荒弃着，没有一分人力闲眠着，用与进行战争同样的热忱与英勇来开展在经济战线上、生产战线上的突击。生产

* 1933年初，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不久，正值春耕在即，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写了这篇文章，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红色中华》第五十一期上。

战线上的胜利，是前方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我们的党团和一切群众组织紧急的动员起来，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

为着胜利的进行这个运动，党团与苏维埃的组织，应该立即的努力来组织和领导这个运动，用一切方法来开展群众的劳动热忱，提高运动的组织性、积极性、群众的创造性到最高限度，这就要求我们：

一、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²⁾与新发区域中的迅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将其平均分配给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必须要使得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身上。正确的土地分配是激发与提高群众生产劳动热忱的基础。

二、发展广大的春耕与生产的宣传，使每一个农民了解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扩大耕田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同时亦即是为着战争的胜利与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要鼓励基本农民群众以比他在地主资产阶级奴役之下，增加十倍百倍劳动热忱，来耕种从血的争斗中，得来的自己的土地。这种广大的生产宣传，必须包括着广大的传布农业改良的科学知识。

三、发动最广大的群众的生产竞赛，经过党团及一切群众组织来发展生产突击队，订立各村各乡的生产竞赛条约，给与一切先进的乡村以物质的精神的鼓励，并责成他们具体的帮助落后的乡村，来达到总的生产的增长。

四、为着补救目前耕牛、耕具的缺乏，与鼓励农民的集体生产，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必须最大限度鼓励帮助农民的集体合作的各种形式，共同耕种、联耕、组织犁牛站等等。首先特别应该注意到给红军家属以切要的帮助。

五、党团工会的各级组织除掉必须在这个运动中开垦种植各个组织自己的菜园之外，须得对于他附近的乡村负责帮助，组织

帮助委员会，派选自己代表到乡村去宣传鼓动农民，农业知识上帮助他们，直至组织特殊礼拜六去帮助各该乡村缺乏耕具的雇农、贫农及红军家属的土地耕种。为着保卫土地革命的利益，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所组织的向苏区的大举进攻，红军正在与敌人血战着。开展我们在生产战线上的进攻，来配合红军胜利的战斗，在生产宣传与春耕运动之中我们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能忽略战争的紧急动员。在边区尤其应该发展群众的武装争斗来保卫春耕。

春天来了，是怎样一个剧烈战斗的春天呵！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开展我们在各个战线上的全线的进攻。让我们苏区千百万劳苦农民的劳动牧歌与英勇的工农红军的凯歌合奏最后胜利的壮曲！

把勃发着的群众劳动热忱组织起来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

随着春风的吹拂，在苏维埃的领土上，几百万劳苦群众正以空前的劳动热忱耕种着从流血的斗争中，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来的土地，充溢在田野间的劳动山歌正与红军雄壮的进行曲合响着！每个劳苦农民群众都深切的感觉到今年的春耕是与往年大不相同了，在今年锄一犁都是为着革命胜利，一点一滴都是为了劳动者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春耕正在沸腾着！

在这个沸腾着的为争取布尔什维克的春耕的斗争中，特别应该指出是工农红军的积极参加，在两次取得伟大胜利的决战之间，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最积极地帮助着东韶一带劳苦群众的耕种，许多其他红军的部队与红军直属的附属机关都是热烈地不知倦怠地帮助着农民群众的春耕，这种对于劳苦农民群众幸福与痛苦的关切，这种与劳动和土地不可分离的亲密联系，证明着工农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而且只在新的社会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军队能够做有这样伟大的令人钦佩的劳动热忱和与民众生活的利益和痛苦的血肉般的关切！这就是工农红军的力量所在，这就是铁的红军常胜的根源！

但是总的说起来，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党和苏维埃的机关没有以经常的有计划的努力来组织和领导伟大农民群众春耕，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还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与顽强性来争取苏维埃中央政府春耕训令与党中央局的春耕决议的每一条

文的实现而斗争！协助运动还只是在开始的阶段上，差不多限制于红军及其附属机关方面，其他的组织特别是工会中还没开始郑重地担负起这个重要任务，生产宣传进行得没有系统而且薄弱，鼓励农民群众，组织各种集体生产、合作的各种形式还是非常的薄弱与迟慢，总之，我们还没有能够布尔什维克地来组织自发地勃发着的群众的劳动热忱。

春耕运动是在沸腾着，这时候正是迫切的需要对于这个运动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已经给了我们一切组织以明确的指示，为着这些训令和决议的每一个条文而斗争，检查这些训令与指示的执行程度是我们目前战斗的任务！

用我们一切力量以有计划有组织的努力来完成开垦五十万担荒田增加二成收获，以保证常胜的工农红军的供给与更进一步地提高改善劳苦群众的物质生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努力与切实的具体领导，是这个运动胜利的先决条件。

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三星期之后，我们将要庆祝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六周年（周年纪念了！是怎样的一个战斗的纪念日呵！国内战争的烽火，在中国的南部猛烈地燃烧着，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焰飞舞于东北四省及华北的原野中，在战争与革命风暴中，我们庆祝着工农红军，唯一的革命的民众武装的诞生纪念！

六年来的艰难的争斗，经过失败与挫折，胜利与成功，锻炼出来了今年全中国的几十万铁的红军，经过零碎的散漫的小游击队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夺取敌人的武装武器，武装了自己，到今天发展到了十几万二十万的数目，到今天红军成了苏维埃政权可靠的强有力的武装支柱，成了全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奴役与地主资产阶级剥削之下解放起来的民众武装的主力部队！红军英勇的战斗，与其丰富的经验不仅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且是世界革命历史可宝贵的一页！

但是这些光荣的英勇的过去，仅不过是工农红军剧烈与伟大的斗争史的序幕，国内战争还不过是在开始的阶段上，与现代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时代还在面前。正因为这样今年庆祝红军的诞生纪念日，决不是普通的庆祝仪式，而是完成伟大的战

• 为了庆祝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六周年，博古发表了这篇文章，刊登在《红色中华》第九十三期上。

斗任务的战斗的节日。

这个战斗任务便是创造和锻炼一百万铁的红军。革命形势的开展极端尖锐，逼迫着我们要最迅速的完成这个任务。假如六年来的艰苦争斗中，从零碎散乱小游击队中长成为十几万廿万的正规的红军，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伟大的创造力与组织力量。但是为着完成今天的历史任务，十几万二十万的红军是不够的，是完全不够的了。国民党还存在着，虽然政治上非常薄弱，然而武装齐备八九十个师，而他背后还站（着）武装到牙齿上的帝国主义，为着击溃与歼灭这些反革命的军队，一百万以至几百万铁的红军是绝对必须的，我们能够在最短时期中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保证中国革命运动强大的开展与最后胜利。

解决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的时候，每个劳苦工农群众与每一个赤色军人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动员几千几万几十万的工人和农民踊跃地加入红军，创立新的师，新的军团，新的方面军，另外一方面，每一个赤色战斗员与指挥员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提高自己的与整个部队的军事技术，吸收尽可能广大的群众来参加红军的建设是完成这个战斗任务的保证与先决条件。

根据着苏区工农群众增涨着的积极性以及党苏维埃和军事机关工作的改善，年内我们在红军建设上开始了大踏步的前进。不但在部队中游击主义的残余逐渐克服，赤色战士的阶级觉悟与纪律更加提高，军事技术的学习亦有了极大的成功，因而大大地增高了常胜的工农红军的战斗力，而且广大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的浪潮，正如万马奔腾一般的澎湃着，仅仅今年的红五月及六月的短短的时间的〔内〕新的三四个师涌现了起来！

在庆祝今年红军纪念日的前夜，不论在前方和后方，我们必

3
须尽量地提高我们完成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具体地说，在后方我们必须完成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的创立，来作为送给今年红军纪念日的赠品，一切党、青年团和工会的组织必须以最紧张的努力与奋斗来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在前方我们必须以学会现代各种军事技术来纪念红军的六周〈年〉纪念，红军指挥与政治机关应当在这个任务周围动员起来！

在工农红军纪念日的前夜，我们的战斗口号是：

“完成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作为我们给工农红军纪念日的赠品！”

“提高军事技术，来纪念工农红军自己的节日！”

战斗的节日，战斗的任务！完成战斗的任务，是我们对于工农红军纪念日最好的庆祝。

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 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实际的统治者，它采用什么方法来应付今天的革命形势，争取革命形势中反革命的出路呢？很明显的，帝国主义一方面尽量扩大其反对中国、掠夺中国的强盗战争，扩大他的占领中国的领土，瓜分中国，把中国成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在贪狠地掠夺中国民众中，来挽救其本国的经济危机。另外，为和缓他们本身的矛盾，企图采取共管的方式，来统治中国，把中国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的殖民地。这两个政策是在同时并进，他们的目的是一个，就是想从加重奴役压迫的枷锁在中国民众身上，来挽救他们不可救药的危机。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之前投降、屈膝、帮助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殖民地化，替帝国主义的政策开辟道路。所以，我们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是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制造者，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国民党以无耻的出卖和血的屠杀替帝国主义争取殖民化中国开辟道路，然而国际帝国主义要实行使中国殖民地化的政策时候，必须用极大的力量经过残酷的斗争，击败了无产阶级及千百万劳苦群

* 这是博古在7月21日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这次报告全面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对四次反“围剿”作了总结，并对第五次反“围剿”作了分析，同时提出了苏区党面临的紧急任务。这里摘录的是他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众的革命斗争与积极反抗之后，才有可能。因此他们将用最残酷的手段，企图把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是中国苏维埃红军放在血海里面，所以帝国主义正在指挥着国民党向我们作新的第五次最疯狂与绝望的进攻。五次“围剿”是国民党造成国际共管中国、帮助殖民地化中国的有力步骤，是殖民地中国与苏维埃中国两条道路决战的一幕，是决定中国走向奴役的压迫的贫困的殖民地道路，或者是走向解放的自由的独立的苏维埃道路的历史关头。

从东黄陂惨败^⑩之后，蒋介石了解了需要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力量来进行新的“围剿”的准备。这里第一，必须以更大规模地更无耻地出卖中国取得帝国主义更大的帮助。因为他深刻地了解，假如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国民党是不能进行五次“围剿”的。所以蒋介石在东黄陂战败后曾亲往北平，与日帝国主义谈判，经过黄郛的手签订了五卅密约以出卖辽吉黑热四省，承认满洲国，划河北北部为中立区，担任镇压一切排日排满活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他“勘平内乱”。就是说，蒋介石把东三省、华北拱手跪送给日本，换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同时蒋介石派遣宋子文周游欧美，同样以卖国条约取得帝国主义军械军火与金钱上的帮助，宋子文在美国和罗斯福谈判之后，借了五千万美元，合中国大洋二万万万元的棉麦借款，美国所付的借款并不是现金，而是麦和棉花，在美国市场上停滞的过剩货品，经过国民党在中国的倾销，换得现金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宋子文又向英国借了五百万英镑，购买军械，到意国和法西斯蒂首领墨索里尼这个混蛋签订条约，无疑的，这又是一个卖国的密约。虽然现在这些条约的内容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一看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的言论，也就容易索引的了。

其次蒋介石正在整饬旧的部队，调动新的部队入赣，征募与

训练新兵，重新训练军官以准备对苏维埃和红军的新的进攻。五月初在庐山开会的五省“剿匪”将领会议，正是总结四次“围剿”的失败的一个会议。同时他进行了改编军制，和重新训练以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为骨干的军官团，调动新的五六个师入赣，另外还准备训练十五个新的师，已经招募三万五千人，在汉口、九江、归德大造兵营从事训练，用收买利诱种种方法来团结和缓他们内部的冲突，委任了北路南路西路的总指挥，使湘敌粤敌开始更积极的进攻，何键到萍乡，粤敌的积极化都是这个总攻计划的步骤。

第三，为着将经济浩劫的全部重担转移到劳苦群众身上，为着进行五次“围剿”，国民党更加重对于工农群众的压迫剥削白色恐怖与屠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苛捐杂税的名目繁多，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据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大晚报的统计，国民党区域中的捐税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种，收税卡局共有八百九十四处。这已经（是）足以吓人的数目字了，可是实际上这还是不确的减少了的数目字，譬如一个在张家口工作的同志，在他的信上这样的告诉我们：“从张家口西头到桥东不过几里路，可是捐税局竟有八处之多，每一车子粮食从乡村运到城市来卖，这八个税局一共要收五元二角五分的捐税，而每车粮食不过值四元，因此农民从乡村中将粮食运到城市中来卖，他必然的不仅得不到一个钱，而且要将车子牛都卖了，来完清捐税才能回去。”仅仅几里路就有八处捐税局那全国岂止八百多处？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阀还实行预征捐税，譬如川西的钱粮已经征收到民国六十年（一九七一）了（大公报），在进行新的“围剿”中，国民党还要预征与增加各种税项，还要帮助资本家向工人的生活水平继续进攻，这是国民党罪恶政策之组成部分，另外一方面国民党在白色恐怖的凶

焰简直把全国变成了监狱屠场。罢工工人、反帝战士、革命士兵义勇军及暴动农民成千成万的被屠杀，首先是共产党员，统计今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屠戮的逮捕的我党的干部（仅仅是干部吗！）已经不止一二千数目了，广大群众的被屠杀简直是无法统计的了，而且对于一切不满国民党的分子亦是采取种种残酷的手段，譬如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佛^⑨不久以前被蒋介石的暗杀队暗杀了，杨杏佛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离开共产主义与工农革命是很远的，他只因为不满国民党白色恐怖，主张最低限度的民权保障就被杀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亦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受着暗杀的威胁，国民党企图将一切革命运动沉在血海中，以便进行五次“围剿”与忠实地做帝国主义之下的“甲必丹”！

阶级敌人是在拼命地有计划地准备新的大规模的大举进攻，这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共管中国计划是不可分离的。这是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两条道路斗争的生死关头，能够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才能够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 宣传者和组织者^{*}

——热烈的庆祝《红色中华》——我们的第一个
自由的苏维埃的刊物——的百期纪念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虽然，“红中”还只有百期的历史，但是它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动员、战争动员上的功勋，我们大家都知道与记得的。经济战线退换八十万公债节省三十万的胜利号召；扩大红军的经验与光荣例子的传播；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状况报告与分析；在各战线上为着党的总路线而坚决斗争，严格的自我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弱点错误藉以帮助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去克服它，以及无情的铁锤，打去一切官僚腐化及潜入苏维埃机关的敌对阶级的奸细等等，这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成绩。《红色中华》是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是我们一切群众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

热望着“红中”更好提高它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的作用，热望着“红中”更大的成为在国内战争中鼓励前进的喇叭，经济战线上的哨兵，保卫党的总路线而斗争的卫士与为着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华而奋斗的战士。热望着，我们《红色中华》从有四五万

* 1933年8月，《红色中华》出刊整整一百期，为了祝贺，博古专门写了这篇短文，刊登在《红色中华》一百期第一版上。这也是目前能够发现的博古担任中央领导后，有关报刊言论最早的一篇文章。

读者的刊物变为有四五百万四五千万读者的刊物，从有几百个通讯员的刊物成为有几千几万通讯员的刊物。热望着，《红色中华》成为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华的最广大的群众的读物。

我坚信，这些不大的热望，能在最短时期中得到满足的。

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大革命的风暴逼临了，历史要我们在最短促的时期中，解决在中国面前放着的绝对的问题：“或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而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中共中央决议）

“阶级敌人是在疯狂般的准备着新的第五次的绝望的进攻，这就是新的五次‘围剿’，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的最凶的步骤。”（同上）

为着将存在着的革命形势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为着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动摇，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来粉碎这个新的“围剿”。“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出路的斗争，即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这个历史的环境，给中国工农红军以及每一个红色战士以最负责的光荣的任务。工农红军是中国民众的武装，是胜利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与争取中国独立解放的武力。红色战士的英勇奋斗，不仅是为着保卫伟大土地革命的胜利，而且是为着争取中国民族之彻底的解放与自由。

在六年来艰苦的斗争中，工农红军锻炼与强健了自己，从零碎散乱的小游击队成长为几十万人的铁军。他们丰富的国内战争的经验，英勇的作战功绩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几页，是今后我

们能够在战争中取决定胜利的保证。

但是在今天，在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这样的伟大与负责，给我们解决这个任务的时日又这样的急促；因之，我们更加不能一分钟的忽略，我们今天还存在着弱点，我们应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克服他，使得我们能够担当得起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

无疑的，技术上的落后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弱点之一，党及苏维埃机关已经历次的提出这点，并号召所有赤色指挥员与战斗员，以最大的革命热忱来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自然，在新部队中，我们在今天以前亦经做了许多的工作来切实具体的实现这个党和苏维埃的口号，然而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该做的了。而今天这个问题是更加重要与锐利了，一方面是因为五次的“围剿”是比以前更加剧烈与残酷的战斗，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新组织的队伍的大量的增加。所以，放在我们整个指挥机关与政治机关面前的重大的责任是启发组织我们赤色战斗员的提高军事技术的热忱，造成部队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的怒潮。

这里，第一，我们应该最好的来使用我们现有的武器，射击、刺杀、高射、手榴弹之掷抛、机关枪自动步枪之熟练的使用，火力之配备及协同动作，基本动作之纯熟，警戒的严密，行军、夜间动作、冲锋等等，必须使得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发扬到最高限度，最好的最精确的熟练的使用我们一切现有的武器与技术。第二，我们必须最好的来防御一切敌人的新式武器与夺取它们来武装自己。譬如防空对空射击、防毒、坦克车、装甲浅水兵舰等等，在五次“围剿”中必定将更多更大的采用这种新式武器，我们必须使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都了解这些武器作用与效能以及抵抗他的方法，不放〔致〕于在它突然出现时，给我们以慌乱或

重大的损失，并且要夺取这些武器为我们使用。第三，对于指挥员应该是更大的加深战术与战略的研究，要最灵活的运用我们在国内战争中丰富的经验及最新战略与战术的原则。

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与敏捷，学会现代军事技术最好的使用军事技术，这是我们今天在持枪待放以粉碎五次“围剿”时的战斗任务！

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一、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在对于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但在最重要的与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冲突的新阶段——即走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期中”。

五中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基本论点，并责成全党以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来彻底的实现从这个结论中产生起来的党当前的伟大的负责的任务。

一年来的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十二次全会的论断之正确。全会以后事变发展之总和，正是明显的带着过渡到新的战争与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飞速的跃进着，它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集体化与文化革命的计划，正向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大踏步的迈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之成功，不仅在经济上，更大的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性，而且在国防上亦大大的提高了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苏联的国际意义及其对于全世界

* 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左”倾错误有了进一步发展，博古在会上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也有一些错误观点。这是报告中对于国内形势分析的部分摘录。

劳苦群众的革命影响，日益增高，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之愤恨与嫉视，他们正在进行各种的阴谋挑衅与军事准备来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他正在疯狂般的准备反苏联的军事冒险。同时，正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国防力量之增高与彻底的和平政策，使得许多帝国主义的国家不能不在苏联和平政策之下屈服，而与苏联订立不侵犯条约及恢复邦交。

经济危机之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系统更进一步地崩溃，而且明显地带着战前的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企图用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手段同时亦即是准备新的战争的手段。罗斯福的复兴运动的“试验”，遭受到完全的失败，德国法西斯蒂的诡诈的阴谋，并没有减少失业。资本主义世界中剧烈的进行着经济战争，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之失败，证明帝国主义放弃了谈判与外交辞令，而代之以剧烈的关税壁垒与货币战争，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准备。而日内瓦“军缩”会议的“结果”，则是美日英法意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大军备的宣言，法西斯蒂德国要求武装的合法权利的喊叫，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机大炮轰炸雷鸣和新的反苏联战争的准备。英美、美日，英日间的冲突，首先在争夺中国方面，在太平洋上正在迅速的增长着。希特勒的登台增加了欧洲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在增长着的帝国主义矛盾前面，国际联盟正处在分崩离析与解体的状态之中。战争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口实之下爆发起来，同时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暂时和缓自己之间的生长着的矛盾，以便首先爆发一个反苏联的战争。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正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波兰、捷克斯拉夫、英国、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之顽强的罢工，波兰农民暴动，西班牙的土地革命之发展，中国苏区之扩大和巩固，印度北方之农民暴动，斯脱拉堡之巷战以及帝国主义

国家士兵与海军中之骚动证明，虽然革命运动之发展还是不平衡的，但明显地带着走向新的革命与战争的过渡的性质。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地主、军阀，则以更加厉害的压迫剥削，更加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更加剧烈的战争进攻中国民众及苏维埃政权，来回答这个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

第二国际^②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亚姆斯国际的黄色工会，更在法西斯化的过程中前进了几步。不但德国的社会主义法西斯蒂和黄色领袖完全投降希特勒，而且在法、英及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亦公开的替法西斯蒂做清道夫的工作，竭力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第二国际正在崩溃为各个独立的社会法西斯蒂政党，这个过渡还没有完结，因为战争还没有爆发。这种崩溃的过程，正是反映着过渡时期之特点。各国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持，正在各自为了自己的主人准备战争。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伟大胜利，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的增长，经济战争、扩张军备、反苏联战争准备，革命运动之发展及第二国际之崩溃，都证明着“走向革命与战争新阶段”的过渡是迅速地加紧着。

二、一年来事变之开展证明十二次全会之论断——在中国存在着革命形势之完全正确。中国正处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中，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影响到民族生命之一切形态。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到了新的高的阶段！即是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保证着这个政策之加速度的进行。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占领了满洲与热河，而且已经实际地统治了华北，正在经过他忠实走狗——国民党，及组织内蒙的王公，而准备最后地占领整个黄河以北的中国领土，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猛烈地巩固他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及依据台湾为根据地加强

着他在福建的阵地，准备着在一个适当的口实之下，公开的占领福建，他的势力亦正深入于广东。日本帝国主义正以全力来争取自己中国的优势，并将中国变成自己的奴隶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步骤与军事布置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准备着进攻苏联的战争及争取太平洋上主人翁地位的帝国主义战争。

英国帝国主义赞助着日本的侵略，只不过企图将日本的刀锋离开他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转向北方去进攻苏联。同时他公开地经过西藏的傀儡进攻四川和青海，在新疆事变的幕后亦明显地看到英帝国主义的血手。虽然英日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增加着，但是这不会减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相反地，帝国主义所遭遇着的生长着的困难，只有增加他们侵略的贪欲。

法国帝国主义一样的利用安南的优越地位而操纵云南、广西、贵州的统治，并时刻准备着公开地占领这些区域。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狂热的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太平洋霸权的强盗战争。同时他在帝国主义强盗反苏联的挑衅与战争准备上成为更加积极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者，尽力的企图维持和加强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经过这个工具来奴役中国民众，使中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以棉麦借款帮助国民党进攻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众，摧残中国经济，奴役中国民众。

国际联盟积极的参加和组织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计划及反苏联战争的准备。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际联盟尽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领土，摧残和屠杀中国的民众。国联的一些“反日”的决议，与日本之“退出”国联的滑稽戏，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的反映，和用来欺骗中国民众及世界劳苦群众的烟幕弹。

可是不管在瓜分中国上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冲突是怎样的剧

烈，但是他们都一致地积极地指挥和组织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的疯狂的进攻。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中国之存在，是帝国主义者进行瓜分中国将中国变为完全的殖民地的计划的最大的障碍。为着实现完全瓜分与奴役中国的计划，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一致的组织反对苏维埃中国的反革命战争，供给国民党以金钱枪炮飞机与军事专家，企图将中国苏维埃及几千万苏区劳苦群众沉没在血海之中。

三、中国的经济状况是一幅崩溃破产失业饥饿的悲惨图画，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中国之结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更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极度的恶化起来。

农业的危机已经达到空前的极点。农村经济在完全毁灭的状态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与掠夺，洋米洋麦与人造丝的倾销，军阀搜括，内战与强迫种鸦片，巨大的水灾和其他灾难，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饥饿死亡，流离失所。丝茶与其他的特殊生产品是全部的毁灭了；家庭手工业是被资本主义的倾销消灭了；米麦及其他基本的农产品，在洋米洋麦倾销之下，即使在良好的收获状态之中，亦不能够抵偿成本与劳动力的消耗，及满足军阀地主高利贷的贪欲。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饿饭，几千百万农民没有饭吃，没有地种，没有地方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在漂泊的难民队中挨冷受饿，忍受着非人的痛苦与死亡。

民族工业也在崩溃的状态之中，重工业差不多全部都被帝国主义霸占着，棉业丝业及其他的轻工业是在破产的状态之中，许多工厂关门，许多工厂减少工作的日子，中外资本家同样毒辣地减少工人阶级的饿饭的工资和恶化他们工作的条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人是失业了，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救济，在都市中街道上流浪着，过着悲惨苦痛的非人的“生活”。

农村经济之浩劫，民族工业的衰落，与世界经济恐慌之深刻化，影响到整个国内国外贸易之惊人地锐减，入超更大大的增加，国内市场的缩小更使国内商业处于停滞和破产的情况之中。

与国民经济崩溃与浩劫并驾齐驱的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激增。巨额的入超在数量上超过了整个中国的出口数，大批的投资于准备战争与镇压革命运动的军事工业，长途航空线的设立，重工业甚至轻工业中帝国主义的资本已经占取着垄断的地位，大批的借款不仅在财政上资助反革命的统治来屠杀中国民众以尽其清道夫的作用，而且更进一步加紧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和巩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

四、暴风雨般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在广大的中国领土正燃烧着。不管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残酷的恐怖和压迫，城市中的工人更多集合于他们自己的革命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而战斗。不管黄色工会领袖的出卖，反对中外资本家的空前未有的伟大的罢工时常爆发起来。罢工的人数是逐年的增加着，最近两年来的罢工人数远超过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斗争的性质是异常的坚持与顽强，常常为着达到自己的要求，工人群众不惜接二连三地利用罢工的武器，罢工工人的热烈的战斗热情，更加明显的揭露了罢工的革命反攻的性质，工人群众常常以革命的自卫来回答资本家国民党当局军警与工贼之残酷的恐怖。罢工工人与军警之肉搏冲突是屡见不鲜的事实。罢工斗争不仅在地域上普遍到全中国，而且牵动到一切的生产部门。浓厚的政治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更加清楚的显露了工人阶级在反帝运动中之领导作用。

农民的抗税、抗债、抗租、分粮的斗争，往往发展到武装暴动，发展到游击队伍的建立。农民自己将土地革命的旗帜非常鲜

明地高举起来。为着挽救自己的死亡与饥饿，农民群众坚决地平民式地没收和分配地主豪绅的粮食与土地。在反帝国主义斗争及土地革命的影响之下，国民党的部队的瓦解，是在急速的成熟着。广大的士兵群众的反对进攻红军要求抗日的斗争是在开展着。兵变与暴动不断的产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及自己的封建剥削者压迫之下的少数民族，亦开始被吸引到革命斗争的舞台上来，为争取弱小民族的解放，为争取土地，为推翻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军阀官僚和自己的封建剥削者而斗争。

国民党的投降与卖国，及他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残酷的压迫，非但不能阻止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发展，而且相反的使反帝运动正在脱离民族主义的幻想与国民党的影响，坚强自己的队伍，驱逐自己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与反动领袖，而团聚在共产党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周围，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游击战争是越发发展起来了。满洲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坚强地进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

五、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标志就是苏维埃运动之茁长、胜利与成功，他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与雄大，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有力的柱石，成为一切国民党区域中群众斗争所环绕着的太阳，并使中国革命成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革命的先锋队。

苏区的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土地、工作和自由。真实的改善与提高了经济的文化的生活，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建设新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设工作之中，卷入神圣的保卫苏维埃领土的革命战争之中。伟大的常胜的铁的红军是创立了起来，接连粉碎

了帝国主义国民党集其全力进行的四次大举进攻，不仅保卫了原有的苏区而且大大地扩大了苏维埃版图，在广大的中国西北部创立大块的川陕苏区。得着全中国几万万劳苦群众拥护的苏维埃运动是坚强不可战胜的力量。苏区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成功与胜利的经验，给全中国的民众指出，只有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推翻，苏维埃中国的确立，才能够解放中国统一中国，脱离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奴役，脱离剥削压迫饥饿失业和非人的法西斯恐怖。

目前的形势是中国领土内存在着的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中国及中国的劳苦群众前面尖锐地摆着一个问题，或者是直接的和经过国民党的工具而变为帝国主义的奴役的殖民地，或者是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确立。

在累次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动员其所能动员的一切力量，向着中央苏区作绝望的进攻。这个进攻已经继续了几个月，但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由于全中国苏区与国民党区域中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发展，蒋介石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但是，五次“围剿”还没有完结，蒋介石的变更作战的部署，只是为了他能够最迅速的经过福建来从东方侵入基本苏区，继续他的五次“围剿”。决定胜负的决战还在前面，每个工人农民，每个赤色的战士，每个革命者，在这个紧张与负责的关头，必须以一切的力量来准备迎接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取得其胜利，这个胜利将实现一省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

连队的政治工作*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一、连指导员如何进行政治工作？

第一，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连队中的政治工作的意义和重要，同志们都是亲身参加战斗，很清楚的。我们在四次“围剿”时，打一仗以后，还可以休息半个月，一星期。现在的战斗，和从前的不相同了。我们许多兵团，今天打仗，明天打仗，或者后天又要转移战区，继续进行战斗。因此，要求我们的动作，更迅速、更灵敏、更机动。我们是很少休息的时间，就是待机的时间也是很少，很短促了，所以我们的政治工作，应该放在连上，加强连一级的指导员、支部及每个党团员的责任。环境不容许我们像过去一样，召集很多的会议，每次会议经过几个钟头的时间，应该多用命令的方式，实际派人到连上去，口头的传达，帮助连上的工作，及个别的找指导员支书来谈话。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不能常常开会，不能经常在会议上详细的讨论，甚至有时候不能适时的得到团的指示，因此，我们的指导员，应有最高度的自动性，迅速的看到情况，自己定下决心，如像军事上，连排长要依据情况，迅速定下决心，不待上级之命令一样。目前连队中的政治工作，主要的原则是极大地提高连一级的独立性、创造性、自动工

* 这是博古在军委总政治部召集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演讲，刊登在《红星报》第四十三期上。

作的能力。

第二，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主要的是依靠着党的组织来进行。指导员应抓住连上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个别的口头的告诉他一定的任务。每一个指导员，应该很清楚的了解连上每一个党团员战斗员的情形，像了解我们手上五个手指一样。这样来分配每一个党团员，以至战斗员的工作。

第三，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更要求连的指导员、支书，以身作则，为全连的模范，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战斗员。模范作用，不仅是要依靠自己的勇敢（自然勇敢是必需的，但如果单凭个人的勇敢，自己跑到前头，脱离自己的队伍，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和工作，这是不对的），而且要告诉战斗员正确的动作，正确的运用新的战术，做战斗员的模范。比如在突击时，要坚决、迅速、顽强、积极的动作；在守备时，要沉着、镇静、毫不动摇；在行军时，要注意伪装，不表现丝毫的疲倦；在夜间动作时，同样要求有最高度的勇气、沉着、严格遵守战斗纪律等，这样来影响战斗员，使战斗员学习，做战斗员学习正确的战术的模范。

二、目前战斗中，对部队基本的教育是什么？

（一）运用政治课、读报等方式，来坚强全体战士的胜利的信心，使每一个红色战士都能懂得红军是不能战胜的力量，懂得在残酷的五次战役中，敌人在崩溃死亡中的困难，我们有着一切胜利的条件，具体的利用各种实际的材料（如帝国主义相互间，国民党如军阀各派间的冲突，白区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白军士兵的动摇、革命化、大批的开小差逃亡，以及苏区群众热烈的参战动员，整营整连赤少队模范营加入红军，各个战线上我们的胜利等），来解释我们必然能够战胜敌人的原则。不仅突击的兵团，要

坚强我们胜利的信心，即守备的部队，同样要巩固其守备的信心，相信我们能够巩固这一守备阵地，配合着我们突击部队的突击，能够战胜敌人。过去有些守备部队，缺乏守备信心，往往我们修筑了堡垒。敌人还没有接近，而我们即放弃这一堡垒，让敌人进来，这是非常错误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特别要着重表扬我们的红一团在三甲嶂上，红十二团在大阳嶂、白塘等战斗中的坚决顽强的精神，以一连的兵力，抵抗及击溃敌人一团以至数团之众的光荣模范。这些光荣的例子（各部队还有许多同样的光荣例子），应该深入到每一个战士的脑筋中去。在这方面不仅是要坚定战斗员对于整个红军的胜利的信心，而且要坚定每一个战斗员对于本部队的一定的具体的任务的能够完成的信心。

（二）防止与克服对子敌人的技术兵种——飞机、大炮、毒瓦斯等的任何的恐惧现象。我们应该使全体战士都能了解，这些技术兵种，是用来帮助步兵的，它本身并不能够解决战斗的任务。我们虽然没有这些技术兵种，但我们已经学会了对付这些技术兵种的办法（如对空射击、伪装、防空防毒等），使他们这些技术兵种，大大的减少其效用。同时对于敌人一切可能使用的新式武器（如装甲车、浅水炮舰等等）都要使他们了解对付的办法，防止与克服任何的恐惧害怕的心理。

（三）要使每一个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都能懂得新的战术动作，懂得在敌人使用新的战术下，我们亦应学会新的现代战术。在战斗中，怎样的注意隐蔽的前进，利用地形地物，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土工作业，以及严格的遵守射击纪律。在夜间动作中，要怎样的沉着，不要掉队，不要高声说话，不要点火及吃烟，注意联络，及非有上级命令不许乱打枪等。要使每个战斗员，不仅懂得山地战、运动战、还要懂得阵地战、堡垒战，同时应该使

每个战斗员，都能够使用新式武器，以便在战斗中，夺获敌人新式武器，便能够马上用来武装我们自己。这些，是需要我们的政治工作来注意，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新的方法（如读报、小组会、列宁室与各种研究组等）来深入到每一个战斗士（兵）中去。

三、政治工作应该适合于战斗的情况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应有适合于各种情况的政治工作。不仅是内容上，而且在方式上也有不同。分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口号，还要注意适合于各种不同情况的工作方式。

（一）在守备中，我们的目的，是提高部队守备信心，根据这一目的，说明我们守备任务的重要，表扬我们许多守备部队的成绩，相信我们能够巩固这一阵地，相信我们的反突击，能够战胜敌人，以及鼓励“与堡垒共存亡”的决心，同样要用最大的鼓励，遵守射击纪律，服从射击指挥，正确的使用火力。像三军团规定“没有班长的命令，不许打枪”一样，注意弹药的节省。

在守备的时候，如果时候比较允许我们，我们可以召集支委会议，党团员大会，政治战士的会议，以及军人大会，来进行各种宣传鼓动工作。

（二）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要求我们鼓起最大的勇气与决心，提高全体战士的阶级仇恨，使每个红色战士都能勇猛的冲锋，与敌人肉搏，了解在进攻中，敌人的飞机大炮、优势的火力，在白刃战斗时是失掉了作用。了解敌人士兵的动摇，在我们勇猛的冲锋面前，必然可以把他们冲垮、消灭的。在突击的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时间是大大的受到限制了，冗长的讲话，也是不适宜了。这时，我们只有利用五分钟的讲话，甚至只能个别的告诉组长，以及在途中设立鼓动所等的方式来进行。

其他各种情况，如在夜间动作、侦察警戒及退出战斗等时机，同样要适合这种时机，迅速的传达任务，定出具体的口号，在不妨碍军事秘密与我们的行动的原则下，进行有力的政治工作。

(三) 任何一个战斗，我们都要使全体指战员了解“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最高的形式”，任何的迟疑与动摇、畏缩，都是不容许的。战争——残酷的国内战争，要求我们有最高度的阶级觉悟，最高度的革命勇气，英勇的牺牲精神，用我们一切的力量，来消灭阶级的敌人。同时要提高我们的阶级警觉性，防止敌人的奸细混入到我们革命的队伍中来，消灭投敌的现象，使每个红色战士，都能用最坚决的手段，来对付投敌的分子。

现在的战斗，政治工作的中心是放到我们指导员、支书的身上。要求我们连上，有更多的活动，要求我们的连上，有独立性、机动性、积极性与适合情况，自动工作的能力。

给×××同志的信*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同志：

看到江西省红五月扩大红军的惊人落后，（据各补充师报告，连长胜在内，至二十日止不过二千五百人，而计划则除长胜外，应有一万两千人！）不能不使我们要严重的来追求这里的原因。不止一次我们曾经估计江西党的组织是苏区中先进的组织，江西党在突击的工作经常是能够最迅速的胜利的回答中央的号召与中央所提出来的任务，为什么我们的先进的组织，这一次表现这样惊人的落后？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更深刻地检阅江西党的全部工作与最近时期内党内生活之发展。

如果抛弃掉次要的枝节的原因，而提出基本的问题来时，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就是，江西省的组织在这次扩大红军中基本上错误的方针。在运动开始之时，中央已经着重指出：“我们必须最广泛的和深入的把目前战争的形势与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在党员中首先是积极分子中进行详细的解释……使每个党员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肩膀上的责任。”“要把博古同志的文章和中革军委的宣言，在每一个赤少队、一切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劳苦群众中进

* 在扩大红军的运动中，江西的扩军工作不尽如人意，因此，博古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写这封信给×××。此信刊登在《斗争》第六十三期上。

行通俗的解释，使中革军委的宣言成为广大群众武装上前线的誓词。”根据中央的委托，我在红中的社论上便直接以“我的位置在那边，在前线上，在战线的最前面”的标题，“号召共产党员、共产青年团员、赤少队与模范赤少队的队员以及一切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和农民”，“立刻放下我们的锄头，抛弃我们的犁耙，奋勇地报名当红军，穿上军衣，拿起枪械上前线去！”所有这些说明中央的基本方针，是根据最广大深入的对目前形势的解释与鼓动号召群众直接地加入红军，上前线去，同时这个运动须得开展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曾经直接的指出：“当然，模范赤少队的整连整排的动员是动员的中心，但是若把赤少队与模范赤少队看成像有‘天远地隔’的不同，把动员的范围限死在狭隘的模范赤少队的圈子里面，就是最蠢的事情，必须把动员的范围推广到赤少队以至无组织的群众中间去，必须动员全部逃兵归队，必须把扩红突击造成全体群众的热潮，同时争取上前线配合红军作战的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也是地方党与红军中党的任务”。（《斗争》六十期社论）

这是中央的基本的方针，我想是很明了的，这个方针无疑的是正确的，因为瑞金（二十天内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以及其他直属县的革命的实践已经确实的证明了 this 方针之正确。

江西的党的组织了解这个基本的方针没有呢？是否以全力来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个方针呢？很可惜，我们不得不说江西党的组织没有了解没有以全力去实现中央的方针，而是以自己的基本上错误的方针去代替了中央的方针，这就是江西党的吃亏之处。

什么是江西党的基本方针呢？以兴国、博生为代表的的基本方针就是动员模范赤少队上前线配合作战，而在配合作战的过程中（正确的说是在送给主力兵团后）由红军的政治机关，争取他们加

入红军。

这个方针的错误在哪里呢？就在：第一，他极大的减弱了我们的广大深入的政治鼓动，因为在配合作战的口号之下，许多实际工作中的同志将“偷巧”一些，而不坚〔艰〕苦地去进行政治鼓动。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因为紧张热烈的政治的鼓动，不仅能够提高新战士的战斗意志，而使他们热忱的自动的上前线去，而且能造成着在整个区域中间的热烈的战斗的社会舆论，提高全体劳动群众的阶级的觉悟。第二，他将运动限死在狭隘的模范赤少队的圈子里面，限制运动的范围而不能造成全体群众的热潮。第三，延迟时间。第四，影响到新战士的质量方面，不论是政治的觉悟方面或者军事的准备方面都是一样。为什么？因为在最初没有深入的政治的鼓动与说服。没有使他们了解今天的形势是死亡或胜利的形势和今天每个劳苦群众的责任，就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战斗的意志决心、勇气与政治的觉悟；至于军事准备，去年十二月军委已经有命令每一个新战士必须给两星期的军事训练才能送入队伍中去，而这种方式就破坏这个命令的执行，而使完全没有训练的新战士到队伍中去，或者主力兵团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要分出力量与注意去训练新战士。第五，这种方针并且影响于战区的党的直接的参战动员，显然的，兴国模范营接二连三地动员到杨殷去，必然地使杨殷的组织依赖兴国的力量而放松在当地的动员。

这就是这个方针为什么基本上是错误的。应该指出，兴国及博生的这种错误省委是没有纠正的，而且省委亦是赞助这个错误方针的。

这就是第一个基本的原因。

第二个基本的原因，在我觉得是更加重要更加值得注意的，就

是最近江西党的党内生活发展之不健全。江西省党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坚持地广大地进行着对于各个地方党的组织的工作的检查，发展自我批评来克服这些存在着的弱点与坚决的开展反对两面派的斗争、检举与驱逐一切混在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所有这些当然是对的好的。但是这个正确的决定却没有正确的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起来，而且在实际工作之中，犯着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使得我们党的地方组织不仅没有在发展自我批评，清刷阶级异己分子及反对两面派的斗争中巩固起来加强起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反面使他们涣散起来，麻痹起来，这样，便直接影响于今天党面前的战斗任务的完成。仔细地来考查这些错误的时候，可以看见它是表现在：

第一，没有把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与犯了错误的同志分别开来，没有把真正的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与忠实于党的路线而犯着个别工作上的错误、缺点、疏忽的同志分别开来，而采取简单的赤裸裸的一视同仁的态度。省委从四月底到现在把绝对大多数的县委书记撤了职（公略、万太、杨殷、赣县、胜利、博生、洛口）而且差不多全体都被称做为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什么是两面派？就是口头上同意党的路线而在事实上怠工，破坏党的路线，就是在口头上同意党的路线而事实上执行着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所以两面派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的名词，他不能够随便施之于一些忠实于党的路线而由于能力经验及其他原因而在工作中犯着一些错误、疏忽、弱点的同志。领导的任务就在怎样能够分别清楚这两种人，严厉的打击真正的两面派机会主义者，而批评、教育、帮助后者去克服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疏忽、弱点，而团结他们在党的路线周围，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两条战线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党的干部，巩固党与提高

党的战斗力，这在目前的情况下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应该记着斯大林同志的话：

“党的机关与党的群众是整个的，党的机关是党的整个领导的化身，机关应该包含好的无产阶级的分子，这些人的错误能够而且应该加以批评，能够而且应该‘刷新’他们，但是不应该侮辱他们，以免使党解体使党解除武装！”

很明显的，这个重要的指示，江西省委是没有加以充分的注意的。无疑的，在撤职的许多人中，是有真正的两面派与机会主义者在内，但是也有许多忠实于党的路线的而犯着一些错误的同志。而这种没有明确态度分别对待每一个犯错误的同志，便损害了党的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使党涣散，使党减弱战斗力。

第二，与这个联系着，便是简单的组织结论，而缺乏艰苦的说服教育与同志的帮助。反对倾向的斗争，主要的当然不是依靠组织结论（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而是依靠于广大的艰苦的说服与教育，以及以同志的态度去帮助犯错误的人克服自己的错误。列宁对于倾向，曾下如下的定义：

“倾向还不是完成了的流派，倾向是可以纠正的，人们离开了多少离开了正路或者开始离开，但是还可以纠正的，我想，这就是俄文倾向一字的意义。这是着重指出，这还不是已经完成了的，这是容易改正的——用倾向这个字只是预先的警告及希望，把问题完满与原则的提出来。”

在这个列宁定义之中，着重指出倾向是容易纠正的，其意义正是在不使以轻易与简单的处罚来代替教育与说服及同志的帮助。但是省委在这时期内以连一接二的撤职为满足，这不能不算很大的错误！

正因为这样，所以目前江西反倾向的斗争、反两面派的斗争

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他们增高党的战斗力，相反地，使一些干部觉得无出路与不安。这里，省委一级的个别负责同志，亦反映了这种不安的情绪。同志！这应该使我们警觉了吧！

第三，就是我们的工作团及省委，都没有能够以完成目前的战斗任务为标准，来检查各县党的工作与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成效，而脱离目前战斗任务的单纯的“清刷”与“反两而派”！这在赣江各县表现最明显！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了解江西党内生活最近时期发展之不健全，造成我们党的机关之涣散及干部之不安，是扩大红军工作惊人落后之基本原因。目前的紧张的情况，要求我们的队伍有最大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与团结，在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要驱逐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但是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切忠实的党员于党的路线的周围，帮助某些犯错误的同志克服自己错误，而在中央与省委的领导之下，为着党的路线、党的任务而斗争到底！

这是两个基本的原因，至于干部力量分配之不当，没有抓住中心的区县及动员机关之薄弱等等，在我们报纸上已经指出了的，不再重复！

希望省委讨论这封信。我相信江西省的组织仍然能够表示自己是先进的组织，勇敢地改正这些错误，而最迅速的完成自己而前的战斗任务。

顺致

布礼！

博古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

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

（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是要把三年以来，党在组织民族革命战争方面的工作，做一个总结，和说明党在这方面所规定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这个总结是非常必要的，这因为（一）目前我们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新的大举进攻的面前，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阶段面前，处在中国民族危机新阶段的面前。这个紧张的情况要求我们仔细的检查过去整个时期中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它的成绩和缺点，并由此决定我们新的任务。（二）因为正是在这方面，亦能够清楚的看出四中全会以来，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面的进步，党不仅能够正确的提出总的路线与总的口号，而且能用具体的灵活的战术的方法，使群众在自己的政治经验上相信党的口号，使党的口号成为广大群众的口号，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之实现。我们应当具体的说明党的这一进步，这对于我们党——首先是年青的新党员有极大的教育的意义。（三）因为反帝问题，是党与一切反革命派斗争最尖锐的一方面，在这个

*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讲会上发表的演说，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出当时他的政治观点，其中包括不少的“左”倾错误观点，为了历史地、全面地了解博古，故将这篇演讲全文刊登，原文刊登在《斗争》第六十九期上。

问题上，党用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反对改良主义的和国民党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并在这方面取得巨大的胜利。党在残酷与艰苦的斗争之中，在思想上、理论上大大的增涨了。总结在这方面我们几年来的经验，将能更加尖厉我们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武器。

一、党在反帝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口号和战略原则

试问：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上党的基本方针、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什么？

党的基本方针，即在于尽量发展苏区与非苏区的群众革命斗争，把全国的革命斗争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适时地配合起来，率领它们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的统治，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这就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

但仅有着总的路线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根据着这一方针而定出的明显的具体的口号，就不能组织与号召群众，发展革命斗争。我们党不仅有了上述的方针，并且定出了动员群众的三个基本口号：

（一）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二）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胜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三）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彻底进行与领导最广大的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并达到完全的民族解放。

从九一八以来，一直到现在，党的动员群众的基本口号就是

这三个。

但是，仅仅有了口号，还不能组织胜利的伟大的民众革命，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使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使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是布尔什维克战略原则的第一个。

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说：

“如果这个革命是一个真正民众的、含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那末，它的胜利，只靠一个党的正确口号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必须的条件，才能使革命真正获得胜利，这就是说：必须要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去相信这些口号之正确，只有那时候，党的口号才能成为群众的口号，只有到那时，革命才成为真正的民众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期中，其策略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正确的决定那种路线和关键，能很自然的使群众跟着党的口号走去，使他们能根据其本身的经验，很自觉的去了解和承认这种口号的正确。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策略上的另一特点就是，它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领导不相混淆。它很了解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的根本区别。”（《列宁主义问题》第三五页）

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是依据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指示而工作的。三年来党在反帝运动方面的努力，正是在用一切方法使党的口号由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相信是唯一的正确的口号，藉以保证革命发展成为伟大的民众革命。

当我们总结过去的工作时，第一个出发点就是而且应当是：党在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上，怎样做了工作，并得到了些什么？

党的战略的第二个原则，也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就在孤立妥协的改良的政党。

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说：“列宁主义战略上根本规律，就是在

承认：

（一）在革命将获最终胜利的时期中，最危险的革命的敌人的社会柱石就是妥协的政党。

（二）要推翻我们的敌人（沙皇及资产阶级）首先必须设法使这些政党陷于孤立。

（三）在革命准备期中，我们的枪锋，应注射在这些政党上面，首先必须把他们孤立并和劳动群众隔离。”（同书二十八页）

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这一原则，也就是党在三年以来所采取为领导的战略原则的。

在这方面要指出：在三年来的斗争中，我们在抗日救国的问题上不仅是要与一切反革命派别血战，而且在朝的国民党统治，虽然实质上是无耻的投降与出卖中国，然而口头上自始至终想用种种方面企图表示他是要“抗日救国”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妥协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口号纲领，正是从国民党武器库中拿出来的。因此，要揭露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派别，必须揭露国民党一切无耻的武断的宣传。

党在三年来的工作中，还有第三个中心的领导的原则，即是尖锐地把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起来，把这两个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制度，对立起来。在群众中竭力提高苏维埃与红军的威信。

党在三年的斗争中的领导的战略原则就是这三个。

二、党在三年来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了这些基本原则？

党在反帝斗争中的工作，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今天，可以分作四个阶段来说，这四个阶段就是：（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南京大示威为止，（二）上海一二八战争起，经过李顿调查团来华，到一九三三年春一月苏维埃中央政

府和红军发表对日作战统一战线的三个条件的宣言止；（三）人民革命政府的产生到它的破产；（四）目前阶段——即日本新的进攻与民族危机的新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到南京的枪杀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直接在九一八事变影响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惊醒了广大的中国民众，唤起了他们的民族的自觉。千百万的群众是卷入于反日斗争的热潮之中来了，这是每一个真正的民众革命的先决条件。但是同时这种最广大的群众的民族的醒悟，在最初的阶段上，亦必然的将一些偏见、幻想迷惘，带到运动中间来。列宁曾经说过：

“一切种种被压迫者不满意者的群众斗争之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个斗争——非有他们的参加不能有群众的斗争，不能有任何的革命——而且同样必然会把他们自己的偏见，自己的反动的幻想，自己的弱点与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列宁《关于民族自决辩论的总结》）

九一八以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广大的群众是觉醒了，运动的范围是扩大了，但是整个运动还缺乏明确的纲领和口号。一切党派都用各种各色的方法，来争取群众，各种各样的众口纷纭的五光十色的口号纲领宣言在战斗着，国民党、“国家主义派”^⑧、“社会与教育”派、“新月”派^⑨……以至托陈取消派^⑩都提出了自己的口号与纲领。这一时期，是各种党派，各种口号，各种纲领，斗争最剧烈的时候。一切反革命的在野党派：“国家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新月”派……一直到托陈取消派，虽然有五花八门的面目，但是它们同有两个基本口号：（一）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宣战；（二）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容纳各反革命党派参加政权——这个要求的具体口号，就是所谓“组织国防政府应付

国难”。

当全国民众对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极度愤恨的时候，国民党的基本方针，就是把一切罪恶推到张学良的身上。国民党把自己与张学良分开来，为要竭力表示不抵抗的只是张学良而不是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与一切反革命派别一起，鼓吹“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的口号。同时它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来对付一切在野的反革命党派的“国防政府”口号。国民党一方面竭力维持群众中对它的幻想，另一方面则团结一切反革命党派，首先是团结国民党内部力量，来抵抗广大群众的民族觉醒。

在这样的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下，我们党的方针和具体方法是怎样的呢？

党抱着下列三个基本方针：

(一) 坚定的揭破一切反革命党派的各种口号，在群众中广大的传布与通俗化党的基本口号（即前述的三个基本口号）。并经过各种过渡的口号，使群众在自己的切身的经验上，确认党的口号是唯一的正确的口号。党把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来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党并提出各种辅助的口号“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完全自由”，“组织义勇军要求发枪并夺取枪械”，“组织反日的罢工罢课示威游行”等等，并且根据每一个事实证明整个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国民党政策的典范，并使群众能依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而证实这一点。党揭破“国防政府”是卖国的屠杀群众的口号，把苏维埃的口号与“国防政府”的口号对立起来。

(二) 紧抓着群众中的民族觉醒，清楚的估计到群众中存在着的弱点、偏见与幻想，不是简单的站在群众运动之外去批评这些弱点、偏见和幻想，不是仅限于文字的口头的揭露反革命派的口

号，而是一方面最明确地指出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的口号之幻想与反动，另一方面尽量发动群众，不是在纸头上电文上，而是以群众的行动广大群众的请愿与示威要求国民党实行对日宣战，藉以使群众在自己的切身经验上了解国民党是不会对日宣战的，藉以消除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并揭露在野反革命派别之真正的政治面目。

(三) 迅速团集革命的力量，形成全国革命运动领导的中心与骨干。党加速建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在一九三一年十月革命纪念节，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了，颁布了革命的政纲，成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党把苏维埃的革命政纲，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纲对立起来。并在这个革命政纲的周围团集全国的革命力量。

党所进行的具体步骤是：(一) 利用广大群众民族觉醒的茁长中，国民党失掉控制力量的间隙，尽量争取半公开的地位，用一切可能的公开与半公开的方法，如集会、刊物、群众示威等，进行广大的宣传。(二) 把反革命派所召集的群众大会的领导权，夺取到我们的手里，把大会变为革命的集会，上海九月二十六日的群众大会就是最好的例子。(三) 发动群众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示威与请愿，夺取这些群众示威请愿的领导权在自己的手里。(四) 最广泛地组织群众的反日团体（反日会、后援会等）及义勇军的组织，发动一切形式的群众抗日运动，抵货、罢课、罢工、示威等等。

党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在这个阶段上得到什么结果呢？

九月二十六日的上海群众大会，我们在这大会上夺取了领导权，把反革命派所召集的大会变为革命的大示威。十一月三日五日党所领导的两次上海闸北示威中，国民党开始撕破它的“对日

宣战”的假面具，公安局五区下令开枪屠杀向国民党请求对日宣战的群众。广州在十一月十日发生同样的惨杀。但国民党仍用撤换公安局长职务的办法，来维持群众中对它的幻想，装出模样好像下令枪杀的只是公安局长，而不是国民党，好像国民党还是准备对日作战。我们党于是集中火力，把运动推向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去，动员了广大的学生群众，到南京请愿和示威。直到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南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于示威和请愿的学生，实行大批屠杀。国民党已经不能容忍群众的民族觉醒，下令禁止一切反日罢工示威等，连到南京请愿对日宣战也被禁止。国民党公开地说，“对日宣战”是政府的事，民众不得过问。这时候国民党迫得不能不取消“对日宣战”的口号而改用所谓“长期抵抗”的口号。国民党不能不暴露自己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以血的镇压来对付群众的抗日运动。

这样，一方面，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欺骗被拆穿了，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上认识了国民党的卖国贼的作用；另一方面，群众的反日运动开展起来，并且这个运动带着直接反对国民党的性质，群众的反日组织是形成和巩固了起来，而十一月七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更把苏维埃与国民党的原则的对立尖锐显示了起来。

第一阶段的情形，就是如此。

第二阶段——一二八到中央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抗日作战协定三个条件的宣言

南京屠杀之后，党继续开展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组织反对南京政府屠杀的群众行动。在上海，这一斗争得到“抬棺示威”的名字。党在上海领导群众把在南京被惨杀的杨姓学生的棺柩抬着游行，组织了几年来所从未有过的几万人的大示威，示威的行列通过许多上海最重要区域与街道。这时候运动是扩大了，但运动

有自己的弱点，就是还没有吸引更多的工厂工人来参加运动，无产阶级的骨干还是比较的弱。党立即就注意到工厂中的工作，使这一运动不仅有无产阶级的路线，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组织的骨干。党组织了沪西的同兴、日华等日本纱厂的罢工，并把它扩大成为全沪西以至全上海的日本纱厂总罢工。这一目的，在上海战争尚未爆发的前夜，就达到了。这一伟大的日本纱厂同盟罢工，革命化了整个上海的环境，使帝国主义在赤色的上海面前恐怖起来，因而决意采用直接武装占领的方法，来与革命的上海工人与上海民众作战。同时，亦因为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及群众的反日运动的高涨，使十九路军士兵受到革命的影响。由于这些情形，爆发了“一二八上海战争”。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十时，国民党已经完全答应了帝国主义的一切要求，十九路军军阀下令军队撤退淞沪，把上海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并且封闭民众反日会，禁止一切反日运动，镇压反日罢工，自己担负起反对上海反日运动的清道夫的使命。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已经完全可以证明，上海战争中最初抵抗的是工人义勇军。工人群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引起了十九路军士兵的自动参加。大家知道，当一二八战争爆发的时候，十九路军已大部退出上海，留在上海的只有一团人。战争爆发后，因为十九路军士兵要求抗日，十九路军军阀最初只肯每团抽一些人去作战。但是十九路军士兵违抗了他们官长的意志，全部参加了抗日战争。工人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士兵，把这个英勇的抗日战争支持了一月零四天。

国民党采取了一切办法，来迅速地结束战争，他们准备收缴十九路军士兵的枪械，最后更用机关枪扫射不肯撤退的十九路军士兵。一切反革命党派，重新提出了他们的已经破产了的“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的口号。

我们的党做了什么呢？我们告诉全国民众，怎样能够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党在二月二十六日，即是上海战争的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拿上述一标题发表了宣言。宣言说：

“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

因此，我们主张：

（一）十九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

（二）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迫，自动启封一切革命团体，大批的武装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民众的义勇军与游击队，保护自己的革命组织，并参加前线作战。

（三）革命的士兵，立刻组织士兵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当十九路军士兵在上海抗日作战时，一个多月中共收到民众捐款与慰劳品数千万元，大多数被军官吞没——博注），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且加入民众的革命组织。

（四）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革命战争。

（五）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银行、工厂、商店与交通工具，拿来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用途，并且以同样的办法对付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家。

（六）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腾出一切公共房屋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居住，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筑物交给工人与灾民的组
织；从大资本家大商人大批的征发粮食与衣被，分配给失业工人与灾民；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投机资本家的财产；立刻宣布八小时工作制与社会保险，改良失业工人的生活；没收一切地主

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七) 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的代表会议，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

我们以为只有这些具体办法的实现，才能把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拿在我们的手里，而不为国民党军阀所出卖。也只有这样，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上海战争中党提出了最彻底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纲领，提出了要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的革命的办；这是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具体的行动纲领。

但是，我们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主要的弱点，这就是，党没有能把上海战争的军事上的领导权夺取在自己手里，一直到战争结束，军事上的领导权是在十九路军军阀的手里的。我们的这一弱点，一方面使国民党能够出卖上海战争，另一方面使国民党及十九路军（军）阀能把自己描写成为“民族英雄”，这就使得：

(一) 国民党能在一二八后再行欺骗群众，似乎国民党中至少还有十九路军那么一派不是不抵抗的，国民党利用了这一政治资本，就提出“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国民党卖淫妇汪精卫之流，把上海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苏维埃与红军身上，说上海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红军“捣乱后方”，使国民党“不能调兵援助十九路军”。为了增加这种武断宣传的政治资本起见，国民党尽量利用一些所谓“民族英雄”除了蒋光鼐^⑤、蔡廷楷^⑥等以外，还把出卖满洲义勇军的×××、×××等抬出来。蒋介石把×××、×××等请到江西来“参观匪区惨状”。叫他们回去宣传，说“江西的共祸，比满洲的亡国还要凄惨”等等。

(二) 国民党散布对国际联盟与美国的幻想，说“世界公理尚存”，要群众去等待美国与国联来主持公道。党的弱点，使得党在

一二八战争以后，要用极大的努力，长期的工作，才能把国民党的欺骗完全揭露。

一二八战争之后，群众已经知道国民党的投降出卖，但是他们还没有确信苏维埃与红军真正抗日。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党的方针应当是三个，第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最明显地表示苏维埃与红军是决心准备抗日的，揭破国民党“红军捣乱后方”的欺骗。

正当国民党说红军妨害抗日的时候，苏维埃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发表了对日宣战宣言和动员令。宣言中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直接的毫无障碍的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在全国大大的发展起来。”

国民党把淞沪变为共管区域，而苏维埃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下动员令。在动员令中，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红军、地方部队与赤卫军，全体准备随时出动，全国苏区准备一切力量来发展民族革命战争。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这一行动，相当的揭露了国民党的“抗日必先剿共”的武断宣传，但还未能把它完全揭露。因此国民党尚能在“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之下，进行四次“围剿”。

为着更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和表示苏维埃红军的抗日决心，在黄狮渡战斗胜利，四次“围剿”开始粉碎的时候，在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的时候，中央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发表第二次宣言，这就是最著名的在三个条件之下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宣言说：“国民党政府及其政客，解释他们的罪恶行为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中国苏维埃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国防，使蒋介石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将近一百万的大军，去进攻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工农。

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开始了解，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胜利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斥国民党的解释是愚笨的谎话，他们想用这些愚笨的谎话，在全国民众的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四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进攻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红军，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族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这一宣言，是反帝反国民党最主要的文件之一。它揭破了国

民党的“红军捣乱后方”的谎话与造谣，使国民党军阀处在最困难的地位中。这一宣言的影响，如此之大，使得国民党政客丁文江之流也来讨论这一宣言。丁文江做了一篇文章，叫做“假使我是蒋介石”，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假使他是蒋介石的话，他就要与红军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了。帝国主义的报纸，也把这一宣言发载〔表〕出来，并且认为这是中国的重大事变。宣言惹起国民党下层党员的不满，质问国民党中央，为什么不与红军联合抗日，以致于汪精卫不得不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含糊地狡猾地回答道：“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质问，为什么本党中央不与红军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呢？这个问题是太幼稚了。”最后，这个宣言瓦解了“围剿”苏区的部队的军心，直接帮助我们彻底粉碎四次“围剿”。在士兵群众要求北上抗日，不愿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的压力之下，许多中下级白军军官要求北上抗日，离开江西，甚至蒋介石的最忠实的走狗陈诚也惧怕因士兵反日情绪与对苏维埃红军的同情之增大，而在与红军作战时遭受更大的损失，被迫向蒋介石提出北上的要求。这使蒋介石再不能容忍下去，不得不公开下令，说“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

这样，我们就把国民党“抗日必先剿共”的政治资本，完全夺去，把国民党的卖国嘴脸，赤裸裸的在广大群众面前揭穿。

为要掩饰自己的投降出卖，国民党用一切力量企图证明“中国无力抗日”。藉此在群众中散布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失败情绪。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卖淫妇汪精卫做这样的演说：“要有抵抗的能力，要充实抵抗的能力，必须从政治上社会上想种种方法去充实国民的生产力，然后再想种种方法，使国民的生产力能应用于武力……”。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没有力量抗日，要抗日必须等“建设”后才有办法，所以现在只好让日本向中国进攻，只好步步

投降，步步屈服。他的这些话，不过是想把国民党的一切卖国行为，以及将来更大的无限制的卖国行为，解说成为合理的行为，但国民党已经被迫得不能不公开承认，它完全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它迫得承认，它是向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投降，步步屈服，而且是反对抗日的。

党除了上述的第一个方针以外，还有第二个基本方针，这就是建立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群众已经对国民党不满，但还没有完全的相信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最广泛的团结群众，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党在这时候与“左”倾的关门主义作斗争，因为“左”倾的关门主义，把那尚没有相信和拥护苏维埃的而真心愿意反日的群众，当作反动的看待。党同时也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不愿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不愿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我们变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尾巴。党在许多文件中提出统一战线的问题，在去年九月党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中，指出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与策略方针：

“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阶段上，我们的总策略方针，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斗争》十九期）

在这封信上，中央指出了统一战线的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性，即无产阶级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提穿统一战线内同〔团〕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

“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

“第四，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就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同上）

党在这四个原则的基础上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关于三个条件的宣言，亦是根据着这一基本方针而作的。党用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在满洲以人民革命军为骨干，与其他义勇军订立了统一战线。谁也知道，因为党的这一方针，满洲的反日战争不但不因国民党军阀的叛卖变节，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惨酷屠杀大举进攻，而削弱、而失败，相反的，现在连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承认，没有十年的“进剿”不能把这个力量消灭。它日益团结满洲最广大的反日群众，成为满洲苏维埃运动的胚胎。

党的第三个基本方针，是尽量揭露国联与美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针对着国民党的散布美国国联的幻想，党在群众中指出，国联和美国并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相反的，它们鼓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自己也实行趁火打劫，加紧的瓜分中国。党利用了李顿调查团来华及其报告书，美帝国主义在上海战争时企图瓜分上海等等事实，进行揭破的工作。消灭国民党在群众中散布的幻想。结果是很明显的，国

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的机关，美国一样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些观念是最深刻地印入于广大群众的心头。

第二个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无疑地，在这个阶段上，由于我们采取了许多灵活的适时的战术步骤，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这个阶段上以及以后的时期中，我们还有许多弱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没有能够适时地揭破国民党“中国无力抗日”的武断宣传，而以明白通俗的反日作战纲领，在群众中广泛地通俗化起来以坚定群众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的信念。

第三阶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⑧的产生及其覆灭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滦东、察哈尔，卖国贼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使进攻苏区的白军瓦解，在四次战役中得到最后的胜利，并且接着在福建方面摧毁了十九路军军阀的进攻，得到极大的胜利。

国民党统治的破产，群众的不满和革命情绪的增涨，苏维埃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个能不迫使统治阶级找寻新的机动，玩弄新的把戏，以新的统治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一九三三年秋季我们在统治阶级的营垒中看到两种政治的倾向，一方面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之法西斯蒂化的激进，这一派想依靠于野兽般的恐怖主义，无情地残酷地镇压一切群众的不满情绪，依靠法西斯蒂的屠刀来维持自己破产了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十九路军（军）阀为首的一派，企图借助于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以阻止群众更近的革命化，而在新的形式之中继续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后这便形成统治阶级营垒中公开的分裂，福建便组织了独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它在一个时期中成了一切在野的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派集合的中心。

人民革命政府的问题，是放在党面前的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政府公开的与南京政府对抗，口头上讲着一切革命的词句，并且以口头上的应允苏维埃的三个条件而要求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协定，事实上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很清楚的，这些屠杀工农兵与革命士兵的刽子手，不会执行任何与南京国民党有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的。问题的复杂更在于他们的确有一部分群众的支持，这些群众极端愤怒国民党的投降和卖国，然而还没有能够确信我们的主张，福建派的首领们正是用找寻第二条道路之旗帜以剥削群众间的这种情绪而阻止他们直接的转到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的方向来。

在这种情况下，党采取了如下的基本方针：

(一) 尽量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争取群众的同盟者以推动并发展在福建以及全中国的群众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将这个问题提高到争取革命后备军的高点上来。

(二) 最严格地无情地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并使群众在自己的实际经验上了解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的真理，以促进第三条道路找寻者的破产，以保证群众决定地转变到我们方面来。

(三) 在福建派承认苏维埃红军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不拒绝与福建政府订立初步反日反蒋的协定，以便在群众的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并只要有最小的可能都用来为着实际的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而奋斗，同时最严厉地批评指斥福建派对协定的执行的延宕，迟疑背约，藉以揭破他们的真实面目。

党的这个基本方针是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战略战术的原则而定下的。

斯大林同志曾在列宁主义概论上指出：除了在直接的革命后

备军之外，还有一种间接后备军。且特别指明这种间接的后备军“对于革命过程有重大的意义”，这种后备军是：“（一）无产阶级以外之本国的其他阶级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的势力，增强自己的后备军，（二）敌视无产阶级国家之资产阶级国家互相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譬如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向敌人进攻或对敌人防御。”（列宁主义概论九三页）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战略的指导和任务，就在正确使用所有这些后备军，以求在革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中，达到革命的根本目的。”

怎样才能正确地使用这种后备军呢？

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更详细的解释了这一问题：

“要想战胜更有力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并且必须最谨慎周到细心敏捷的，一面利用敌人间每个（即令是最小的）间隙，利用各国资产阶级间各国内部各种资产阶级间的每个利益的冲突，他方面利用每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的机会以求获得群众的联盟者；尽管这个联盟者是一时的、动摇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都不要紧。谁要是不懂这一点，谁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一窍不通。在比较长久的时期中，在比较复杂的政情中，谁要是不曾在实际上证明他会应用这个真理，那么他就可以说还未学会怎样在斗争中帮助革命阶级，以求把全体劳动人民从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及以后的时期，都可适应。”

列宁与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战略原则，党把它采取了作为对付人民革命政府事件的领导的战略原则。党依照着这一原则，把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提到为征〔争〕取革命后备军的高度上来，这

样来揭破第三条道路的武断欺骗，忠实于自己的发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事业。

党与苏维埃政府怎样实现了这个基本方针呢？党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步骤，其主要的是：

（一）最坚决揭露人民政府的政纲：指出其政纲之中“否认帝国主义强制的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及拥护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指出“计口授田”实际上是阻止农民自动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口号，揭破所谓生产人民的术语是用以模糊抹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以党和苏维埃的革命政纲尖锐地与他对立起来。

（二）利用他的反日反蒋的左的空谈及民主权利的允诺，发动广大的反日反蒋的群众运动，号召群众自动地实现一切民主的武装的权利，提高这个运动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斗）争及土地革命的高点。

（三）为着这点加强党在福建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的工作，组织他们在工会、反日会、农民委员会等等中间，并实行自己武装起来同时采用最广泛地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保证在这个运动中的我们的独立领导。

（四）在苏维埃红军宣言的三个原则的基础上，苏维埃与人民政府订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采用许多政治和军事的步骤以求这个协定的实现及推动反日反蒋的斗争，同时最严厉批评指斥揭露“人民政府”的对协定的怠工，藉以揭露人民政府领袖的反革命面目。

（五）加强在十九路军士兵中的工作，号召他们反对反动的长官，实行坚决的反日反蒋的武装斗争，号召他们与红军联合与加入红军。

这些以及其他的步骤，保证了党的基本方针之实现，扩大了党和苏维埃的影响，使群众了解第三条道路的破产的实质，使它迅速地走到破产。广大群众不仅知道国民党是不能抗日的，并且知道，所谓第三条道路也不能抗日，只有苏维埃能够领导胜利的抗日战争。

不管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弱点，以致我们没有能夺取十九路军影响下的士兵到我们方面来，没有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个时机，但是我们基本的方针是正确的，而政治的成功亦是不可忽视的，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阶段。

三、民族危机的新阶段中我们党要做的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已进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民族危机的新阶段。

哪些事实表明民族危机的新阶段？这就是：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北、华南都最积极的进行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事实上已经占领了整个黄河以北的中国地方，而且事实上开始占领福建。但这并不使它满足。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所发表的宣言，声称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国，一切帝国主义不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允许就不得干涉中国事情。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把全中国做它的殖民地。在发表宣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许多步骤，日本公使有吉与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黄郛密谈卖国协定。实行中满通车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无阻碍的侵入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一千五百余件所谓“中日悬案”与国民党进行交涉，其中一件就是要国民党政府承认三万万圆的西原借款。日本帝国主义把南京副领事藏本藏在山里，藉口藏本的“失踪”动员兵舰集中南京，镇压南京政府，更进一步地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台湾浪人在福建到处活动等等。总起来说，就是：日

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占领华北，并且要独占全中国。把全中国变为满洲，变为它的奴役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地进攻福建，这是将来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准备。

国民党更公开地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现在国民党已经不但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它已经出卖了满洲、华北、藏康、新疆等半个中国，还在继续出卖整个中国给帝国主义。

国民党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运动”来麻醉群众。“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是“复兴中国民族”，不是用民众的武装的抗日战争，而是用提倡礼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隶顺从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地做奴隶。“新生活运动”不是蒋介石所发起的，而是帝国主义所发起，由蒋介石来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才是“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与组织者。日本的最积极主张侵略中国与进攻苏联的法西斯蒂军阀——前陆相荒木贞夫，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与日本新闻记者谈话：“道义的日本，建设皇国的日本于道义之上，集日本全部的努力，其庶几乎有效。”以侵略、屠杀、轰炸、抢掠、奸淫为事业的“道义的日本”要把中国也创造成为“道义的日本”的一部分，所以要使国民党先在中国亡国之前，把旧道德提倡起来，准备顺民，以便“皇国的日本”好来安稳的统治。今年四月二十日，日本驻福州公使今村，在蒋鼎文的宴会上说“中日两国的国交，要建立于道德之上。”换句话说：中日两国的“国交”，要建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用“新生活运动”提倡旧道德，养成帝国主义顺民的基础上。

国民党高喊“中国无力抗日”、“抗日必先建设”。国民党的四中

的

对于抗日作战的悲观失望的情绪，阻止群众的革命斗争。

同时全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虽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下，但仍是发展着。最近，七月一日中满通车的第一次列车，在塘沽与芦台之间，发生爆炸，乘车的汉奸遗老之流死伤了半数。在华北战区中，发现了革命的传单。在白区，成千的爱国志士正在发起民族自卫会。反日反帝国的斗争也正在走上新的更剧烈的阶段。

在目前的阶段中，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

为着实现党的基本口号，我党的中央已经和将要采取什么步骤？我们应该动员做些什么？

（一）党在四月二十日的宣言中，定出了反日统一战线的五大纲领：1. 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华北与全中国的塘沽协定和中日直接交涉。抛弃对国联与美国的任何幻想，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与胜利的保证。2. 全中国的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3. 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用所有军器库及入口武装来武装民众，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积极援助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广大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4.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来作为抗日的费用。5. 中国必须立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这一个步骤，使我们具备了一个最通俗的纲领，作为团结全国民众的旗帜，揭破国民党的“中国无力抗日”的欺骗。

但是，仅仅有这个纲领，还是不够的。要使这个纲领为群众所了解，要使群众了解中国是有力抗日的，必须进行具体的解释，

解释我们对日作战的时候，兵力哪里来，武器哪里来，战费哪里来，拿什么做领导机关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群众完全相信，抗日是有办法的，而且一定会胜利的。

这个解释与鼓动应该依照着下面的基本纲领而进行：

1. 全体人民总动员：广泛组织民众反日义勇军、反日游击队、募捐委员会以援助满洲、热河义勇军与游击队，以及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基金，组织侦探队、破坏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宣传队等等；组织纠察队，以监督抵制日货，吸引和动员一切民众去进行反日反帝斗争。

2. 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不许一兵一卒一个〔架〕飞机留在后方反对本国民众。停止进攻苏区，一方面使红军能够进行反日反帝战争，他方面，使军队不至于参加屠杀工农，而给他们一种可能把自己的武器用去反对中国的死敌——帝国主义侵略家。

3. 以兵工厂和军器库的一切武器来武装全体民众，将本国已有和正在制造的以及由外国买来和输入的武器武装起来。

4. 解决抗日战争军费的具体办法：（1）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租界、银行、工厂、铁路、轮船、矿山等）和商品，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因为日本在华的投资已经超过了日金二十万万，（2）停付日债一切本息，（3）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4）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5）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劳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人们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等等。

我们必须动员我们一切的力量用一切方法来通俗化这个纲领。这是揭破国民党无力抗日的胡说的最有力的工具。

（二）不仅要宣传，而且要用这个纲领来广大的组织群众，把

工人、贫民、学生以至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组织在各种民众反日组织之中，我们用一切力量来形成民族革命自卫委员会，成为领导抗日战争的最高指挥机关与政权机关。

(三) 加强白军士兵中的工作，要采取更多的方法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工作薄弱的一环，今后必须努力的加强它。要学习上海战争中的经验，利用居民中的反日情绪来影响士兵群众。

(四) 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目前的阶段中我们已不能满足于宣言与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担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相当的决定。我们应该给群众证明，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

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迫近，我们的全体红色的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率领着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这种情形，要求红军努力提高军事技术，军事政治的教育，和自觉的纪律，使红军能随时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我们的赤少队，也要加强政治军事的训练，准备将来一声号召之下，站在全国民众的先头，去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五) 但是，当苏维埃与红军进行一切工作来组织全国民众的抗日战争的时候，丝毫不能减弱我们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工作。因为这个“围剿”，是帝国主义所组织的，是对中国唯一完全脱离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区域的进攻。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每一次进攻，都是与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联系着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国民党不是去进行抗日而是进行对苏区三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热河，国民党不是去抗日，而是进行对苏区的四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国民党不是去抗日，而是进行对苏区的五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宣言

独占中国，国民党不是去抗日，而是向苏区大举进攻。只有忠实于我们的口号：“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的前提”，彻底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全部红军才能北上抗日，才能真正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

* * *

我们将实现列宁的预言。列宁曾对东方的弱小民族说：

“无论这些民族如何弱小，无论欧洲的压迫者在斗争中使用一切惊人的技术与军事艺术，似乎他们的力量是不能战胜的，然而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果它善于唤醒真正千百万的劳动者与被剥削者，那末，它包含有这样的可能，这样的奇事，就是说：不但从世界革命的前途的观点，而且从直接的军事经验的观点来看，东方民族的解放，现在就实际上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们将要教训帝国主义者们，教训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们，教训高喊“中国无力抗日”的汉奸卖国贼国民党，中国的民众将在苏维埃的领导之下，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得到彻底的民族解放，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

白区学生的反日斗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此次平津京沪粤各地十数万学生举行的壮烈的罢课示威游行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本土，蒋介石无耻卖国所激起的中国人民救国图存的爱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登堂入室了，中国四五百年来之首都——北平，已经沦于异族，冀察两省非我所有，鲁晋绥豫诸省岌岌可危。而卖国当局如蒋介石辈，反而更加投降出卖，协助日本组织傀儡政府（即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①订立天津密约。外有暴日，内有国贼，亡国灭种的危险直迫临头。凡我大中华民族之人民稍有血气自然不能坐视不起，各地学生本着中国学生所特有的民族革命之光荣传统奋然起来举行罢课、请愿、示威游行来向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示威，并以英勇的行动来感奋激起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救亡图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他们这种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我大中华民族不可灭亡的精神，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些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深深地表示无限的同情与敬意。

宋哲元在北平的屠杀，各地卖国政府的大批逮捕更极端地表现了卖国贼之无耻、残酷、毒辣，为尽忠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竟

* 1935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学生举行盛大的反日、反蒋示威游行活动，红中社记者走访了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的博古，并将博古的这次谈话刊登在《红色中华》第二百四十五期上。

不惜以刺刀子弹牢狱来对待爱国同胞。虽秦桧、李完用辈亦不足比拟其无耻与毒辣。可是，卖国贼们应该记得血债要以血来偿还的。毫无疑问的，屠杀流血、恐怖是不能阻止民族斗争的发展，只会激起全国学生及各界人士的反日反卖国贼的浪潮。苏维埃政府对在卖国贼刀枪下牺牲的英雄表示沉痛的追悼，号召全国人民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为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对于被捕的爱国学生致意慰问，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全部释放。国民党政府及各地当局中，如尚有不甘为卖国贼与亡国奴者，应立即实现这要求。

人民的苏维埃政府是永远与彻底的为着大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战的。最近更主张组织抗日讨蒋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准备用一切方法给各地的爱国学生以精神的、物质的、实力的援助。

深望平津京沪等地的学生本不屈不挠，百折不回之精神，继续奋斗，使这一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唤起与组织全国各界同胞实行武装起来，组织学生义勇军及人民革命军等来进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独立自由的大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

红军在山西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已渡过，民族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我们的铁红军。”“卖国贼阎锡山，太原□得稳，传来了警报，胆战又心警〔惊〕。沿河堡垒一扫尽，吓掉汉奸魂。”“红旗山西飘，同胞齐欢迎，华北国阴谋，受了当头棍，抗日讨蒋大家来，工农商学兵。”

——红军渡黄河——

谱着陕北调的上引的歌声，传遍着抗日根据地每一个农村和田野！红军渡过了黄河！吕梁山脉驰骋着民族英雄的战骑，同蒲铁路飘扬着鲜明的红旗！这红旗，好多年来已经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解放的旗帜，而今天，却并是全国人民民族解放的象征！这工农红军今天已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争取直接迅速对日作战”是充溢在每个战士心中口头的标语和思想。我们迈步上火线，热血沸腾，为自由，为主权，为领土完整，红军浩浩荡荡地东征。

这个红军和苏维埃的新的步骤，在一切营垒和阶层中，激起了巨大的震荡，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狂妄地咆哮着：

“日本军中央部对华北赤化渐次蔓延情形，持重大之关心。即华北之赤化分子活动在冀察政权树立之前后，渐次表面化，共产军之侵入山西，果然自二月下旬开始活泼〔跃〕，恰似与共产军有

何联络，其疑念至为浓厚，然山西军自省击退共匪事，殊难期待。故共产党在该省建设共产区域，为不可避免之情势，山西省之共匪盘据，实予河北、山东赤化分子以刺戟〔激〕而大见活动。冀察政权亦爆于赤化之威胁，日本诚难坐视赤化势力之进攻华北。于是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重视该项重大之情势，对其演进持重大之关心，万一共匪侵入河北省内，则决意以赤化防卫之见地，断然将采取排击之手段。日本军中央部亦以共匪如侵入华北则在权益拥护之立场，不得已而发动自卫权。共匪进路今后如何，以华北内蒙为中心之日满蒙中国俄国间关系上，极为微妙且尖锐化，日军中央部对共产党之行动，予以甚深之注目。”

（三月十九日大公报日本同盟社电） -

这个咆哮中虽然充满着日本军人惯用的狂妄语调与恫吓，但是亦够明显地呈露了民族死敌的意外的惊惶和胆怯。狂妄胡为的日本军人，对于向东奔腾的民族解放的铁流，不能不冷静地估计其前途和影响，不能不承认，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在山西之发展，“为不可避免的情势。”将大大地激起河北、山东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的民族解放的浪潮，不能不承认在红军的东征和华北人民民族革命斗争面前，傀儡的冀察政权之朝不保暮，岌岌可危，不得不承认这步骤与行动具有国际意义之重要性。因之，不能不以太上统治者之口吻咆哮着：“断然排击之手段”、“发动自卫权”之类的狂吠。自然，日本军阀亦颇得知这类的恫吓施之于蒋介石之类的卖国贼汉奸自能得心应手，可是从浴血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红军，不是能被虚声恫吓住的，于是：

“日扩增华北驻屯军为一师团，下月实行，将以半数驻平津，半数驻榆塘线……又长城线日军已增多，系关东军部队，据称目的为防共匪。”

（三月二十三日时事新报专电）

“日特务机关长和知大佐乘 140 号军用机飞并” “日机盘（旋）太原市，飞行甚低。”

于是在有田大使^④的领导下，召集着华北各地的领事、驻屯军首脑、幕僚们举行会议讨论着“共产军今后之动向”和“华北赤化防卫”。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磨擦着自己的刀枪。他们深知，这里没有“亲善”和“提携”，有的是决斗和死战！然而，今天还只是磨刀擦枪，还只是“持枪”，因为用“以华制华，用中国人杀中国人”，是最合算与适当的。何况正有大批丧心病狂的汉奸，准备着供其驱使呢。还在红军东渡之前，土肥原中将^⑤已有三次飞并，以和知大佐为首所谓“特务机关”已经正式地组织了起来，日本武官居然在晋军保卫之下，到吴堡宋家川一带“视察堡垒”。红军的胜利东渡给了猖獗的日本军阀和无耻的汉奸以当头一棍。沿河堡垒二百余里，一天之内，一扫而平，猛冲猛追，直追中阳石楼两城；关上一战，“满天飞”（阎氏部最精锐之第三旅之别名）打得落花流水而变成为“满山飞”；同蒲路飘扬着红旗，兴、临、静乐、方山一带，我左路军任意纵横，不到一个半月红军击溃晋军二十团以上，缴获人枪各四千，半个月內扩大了红军八千，更见得山西民众对抗日军拥护和参加的热忱！也吧〔罢〕！这或许是我们的扩大宣传，那么，请看阎锡山自己的报供：

“阎锡山昨（八日）电驻京办事处报告：在晋西与共匪激战，我方伤七八千余员名，亡五千余名，实为空前未有之剧战云。”（中央社太原九日电）

早就自认“防共”是“束手无策”的老西，在这重创之下，更是神昏〔魂〕颠倒，张皇失措。军事上，徬徨于“陷围”“打围”（阎先生的新战术名词！）而莫宗〔衷〕一是；政治上则只靠屠杀

与镇压，只太原一地拘捕之学生教员已达百人，枪毙十多人，政治犯大批残杀；封锁通外省的大道，不准人民往来（自然，日本军用飞机光临是欢迎之至的！）铺保、居留证、行人要佩带通行证等等倒行逆施的办法；财政上，极尽搜刮，房捐又重新创立，公务员抽“剿共”捐数目大至百分之五十。然而，这些只能加速地激起人们反对卖国贼，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残暴政治之怒潮。阎锡山终于将被这个怒潮和红军的铁拳所埋葬！在汉奸群里，被红军东征所烦恼而忙乱着决不止阎锡山一个，日暴于赤化之威胁下的冀察溥仪^②、宋哲元^③，亦在其日本“顾问”的指挥下，岌岌于冀西防务。

“二十九军开赴冀西”，“二十九军一师正开拔任邱”，“二十九师孙德基部今日开向娘子关”，“五十七军开冀西南并有入晋剿匪讯”。

这一类的电讯和情报，不断地飞来。而且这位冀察主席更不辞劳瘁，亲赴直南，并有出巡消息。一面更大发表其反对共产党的告父老书，大反对而特反对宋哲元将军所捏造的共产党四大政策，即所谓“共产、公妻、弃老、用幼”（天啊！宋将军头脑中的共产党人不知道的共产党政策！）。一面更大开屠刀，虐杀“爱国犯”，迫书反共宣言，摇头摆尾地以反赤忠诚献媚其主人。

然而，不管阎、宋等如何努力，他们的主子心里雪亮，要靠这些杂牌军来抗击红军，事情是“殊难期待”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这种情势，确有大大的重用之必要。蒋和有田之数次会谈，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华北赤化之防卫”是会谈中心之一。听说日本方面对于这会谈之结果，还微觉不满，路透社就传播如下的电讯：

“日日新闻今日登载上海访电：预料日本对华政策将有变化而

趋向强硬态度。据谓最近有田大使与蒋院长及张外长之数次会晤，已告中日双方在基本上依然不同，而调整中日间关系，殊感困难。中国不能迎合日本之意见，且仍抱对日本远东政策之疑虑态度。再中国人民反对广田三原则⁹⁴，此种空气已左右中国领袖，南京要人对有田之解释不甚注意。日本仍不宜再与中国谈判，职是之故，有田就任外相后，将变更对华政策云。”（三月二十四日申报路透社东京电）

散播这个消息之目的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是在中国人民面前给南京政府施放政治烟幕，挂起遮羞布，希望欺骗一些天真烂漫的老实阿斗；一方面，就是威胁一下南京，使他们更进一步地善体主人的情意，而柔顺地迎合！对于我们，对于一切决心抗战的人们，事情是很明白的，蒋介石不仅接受广田三原则，而且南京会谈就是讨论怎样实现的方法，南京要人正在鞠躬尽瘁地替主子清除道路。试看广田三原则之第一条不是一切排日排外运动之绝止〔对〕禁止么？南京做了什么？一、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二、解散平津学生会；三、停刊（即封闭）《大众生活》及其他站在民族立场上的刊物二十余种；四、搜捕爱国学生（复旦、山东大学等不必说，平津屠杀是南京同意的）；五、逮捕反对日本厂主而罢工的裕丰工人二十余名而以危害民国罪惩治。至于“承认满洲国，中日满提携”，中日贸易协会不是创设了么，通车通邮是实现了，南京不是在大声疾呼抗议俄蒙协定⁹⁵为日满壮声势么？这里或许南京一时还不敢公开承认满洲国，这就是主人们所谓尚不能迎合之所在吧！至第三条之赤化共同防卫，那是彻底地尽心极力地在执行。远的不说，蒋与有田谈话之后，南京“剿匪”健将陈诚、胡宗南们不是又被判决一次“无期徒刑”（胡宗南语：“剿匪是无期徒刑”）而率部入晋了么？何梅协定中规定撤退华北之中央军（特

别是指明要撤的第二、第二十五等师)，不是又蒙恩准入晋“剿匪”了么？在半个月內，居然有十师以上的中央军入晋，不能不说办事敏捷。然而尚蒙不能迎合意旨之申斥，汉奸实在亦不大好做！以数十师大兵遮断和阻拦抗日军队还不足，更动员陕甘的武力，伸其魔手于抗日根据地！是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的新阴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实施”。中日“满”联合“防共”的协定现在由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坚决执行了！

伟大的东征，像疾雷闪电一样，震惊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群，使他们丧魂失魄，使他们胆战心惊，使他们张皇失措，使他们原形毕露。

* * *

这是一群，这是磨刀霍霍、鬼影憧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一群，这是残暴凶横卑污无耻的一群。但，这是渺小的一群！

另外还有一群，巨大英勇壮烈的一群！不顾着摧残压迫屠杀，而艰苦卓绝为民族解放斗争着的战士和英雄的一群！他们“把每一角落的救亡的火都点起来，配合着我们举起的巨大的民族解放的烽火”。

红军的东征，给了他们以极大的兴奋、鼓励和激动，正如他们的英勇斗争的伟大事迹〔迹〕，给我们的兴奋、鼓励和激动一样！

试读着下面的书信和祝词的摘引：“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英勇的战士们，你们的胜利是必然的，山西广大的人民大众已经不堪受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希望救星的出现。英

勇的战士们，你们对山西走狗的胜利，也就是我们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因为你们是以全中国人民利益为自己利益的真正救国军。”

“微笑吧！努力吧！同志们，这里有广大的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兄弟在热烈地拥护你们，期望着你们的胜利。因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光明和幸福的未来，在你们手里掌握着中国四万万受苦难的同胞以及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命运。”

看呵！这何等样的由衷的热烈的颂赞。不，这是受苦难被摧残被压迫的同胞热血沸腾的怒吼！他们以红军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他们把人类的光明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我们红军身上！而且阿谀、献媚绝不是这一群之所能！这怒吼的颂赞正伴着铁一般坚强的誓言：

“我们在你们面前宣誓：永远献身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它现阶段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忠诚地服从你们的正确的领导！”“我们已联合各界同胞，在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统治区域里，以坚强的抗争做你们的后盾。我们已经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准备随时到火线上去作战！”“我们号召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要以无限的热心和积极性援助最英勇最果敢的抗日红军，在物质上接济你们，在精神上鼓励你们，并且立刻全体动员，团集在你们的周围，向日帝国主义强盗和一切卖国贼汉奸作殊死战！”

这不是空口白话，这不是墨写的文字，这是鲜红的血的斗争所证实了的崇高的誓言！

然而，这些仅仅是排除了万重障碍，历尽了无数风波，落得我们手中的我们“真正的兄弟最亲爱的同志们”的呼声！这是在这个巨大壮烈之群里的一小组，其他千千万万我们真正的兄弟，最亲爱的同志们的呼声，正是“还被那万恶的魔王隔离着”！

但是，他们的浴血斗争的怒吼，他们以手榴弹、来福枪、大刀、矛子所写的誓言，是魔王们所不能涂没〔抹〕、不能遮盖住的。看吧！我们河北的弟兄们，是怎样的为着民族事业而奋斗，是怎样的为红军东征而激动，是怎样的英勇壮烈的在帮助抗日红军，他们已经拿着枪走上战场，他们准备着在抗日的火线上和抗日红军握手。下面是半月内〔报〕纸上所登载一些消息：“内印尧山任邱共匪刘文忠行动渐猖獗，已集结二千余，向内邱顺德间窥伺，省令二十九军冯师刘振先游击民团合力堵防。”“冀南平乡硝民反对税警，平毁盐池，聚众暴动，具有背景，县城戒严，尽闭四门，商震部黄克华师往剿俘四百余人。”

“冀省西部六县如平山灵寿井陘一带边区，地当太行山脉，境内山岭纵横……去夏即有穷人会之组织……致匪势坐大，最近聚众六七百人。”

“晋北厂门关发现共匪人数约一千余”，“许昌附近有共匪出没，破坏平汉路轨，自称红军，当局已派队严防。”（敬〔均〕见三月五——二十五日津沪各报）

这是在新闻严格检查下，掩饰不住流露出来的消息！就可以看到，河北的兄弟们是怎样地在英勇奋斗，他们以暴动、毁坏铁路、游击战争来庆祝红军东征，来响应抗日红军的动作。这是在河北，在全中国的广大的领土上，在每一角落里都燃烧着同样的光辉的群众斗争的烽火！

我们坚决的相信，民族自卫×××给我们信上所说的：

“伟大的兄弟们呀！当你们在西北和华北的疆土上第一声发动对日作战的时候，你们总能想象到，全国的士兵和同胞，将怎样地被激动，将怎样地立刻停止对内一切的大小纠纷，争赴疆场，跟日本帝国主义拼个你死我活呀！”

是的！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是想象到的，不仅想象到，而且，正抱着这样的坚决的信念而勇敢的、义无反顾的负担起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火车头和发动机的光荣历史的任务。对日作战的时机迫近了，伟大的日子快来临了，让我们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弟兄们紧紧地握手吧！

向一切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为我们共同事业、民族解放的事业而奋斗着的兄弟们，同志们，致我们人民红军的敬礼！

“协同剿共”还是一致抗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四月三日有田八郎在仆仆风程长途跋涉之后，走入霞关官舍，发表其对华外交政策的伟见如下：

“因此，在对华政策不必拘泥于三原则，应以即于事态之方法，逐渐调整国交，而中日共同防赤乃系先行工作。”

据说，这位新外相在遍历沪京津与中国当局会谈之后，得到了“另一半关于中国的知识”，而在长春与关东军首脑会议中，又受了“甚深之感动”，这个新的方针就是从这里得出来的。不过，依我们看来：这位旅行大使，在一个半月之中国游览中，确是得到了“另一半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可是，不是从中国当局方面领受的，而是从中国的千千万万的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及其先锋队——中国人民红军方面领受的。以学生为急先锋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如火如荼地发展，及中国人民红军的浩浩荡荡的东征，是足以使这位大使痛感其对中国知识之不足，及“东亚和平”之威胁的。因之，于走马上任之际，便大声疾呼，“最紧要者由赤化危险中救出东亚”，而劝告其帝国主义的同僚们要即于事态，以中日共同防共为先行工作。再明显不过的，这不是三原则之缓和，而是更毒辣、更凶恶的三原则之实施！只要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敌人

* 这是博古在《斗争》第九十八期上发表的文章，用以揭露所谓“协同剿共”的实质与阴谋。

这种狂妄的发言的回答，应该是抱定最大的决心，高举抗战的义旗，迈步上火线，一致抗日，把自己最后一滴血流在反日战争的前线上。

可是，南京的卖国贼们，却对之歌颂礼赞，有田谈话发表之翌日，南京方面即发表如下之谈话：

“外交界某要员谈：有田谓对华交涉不拘泥三原则，其新方针当然较三原则为开明……惟惜所谓不拘泥三字，过于空泛，不着实际……故深盼有田更能揭橥范畴……一般观察，日如能尊重我领土主权完整，中国调整自无困难问题。”（五日《益世报》）

汉奸们的歌功颂德、摇尾乞怜的丑相，真是淋漓尽致。既歌颂之为开明，复宣言中日调整自无困难问题，更得盼其能揭橥范畴，以便遵行。屢蒙不能迎合意旨之申斥的汉奸们，这次总算极尽其眉目传情纵身迎合之能事了！可是，汉奸们且慢得意，主子对于这种轻狂，还不甚乐意，叱骂随着就来了：

“中国政府方面……认为日本因坚执三原则与中日国交不利，故将其撤回。但日外务省方面，对于此事则持如下之见解：中日外交之调整应按三原则办理，前外相广田已在议会中关于外交方针之演说，及前大使有吉之活动，均以此点为先决条件。并已明白通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亦加以容认，外相有田当踏袭前内阁方针，三原则既系中日国交调整之根本原则，自无丝毫变更。要之，前记消息，当系南京方面之误解。”（四月五日同盟电，《大公报》载，有圈之一句，其他各报均被删去）

这一回又迎合错了！好一幕汉奸外交的悲惨的丑剧！汉奸们原想借“不拘泥”三字之遮盖，而驯顺地执行共同防共的先行工作。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却偏不放松，更一次揭露“国民政府亦

加以容认”，使卖国贼的面日益加暴露。

在南京、东京间这幕丑剧的锣鼓声中，华北舞台上协同剿共的戏剧，却以“全武行”的姿态出演了。

驻屯华北的日本军，在人民红军突破天险黄河而纵横自如地驰驱于山西境内，立即感觉到事态之严重。三月十九日，经过同盟社的电讯，透露了他们的不安与烦躁，咆哮着“诚难坐视赤化势力之进攻华北”、“断然排击之手段”等等。三月下旬，红军更进入汾河平原，占领同蒲路中段，在这个激动〔动〕之下，华北人民的救亡运动——特别的〔是〕抗日的游击战争，暴风雨一般地发展，促使他们更大的烦躁。谈话，恫胁，显已不足，是行动的时候了！

“京津日日新闻昨日载称：山西赤匪渐向东南移动，有与河北省南部赤化地方联络之势。日本驻平武官今井武夫于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时赴冀察政委会访宋委员长，说明赤匪形势，不容乐观，日本由确保东洋和平的见地，对华北共产军之防卫，将不吝加以援助。宋氏对此答称，关于共匪防卫已讲求种种对策，此后在必要时当将采取适宜措置云。”（见三月三十日《大公报》）

这闪烁的词句，实质上就是由于红军的积极进攻山西形势不容乐观，日本要求出兵协同剿共，而卖国贼宋哲元答应在必要时当恭请皇军出马。这是协同剿共的具体谈判之第一步，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作第二次的谈判。宋哲元三十日抵津，三十一日报纸上有如下的记载：

“关于冀察防共及冀东北两交涉，三十日宋与多田、永见、松室会见时，彼此交换意见，除防共事双方各有明白表示外，冀察外交仅就原来轮廓提示。”（三月三十一日《申报》）

所谓双方各有明白表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方面明白的提出要求订立防共协定，而卖国贼明白的承诺了。二号，朱哲元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说：

“日方对冀察防共曾表示实行防共协定，顷在津虽彼此会面，但未正式谈及冀东事。松室到后亦限于酬酢，未正式商合，双方虽为意见交换，因日方意见未划一，俟永见日内归国，赴长春接洽后，如何决定。”假如把下面的申报专电，对看的时候事情便一目了然了。

“冀察防共事，中日双方负责人，连日在津磋商已得具体办法。该办法由永见参谋长赴长春谒植田司令官接洽，返国面呈军部核示，十五日飞返，再经一度协商，即可实现。”（四月四日《申报》）

中日冀察防共协定已经签订了！永见参谋长正携带着这个新的胜利品而凯旋回朝！同胞们！兄弟们！卖国贼又给我们签订了一张新的卖身契，再加上一副新的桎梏，再系上一根新的绳子！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愿作亡国奴，我们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像猪仔一样宰割我们么？我们能容忍卖国贼肆无忌惮的出卖国土丧权辱国么？我们能坐视卖国贼和日本强盗“协同”地进攻我们最英勇坚决的抗日先锋队——人民红军么？不，不，一万个不。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我们要以热血头颅，奋勇抗战，撕破一切新旧的卖身契，击破一切新旧的桎梏，斩断一切新旧的绳子！我们应当最积极最奋不顾身地援助我们的人民红军，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地为民族统一阵线的形成而努力，我们要以人民统一阵线的一致抗日，去回答击破日本帝国主义卖国贼的“协同剿共”！

至于这个防共协定的辱国丧权之程度，是超越一切国民党卖

国贼所手订的“淞沪协定”^{④⑤}、“塘沽协定”^{④⑦}、“何梅协定”^{④⑧}……之上的。虽然，在目前我们还只知道这个协定有六条，还不能确切知道其每一条的内容，但是这个协定已订立而待东京军部核正间的短短时间，日本军在华北的动作，已经可以使人惊心动魄，瞠目咋舌，已可略窥这卖国协定之一斑。

无疑的，这六条之中的重要的一条是：“华北之明朗化”，就是冀察政权之更加傀儡化，就是冀察政权变为实质上形式上都一样的溥仪第二政府，一切大权均操之日籍顾问的傀儡政府。这正在急剧的实现。四月六日，松室良平抵平发表的谈话，其咄咄逼人之态，即使麻木不仁的人看见，亦恐怕亦要有啼笑皆非之感吧：

“松室少将以冀察政权最高顾问之资格，与政治军事并行于经济文化方面之指导亦负责任。少将能赴北平，对北平之明朗化，将益尽力。”（电通社电四月七日）

“松室抵平后发表声明如下：余之任务系代表天津军司令官根据坚强一途之方针，协力从（速）完成华北之明朗化，以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同日《申报》）

据说，河北还是中国的领土，冀察政委会还是国民党政府所任命的。但是，假如我们说松室的声明，其气焰、其话调是一个殖民地总督恐怕更逼切一些吧！河北的大好山河，是名存实亡了，不，名亦快亡了！

在这位负责指导冀察政权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最高顾问”的指导下，冀察傀儡正在组织各种委员会，如财政、经济、交通、建设、教育等，每个委员会都聘请日本人当顾问。满洲国伪黑龙江省总务厂长永井四郎已于二月十二日离开齐齐哈尔，来就任冀察财政委员会的顾问了！连人物都是满洲搬来的，不难相〔想〕见冀察政权是甚么东西！满洲国黑龙江省总务厂长荣

任国民党所委任的冀察政委会顾问！同胞们！记着这个事实啊！

这协定中其次的一条，就是为协同剿共日本驻屯军之强化与多数的飞机场之修筑。今井武夫在谈话〔中〕承认日本增加华北驻军，但因事关军事秘密，数目不愿宣布。报纸上宣传增加一至三个师团，或者后面一个数目字是比〔较〕接近的数目，只要看日军在天津兵房之大兴土木，就可以知道，增军的数目字单位，不是千而是万。

“津日军因强化华北驻军……顷借用津东局子李明庄前飞机场起造房舍五百间，刻正大兴土木，加紧建筑，该地段共一千三百亩。”占地一千三百亩、房舍五百间的新营房！至于飞机〔场〕则正用皮鞭和大刀强迫着亡国奴和亡国婆子在保定静海通县加工修筑！在中国的领土上修筑着敌人的营房、飞机场，而中国的军队呢，是在“奉令剿匪”！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啊！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血气的人们请想一想！

协定中另外的重要的一条是：“设立防共组织”。松室少将不仅是冀察最高顾问，而且是“华北防共组织”之最高首长。这个组织之名称是天津军部特务机关，而其支号遍设晋绥鲁。不仅这样一个特务机关就是够了，日本军首脑部亦派了松永忠恕大佐到天津组织其直属的“防共组织”。汉奸们的防共组织，更不必说了，殷汝耕、德王都不是早挂着防共自治的招牌么？在这协定资助之下，更会如雨后春笋一样怒长起来。

协定中不可缺乏的一条就是中国军聘请日本顾问，并在其指挥下更积极剿共。四月初日本军屡次喧传着何应钦（断送华北之“何梅协定”的签订者）入晋剿共代替陈诚，河北军队调动频繁。

“五十三军一部四日开驻平汉线，正定以南沿线各桥梁均派队驻守，驻大名骑四师王奇峰部奉令开灵寿协防。该军驻南乐部队

四日动员，……三十二军开晋冀边，对东阳关、壶口关、十八盘、黄峰关等各要隘，皆派主兵扼守，防晋境共匪窜入与冀南奸民会合。”（四月六日《申报》）

中国军队拿着手里的枪支杀中国人，而日本帝国主义则“不费一兵一卒，为帝国增加一大块土地。”（土肥原话）这是何等痛心的状况啊！对那些甘心为虎作伥的汉奸卖国贼们，我们觉得无容对牛弹琴。可是，对于抗日有志然而命令神圣的白军弟兄们官长们，禁不住要问一声，还是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孩子”而残杀自己的同胞呢？还是做轰轰烈烈的神圣民族革命战争的光荣战士呢？二者必居其一，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撕烂狗屁命令，干将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这是协定后三、五天内所做的，整个协定丧权辱国之严重，可想而知！

* * *

敌人的魔手已经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敌人的刀锋直指着我们的心胸，“防共协定”是新的一刀一掌。中华民族的生命已到了最后一息了！

“防共剿匪”已经成为敌人向中华民族进攻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敌人想扑灭中华民族生命所寄托的中国共产党和在他领导下的人民红军！在这个旗帜下，敌人想最后地占领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在这个旗帜下，敌人想团集一切中国内部的汉奸卖国贼的内应力量和取得帝国主义世界之缄默。

每一个不甘为亡国奴的人民，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要为民族留一息生机，要为中国民族的存在尽一点力。那么，第一件事就应该反对“防共”“剿共”。或者中日满联合剿共反俄，或者联共联俄反日讨逆。二者之间已不容我们再犹疑的时〈间〉和盘旋

的余地。

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尖锐关头，而还痴呆朦瞳（或者是假痴假呆）地希望敌人在剿共问题上“不援助而援助”，或者高唱些什么“光荣的独立”，“严格的中立”之类，实质上都是汉奸和准汉奸的亡国理论，至少是帮助了汉奸和强盗们。

在帝国主义和汉奸们所恩准和卵翼之下的“舆论界”，似乎正在赶制这种应时的商品。天津《益世报》在它一篇社论里说：

“倘协同剿共的意义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以外的合作，那么问题就严重了。这件事在我们看来，绝不可行……假借外力以剿共，即共乱剿平，但外力干涉内政的结果，中国的主权，中国在法律上的地位亦完了，中国的生命亦完了……。”代表天主教的机关报，能说出这几句，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可是结论呢？“在我们看来，日本果然希望中国剿共的军事成功，最好的方法，是对中国剿共，日本不事干涉，这种不援助的援助比实际援助的力量大。”（均见三月三十一日“外力协同剿共问题”之社论）

啊！原来是殖民地侵略者的急先锋在教训其后进，要他不要这样公开干，因为这将“驱中国国民向共产表同情，甚至驱中国许多青年加入共产”，而教训其后辈要隐秘地干涉。所以，《益世报》虽然在表面上似在反对“协同剿共”，而实质上，却是货正〔真〕价实的主张隐秘地“协同剿共”。

谁要真个为中国主权、中国生命着想，谁就要反对“协同剿共”，而要反对“协同剿共”，必须反对剿共。这是简单的真理。《益世报》不明白这个真理，当然是有原因。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是殖民地侵略者手中工具的缘故！

另外一家报纸——上海《时事新报》在四月三日的言论版里，

登载着一位薛农山先生的讲评，在“中国民族的出路”的煌煌标题之下说：

“排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日本要我们跟他反俄，就是苏联要我们跟他反日，（哎哟！我的皇天！原来苏联要我们跟他反日！可怜的准汉奸的头脑！——博注）介于这两大国际形势之间的中国，好像有逃杨归墨的讽刺。因此在少数人的观念中，以为立国于现代应该取得国际的奥援，于是乃有所谓莫斯科路线与东京路线之憬憧……一面是火山，一面是冰窖，生息在这个时代环境的中国人，只有依靠‘自力’才可以‘更新’，只有严格的中立，光荣的孤立，才配得上谈独立。只有以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的精神，在外交上以光复失土为最高峰，以捍卫目前主权为低点，不怕流血，但求血不白流；不避交涉，但求交涉有效。换句话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为和平努力，牺牲已达最后关头任何牺牲亦所不惜……。”

好一个政治鲁滨逊^④！只可惜他没有生长在荒无人迹的孤岛上，而“生息在时代环境的中国”，因此，也就没有那股高尚纯洁的气概，而只能照着蒋介石的演讲词和中宣会告民众书而喃喃背诵，只能作汉奸卖国贼的留声机和应声虫。这是这类政治鲁滨逊的悲剧和归宿。

当强盗已经登堂入室，尽劫了你的宝藏，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着你去手刃你的亲兄弟和帮助你〔他〕的朋友的时候，你只是叫我“严格的中立，光荣的孤立”，这还有半分人气么？这是道地的汉奸行为！每一个不甘为亡国奴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地将咒咀这汉奸行为。不仅咒咀，而且奋勇地团结一致地以铁一般的人民阵线抗日讨逆，来回答帝国主义和汉奸的“协同剿共”。

在这种局势之下，四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的宣言。这是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忠诚于民族事业的新步骤，这是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协同剿共”的壮烈的回答。在这宣言上说：

“……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至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卫〔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以反对汉奸卖国贼丧心病狂的无耻行为，并提出下列条件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1.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
2. 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3.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4. 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5. 实行外交公开！
6.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

全中国的人民，亲爱的同胞们！起来，响应这个号召！起来，拿我们团结得铁一般的人民阵线一致抗日，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盗匪及汉奸们贪残凶毒、卑鄙齷齪的“协同剿共”！

武装上前线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

打倒拦阻红军抗日捣乱抗日后方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陆海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在五月五日的通电上这样写着。无疑的，这通电和红军回渡是一个极端重大的政治步骤，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的政治路线及最近几个月来暴风雨般发展着的中国政治生活的环境产生起来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掠夺和榨取是愈来愈〈愈〉狠毒，愈来愈狰狞凶残，愈来愈肆无忌惮。吞并了东四省，沦亡了华北，肢解了内蒙，进逼着浙闽，最近更以“防共”、“协同剿共”的旗帜，企图斩绝我们民族任何生机，吞噬整个的中国，置我们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死地。汉奸卖国贼的投降出卖，愈益无耻，愈益卑鄙齷齪，愈益俯首听命。四年间断送八百余万方里的土地，让敌人的铁蹄在中国领土上任意纵横，让敌人的飞机在中国的领空上翱翔自如，为敌人的警犬，为敌人的刽子手，无所不用其极地压迫爱国运动，屠杀爱国民众。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动员

他所有的兵力，枪口向着抗日的红军和不愿作亡国的民众。最近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防共协定”，给我们的民族生命加上新的锁链桎梏，阻拦抗日红军的前路，捣乱抗日后方，残杀、逮捕、监禁、蹂躏每一个崛起的民族解放斗争。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的调言：“从赤化的危险救出东亚”，和汉奸的无耻的亡国理论：“攘外必先安内”，在今天已经汇合着，结晶着“协同剿共”的协定。“反共”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卖国贼汉奸投降出卖之共同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团结着沦亡中国毁灭中华民族的反革命的联合。这是发展着的政治形势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伟大的千百万群众崛起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在几个月来汹涌澎湃的群众民族革命争斗的怒潮中，愈益明显地表示出：“组织国内的统一战线去反对外来的侵略者”是其中心的最高的观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最普遍最广大地流传，散播在这个运动之中，成为反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的学生示威，在他们的旗帜上、文电上、要求中，都高高地举起“停止一切内战，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的标语。每一个多少想为中国民族留一线生机的人，都莫不极力排击几年国民党官场的亡国理论：“攘外必先安内”，面尖锐地将动员全国力量抵抗外敌和它对立起来。譬如国家主义派的重镇之（一）——王造时先生在上海一二八纪念会上讲到四年来的教训曾指出：

“第五，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这有许多事实告诉出来，证明了内既不能安，攘外更说不到，恰恰得了相反的结果。我们现在要改变为先攘外而后安内，因为只有抗敌才能安内，才能真正统一。”（见《怒吼》第一期）

至于章乃器先生，则更以“沸腾的血，焚烧的气”敢冒“刀锥斧钺”之险而迸裂出下列的呼声：

“几年来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勇敢而有余的英俊青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无以安。……显然的，‘反共’的口号，目下已成为敌人和汉奸殷汝耕辈的骗人工具，这还值得大吹大擂么？中国人日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大众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非立刻停止自杀的内战决不足以言民族，非立刻组织民众的力量亦决不足言民族解放，假如政府真有抗敌的决心，就应该马上停止剿匪，同时准许人民隔断火线……。”（见《四年间的清算》）

这是中华民族最热忱为国的好男儿的呼声！应该如何地激动每一个人的心弦。然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辈仍然一意孤行，且以派更多部队入晋，更严厉命令、督促堵击和进剿，来回答这种血泪俱下的呼号。

可是，当红军飞渡黄河，马首东向，坚决地向国防前线上猛进，以求迅速实现对日直接作战的时候，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抗日决心和意旨，为更广大的阶层，更广大的中国人民所了解的时候，于是更稳健、更徘徊与犹疑的人们，亦或明或暗，呼喊或透露出相类的语调。

天津大公报在华北睦邻防共空气之中，红军渡河入晋时，在其社论上说：

“最近中央发言人指示，舆论界之救国途径，不外两端：一、肃清赤匪余孽，二、应具奋发沉着之精神。此两端在中央政府，吾人信其必能言行一致，然以之说服人民则未必有效。盖中央数年来集中全力剿匪之结果，外患不但未能减轻，且日益加重，足见剿匪为一事，救国为另一件事。”

这时候，这地点，这报纸，这适可而止的话，我们当然能够懂得它要“透露”的意思。不仅《大公报》，即现任南京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亦于三月三十日的广播演讲中说：对现在抗日前进的力量不能加以抵消。谁抵消这力量，谁就帮助了敌人。甚至于在前线“剿匪”的军官有的亦确认“红军入晋，已竟不等待的、主动的执行抗日先锋队的任务”。有的则以“剿匪”有损国防力量为辞，再三吁请他调整理。

所有这些都说明白不仅在全国人民心怀中，不仅在全国舆论界的笔尖上，而且在国民党自己的营垒内，蒋介石部下的稍有一点热血的人们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巨雷是在波荡彻响着，愈加宽广，愈加普遍。

假如一二九开始而迷漫全国的学生运动是崛起的民族运动出现于街道，是全国民族解放斗争成熟的指标，是要求以民族的人民战线抗拒残暴的敌人的先声与发端，那么，红军在山西的行动与胜利，其最大的历史意义的收获，就在更广大的人民面前证实了红军的抗日先锋的作用，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更深固的基础上使他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和团集的中心。就在他推动了全国人民反日运动，要求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运动向前开展，开始了苏维埃运动的扩张与人民反帝运动扩张之间新的辩证的联系，就在他推进与促成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客观主观条件的日益成熟。

国内政治情势的特点，是在环绕于联共抗日或降日剿共的问题周围而进行着社会力量之新的分布，尖锐的两级化和统治阶级中内部的分化并行的飞跃着。一方面是结晶于“防共协定”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汉奸们之反革命的“剿共”（=灭亡中国）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日益成熟的全国范围内的抗日人民统一阵线。

在这尖锐的两极化的情况下，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命令着执行“协同剿共”的部队，不论其士兵和长官益加有力与明显地显示他们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不愿以自己血肉替日本天皇创功立业，不愿残杀自己的同胞。可是，这种不满的酝酿和表示，还没有走上大暴烈，命令神圣还能维持自己的魔力。要使这种不满、“内心的痛苦”走到公开倒转枪来，要使“无期徒刑犯”敢于决心越狱，当然，还须极大的政治的工作，忍耐的说明，无情的揭露卖国贼，光荣的模范例子，和他们切身的政治经验。在这种形势下，假如红军采取和阻拦抗日前进道路的国民党军队的决战的方针，自然，胜利的把握是具备着的。但是向着可能逐步走近来的明天的朋友，今天不给他们以反省的机会，而立即给以当头一击，当然，不仅是愚笨而且是罪恶。目前需要不是肉体的歼灭，而是诚恳的说服。这样，苏维埃和红军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自动的撤回黄河西岸的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的动作，可以帮助这些抗日有志、命令神圣的官兵们决心何去何从，推动他们走上决心抗战道路上来，使日益成熟着（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实现于他最高方式的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之中。

差不多和这个宣言同时，在山西的中央军，好几个部队都一致吁请免调入陕籍以保存国防实力，这一行动，确切地表示了苏维埃和红军这一步骤之成熟和必要。

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健儿们，更勇敢些，更坚决些！起来，响应全国舆论一致呼号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苏维埃和红军准备着欢迎我们民族英雄和战士，一共携手前进！

西南事件之教训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日本帝国主义者大举增兵华北的行动，激怒了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与军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一贯的采取不抵抗投降主义，致使日本强盗得寸进尺，横冲直闯，企图进一步的直接统治华北，进窥华中、华南以至整个中国。在这一形势下，使中国的救国运动形势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转入大规模抗日讨逆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

西南出兵抗日的军事发动，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序幕，是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开始。西南发动是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而发动的，同时它本身包含着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西南与南京间的矛盾。正因为这样，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极力将它描写为内战的发动，而全民众则抓紧其抗日发动的重大意义，努力使它坚持扩大发展成为真正的全国反日作战之开始。苏维埃和人民红军一开始即站在援助拥簇〔护〕这个抗日发动的立场上，同时亦给西南的领导者以诚挚的忠告（参阅宣言）以期运动能达到胜利之结果。

西南这一发动的领导者，依然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发动之后，明显地表现出严重的弱点：

-
- 1936年6月“两广事件”失败后，新中社记者走访博古，博古就事件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刊登在《红色中华》第二百九十期上。

一、西南发动先后，始终没有提出彻底的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同群众直接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利益联系起来，没有给予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和切〔必〕要的政治经济的改革，因之不能发动广大群众斗争，不能吸收广大群众到运动中来，使这一发动有着雄厚的力量。

二、没有发动群众斗争。正因为他们领导者是地主资产阶级集团，所以害怕群众起来，不去积极的推动群众，甚至于反对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因之在敌人强大的武装力量进攻前面，得不着广大群众的参加，而使自己军事上受着敌人的压迫。

三、西南抗日发动之后，没有彻底的抗日行动。一方面不积极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西南的财产，没有发动商人及一切人民进行抵货运动，实行经济绝交，在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应与日本断绝邦交，这样一方面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一方面断绝一切敌人和汉奸的造谣。

四、由于西南发动的领导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所以部分领导在卖国贼的分化利诱威胁下面，半途动摇面叛变了（如余汉谋、缪培南等辈）使这一发动终不能坚持下去。

西南发动虽然包含着这一弱点，但是他们仍然是有其革命的意义。因为：

一、西南军事发动的性质是完全与民众的救亡阵线的原则相一致的，这重要之处在西南六月二日、四日的电报上及广西九日动员的宣言里，很明白规定他的目的是抗日救国，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争取民族解放。并宣称不分党派，欢迎一切抗日救国的军队与政团一致参加抗日，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等。

二、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进攻下，居统治地位的南京政府只有一步步地退让屈服之下，这一行动给予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

国以有力的回答，他这一发动则更加推动中国的军队走向抗日的大道上去。根据上面情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个教训来：

第一，凡是某一抗日发动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彻底的解决群众的切身要求，是不能团结广大的抗日群众的。

第二，抗日行动没有与群众运动取得密切联系，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是不会胜利的。我们要知道，只有组织武装群众，才能打破优势的反对者的武力进攻与反抗。

第三，没有彻底的抗日行动最容易使群众认识不清，而使群众发生怀疑。西南在发动后没有如此做，反被敌人指他为“假抗日”“真联日”，而使内部动摇分化，以致受着挫折。

第四，中国统治阶级旧的机关、旧的军队，没有经过任何的改造，使其真正的来进行抗日战争，是很困难的，简直是不可能的。西南发动中某些将领之背叛容易实现，原因亦就在此。

第五，我们必须指出，无论某一抗日军事行动，若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民族的先锋队坚强的领导，要使之走向彻底的胜利道路上是去是不可能的。

西南抗日发动受挫以后我们决不能认为他是抗日的失败，抗日运动将更加继续开展，抗日运动更加走上彻底的方面来，使广大群众更加认识清楚卖国贼首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出卖中国的罪魁，更加会激起千千万万的群众的愤怒与抗战的热忱，西南抗日发动挫折的经验使以后运动将走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大道。

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一年来日本侵略之变化及其现阶段

从有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以后,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一年!事变发展的过程、民族革命斗争的火焰,光辉地照耀着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的正确性。一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民众反对日寇及卖国贼的英勇顽强坚持的斗争,不仅创造和积聚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推动和促进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局势,国内阶级力量的新的变化和重新结合。我们必须最冷静地、仔细地来总结这一年的经验教训,并对目前的时机的具体特点和阶级力量的互相关系,作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估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给我们对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 and 前途以正确的认识,因为只有这样,总〔才〕能够使我们根据来确定在实行新政策中,今天阶段上,我们可必须采用的步骤、方针和口号。

从我们民族的凶残的死敌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在灭亡中国,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伟大民族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木屐下的奴隶牛马。时至今日,这是对于胡适之先生却明了的事了。但是,对于我们——抗日救亡的战士决不能限于这种一般地对日本对华政策之基本的承认和认识,重要的是研究、分析暴露

每一个具体阶段上日寇实行这个基本政策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手腕和把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随着国际、日本和中国的情况的变化而变动着侵略的方法方式的。使用着复杂的、花样百出的侵略手段。回顾过去的一年内日寇侵略的方法和手段之变动，大概可以分作三个时期即：（一）组织脱离中国的华北傀儡国家的时期。（二）压迫订立防共协定组织反共统一战线为中心的时期。（三）目前的时期——即重新高唱经济“提携”经济“合作”的时期。自然，这种分划是相对的，各种方法与手段，常常是同时地使用着，这种划分只不过指出各个时期中侵略方法与手段之重点。

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帝国主义提出了实际占领华北和巩固自己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的任务。国际的环境，特别是意阿战争的爆发，满洲事件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所得到胜利和成功，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客观上使它成为日寇实行自己计划时的工具。南京政府以一切力量进行武装镇压一切反日运动和反日言论，进攻红军和苏区，这不仅大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力量，并且灌注了恐日病和中国无力论于人民的思想之中，这种环境允许了日寇以最猖狂的凶暴的公开的方法，来实行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制造华北傀儡国的运动。一九三三年五月底的《塘沽协定》，安置了日本统治华北的基础，而一九三五年七月的《何梅协定》，奠定了日本占取华北——首先是冀察为殖民地的实际开端。妥协、让步、压服的政策不仅不能稍磨日人的贪欲，相反地更刺激和鼓厉〔励〕了它的凶残的无厌的侵略的气焰。日本军阀以不可一世的气概，肆无忌惮的倡言，“不费一矢一卒，为皇国增加一大块土地”（土肥原）“实现帝国国策之初步，即为变华北为和平区……变华北为共存共荣之乐土”（多田骏）。这样，去年秋季，日寇倾其全力来创造华北为共存共荣的“王道乐土”。浪人汉奸的自治运动、请愿和

示威、香河三河的“民变”、“冀东防共”政府的成立、华北铁道上重要战略地点的占领、军事的威胁等等的手段与把戏，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华北脱离中国，建立满洲国第二号。日本军阀与外交家兴高彩烈地期待着自己的杰作的完成，期待着满饮胜利之杯，可是，正当这时候，他们遭受意外的反抗和阻碍。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发展，使华北走上了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紧急关头，并且在全中国的面前指示〔出〕了同样的命运。被压制着、抑郁着的群众反日情绪很快的生长、积聚着。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之壮烈的出动，是日益生长的民族解放运动突破一切压迫而出现于街道之上。他们的英勇壮烈的斗争，引起了全国各地各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反日的示威，潮水一般泛滥于全国，反日的口号，春雷一般彻响于全国。学生、工人、店员、文化工作者、农民、士兵，一切我们民族的最优秀的人们都大声疾呼抗日救国的口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群众愤懑之增长，反日运动之发展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变动，逼使南京政府不能不起来相当地迟滞日本的华北独立计划之实施。在这种局势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也被迫地不能不走上一时暂时妥协的解决，这便产生了冀察政委会。使华北问题“暂告一段落”。而日寇的侵略政策也就不能一往直前而必须加以面貌的变更。

投降屈辱的政策，只能“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只能鼓励狂妄〔妄〕的贼寇之冒险的勇气；只能丧权辱国；而伟大的民众的反抗，即使在其出动的最初阶段上，就已经能够保持了华北的大好山河不致立刻沦亡。一个值得令某些人反省和猛醒的教训！

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崛起，给了日寇的华北国阴谋以当头一棍，可是，正因为这个运动的发展还在开始的阶段上，所以，没有能够打破日寇的全部计划。日寇还能够获得足以暂时满意的收

获而和南京妥协。经过南京政府的手，华北主权的完整是大大地受到了损害。日本帝国主义者获得了华北的半独立，华北的财政的自由权，以及华北当局和日满订立防共协定的权力。最后一点正是日寇在第二时期内努力的中心，而且决不以华北局部范围为满足，而企图在中国的范围内实现反共的统一战线，在反共的旗帜之掩盖下灭亡中国。

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之开展，抗日红军势如破竹地驰骋于山西，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痛感其对华政策有全部破产的威胁，恶意的声嘶力竭大呼赤化之危险。企图以夸张赤化危险恐吓中国某一部分的社会力量，使之站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下，获得自己侵略政策在中国的社会支持，而以防共的旗帜结成日寇汉奸的统一战线对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而实行其灭亡中国的政策。

从今年春季起，特别在红军进入山西境内之后，日本军阀与外交家强调地申述着赤化之危险，属于大陆政策之基本方针的东亚和平有被扰乱的危险。有田外相谈及基本外交方针时曾再三申说：“最紧要者为由赤化危险中救出东亚，确立东亚和平”（四月五日电通电），“对华政策不必拘泥于三原则，应以即于事态之方法，调整国交，而中日共同防赤乃系先行工作”（四月三日同盟电）。在这一时期内，在华北与南京进行的中日外交谈判之中心正在所谓防共协定订立之磋商。

可是，放在面前的亡国灭种的惨祸，是这样的显明和惊心动魄，决不能为夸张的赤化危险的宣传所淹没，而民族抗日运动之发展已经有这样的力量，这使南京和华北的当局不敢冒然地公开地和外敌站在一条战线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受到全国人民的反抗，即资产阶级的营垒中，亦发出了：“假借外力以剿共，即共乱剿平，外力干涉内政的结果，中国的主权，中

国在法律上的地位亦完了，中国的生命亦完了。”（《益世报》三月三十一日社论）的呼声。¹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抗的基础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内部一部分社会力量结合为一反共统一战线的企图是失败了。相反的，日寇这种政策，更加推动了全国人民要求“团结统一，一致抗日”的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中国最普遍最通俗的口号，甚至蒋介石的半官报纸密勒氏评论²上亦主张目前的剿共运动应该停止，以便协力以御外侮。（参阅七月十八日该报二四八页）

这样，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的面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统一战线政策遭受了失败，但是，正如第一个时期一样，因为全国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形成，武装抗战还没有发动，以致整个地说来，日寇更加加强与巩固了他在华北和全中国的地位。除了防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失败外，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日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重大获得，华北增兵和大规模的走私。一师团以上精锐部队之入驻冀察，控制一切重要的军事战略要点，不仅保障了华北的已得权利而且准备了更进一步的侵略与武装进攻的阵地，大规模的走私不仅使中国的关税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并且凶残地摧残了中国的国民经济，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处于毫无出路的地步而胁迫他们走向对日妥协与投降的道路。

只有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上，只有从日本对华政策最后时期的失败与成功的考察中，才能了解今天日寇口上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和经济开展之深远的意义。本来，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广田外相的国会演说之后，经济提携的口号曾经风行一时，但是不久被华北独立的军乐淹没了下去，现在又被日本帝国主义轰动一时的旧调重弹起来。据日本报纸的消息，川越茂出使中国之前，经外务军部两省协议后之对华政策是：

“(一)……现在日本在东亚之安定势力的地位，已为各国所承认，且满洲国的独立与冀察冀东两政权亦已确定，故日本对华政策之最大急务，及设法促进中日经济提携，本互相扶助之原则以取实利。

(二) 现在中国在各方面，科学技术之点均有重大缺陷，日本应加以援助，同时认清农业中国与工业日本之特殊关系，使‘日满经济集团延长到中国’，结成‘日满华经济集团’”。

川越茂^⑤抵华后，反复在口头上之经济提携、经济合作的谈话，日本报纸上国策再宣言的空气竟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营垒中的某些人发出了阿Q式的自慰^⑥自欺的幻象。譬如蒋介石氏就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发表其“半年来较之以前的情势还有一线希望”的论调。而《大公报》记者则大声急呼地认为：

“吾人以为日本最聪明之做法，为放弃九一八以来之武力主义，而从和平的政治经济方面入手，……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尹实代表日本广田内阁所谓经济外交之主张俱来，窃念此殆日本聪明外交之再起而极有历史意味者也。为日本谋，此究为最理智之办法，以中国立场言，政府回顾在和平途径上获得与日本合作之道……”（社论）。

既称之为聪明理智，复颂之云有历史意味，若恐欢逆舐吮之稍迟者，呜呼！

对于“实有一线希望”论者，我们只有请他读一读须磨领事之谈话与半年来之事实，稍为用些脑刀想一想：须磨先生说：

“在中日之间，已不是亲善，而必须使用依存一语，关于此点，余已屡向国民政府要人表示……说句彻底的话：南京政府将来有两条路对日依存，或对日作战”。难道一线希望在对日依存么？

对于高谈历史意味的《大公报》，应该想一想，到底这句话的

真意味在哪里？从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那么高唱着的经济提携之历史意味只能在于：

（一）这是武装占领后的必要的补充与巩固阵地的方法。远在两年前，日本军阀已经说：“日本对华政策之最宜重视者为经济及军事方面。军事方面之工作尚能锲而不舍，而促进经济财政方面合作之努力常显落后”。（引自一九三四年《中国经济情报》二五页）这种情形在冀察冀东两傀儡政权树立之后，在华北大举增兵之后，更是显著了，目前必须加强经济的进攻以弥补这种落后，以巩固已得之阵地。

（二）这是新的武装占领之准备与陪衬。难道能够否认在提携声中绥远方面之火药的腥味么？难道能否认沧石铁路及其他公路之建筑，是为着以后便利于屠杀中国同胞之准备么？难道成都等事件后，还缺少日寇新的积极行动的警号么？

（三）这是要把全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使中国成为日本的经济附庸。这就是把日满经济集团延长到中国，这就是工业日本和农业中国的意义。使中国在经济上完全失去独立，而“依存”于日本，而政治上的奴属必随经济的“附庸”而俱来。

（四）这是在防共统一战线失败之后，新的争取中国某一部分社会力量，为其侵略政策的社会支持的具体步骤。经济的进攻，在表面上不像大炮弹炸那样吓人，因之，不致立即引起发展中的民众反抗运动之突飞猛进；而且提携合作的口号确乎可以博得陷于绝境的民族资本家之一部分的赞助和拥护。吴鼎昌等之中日贸易协会，刘鸿生之中日火柴业销联营社，……以及《大公报》记者等的论调，指证了这方面的某些成功。

要谈“历史意味”的话，那么他就在这里，而不在任何别的

地方，但是除了历史意味之外，更重要者是日寇实施其对华经济提携的现实状况。日本的对华经济提携之第一个贡献是走私。走私是中日经济提携的典型。在这种提携之下，去年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贡献给中国以三万万一千元的不交关税的货品（超过正常输入的日货份数一倍以上）。今年的贡献是更大了，差不多全中国总输入之三分之一以上是走私货。中国政府的财政，在这个提携之下濒临破产，民族工业在这个提携之下，陷于死亡！第二个提携的赠品是民族工业的被吞并，在纺织工业方面，华北纺织业巨擘之裕元、北洋、宝成、华新，已经被日寇提携了去，而且三大日本纺织公司正在准备在天津建设东方兰开夏。在重工业方面，榆关的柳江公司被关东军直接的提携了去，而河北其他各矿，亦都有日资的注入。兴中公司正在筹备开采龙关煤矿，并且已向阎锡山提出山西煤矿应由中日合办。火柴业已经设立了“中日产销联营社”；肥皂业方面，日本七大油脂肪公司已在华北设立，“输出共贩组合”并准备在天津开设一大肥皂厂，……够了，这种提携难道不是民族工业之一服鸩酒？第三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首先是华北的植棉，是“棉业五年计划”。中国农村经济，在这个提携下将更加破产，更加成为日本纺织业的附庸。第四，为便利皇军剿灭匪贼及开展内地资源而建设的铁路与公路；沧石线、彰济线及许多公路都在动手了，塘沽大沽两港亦加强地经营着。看了这种提携的现实状况之后，正是“只要稍知廉耻，稍有常识的人，就不应该说出自日经济提携是中日两国都有利益的话来”（一九三五年《中国经济情报》二八页）。

不仅如此，假如有谁竟被经济合作的嘈杂的呼声所蒙蔽，以为今天日本对华政策只限于经济的进攻，那他将陷入于不可宽恕的错误之中。经济提携和经济合作，虽然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报章

杂志和外交官的外交辞令所喧染着，被不肖的汉奸准奸辈所颂扬着，但是日寇的对华侵略的现阶段，不限于经济的进攻，而且主要的不是经济进攻，经济的侵略只不过是政治和军事侵略的附助和陪衬，无论他叫喊得如何凶。即在川越出使前郑重协议而后定的对华基本方针中就有着如下之一条：

“（一）作为对华政策之全体，固有采取切实渐进主义之必要。惟在日满华三国接壤地带之华北，冀察、冀东两政权既已树立，并与日满两国之关系亦已渐次调整，故有急速地使其扩大强化之必要。现在防共工作将要完成，日侨之居住营业等自由，亦完全受保障，将来必须使冀察冀东两政权合流，树立单一独立政权，俾收健全发达之效，且可借以为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等等合流工作，而建设日满华三国保有调整关系之理想乡”。

事实上，新的侵略纲领上的第一项仍然是完成未完成的任务：即华北满洲化。这方面脚踏实地地坚实的做着：华北增兵了，“演习”家常便饭似的天天“演习”着，冀察政权大批的日本顾问是聘请了，王克敏^③、曹汝霖^④、石友三^⑤之类的老牌汉奸是荣升了，一切挑衅和小战，逼迫着二十九军及最后一个中国士兵退出河北，华北独立的海关已经建树了雏形，直接的干涉和镇压反日运动早已实现之中，山东山西之“合流工作”，急剧地在进行。韩复榘^⑥面前已经放着五项要求。日伪匪军的刺刀的锐锋直指着绥远。难道这些事实，是大吹大擂的“亲善”“提携”的声浪可以抹煞的么？

特别是最近几星期的事变的开展，给了一切歌颂赞叹日本对华政策有聪明理智的转变的人物以冷酷的讥嘲与残忍的讥刺。当日寇和汉奸们的经济提携，国交调整的合奏，还在调整丝弦初试噪音的时候，杀风景的军乐和炮火声却已经隆隆的彻响起来了。在

短短的休息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重新又转入攻击了，在巩固了华北的阵地之后，在大举增兵占领了一切华北的战略要点之后，在控制了内蒙之后，在引动自杀与残杀的西南与南京间的内战的企图失败之后，经过了无数会议的讨论与郑重协议之后，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各种“意外”事件，有计划的被制造了起来。由成都、而北海、而丰台、而汉口，而上海，继续不断地发生着“不幸”事件；不管这些事件各在其本身上有何等差异和不同，而实质上，都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恶毒的挑衅计划所引起的，这种挑衅的目的是为造成华北之完全独立，建立在华中华南之侵略的新根据地，及巩固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成都事件所提出的八项要求，无理的蛮横的要求（包括根绝一切反日运动，修改教科书，解散反日组织与会议，南京政府应对国民党之反日活动负全责任，及不准妨害成都领事馆之开设等等），日本海军之向华南、华中之出动，华北七千日军在北宁平汉路的“秋操”，日本报纸的不敬的口吻和挑拨的言论，都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狂乱的敲着警钟——中华民族生命千钧一发的警钟。寇深矣！中华民族热血的男女们！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事急矣！不甘为奴隶的人民大众，在最近一年来抗日救国的斗争中，你们已经表显了无限的英雄气概，保持了华北山河不致即刻沦亡，打击了企图消灭反日运动的反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可是华北的沦亡更紧迫了，寇贼之根绝反日运动的呼声愈益嚣张了，我们应该更坚固地、更亲密更广泛的团结一起，表现我们组织的特长，将全民族的一切力量，一切武装，一切财产，一切智力都争取到抗日救亡的伟大阵线中，并把他组织起来，发动反抗日寇的革命的神圣的防卫战争！只要我们伟大的民族能够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我们必然地能战胜日寇，必然的保存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求得民族的完全解放和独

立！为创立更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抵卫〔御〕日寇的进攻而斗争！为争取全国武装力量参加与发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斗争！

二、国民党的分化和动摇

自满洲事变之后，国民党不是由于恐怖，而是出于自愿地担任了为日寇侵略的清道夫的责任。不抵抗主义，三天亡国论，长期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各色各种花样，实质都是一样地为着投降屈服退让。特别是当着上海战争之后，全中国及全世界的人士，都能够根据这次战争的经验指证：如果全中国的武装力量能够统一起来，如果这个武装力量能够与誓死不作亡国奴的人民大众结合起来，那末，中国有充分的力量，去战胜凶残的日寇。可是，当权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在上海战争的当时，采取着失败主义的路线，按兵不动，并且阻碍别的部队之出动增援，陷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于孤军抗御之中，同时进行和平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且与日寇痛饮香槟，举杯庆祝！上海战争之后，更加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用以动员他所能动员的力量，以压迫和瓦解群众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个运动正是日寇在实施其侵略计划时之唯一的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府无视苏维埃红军屡次三番的提议，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反而动员三百五十余团的兵力对江西苏区进行绝望的进攻。同时高唱其侈言抗日者杀无赦，解散一切抗日团体，封闭一切抗日的报纸和刊物，禁止一切抗日的集会结社，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睦邻令，用其全力灌施中国无力抗日论、恐日病、奴隶心理于群众之中，驯至报纸编辑为登载“闲话皇帝”之小品而判处一年有半的徒刑，驯至一切报章要以××代日本。同时反而以民气消沉为自己的卖国

政策张目。国民党政府与其说是独立的或半独立的政权，倒不如说是侵略者手中的宪兵来得切合当时的事实，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之中，毁灭多少的田园庐〔庐〕舍，残杀了多少我们民族的优秀人才，耗费了多少国家财富与实力，其结果只是帮助了日寇乘虚而入。满洲沦亡了，热河失陷了，冀东在战区名义之下断送了，《塘沽协定》签订了，华北五省整个地在敌人口中，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是最直接的威胁了，而国民党本身亦在无可幸免之列。果然，去年五月，《何梅协定》之中，竟至承认华北五省党部之解散，国民党要员之驱逐！历史事变发展的过程证明，东北四省之沦亡，国难之愈演愈惨愈烈，不能不由国民党负其完全的责任。但是，事实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不警告与促进统治阶层中许多人的憬悟，体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真理，国家沦亡，国民党决无幸存之可能！

日寇的侵略，为投降屈服政策所鼓励，愈益凶残，愈益贪得无厌，中国——首先是华北——直接处在行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命运的面前，全国同胞——首先是华北的同胞——直接处在行将遭受亡国奴的惨痛的面前。可是，我们有四千余年历史的伟大的民族是不会无声无息的沦亡的，我们有太平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光荣的反帝革命传统的同胞是不甘被人宰割的，反日义愤的狂潮不是任何压迫恐怖所能阻拦的。果然，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北平学生的示威，以民族解放斗争成熟的指标的姿态而出现于街道之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凶残的侵略威胁着国民党自身的生存，民族解放运动所表现的伟大的不可估计的力量，这两方面都推动着统治阶层重新估价自己所执行的策略。

更重要的更有影响的因素，是在亡国灭种面前，国内阶级力

量的重新结合。无疑的，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涨是依据于这个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之上的。亡国灭种的危险，不仅推动了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之中，更广大更落后的阶层参加反日的民族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及知识分子，而包括其上层分子在内，亦卷入于这个狂涛之中。不仅如此，“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的新的民族运动，是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中央十二月决议）。在这个阶级力量重新结合之中，特别显著的是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转变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民族资产阶级被日本的侵略；陷于绝望的无出路的境遇之中，他们内部发生了深刻地分裂和分化，其中一部分企图在投降日本，附庸于日本帝国主义之下找寻出路；一部分则希望日本帝国主义能够满足于已得的侵略获得，不再前进，而他们能在“偏安”的局势下图得苟存。第三部分，则转向于积极的抗日斗争，以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大半年来的过程正是这种深刻的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明白地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营垒中的两极化。虽然一直到目前，一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相信让步妥协可以满足日本，可以求得苟安，然而残酷的事实，一天天的粉碎了他们的幻想。

至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之转变，则最明显地表现于文化界之积极化，及许多平教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参加者和领袖之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特别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二年第一个反日运动浪潮过去之后，在严重的反动空气之中，充满着悲观、失望、踌躇、烦闷的情绪，其中一部分沉醉于荒淫享乐的生活与憬□之中，一部分甚至转向于希望蒋介石的独裁，有些则在幽默之中找寻，“会心的微笑”；即使其中的最好的部分，亦在“默默滴滴的改造”的哲学之下，在

“纯”学术之中考据及古文古史之整理研究之中找寻安慰，更坚实的则走向在不变更现存的关系之下，实行局部的改造，这就所谓平教促进会，乡村建设等等。反日民族革命运动，首先推动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走上勇敢的反日抗争的阵地上来。以马相伯老先生为领衔的二百几十人的宣言，上海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成立^⑤，在无锡开会的平教促进会^⑥的年会上，一般的情绪的转变，许多平教领袖（如俞庆棠先生等）的声明只有整个社会制度之变更，他们的工作才能够发生真正的效力，手工业者、店员之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学生运动之新高涨等等都指明了小资产阶级群众及其上层之情绪的转变。许多我们民族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今天已经成了广大群众所爱戴的反日运动真正的领袖。

阶级力量之重新结合，民族资产阶级之分化，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急剧的转变，工农群众反日斗争之高涨，所有这些，不能不反映于南京统治阶层之内部。对于南京政府政策之变动，有不小作用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英国远东政策的某种程度上的强化和它在南京内部影响之增加。大家知道的，在满洲事变之后，英国帝国主义的远东政策是对于日本的侵略采取一种放任取巧的政策，而从一九三五年起，当着欧洲和远东的局势有着急剧的变化之后，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产生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企图组织一种较有力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运动。季兹罗斯的来沪，南京的货币改革，粤汉路的通车，西南事变中英国的立场，香港军备之大大的加强等等，都说明了英国政策之变动，和他对南京影响之增强。这就不能不反映于南京政策之变化和动摇。

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之第一个严重的标指〔志〕，就是一九三五年春以十九路军及福建人民政府领袖为基本的新的政党——民族解放大同盟之成立。这个新的政党在其纲领上提出了鲜明的反

日和反对南京的口号,并且力图参加与形成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对苏维埃和红军继续福建政府时代的友善关系,并求得更进一步的共同奋斗。

第二个严重的标指〔志〕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前后的改组派的下台,以民族改良主义和反日空谈的代表者,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二年第一个反日浪潮时登台的改组派,在几年来的实际的政策中,完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成为整个南京政府投降政策之经纪人,成为全国人民义愤所集的众矢之的。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前后,被当作赎罪的羔羊而牺牲了。

第三个严重标指〔志〕是两广事变。两广的发动,显然是受日本挑拨而起的,但是两广之发动不能不用抗日的口号与旗帜,这不只证明在群众中民族反日运动之成熟,而且指明在统治阶层中抗日的情绪之生长。而两广事件之和平的妥协的解决,说明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口号,使双方均不敢冒然地进行战争。

第四个严重的标指〔志〕是南京内部各派系之间在对外政策之分裂和争执,很明显的南京内部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外交政策之争斗:

(一)亲日降口派。这是以杨永泰、张群为首的政学系^⑤所主张的,张群外长在五月间之外交演说,是最明显的他们的纲领,对日是无论如何都是要“亲善”“提携”的,“剿共”是无论如何不能变更的国策。这派是最卑鄙无耻的北京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政客官僚的集团。是汉奸卖国贼的垃圾堆。可惜,在今天他们还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各部长之中各省主席中占着优越的位置。(二)欧美派。这是以孔祥熙、宋子文以及CC系^⑥所代表的,他们企图在美、英方而找得支持,他们想抵抗日本,但是极端害怕群众运动。

这些人未尝没有爱国的心理和情绪，然而对于群众运动之担心，妨害着他们积极走上抗战的道路上来。但是日本的继进的无饜的侵略，民族资产阶级之继续的分化及其一部分之更加左倾，群众斗争的高涨将推动他们更向抗日的方向上来。(三)以冯玉祥氏为代表的，而在下层的党员群众和军队中有相当的影响的一派，这派主张武装抗战，主张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可惜，这派一方面今天还不能在南京内部有重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还空谈多于事实。谈话演说自然是件极好的事，可是切实的行动，对于我们伟大的民族的命运更加切要而紧迫，因为寇深矣！事急矣！

最后一个，同时是极重要的一个标指〔志〕，是国民党下级党部、党员群众，公务人员及军队中之军官和士兵中，抗日的民族革命情绪之增涨，对于南京现行政策的不满义愤的增涨。从痛苦的经验教训中，从身受的难堪的侮辱中，从华北党部的解放〔散〕中，从日本在河北任意逮捕国民党员及公务人员中，从强迫撤退中，从各种意外的污辱中，使他们不能不郑重的思索。许多党员对华北党部解散之悲愤，请求讨伐殷汝耕的通电，地方党报反对防共协定的呼声，反对内战的呼声，杜曦、续范亭^①之自杀，二十九军、东北军、中央军、粤桂军中，中下级军官抗日情绪之激昂，公务人员警察对抗日救国运动的同情，在学生示威中“只要有命令，抗日我打先锋”的诚挚的呼声，都指证了这点。

在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高涨的基础上，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内部的分化和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南京政府政策的动摇，他取消了某些以前的基本口号，或把它放到第二位上，但是整个国策依然保持着基本上的不变；在群众的压力下，接受了某些人民的要求和口号，但是加以涂改和歪曲。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和二中全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这种情况。在五全大会上，国民党几年来

的基本政治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暗淡下去了，“剿共”“反共”的口号在大会的宣言的基本纲领中是不见了，训政时期宣布了结束，准备召集国民大会，对于叛逆殷汝耕下了讨伐令，这些都是显明的变更。然而，对于在目前中国政治生活最基本的问题——在对日关系的问题上，仍然决定所谓“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基本方针，实质上，这种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变种。在对于民众的爱国运动——首先是学生运动，发布戒严令，解散平津学生会，屠杀、镇压、逮捕学生及一切的爱国的群众，以及用各种方法分化、瓦解这个运动。对汉奸殷汝耕之流，除一纸空文外，并没有任何动作。对于红军的抗日的进步，依然到处阻挠，并进攻抗日根据地的苏区。为解决两广事件而召集的二中全会，更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摇摆。二中全会对于两广的抗日口号，不能加以任何的反驳，相反的，不能不对于外交的最后限度加以确定，申明：“对外政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在民众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下，使南京政府亦不敢利用自己战略的优势进行对两广的“讨伐”；对于全国人民所大声疾呼的民主要求，不能不提出现代国家的口号来作为对于这种要求。某种程度上接受的表示，“剿共”已经在全会的主要文件及演辞中不提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对日问题上又武断地盲目地断言“半年来的外交情况较半年前更有一线希望”，倡言，半年来没有容忍损害领土主权之事实，抹煞半年中重大的日寇侵略的事实（走私，华北增兵、内蒙独立……等），而外长张群的演说更为日寇所赞扬。对于国内团结一致抗日，则用全力说明团结之必要而不说团结统一是为着什么目的！抗日呢？还是降日？并企图以国民党内各派之团

结以代替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对于停止内战的口号不敢勇敢的彻底的实现,而且最近并企图重新挑拨起反对红军的新的战争,进行对红军苏维埃的新进攻。对于群众的民主政治的要求则以非驴非马的国民大会来搪塞,实质上,国民大会只是对民主政治的风〔讽〕刺画。在官场及半官场的报纸上容忍和允许登载和散布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同时又害怕与任何人订立抗日协定……。

在最近的时期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国民党内部及南京政府内部加强着分化和争执,另一方面,显然露了南京政策之一种新的动向和趋势,虽然,这种趋势还仅仅是一种趋势,还没有否定旧的政策的基本,然而不能无视这种趋势,在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环境中,这种趋势显然是会继续地发育和生长起来的,因之,假如把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及其军队看做是单纯的一色的整体,显然是十分无生气的,不切合于事实的公式主义的错误。同样,将国民党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与日寇等量齐观,与满洲国溥仪傀儡等量齐观,一样是很大的错误。将国民党及中国的统治阶层看做一色的日本的同盟者,看做一个不变的死的卖国集团,显然是忽视了这一年来政治生活中的活的新的现象,忽视了对于今天的历史时机的具体特点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估计。

我们今天的斗争,是为着战胜威胁我们民族生命存在的凶残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应把一切力量团结在抗日的目标之下,在现在的阶段上,一切应该服从抗日斗争,为着战胜我们当前的奸狡的凶暴的强大的死敌——日寇,我们不仅需要吸收最广大的,真正革命的,真正觉悟的和真正纯洁的分子,而且需要吸收中国社会上各阶级和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那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半途而废〔废〕的

同盟者和同路人，来参加反日民族解放斗争，以便能够更有力地、更顺利地、更迅速地驱逐日寇滚出中国去。为着战胜这个敌人，我们必须使它陷于完全的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状态中。因此，我们对于政治阶层中任何一个摇摆，任何一个微弱的抗日的趋势，都不应该忽略。我们要争取民族的力量一点一滴都汇合到抗日巨潮中来，即使这个力量仅是一点一滴，即使这个一点一滴的力量，还只是暂时的动摇的，何况他不仅是一点一滴，何况他们中间还可能较久的同盟者。

很明显的，要争取这种在动摇中的力量来参加民族的统一战线，不是靠“容忍”，而是靠斗争。没有为统一战线的斗争，便不能达到统一战线，只有经过斗争，统一战线才能够达到。对于统治阶层中亲日派的斗争愈加激烈愈加无情，则愈能够帮助其另一部分的清醒的过程。对于统治阶层的错误政策的严肃的有根据的认真的无情的批评，将是帮助其内部左倾分子增强自己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最有效的方法。只有最广泛的最有力的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方能使统治阶层中之有抗日倾向者，感觉到脚底下有这样热的土地，使他们在某种条件下，不能不加入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人民的统一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争取统治阶层中的一切可能的部分参加抗日斗争的发动力量。

不是无视与抹煞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及动摇，不是赤裸裸地武断地断定一切统治阶层的人们都一样的、一色的、至死不悟的汉奸，因为这是不合真理，不顾事实，而将一切动摇的力量向敌人的怀抱中推送的愚蠢的儿戏。同时亦不是以对错误政策之“容忍”“谅解”来求得统一战线，因为这将是抗日统一战线之死亡。我们需要冷静地确切地看到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之深刻的分化及剧烈的动摇，我们需要进行坚决的为统一战线的斗争，我们需要严

肃地认真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我们需要开展最广大的群众运动，以加深统治阶层内部之分化，以争取其一切可能部分参加抗日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这种方针是必须的，为着进行反对日寇的严重的武装斗争，争取统治阶层手中的军队之全部或大部的参加是完全必须的。

扩大，扩大，更扩大，我们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阵容，加强，加强，更加强，我们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这是民族统一战线成功的保证，这是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先决条件。

三、民主共和国 一当前的战斗口号

无疑的，在去年的一年中，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的爱国同胞为着实现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拒日寇侵略的斗争，已经获得极重大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国统一团结一致抗日的思想，已获得了中华民族最大多数的优秀的人们的同情和赞助；不论在北平或广州，不论在成都或上海，不论在学校或工厂中，不论在营房或农村中，不论在商场或机关中，在我们广大的祖国的领土上的任何一处，任何一角，一致抗日的愿望和行动都在与日俱增的发展着。工友们，农友们，店员们，武装弟兄们，智识劳动者们，——特别是学校中的同学们都进行着英勇壮烈、可歌可泣的伟大的斗争，为着挽救民族的危亡，反对强暴的寇贼，我们的斗争，我们的牺牲流血，不是空的，不是没有代价的，正像我们指出了的，它已经替我们的民族，在困苦艰难之中，支撑了华北半壁山河，不至即刻沦亡；阻止了日寇的“反共”（灭亡中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更加重要的是打下了真正最广大的民族的统一战线的初步的根基，这是战胜日寇的先决条件。

这一年的成就是不小的，过去辛勤耕耘的收获，正是今后抗

日救国运动无限的扩大的根基，正是彻底战胜日寇之第一步。无怪，我们的死敌，在这个成就的面前现在已经寝食不安起来，必欲扑灭之而后甘心。可是，假如同我们希望的相比较，同日寇一年来的新的侵略获得相比较，那我们的成就真是太小了。我们须得承认雄伟的民族抗日阵线，还没有形成，广大千百万的劳动大众，还没有引入斗争中来，争取动摇的力量参加抗日战线所得到的成绩还不多，因之，神圣的武装抗战还没有能够发动。这些当然是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相联结着的。要总结这些错误与缺点，需要单独的论著，我们在这里只指出其最主要者，为：我们对于民族统一战线之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缺乏坚定明确的确定与认识，在开始的时候甚至将国内的统治者与国外的敌人并立着。这显然，一方面大大地束缚了统一战线的广大性，另一方面减弱了对主要敌人的火力集中。其次，没有把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创立与为劳动群众的日常的直接的利益的斗争联结起来。实质上，这是我党新政策的互相联结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特点，常常忽略与放松后者，以致为统一战线的宣传和鼓动陷于缺乏生气与抽象，以致没有能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的成为统一战线中之基干部队。第三，无生气的公式的应用统一战线政策，不合具体对个别的人与个别的集团，不会从统一战线最低初步的方式开始，而空洞的号召其最高的方式之实现。另一方面对于为统一战线的斗争，反对统一战线的敌人的斗争不够和对动摇者之正确的方针之缺乏。

我们觉得如果将次要的缺点置之不谈，则其重要者大概如上述。

现在让我们转到本文的主要问题——关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要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从目前中国国内外的整个政治环境中产生起来的，是从目前时机的具体的特点中产生起来的，是从目前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中产生起来的，是从我们一年来为着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斗争的成功和错误的经验中产生起来。经过郑重的考虑而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至少是根据下列的理由：

(一) 在已经形成的中国内外的环境中，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最能动员一切抗日和民主的力量去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防止中国人民遭受亡国奴的惨祸的口号，是最能动员全国爱国同胞去反对日寇侵略保卫中国的口号。无疑的，在中国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最急切最紧迫的问题是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是防止中国人民遭受亡国奴惨祸的问题。同样是无疑的，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方法是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进行神圣的民族解放防御战争。问题是怎样在什么口号之下，我们能够最迅速最顺利的团结全国一切力量进行抗战！这个口号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因为这个政治口号能够达到人民群众之最广大的部分，它能够把国内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和进行反对日寇的民族革命斗争联结起来，因为这个口号是全国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中产生起来的，并且是国内统治者自己的允诺（“取消训政实行宪政”）中产生起来的，而且，它是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

(二) 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是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最有利的国家形式。民族革命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神圣的自卫战争，这个战争要求得胜利，必须全国人民的积极的参加和他们爱国主义的热情的最高度的发展。而民众的爱国主义是和民主主义不可分离的。只有从封建或半封建的桎梏中解放起（出）来之后，民众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才会汹涌澎湃而涌现为伟大

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与外敌作殊死战。当着民众在政治上被夺去权利的时候，当着民众被压迫被摧残的时候，当着卖国有罪爱国有罪的时候，当着祖国的命运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少数特殊人物掌握的时候，显然，民众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是被压抑着，不能发展，不能表现的。国内的民主主义的改革是战胜外敌的先决条件和保证。法兰西大革命，北美的独立战争^①、土耳其的解放运动^②，都给我们作为历史的证人。被某些人们恶意的引来作为中国无力抗日论的根据的阿比西尼亚抗战^③的失败，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对外的抗战没有和内政的民主改革联合起来。中国今天发展着的救亡运动，同样是最好指证。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着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时候，勇敢和坚决地起来要求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同时同样的迫切的要求国内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运动与抗日救国运动辩证的联结、统一着。很显明的，广大的民众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亲切地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们要求参加救国的运动，不是被动的，俯仰随人的奴隶式的“尽忠”，而是积极的、要把祖国命运的决定之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民主共和国和普选的国会制度，虽然，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的，但是在反抗日寇的侵略中，它毫无疑问的是一个进步的、有利的国家形式。因为在这种国家形式之下，民众将能发扬其爱国的热忱、创造性、积极性至极大的限度——而这正是反抗强敌的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力量的源泉。法西斯主义者及半法西斯主义者的论客们，胡说什么“应该为了国权与民族的生存，暂时牺牲民权”，主张什么“站在独裁的麾下，作为英勇奋斗的战士”，这不仅暴露这些先生们之历史和政治的常识之缺乏，而且确乎是和他们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之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相联结着的。

（三）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中国内部生活绝对必须的那些改

革之彻底实现的总口号，它是彻底地消灭一切国内政治生活中社会经济生活中之浓厚的中世纪的封建残余的口号——这种封建半封建的残余，沉重的压制着中国的社会生活，成为它面前的发展与进步的重大阻碍。在工厂中，在农村中，在兵营中，在商店中，在国家机构中，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道德的、半封建的桎梏，不仅沉重地、痛苦地压迫着工农大众，而且阻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阻碍着资本主义的普遍的迅速的发展。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今天中国的革命在其内容是反帝国主义革命与土地革命，在其性质上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特别在目前的阶级力量重新结合的情况下，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倾向于反日的民族革命的情况下，这个口号的提出尤其是必要的，因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既是能够帮助我们吸收他们参加到反日的革命战争中来的口号，而同时又是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的性质斗争的口号。它不仅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口号，而且它反对任何的非驴非马口鼻不全的所谓“宪政”政治。（如目前公布的宪法和根据他而召集的国民大会之类）他要求实现在圆满的民主主义。

（四）自然，我们——共产主义者，当着提出民主共和国和普选的国会的口号时，我们十分明白的了解，它的历史的限制性，它的弱点和短处，它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因之，我们不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一样把他看做“绝对的理想”，看做神圣的不可朽的制度，而把他看在今天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时的有利的国家形式，看做实现真正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过渡，看做为实行达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但是这是必须的过渡。“凡是要想达到社会主义而不想经过民主政治的人，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必然的走到

反动的结论上去”（列宁：《两个策略》）。

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的原因。次之，应该说到苏维埃和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当着我们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的时候，人们将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共产主义者，不是用尽力量证明并反复地证明苏维埃共和国较之普通的民主共和国是为更高的民主主义的形式么？为什么今天又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呢？何况，苏维埃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好多年，并存在着？何况你们多年来的斗争都是为着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可能而且应有的问题，是应该解释和说明的问题。

是的，列宁曾经说过并且屡次说过：“苏维埃共和国较之有立宪会议的平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为更高的民主主义的形式”。（《论立宪会议》的提纲，并在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引证并证明了他，及其他许多论文。）这个列宁的提纲毫无疑（问）地是正确的，不仅列宁以天才的理论的明确性证明了他，而且是十九年的苏维埃联邦的历史，特别是最近公布的斯大林宪法草案证明了他，而且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几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苏维埃共和国无疑地是更高更高于平常的国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这是真理，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真理。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谁要无意味的背诵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鲜的灵动〔活〕的今天的实际状态，那就会使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死的字句的牺牲。把革命的理论变成教条而不是行动的领导。

新鲜灵动〔活〕的中国今天的实际状态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其疯狂激进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切侵略的方法，实际的将灭亡中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千钧

一发之秋，而国内呢？在一部分领土上统治着高度民主主义的苏维埃制度，在大部分领土上统治着取消一切民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军警专政，两者之间进行了继续几年的国内战争，这样使中国的力量不能团聚和统一起来给日寇以坚决的抗击。顾及这样的灵活的生活，确切的事实，那么应该说，虽然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上，苏维埃共和国较之平常的民主共和国是更高的民主主义的形式，但是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下则：第一，民主共和国较之剥夺了任何民主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毫无疑问的重大的历史的进步，是无可比拟的更高的民主主义的形式。第二，统一民主共和国较之一部分领土上（主要的在经济上落后的区域中）的苏维埃制度是在地域上更广泛的民主主义，给更广泛的城市无产阶级及全体劳苦群众以政治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这较之一部分（小部分不到十分之一）的同胞享受更高的民主权利，而十分之九以上的同胞完全被剥夺一切任何民权的情形，无疑地是更广泛亦就是更高的民主主义的形式。第三，最重要的是：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能够促进加速中华民族力量的团结与统一，去迅速地实现驱逐日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团集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力量去保卫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正因为历史之急剧的转变，复杂的形势，要求我们的口号的变更。

当然，这不是说：当我们提出了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之后，我们便永远的拒绝或抛弃了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目的。为着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为着争取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最适当的最有利的国家形势而斗争，为着人民大众的基本的初步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同时这个斗争，就是为着彻底更高形式的民主主义而斗争的第一步，为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过渡。

关联于这个问题的，我们想更指出另外一点，当列宁说及上

述的提纲时，曾经着重地强调“平常的”这个字。（参阅《叛徒考茨基》中“立宪会议与苏维埃共和国”一章）但是，假如把今天我们所需要争取实现的民主共和国看做平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将是很大的错误。首先，因为，我们处于民族危机百分紧急的“非常时期”，这个民主共和国的政府不能不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国防政府，不能不是“非常的”政府；为着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他不能不采取许多超出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常度的办法。（如剥夺汉奸卖国贼的选举权，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企业等等）次之，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及由此而产生资产阶级之软弱与无产阶级之强大等等，不能够不使他有异于平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第三，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亦不能不给他印上历史的烙印。这里最明显地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已经锻炼出了红军——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为骨干的真正人民的军队，以及受过更高苏维埃民主主义洗礼的广大地区。这不是平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能见到的。

这些不平常的特点，都使我们能够更容易地更迅速地由民主共和制度走向更完满更彻底的民主主义制度。

其次是关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两者之间联系的问题。人们可以而应该提出如下的问题：“共产党不是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么？为什么现在又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呢？是否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取消或否定了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口号呢？若不，那么两个口号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回答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应回忆八一宣言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宣言上说：

“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

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的事业而奋斗。”接着宣言号召全国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们：“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很明显的，中国苏维埃和共产党在这个宣言上所提出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反日统一战线之一个高级的形式。这个反日的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他一切党派组织在共同反日纲领上的协定，同时各党派均保持其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性，在政府的组织方面是国内各个区域的地方的政权不管其性质与政策之不同，在一致抗日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联盟的政权，同时各个地方政府仍旧保持其独立性。在军事方面，是红军与其他武装力量，关于组织抗日联军的协定，同时每个参加的力量保存其独立性和参加一定的防线。无疑的，这是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中国力量极端需要统一的时候，所提出来的最有效最易于实现的办法，然而这仅仅是一个过渡的办法。这种在一个国家之内同时存在几个不同的政权，各人有他特殊的司法立法行政的组织，这不仅在以后的发展上将成为重大的障碍，而且即在抗日战争中，也必然地会发生许多困难。只有统一而不可分离的民主共和国才能够把中国真正的统一起来，才能够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和自由。

在这里，我们想，马克思主义对于联邦共和国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问题上所指出的深刻的思想是极重要和有兴味的。列宁说：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无产阶级的革命底观点，坚持民主集中主义，坚持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共和国若是发展上的一个例外和障碍，便是由君主国进到集中共和国的一个过渡，他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是一个‘进步’”。（《国家与革命》）

这个深刻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民族革命战争时代的国家形式的问题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联邦式的由协定的基础而产生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在目前的一些特殊条件之下，是一个“进步”，是促进中国以统一的力量抗拒日寇的进步；这个进步的深刻的意义，是在他是从目前毫无民主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及中国的四分五裂的状况进到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过渡，只有在这种过渡的性质上才能了解他的意义，不然，他将在以后的发展上成为一个障碍。这在我们发布八一宣言的时候，就估计到了的，在这个宣言上，我们就把国防政府看做一种临时的过渡的统一战线政府，宣言上说：

“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的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该设法召集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救国的政党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遵〔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可以看见，我们所主张的国防政府是临时的过渡的政府，它的责任是领导抗日斗争并召集全民代表机关来解决抗日救国的大计。试问，什么是全民代表机关？岂不是国会。所以目前所提

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只不过是八一宣言的历史的逻辑的发展，是他的具体化与内容的充实。民主共和国不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否定或取消。相反的，是他的发展的更高的阶段；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走向集中的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之必要的过渡。我们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时，并不是取消或否定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立而斗争，相反的，我们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立看做是走向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必经的阶段和必需的过程。在实际的斗争中，为着准备进行急不可缓的抗日战争之准备与发动，为召集在民主条件下选举的国会，并保证这个选举真正民主的性质及这个会议真正能够代表民意，那么，国内现有各种势力之根据反日共同纲领而建立的临时的过渡的政府与联军是必要的，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实现以民主共和为基础的中国的真正统一，在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维埃将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之一，苏区人民将参加统一的全国的普选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同样的民主制度。

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政府，显然，在实质上，亦是一个国防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要尽力的为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而斗争，为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自卫战争而战斗，为求得中华民族之解放与独立而斗争。不过，他是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而不是各个地区之现存政权的联盟政府。中国无产阶级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时，将最坚决地为这样的统一的国防政府而斗争，为使这个政府彻底地实现在八一宣言中所提出的十大政纲而斗争。为使用一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方法，为着不仅实现抗日的十大纲领而且为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斗争。

至于怎样在实际的斗争中来实现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统一的

国防政府与普选的国会，这个问题是要依靠斗争来解决。斗争，而且只有斗争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最广大的民众的反日运动的高涨，没有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之无限的扩大，没有对于汉奸卖国贼之残酷的斗争，没有对于国民党政府一切错误的内外政策不容情的批评，揭露与反抗，则建立民主共和国是不能想象的。民主共和国不会自然地产生起来，他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全体爱国同胞之共同的、坚持的奋斗中才能产生。

为着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即是（为）着团结与统一全民族的力量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斗争，亦即是为着国内生活中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急切而必须的改革而斗争。为着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密切的联结着为实现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的日常的紧迫的利益而斗争。为民族的解放，为民主与自由，为吃饭，为土地，为改良群众不堪忍受的生活，都互相密切的联结在这个总的口号之中。只有能够把群众身上重压着的生活的桎梏打破的时候，只有使群众生活上之迫切需要的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基础，人民的民主的国防政府才能够有足够战胜日寇的支持和经常的发动力。

* * *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新进攻正在开始，民族生命的警钟彻响着，最后“关头”无疑地是到了！中华民族热血儿女们！起来！团集在光辉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大纛之下，与日寇作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寇深矣！事急矣！起来！一切爱国的人们！坚决起来，以我们的头颅热血，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国内时事杂论^{*}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

—

历史上许多民族和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就是：“由于客观条件，对外政策，占首要的地位。”（列宁）譬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经历了五年以上的深刻的民族危机，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威胁着的今日之中国，对外政策——首先是对日政策，无疑地是占着时局之首要地位，是国内政局发展的决定的因素。我们民族的危机存亡的局势决定了政治斗争的重心要从国内的问题上转移到更重大与根本的问题上去了，转移到维护我们民族的生命上去了。“抗日救国”——这是沸腾于这个伟大的广漠的中华故国的热烈的呼声。对外政策——首先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今日决定中国政治动向的轴心，这是国内一切政治集团、党派的斗争与对抗之大分水岭。

最近几个月来，国内的政局之发展，使着许多人感觉到烦闷、复杂、混淆不明，曲折多幻。是的，国内的政治的局势是异常复杂的、曲折的、令人目眩的。因为，今天的国内政治局势是在一个巨大的转变的过程中。正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转换时机一样，他不能不包括着新的和旧的，过去的和将来的各种成份，而同时在

*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前夕，博古就当前国内形势发表这一文章，刊登在1937年6月22日《解放周刊》第七期上面。

复杂的生活实况中，新的发展的动向是确定地显现着。政治的庸才，在这样的局势中会迷惑、目眩头晕不能领会新的趋势和动向，而觉得一切如旧。我们就需要能够抓住时局发展的基本动向，抓住这新旧混杂的过程中，由于客观诸条件所决定的新的趋势，增强这个趋势，而克服一切阻碍这个新的动向之生长的旧的残留。

这样，对于最近国内时局的评论，我们就从对外的问题开始，从政府当前的对日政策开始，因为这是今天时局中的占首要地位的问题，同时亦正在这对于时局发展动向有决定作用的问题上，最明显地呈现了新的趋势动向。

最近日本国内及在华的报纸上常常披露有许多耸人听闻的词句和论调如：“中国政府已在准备对日作战”，“强烈的抗日运动之新发展”，“南京政府对日攻势之积极化”，“南京政府对华北之攻势”之类。很明显的日本报纸的这类的煽动是过甚其词的、夸大的、别有目的的。可是就是这种夸张的煽动，是片面地反映着某些客观的真实的。这个客观的真实，就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一定限度的强硬化。正是这个对日外交之强硬化，虽然还是极有限度的，是目前中国政局转换时期中的新的成分，他和国内和平的确立这个事变一起，组成了发展的一定的新的趋势。

三中全会^⑥在他的宣言上说出了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的立场，虽然，这个立场正如全会的全部文件一样，是含糊的，需要煞费推敲吟味的。但是在全会后三个月后，即使如汪精卫氏（平津日日新闻论汪氏长行政院时之为调整中日邦交的奋斗的献身与诚实，表示敬意的！）亦曾在中央纪念周上演说：“我们对日本的态度是抗日不是排日，所谓不是排日，是我们本无害人之意，所谓抗日，是人既加害于我，我们不能不加以抵抗。”像汪氏这类曾为日本代言机关所尊崇和曾为民众愤恨

的人物，居然，亦不能不说“抗日”二字了。这个演说值得注意不在汪氏之辞令，而在他证明了在国民党中间以及在国民党领导人物中间抗日空气之增涨。自然，确定政治动向的指证，不是某些人或领袖说什么，而是他们在作什么，不是标语与口号，而是行动与事实。在最近几月来有些什么事实做指证呢？我们指出以下事实来：

（一）南京政府对于儿玉考察团^①的严拒。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训斥下，儿玉考察团空手而返；

（二）不管佐藤^②的巧妙的外交词令，但是他没有能够引诱中国当局去和他调整“邦交”；

（三）税警团^③之增防青岛；

（四）禁止津石路的建筑，禁止龙烟煤矿^④之让渡，禁止中日通航；

（五）加强了反对走私与汉奸活动的积极性；

（六）汕头案^⑤之严峻态度；

（七）全国军队之开始整理及某些有关国防之配置。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在全国人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气氛中，国民党政府在自己对日政策上不能不变换过去的屈辱让步的方针，而改变到较强硬的政策上来；自然，这些步骤是十分不够，特别和日本的激进的侵略比较起来，（冀东察北仍然存在着，海河浮尸^⑥不能立即破获，天津关卡眼看着被占，听凭着别有企图之日本武官飞来奔去，更不说对收复东北的问题。）然而，比之过去的抵抗，比之放弃东三省，签订淞沪、塘沽、何梅协定的时代，不能不说已经转换了方向，现在需要的是依着这个新的方向，大踏步的跑步前进。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一面前，在中国抗日运动的增涨

面前，在南京抗日政策之强化面前，愤懑着、咒咀着。陆相杉山元在五月十九日的地方长官会议上说：“由于在反日旗帜之下政权集中的成功，及军队与国防之增进，中国过分地自信其力量。……这个倾向引导他变更其反日态度为伤害日本……有这样的危险，中国将很快采取一切办法来击退我们在任何方面之和平的扩展。……”

军部首脑的这种威胁的辞句，正指明着日本极力地在准备着灭亡中国之大战，而军部首脑同时又将新的恐日病细菌向中国人民和当局散布，“中国不要过分自信其力量”！完全相反，危险不在中国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在某些当局人物中恐日病的暗症未除，就是说：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尤其对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某些人士还害怕这个力量的奋起，右派分子还在阻碍着压抑着这个力量之奋起。不能勇敢地、大胆地依靠在民众的无坚不摧的伟大的力量之上，就使得今天在对日关系上仍然表示那样踌躇和趑趄之根源，就使得迫切的迅速的切实的抗日战争准备，缺乏最基本的条件。

爱国的人民是应该赞助政府当局的这个对日政策之强化的，正像他赞助每个前进的举措一样。但是他必定更高地掀起抗日浪潮，推动这个新的动向之冲破一切阻止的生长。

二

华北——今天中国人民关心和注意的焦点，这不是偶然的，华北是我们国防的前线，是日本攫取的第一个目的物，是东方的火药库。

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用尽一切军事的经济的政治阴谋的方法来攫取华北。第二次九一八，占领华北的警钟是应打动中华儿女

的心胸的。根据密勒氏评论的消息：“可靠方面息：目前华北日军驻军在二万五千人以上，但是日本当局并不以此为满足，已决定增加北平与丰台驻军至一个师团，而天津和通州至一个师团与一个混成旅团”（该报八十卷十三号）。又据五月二十八日英文大美晚报消息：“日来哈埠盛传大队日军自齐齐哈尔、海拉尔及哈尔滨开拔赴绥远边境向滂江集中，并有大队日军离多伦往商都，似颇有根据。又息，此次部队配备有坦克飞机，商都部队尚有自三江区调来之白俄联队，此外尚称部队达到绥远边境一律改换满洲军队制服，目的在使中国相信系与满洲国军队作战而实际则与日本军队作战也。”从这个消息中，已经可以了解华北危急到什么状况。除了增兵与军事的准备（如兵营要塞飞行场之类的构筑等）外，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亦以盛大的威势汹汹而来。据密勒氏评论息：“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银行与实业界已集合二千万之资本以开发华北经济。外务省已接受使用庚子赔款的三千万元为资助日华北经济机关之用。朝鲜银行拟募集一万万元开发华北。”（该报同期）纺织业在华北之进出，走私的泛滥，冀东的发行伪钞等等都指明日本经济活动之积极，而且他并以压迫华北当局的方法获得了某几项华北中日提携的条件如津石路、龙烟煤矿、芦盐运日，中日通讯等等。

在这个情况下，保卫华北已经成最迫切的任务，不仅对于华北的当局与人民，而且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每个国民应该为保卫华北，守着我祖宗遗留的大好河山而奋战。

可是正在这个紧急关头，正在这国防前线的华北蠢起着谣言。宋哲元氏抛弃了重大的职守而南下乐陵“修墓”，宋韩在冀鲁边会晤，冯玉祥、鹿钟麟奔波于河北山东，平津日本报纸以大字登载着：“国民政府想将宋哲元氏和二十九军调到河南省……任宋哲元

为河南绥靖主任，命张群常驻北平，担任对外交涉，刘峙将在冀察任某项要职，中央军代二十九军的地位。”五月十八日南京军事当局发言人接着否认这个谣言。……华北局势又多了一层新的动荡，注视与关心华北的人民又增加了一种焦虑。“无风不起浪”，谣言的浪潮是为某种风所吹动的。据我们看来，这就是：

（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政治阴谋和挑拨。这原是日本强盗宝库中的著名武器之一，这原是除军事与经济之外的促进占领华北方法之一。只要看一切谣言与消息，首先是从日本报纸上露布出来的这一事实，就可知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加深与促进中央当局与地方当局之间磨擦和裂痕，以夸张中央势力之威胁，利用地方当局地盘或势力之割据的观念，激动他们的“利害感”以促使地方当局投人罗网。这原是日本强盗之惯技，但是这个惯技之能够使用，是以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可乘之隙为其条件的。

（二）这个客观上可乘之隙就是中央和地方之矛盾，而最近又为南京对日态度的某些强化而加深了。由于南京的对日政策之变化，中央当局不能不加强其对华北之注视及干涉，如税警团之入鲁，禁止地方当局履行某些丧权并危害国防之“经济提携”的条件，对汉奸分子（如陈觉生之流）的干涉和弹劾，以及某些军事力量之可能的调动等等。这些举动站在国防的民族利益的立场来说，是应有的，无可非议的，而且还嫌其不足、迟缓、无计划。我们早已经主张集中全国优秀的兵力于华北抗拒日寇的攻击，而到今天还只不过开了一二团税警团入鲁。日寇计划增加三个师团入华北，而我们至少应有足以抵抗这个巨大的兵力的军队增援华北。但是对于那些汉奸自然是恐惧与不乐意的，他们反抗任何一个足以增强华北国防之办法，风浪就从此而起。另一方面，一些不是汉奸而是地方的权要人物，由于旧的军阀的传统及鉴于数年来南

京中一些人物之剪除异己攫权自肥的教训，而栗栗于难于自保之危惧。

(三) 同时南京中之右派分子，到今天还是忠于他们老的军阀的传统，想在增强国防这个口实下，以遂行其军阀的企图。何梅协定的时代，这些人物狼狈逃窜，视平津如异域，今天则又欲卷土重来，带着耻辱的传统重来。而且想排挤与驱除别人和异己的势力，以及企图压迫破坏保卫华北的重要因素——华北的民众爱国运动。这些右派的活动和企图，客观地大大地帮助了日本强盗挑拨和阴谋，因为他们加深了矛盾和裂痕。

这就是吹动华北政局动摇的风。谣言不会因否认而熄灭的，如果有使谣言发生的根基存在的时候。但是今日之华北，如果制造什么变卦来，这就是华北的断送。可是全国人民，不论当局与老百姓，不论地方或中枢，都应该记着今天我们民族的需要是保卫华北，而不是断送华北。

我们主张，动员我们民族一切力量来保卫华北，守着我们国土的每一寸。在保卫华北的第一义的立场上，团结起我们民族的每一分的力量。我们反对中央某些右派分子及地方某些人物之军阀主义的倾向与传统，不论他表现于铲除异己扩张派系势力之上或者表现于地方割据拥兵自肥之上，因为这都有害于保卫华北，便利日寇。我们主张：无条件撕毁何梅协定，把中央军中及其他军队中的最精锐的部队，增援华北，与现在华北之二十九军一同抗战。宋哲元氏应该即时返平，负责保卫华北之一切军事政治的准备，但是冀察政委一切亲日汉奸分子应该驱除出去。宋氏不应当拒绝和中央或任何方面真正抗日之人士合作，并且应该欢迎他们来共同担负国防前线之伟大使命。应该即时放弃对于民众爱国运动之压制及禁阻，相反地，应该帮助和发展华北几千万人组织起

来、武装起来为保卫华北而战，把抗日军队和民众结合起来！让在保卫华北的神圣的职责上，中央地方和民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吧！守住我们的大好山河千里沃野。

三

在详述国内政治的状况，不能不提到严重的灾荒问题，近五六千万人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与毁灭，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

一九三六年是曾经被认为全国农村丰收的年成，亦曾经举行过献谷典礼拜谢丰年。可是这种庆祝丰年的乐调，竟随着一九三六年而俱去，开春以来灾民的凄惨的号泣，震动着全中国。现在大家都承认了灾区之广，灾情之惨，灾时之久，为近百年来所罕见。说到灾区，那么“截至最近，川省被灾区有一百四十一县，灾民三千余万人，黔省被灾区有六十一县，灾民二百七十万人，甘省被灾区五十八县，灾民有二百九十万人”，豫省被灾区九十三县，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九，灾民九百余万人，其他陕西、宁夏、青海，都同样地遭受了灾荒。“全国被灾区域可亘三百余县，灾民可达四千余万。”灾区面积将超过法国或德国的面积，人口可以赶上欧洲的一个大的独立国家。至于灾状之惨，很难正确地反映与描述，就把赈务人员的报告摘几句吧：“由成都至重庆的公路上，饿莩竟达五千余人……不但草根树皮尽充食料，且有易子盗尸以充饥肠之事，老幼死于沟壑，少壮奔走四方，惨不忍闻。”（张群报告）“灾民大都掘食蕨根树皮观音粉，面无人色，衣不蔽体，年轻妇女以破巾松叶围紧腰间，向之问语，奄奄一息，流泪满面，惨不忍闻。”（戴静生关于黔灾报告）报纸关于灾区惨况，更是充满着。

必须问：是谁造成这样的灾况，是谁使几千万同胞陷于活的和死的地狱？谁都知道，这不是纯然的自然的灾害，自然的现象

只有经过社会经济的条件，才会爆发为如此惨烈的景况。去年苏联瓦尔加区及东南部亦遭受天旱，可是感谢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克服了自然灾害，非但没有形成饿殍载道，而且仍有不坏的收获。造成中国目前的重大的灾况是农村中的非人的封建剥削、军阀制度的压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典型的川灾作例，就可以完全明白旱灾的真正原因在那里？长江先生在这方面有很生动的描写。摘录几段在这里吧！“救灾不忘收税！这也是若干地方政治上的格言。乐至县这时正收二十四年度中‘六十七’‘六十八’两年欠粮。民国才二十六年，而在二十四年时已收到近七十年，钱粮岁数大过实际民国岁数约三倍之多。这是四川政治奇迹之一。”“如此灾情之下，武胜和全川一样，两件大事还逼在头上：一是强派鸦片，一是强验地契。……故各县所派鸦片数大可惊，如重庆即每月额销数为十四万两，每年额销数为一百六十八万两，每两以批价二元二角计算即重庆市区，每年在鸦片一项，应负担三百六十九万六千元……全省合计每月额销五百余两，每年额销六千五百余万两……每年可得一万万四千四百万元以上收入。”“最下流的两岸，苍崖翠壁间星罗着无数的琼楼玉宇，熟悉的人可以指出那一座是某将军的住宅，那一座是某要人的娇窝，每座动辄几万几十万的建筑费，这些钱是怎样来的，与现在吃树皮草根泥土的灾民有绝对的联系，热心筹款的人二角的募捐，倒不如拍卖一座别墅来得有力量。”够了，不必再引了，解释是多余的事，灾害原因，就在这种社会的调度之中。

灾况已经这样严重应该怎样办呢？长江先生似乎以为共产党不主张救灾的，他说：“列宁对帝俄时代的灾荒，他不主张救济，认为是革命的最好条件。”应该说：这是没有根据的，灾况当然会推动民众革命化，但是没有这样的人愿意眼看成千饿殍的倒毙而

袖着手期望革命之到来的。我们认为既然发生这样酷烈的灾况，那毫无问题的，应该救灾！“救灾治荒安定民生”，正是中共八一宣言^②提出的十大纲领之一。不仅应该救，而且要迅速救、普遍救、切实救。漠视灾民的生死而无所动心，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另外一些人物。一百万元急赈款被扣留了，灾民仍然吃着草根树皮观音土而相继死亡；一千二百万赈灾公债作为生意而讨价还价着；川灾声中大闹川谣，急赈饱入私囊，工赈时“赴工无口食，工中无住处……工人沿路借宿，无被无草疾病传染甚速，故工人多带药罐做工……监工的人常常吃空名字，到上边查考起来，又把工人互相顶替”，农贷变为变相高利贷，尤为尽人皆知。救灾不忘收捐，救灾不忘强派鸦片强验地契。如果这种叫做救灾，那么“夫复何言”！如此“救灾”，我想，每个还有一丝同情心存在着的人不会不觉得刺骨般的痛感的吧！我们主张切实迅速普遍地救灾，要求国家以大量的款项救灾，要使一丝一毫都落到真正受苦难的人们身上；要吸收灾民自己来管理救灾的款项，监督其用途，要严办一切玩忽赈务的吞浸赈款的灾民公敌。

自然，救灾如果仅仅限制于赈济，那么虽可给灾民一时的帮助，可是绝不能根绝灾荒；要根绝灾荒就要铲除产生灾荒的根源，就不能不激进地改革社会的经济的关系。地主的掠夺，一年四征的田赋，一万万四千万之鸦片摊派，强验地契……这一切如不能与这次川灾同时消除，那么川灾之受惨烈的重演是必然的。是的，灾荒对于社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可是，它不是引导到长江先生所说“产生革命”，倒会引导到“土地革命”去的。严重的川灾，或许能够使有些执政的人民郑重地来思考一下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吧！希望几千万人民的饥饿与几千万人民的死亡，足以启示某些人们以改善民生之具体的道路与方法——抗击外敌的侵

略、消灭封建的军阀的统治和榨取，激进的改革农村土地关系。

四

如果在对日政策上可以看到某些新的气象；那么应该说：在国内民主政治实施方面，国民党的政策是尚没有重大的变更。是的，三中全会后曾经有不少文告：如蒋介石氏的谈话，邵力子氏的演说，中央党部之保护正当言论的训令，如国民大会的法规的修改，除最后一点我们屡有论及，指明其与民主主义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外，其他诸文告固未尝不堂堂皇皇，可是事实上呢？事实与文告之相距，真有隔世之感。

爱国犯不但没有释放，而且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审判着，而且审判时禁止人民旁听。即纳粹独裁之德国在莱比锡审判时亦没有如此。这而且是对于闻名世界的救亡运动的领袖们的特殊的荣典，而普通的爱国犯政治犯则无所谓审判，在黑暗的牢狱中，残酷的苦刑中的呻吟、受难；不仅三中全会前被捕的人犯释放无期，且在三中全会后，又有许多人被投入圜圉。上海大同大学学生程某，被密查员几次“访问”之后，宣告失踪，似此者尚有许多。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谈不到的，相反地许多合法存在的团体被解散了（如上海绸织工会等）。

至保护正当议论的训令，在冷酷的事实面前实有讽刺画之感。上海日日新闻、平津日日新闻、庸报之类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刊物，天天登载着真正危害民国的言论的刊物，则非但可以公开出版而且横行全国，莫加遏阻；以反对统一战线为目标之刊物，如无耻的流氓调的中国研究不仅保护而且津贴着。可是真正前进的刊物则遭受禁止停邮等处分，检查之严“除裸体画外几乎什么都要被抽去；”甚至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氏投稿刊载白话诗之民众

周刊亦被抄没！保护正当言论！呜呼！

这些难以容忍的事实，指证着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士的畏惧民众到何等程度，指证着旧的独裁主义的传统还如何地烙印在国民党的政策上。可是抗日与民主的不可分离是确然不拔的真理。这种旧的独裁政策在今日只能成为全国团结的阻碍，成为切实地迅速地抗日准备的障碍，成为政府与民众阻隔的鸿沟。历史的发展，毫无问题将告诉人们，一切人为的范篱是阻挡不住着民众要求民主的斗争的。

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民众深刻的知道，民主权利是为人的基本权利，可是要获得这个权利，不是要企望人们之仁慈的施舍，而是要靠群众的斗争！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今后国内政局的动向将决定于在抗日与民主的旗帜下展开起来的群众斗争的程度。亲密些团结着，勇敢些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奋斗吧！一切障碍与暗礁，将会被汹涌的民族抗日斗争的浪潮冲毁的。

抗战形势与抗战前途*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

—

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进行了五个月了，伟大的壮烈的紧张的五个月！在这五个月中，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固然遭受着各种的灾难和痛苦，遭受着许多的创伤和损失，然而同时我们却得到了巨大的锻炼和经历，得到了宝贵的收获和成绩。在艰辛的浴血的斗争之中，中华民族正开创着光明灿烂的前途。

是的，在五个月的战争中，我们在军事上遭受到了部分挫折和失利，平、津、沪、宁失陷了，察、绥丧失了，太原被敌占领了，大好山河被敌骑所践踏，锦绣田园为寇贼所焚掠；许多同胞被残杀迫害流离失所，许多悲伤惨痛的事迹，使每一个热血的人都悲愤激动。然而这仅仅是事态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而另一方面，则五个月的抗战给了我们以最可宝贵的收获，虽然，人们常常由于激昂的悲愤而忽略了这一方面的事情。

首先应该说，这次抗战以其规模之大，动员之众，战线之长来说，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不仅如此，而且他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上的重要的转变关键。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我们的

* 抗日战争进行了五个月，平、津、察、绥、太原、沪、宁相继失守，部分领土被日本侵略者侵占，暂时军事上的失利，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笼罩着悲观失望的情绪，针对此，博古写了这篇文章，对抗战形势与前途作了全面分析，刊登在《解放》第三十期上。

民族经常地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压迫、侵略，成了除去懒汉以外谁也可以来欺侮殴打的民族，成了被人鄙弃贱视的民族，并且失去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媚外惧外的心理滋生和散布在人民的某些阶层中——这在近年来就成为恐日病。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被人践踏、蹂躏、奴役、鞭笞而不敢反抗的；现在成千成万的人民觉醒着激动着英勇地不屈地前仆后继地走入了民族自卫的战场。民族战争的炮火惊醒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使他们卷入于民族解放的巨潮中去。鸦片战争以来的积弱的传统被冲破了，恐日病被粉碎了，民族的觉醒，民族的自信心，增强着汹涌着，这对于我们民族今后的发展将有何等巨大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啊！

其次，近百年来由于种种的条件和原因，我们的民族陷于内战不绝的境遇中；而现在全民族为着维护民族的生存坚固地团结了起来，一致地共御外侮，这次抗战不仅为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的大规模的全国抗战，而抗战中之内部团结亦为前所未有，并且在抗战过程中将日益坚强与巩固。

第三，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残余势力的障碍阻挠着中国的进步与近代化，直到抗战以前我们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政权，统一的国防军队，民主的政治制度，可是对外的抗战却开创了在这方面的崭新的趋势。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开始成为国防的政府，政令统一于全国；国民革命军开始形成统一的国防军，并且获得了和现代武装的日本军队作战的经验；政治制度之民主化，虽然还很微弱，但是开始了（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事实上取得了合法地位，政治犯的释放，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之修订，民众团体之奋起等等）。自然，不论在统一国家政权、统一军队、政治民主化的各方面，都还仅仅开始，都还充满着许多弱点，但是重要的发展趋势、动态已经确然的呈现了起来；这个趋势的正直的生长

将开辟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光辉的远景。

第四，日寇轻易地不遇抵抗地占领了东北四省，这大大地鼓励了他的侵略的狂焰；促使他更加猖獗、无忌惮、狂妄地希冀不战而服中国。五个月的抗战给凶残的日本强盗以重大的打击，教训他们！中华民族是不愿意为亡国奴的，非以重大的鲜血的代价是不能占取我们寸土的。日本强盗用了极大的代价与牺牲方才能够暂时占领我们一部分的国土，而我们顽强英勇的抗战，大大地促成日本帝国主义内部矛盾与斗争。

第五，抗战的英勇，为民族为国家而牺牲的将士的可歌可泣的悲壮的史绩，激动着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士的歌颂与赞美，煽起了国际同情的怒潮，提高了中国在国际间的声望和地位。

所有这些收获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其意义的重大，影响的悠久，决非目前暂时的失利所能比拟。五个月来成千累万民族英雄的鲜血不是白流的，全中国人民的支援和热望也不是空费的；将上的血肉，人民的热望，培植起了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的根基。

所以，我们不应该为了部分失利的悲愤而漠视了我们伟大而可贵的收获。当然，军事的失利和许多领土的丧失是惨痛的事实；但是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和部分的失利，部分的领土丧失，决不是中日战争之最后的决定的胜负。何况在民族抗战的初期，部分的失利决非出于意外的，而且历史上民族解放战争亦并不是一战而胜的凯旋式的进军，反之却多是从挫折与败北中再接再厉地苦斗中获得最后胜利的。问题是在我们要坚毅沉着地来分析失利的原因，学习经验教训。

抗战初期的失利主观和客观原因在哪里呢？主要的是：（一）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防力量的薄弱，军队装备的落后，现代武器之缺乏，而日本则是一个有现代武装的帝国主义的强国；（二）中国

在经济发展上，首先是国防工业与交通运输工具上，大大地落后于日本；（三）中国长期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国内团结方才开始，民众的组织 and 动员不够；（四）日本有着长期的侵略准备，而中国则实际上没有准备自卫的抗战；（五）日本在中国内部培植了汉奸亲日派的力量（托洛茨基匪徒是其中的一个支流），而在战争的初期，中国人民还不能和日本人民大众的反侵略战争的运动结合起来；（六）中国军队还没有能达到现代战争所必须程度的统一指挥，中国的政治机构还没有能完全地适应于战争环境的需要，军队和人民没有完全密切地结合；（七）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所有这些都影响着初期战争的结果。但是，我们坚信，我们是有力量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和错误的，因而，我们是能够从部分的失利中学习经验教训而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

二

敌骑纵横，山河破碎，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都能感觉到祖国命运之危急，当前局势之严重。是的，我们是处在一个于钧一发的危急而困难的时期中呵！初期战争的失利，无疑地加重了目前时期的严重和困难。军事上的挫折，重大的伤亡，领土的丧失，一些重要工业区域的沦陷，许多铁道干线的失却，重要海口的被封锁，这都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补充与扩大的急切，兵力转移的迟慢和困难，军费军需补给的紧张。应该说：军事上目前是处在紧张、繁重、危急的时期中。

不过，军事上虽然有着许多的困难，情势虽然异常的紧张，然而决非不可克服的、绝望的，并且不是当前困难之症结。相反地，敌人方面的危机和困难却远远地超越过于我们：财政上窘迫，原料的缺乏，内部矛盾的紧张，战线的过长，兵力消耗过大，后方

的不安，战区民众武装斗争的崛起，在在都足以使敌人的狂妄冒险陷于全部破产。而在战争初期中敌人所依恃的优点，其侵略的长期准备，海陆空根据地与战场之接近，军事技术装备之优越，汉奸托匪亲日派之内应和奸细行为，将在抗战的持久继续中日益消失。

至于国际的形势则我们是大大地优越于敌人的。无论日寇和最富侵略性的法西斯德意怎样地吹播，事实上，德意除纸上人情以外，很少能够真正地给敌人以有力的援助的。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是够使黑衫首相头痛的了；欧洲的风云，内部的不安，中国市场丧失的威胁，亦足够使希特勒踌躇的了；民主国家（英法美）虽然今天还不能协调地一致地动作，但是被日本强盗的嚣张的凶焰所威胁着，而正向这个方向走去。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堡垒，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者，无疑的它同情着援助着我们的伟大的斗争。国际的舆论，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人们的同情和声援，更是在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方面。敌人是孤立的。抗战的坚持和贯彻，则愈将吸引与增长全世界的对我们的同情和声援。

敌不足畏，国际的形势不必忧，一城一地之失不足惧，只要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固团结，长期艰苦的抗战，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今天的困难的症结，并不在敌寇之强或我们的武装不足，而在于内部团结还没有达到应有程度。然而我们民族的铁一般的团结，却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后命运的最主要的因素。

当遭受部分的军事失利而紧张危迫的今天，日寇正加紧采取“以华制华”的阴谋，汉奸托匪亲日派正利用时机，多方煽惑，散布失败情绪，勾引妥协投降，同时更挑拨离间，企图分散民族统一战线。而在南京失陷的前后，失利的阴影并使着抗日阵容内某

些人士或则惶惑无办法，迷惘无前途，或则埋怨责备，猜疑磨擦。这更使亲日派汉奸托匪乘机取利，嚣张一时。很可庆幸的，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的告全国国民书扫除了投降妥协的毒氛，巩固与坚定了抗战的营垒。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宣言更明白的宣告：“当今民族危机更加紧迫之时，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实为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团结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根本方策，在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则为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共中央认为当前足以告慰于全国同胞的，就是在国共两党方面不仅都有了更加精诚团结必要的认识，而且都有了更加亲密合作的决心。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握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这两个光辉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指明了克服困难的途径，昭示了抗战胜利的前途。

不错，目前我们是处在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危急关头；但是只有最无气节的人才会在困难面前战栗。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们是只会更加奋发地更加坚强地更加团结地起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战斗吧，我们有四千年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广大领土的民族，我们将从困难和折磨中锻炼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让我们全国同胞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坚固地团结起来，手携手地为如下的主要工作而共同奋斗吧！这些工作是：

（一）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卫国的长期抗战——这首先要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巩固江防，保卫武汉，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援助东北及各地的义勇军，来击破敌人的前进，限止敌人的深入，以便争取时机，加强力量，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

(二) 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部队，有组织地进行征募兵役运动，使我国在持久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三) 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吸收坚决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各团体的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刷新各省吏治，肃清贪污腐化分子，使政府一切机构和施政方针能适应抗战胜利的需要。

(四) 实行国防经济政策——首先须努力建立军事工业，加速军事交通和实行战时财政政策。

(五) 建立巩固后方，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协助军队和政府积极抗战——一方面坚决肃清汉奸、敌探及日寇走狗的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另一方面广大地动员组织和武装政府统治区域和被敌占领区域的民众，使之积极参加各种有利于战胜日寇的工作，同时加紧动员千百万国外侨胞尽力于保卫祖国的各种事业。

(六) 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见中共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对时局宣言)

让敌人为一城一地之得而卑鄙地庆功吧！我们民族的内部团结，国际上的同情和声援，敌人内部的冲突和斗争，都告诉我们：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列宁——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权威，在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但是要消灭人类之分散为各小国的现象及各民族底一切间隔，不但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起来，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起来。……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的专政的过渡时期，方能达到阶级底消灭，同样地，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就是被压迫民族分立的自由）的过渡时代，方能达到各民族必然的融合。”（《列宁选集》中文本第九卷）

从这个基本的观点出发，列宁坚决地主张，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他说：

“胜利的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制，因此不但要实行各民族的完全的平权，并须实行各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即是各被压迫民族的政治上的自由分立权。”（见同上）

正是站在这样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列宁主张：

“社会主义者应当最坚决地援助这些国家内（指中国、波斯、土耳其及一切殖民地——博注）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

* 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谣言，博古写了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第三十六期上。

最革命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而在发生革命战争的时候，就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去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见同上）

这里，最清楚地说明了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国际主义者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坚决的援助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国际主义者，应当是该民族中最彻底和最激进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的立场，不但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服膺与力行，而且，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民族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所激赏和称颂。孙先生说：

“世界列强所以抵毁列宁的原因，是因为他敢说世界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列宁不但是说出这种话，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中的先知先觉，为他们自己求安全。但是现在人类都觉悟了，知道列强所造的谣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们欺骗。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情况。”（见《民族主义》第四讲）

由此可见：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亦同国际主义者一样，懂得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称国际主义者为“人类中的先知先觉”，称国际主义者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底态度为“进步到光明地位”的政治思想。

值得引为遗憾的是，在孙先生的演讲刊布后十余年，在今天的中国，“列强所造的谣言”，还依然能“欺骗”着一部分人士，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能相容的责难，依然在流行着，散布着……。

二

民族是一种历史的范畴，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的消灭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过程，是人们结合为民族的过程。民族的思想亦正是在这个从封建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的时代的产物。民族主义正是这个向上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旗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之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可以有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即当它用以反对封建的离散和奴役时，反对异族的不堪忍受的压迫时，反对封建的桎梏而使生产力能自由的向前发展时。

但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生产机关的迅速改善，交通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浸入落后的国家与民族，世界市场的形成，最后，垄断之代替自由竞争；都逐步地破坏了民族的间隔和民族的分离。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在各先进国内资本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整个的世界已经被极少数的财政资本寡头所统治。“资本主义已经变成极少数的‘先进’国家对于地球上极大多数人民施行殖民地政策的压迫和财政资本的束缚的全世界系统。”因此，放在议事日程上的，已经是推翻帝国主义世界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规律，促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而必然地要带上国际性。列宁说：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激发，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创立。第二个趋向，就是民族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频繁，民族界线底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国际统一之创立。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底世界规律，第

一个趋向盛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而第二个趋向则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并走向于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列宁全集》俄文本第十七卷）

国际主义就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无产阶级的旗帜。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没落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的先进的国家内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侵略、剥削和压迫殖民地的旗帜，——最可咒咀的旗帜。

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它的实质何在？

第一，就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消灭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前提。所谓人剥削人不仅是包含着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而且包含着跟随着阶级的剥削而来的民族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一旦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消灭了，民族的剥削和压迫亦将随之消灭。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则民族的剥削和压迫若存在一天，则被压迫阶级的彻底解放是不可能的。“压迫别民族的民族是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的。”（马克思）这是何等伟大的一句名言啊！所以“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但是要消灭人类之分散为各小国的现象及各民族底一切间隔，不但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起来，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起来。”（列宁）因之，从其斗争的最后目的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不能不是国际主义者。

第二，就在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殖民地压迫和财政资本束缚的全世界系统，因此，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不能不是国际性的斗争。在帝国主义时代“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运动联合为一条共同战线，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如不建立和不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则

先进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和被压迫民族之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都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基础》）因之，从其斗争的范围和方法看，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亦不能不是国际主义者。

第三，为着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利益，为着组织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战线，社会主义者就不能不以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统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中的劳苦群众。这种国际主义的教育就在：一方面必须和统治民族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巨大强国的帝国主义民族侵略主义斗争；另一方面同样要和被压迫国家里的社会主义者的闭关主义狭隘观点、孤独思想作斗争。只有这样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够保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一致，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国际主义。

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之实质的所在。这就是与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抗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三

显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不能不仇视和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中各色各样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利用一切花言巧语来欺骗被压迫民众，来进行最卑劣的赤裸裸的民族侵略。没落的资产阶级企图把自己的民族描写成为特别优越的民族，有权利压迫和统治别的民族的民族，藉此来进行灭亡其他民族的战争。他企图挑起民族的仇恨来顺遂其侵略的欲望。企图在“保护祖国”的虚伪的口号之下来把千百万群众投入少数金融巨头瓜分世界的战争中去。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阀，正以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旗帜来燃起毁灭人类文化和进步，屠戮和虐杀殖民地人民的战争之火。所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不

根本地反对这一切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的民族主义。

“可是，我们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而且无论何时都不应当做民族虚无主义者。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工人和一切劳动者，是各国共产党基本任务之一。可是，如果谁认为，因为要这样教育群众，所以他就可以而且甚至于不得不唾弃广大劳动民众的一切民族观念，那末，他就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相隔十万八千里，他就丝毫不懂得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报告）

国际主义者坚决的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民族侵略主义。可是他丝毫亦不唾弃自己民族的光荣的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仅是自己民族的宝贵史迹和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是自己民族将来的革命运动的决定者。法西斯蒂强盗藉口全民族的利益，而实行疯狂的民族侵略主义与战争的冒险，这种政策既是压迫、剥削、毁灭其他民族的政策，又是压迫、剥削、毁灭自己的民族的。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斗争，就是要把自己的民族从法西斯疯狗的爪牙下挽救起来，就是要开辟自己民族的幸福自由的前途。“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民族的救星，并为民族开辟蒸蒸日上的前途。”（季米特洛夫）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仅不违反个别国家的劳动群众争取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且由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斗争统一，恰恰足以给这种斗争以必要的赞助，促成其胜利。只有与苏联业已胜利的无产阶级结成最亲密的联盟，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才能得到胜利。只有与帝国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手携手地进行斗争，殖民地的民族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才能达到自己的解放。只有与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结成

革命的联盟，帝国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季米特洛夫的同上报告）

四

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仅有着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内的反动民族主义——民族侵略主义，而且还有着在被压迫的和殖民地的民族里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对最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十数万万人民施行最残暴的剥削和最无人道的压迫。这种剥削和压迫不能不引起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最尖锐的反抗。资本的输出不能不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起铁道、工厂和工业中心，不能不培植起本地的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不能不养育起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觉醒。因此，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起义和革命，不能不成为帝国主义时代重大的革命潮流；成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之一。列宁说：

“社会革命的发生，不能不是将先进国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和不发展的落后的被压迫民族中许多的民主的和革命的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也在内）联结起来的一个时代。”（《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九卷）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形成了在一些资本主义先进的国家中，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已经完结，民族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已经成为一去不返，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反动的侵略主义的旗帜。但是同时在落后的被压迫的民族中，民族解放运动正是方兴未艾，正是今天最主要的革命的任务；而民族主义亦正发展着进步的、革命的旗帜的作用。

对于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社会主义者把它看做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帮助，坚决地和积极地帮助被压迫和不独立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而被压迫民族里的无产阶级应该最积极的最坚决的为着自己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应该站在整个民族的先头而争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

被压迫民族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必然地会发展到以推翻异族压迫为目的的民族战争。而“社会主义者曾经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以推翻异族压迫为目标的保护祖国的运动或防卫祖国的战争为理所当然的、进步的、公平的战争。”“被压迫民族（例如殖民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即反对压迫国家的战争，乃是真正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现在还是可能的。民族被压迫国，为反对民族压迫国而力图‘保护祖国’，这并不是什么欺骗，而且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在这种战争中‘保护祖国’”。（《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俄文版）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者并力主组织发动这种保卫祖国的战争，用尽力量来争取对于压迫国家、帝国主义强盗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样英勇地无愧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地行动着，为保护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奋斗牺牲。

不仅在现在，中国共产党自其产生之初起，即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及一切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参加了反帝统一战线。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向就坚决地主张以民族自卫战争来反对日寇的侵略，它不畏一切倡导与创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这样行动，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因为它了解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里，革命的国际

主义者必然应该同时是最坚决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异族的压迫，保卫祖国的生存，争取民族的解放，是社会主义者的民族的任务，亦即它的国际的任务。在这里革命的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

五

另外一方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他是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他就必然会赞助和同情国际主义的。就是说：第一，他的民族主义是为着自己民族的自求解放，而不是想去侵略别的弱小民族，并且愿意扶助声援其他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把革命的民族主义看做达到世界主义的桥梁。第二，他没有闭关主义，狭隘观点，孤独思想，而是愿意在自己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与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奋斗。中山先生的伟大正是在他是这样的一个革命民族主义者。孙先生说：

“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贫〕，才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它，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它。”

又说：

“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由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

孙先生这句话，就说明了在他的民族主义之内，包含国际主

义（世界主义）的萌芽，经过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实现，国际主义便能够发达起来。所以：孙先生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是和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至于第二点，则孙先生说：

“列宁为什么受到世界列强的攻击呢？因为他敢说了-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种是二万万五千万人。这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是受那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压迫。……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人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以上均见民族主义演讲）

基于孙先生这种遗教，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对外政策进行决议》说：

“本党对外政策，基于总理之遗教，其唯一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方法：一曰联合世界革命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本国内大多被压迫人民共同奋斗。”

由此可见，革命的民族主义不是闭关孤立的，而是要求和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进行国际团结和斗争统一的，它是同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抗战以来，蒋先生曾经屡次说过：“我国此次抗战，匪仅为一己利害而战，抑且为全世界正义而战。”“日本侵略中国，实为其侵略世界之开始，中国自抗战之初，揭橥二义，为民族生存而战，同时即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由此可见，在此次抗战中，最明显地显露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一致。

而为着取得抗战之胜利，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上，明白规定：

“三、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

“四、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威权。”

“五、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由此可见，为争取抗战之胜利，必须把我们的抗战和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结成国际的团结和斗争的统一。在抗战之中，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是不可分割的。

从上面所说，可以看到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不相并容的谣言，是何等的没有根据。不论从国际主义的立场来看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民族主义也好，不论从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国际主义也好，两者都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者，如果地〔他〕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就不能不同时是最坚决的最彻底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同样：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他是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他就不能不同情和赞助国际主义。

正是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之一致，是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底花岗石般坚固的基石之一。正是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之士敏土一般的结合，是我们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子健同志：

四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你来信所提的两个问题，最近还有两个同志也来信问过，所以我们决定把你的信发表，并公开答复你，同时，也就作为对其他两同志来信的答复。

首先应当指明的，就是你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了解和解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这证明我党同志对于目前政治问题及党的问题，平时能严格注意和正确了解，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为的使你和其他同志对这两个问题有更具体更深刻的了解，兹特详为解答如次：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更具体些说，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准备最近也如国家社会党一样致函国民党表明共产党对国民党及对三民主义态度问题，你的了解是对的。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时起，即表示愿与国民党

* 1938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在武汉《新华日报》上正式发表。同日，国民党《扫荡报》上发表了《张国焘声明》，为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进行辩解，国民党特务借机大肆造谣进行挑拨离间，面对这种情况，必须在适当时机，予以回答，澄清是非，以正视听。恰好4月26日，博古等人接到子健同志的来信，信中提出中共最近是否要表明对国民党与三民主义的态度及开除张国焘党籍等问题。为了澄清是非，驳斥张国焘的《声明》，博古与王明、周恩来共同署名发表了《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刊登在1938年4月29日的《新华日报》上。

及一切党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曾专门致书国民党，提议恢复两党合作，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中共中央曾向三中全会提供两党具体抗日救国合作的基本纲领和办法；去年卢沟桥事变及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关系迅速确定和增进；因而有去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宣言^③的发表及蒋先生在九月二十四日谈话^④的发表。在去年九月二十三日宣言中，中共中央不仅又一次坦白说明自己抗日救国政策的内容，而且又一次恳切说明中共对国民党及中山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基本方针的赞助和拥护的立场，同时，在蒋先生的九月二十四日谈话中，正式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自此以后，在抗战以来的整个时期中，国共两党关系日益增进，已为举世公认的事实。因此，确如来信所说，共产党没有再重复一次类似去年九月已经发表的说明国共关系一类的文件的必要。至于最近国家社会党^⑤上书蒋、汪两总裁于先，中国青年党致函蒋、汪两总裁于后，表明他们赞同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并愿与国民党共赴国难；同时，蒋、汪两总裁复函慰勉并在实际上承认国家社会党及青年党的合法地位，这的确是值得欣慰的事情。这不仅是使最近以前一时期所谓党派问题的争执（即国民党以外，中国是否应允许其他党派合法并存问题）得到光明合理的事实上的解答，而且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盖除国共两党之外，应吸收一切抗日党派和群众团体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为中共夙来一贯之主张，今竟能逐步见诸事实，中共同志当然对之表示无限欢迎和快慰。至于第一个问题中的第二部分问题，即共产党对于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⑥所通过发表的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⑦的态度问题，来信所谈，一般的也正确，不过有更深刻更具体了解的必要。首先要说明的，即中共中央在国

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前，的确曾给大会一个建议书；不过当时因某种关系，国民党在大会开幕前不便宣布召集大会及大会开幕日期和地点问题，所以中共中央也不便将其致大会建议书发表；现在因许多同志和朋友急欲知道这一建议书的内容，兹特将全文披露于左：（略）

由此可见，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未开幕以前，中共中央即以最大的注意力和热忱来赞助大会的工作。在这一建议书中，中共中央不仅向大会提供自己当前几个重要政治问题的意见，而且预祝大会的成功，并相信大会的决议能大有裨益于全国精诚团结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业。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三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的社论，实际上即为这一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四月二日夜交各报发表时，当时因《新华日报》收到宣言较迟，收到《纲领》更迟，来不及撰述社论，但当即对大会宣言发表短评，称之为“一个有严重意义的大会宣言。”在这个短评里说：“当寇敌深入和第二期抗战积极进行之际，领导我国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的政党——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全国同胞一致热望着国民党这一临时大会的决议，大有助于抗战救国的事业，本日各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方面表示出国民党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又一次坚决地昭示着抗战到底和抗战必胜的毅力和信心，另一方面鲜明地表示出国民党领袖和全体同志对于建国事业的希望和计划。这一个宣言，对于国民党本身的今后工作，对于全中国同胞当前的救国事业，无疑地均有严重的意义。我们曾诚挚地预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我们更热烈地希望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能更加努力去加强国内各党派抗日救国的大团结，能更加积极去加强

民众与政府的互助,能更加提高我军将士的抗战精神和抗战信心,以加速我国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到来。”次日,四月四日,《新华日报》立即又发表社论,命题为《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就》。社论一开始便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于四月一日闭幕,通过了《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和关于《党务决议案》,并选举蒋委员长为国民党总裁。就已发表的文件看来,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国民党更向前的进步,对于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国策,更确定了基本的方针”;社论接着历举大会《宣言》和《纲领》中所明白昭示的对内对外的政策以及对于三民主义的阐述,在结尾时,社论以极恳切的态度说:“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就,正是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胜利的重要步骤,我们深望这些进步的继续发展,这些成就的一一实现。”此外,《新华日报》四月五日之社论为《抗战与改善民生》,四月六日之社论为《抗战中的民权主义》,四月九日之社论为《抗战与外援》均为根据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宣言》和《纲领》的基本精神而对内外政策加以发挥和建议的。

《新华日报》为代表中共主张之报纸,为中外公认之事实;故《新华日报》这几篇社论之主张,即为中共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的响应,这是明白无比的事实。从这些社论当中,任何人不仅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宣言》和《纲领》作恳切的响应,而且有热忱具体的建议。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其声明中,企图藉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为更恳切的响应一层,作为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点,显然是毫无根据而白费精力的。

我们愿利用回答你的信的机会,再一次说明中共中央对国民

党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和《纲领》的态度，我们认为此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纲领，对于抗战建国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所提出的我抗战时期的一般施政方针，我们是赞同和拥护的。它和中共中央历次发表的抗战时期的政治纲领的基本方向，是共同的；不过有一点，我们还未得到国民党中央明白指明的，就是这一《纲领》发表时命名为《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因而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知道：国民党领导机关是把这一纲领只作为国民党一党的纲领，还是用国民党大会名义提出交各党派及各团体共同讨论和研究，以便得到各方意见而变成抗战时期各党派各团体共同遵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关于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准备再与国民党领导方面交换意见。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新华日报四月二十二日所发表的《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决议》已经简明地指出张国焘被开除出党的原因，原文如左：“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离中国共产党，查张国焘历年在党内曾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成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擅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然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申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的铁

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由此可见，张国焘之所以被开除出党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他因为在政治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信任及对于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因而走到在组织上破坏党的纪律，自由离开工作，从陕西私自跑来武汉作反党和破坏抗日团结的活动。

的确如来信所说：“张国焘在党内确是个著名的老机会主义者和小组织者”，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他始而站在“左倾关门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国共合作的政策，继而在一九二七年时，又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与陈独秀一起造成革命失败的严重错误。当时大家都晓得，对机会主义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即为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时，张国焘虽承认了他的错误，但在大会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又犯了对许多政治问题有右倾倾向及参加少数中国学生的反党反国际的右派小组织活动，而这种右派小组织，当时曾与托洛茨基派勾结，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在一九三〇年曾通过有专门的决议。当一九三〇年中国党内反立三路线斗争取得胜利时，张国焘开始表示自己在代表团工作中反国际反党的错误，并表示反对立三路线，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国焘回国，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决议及四中全会新选之政治局，党为给张国焘以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和表现对党忠诚起见，派他赴鄂豫皖区工作。在鄂豫皖区及四川通南巴区工作中，张国焘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其中重要者为轻视军队中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忽视建立地方党组织及群众工作，特别是肃反工作中马虎和对青年的不负责任和罪恶的态度。当一九三五年秋季，原一、四方面军会合于川西时，张国焘因为在政治上估计中国革命已完全失败，革命形势已又如一九二八年六大时一样的所谓“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落，于

是主张采取完全右倾消极的机会主义路线；当其机会主义主张为我党中央拒绝时，并擅自成立伪中央以分裂党的统一，破坏党的纪律。一九三五年冬我党中央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告诉他时，他表示怀疑。一九三六年秋，原二、四方面军在朱德、贺龙等同志督促和原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复出甘陕而与原一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虽经党中央及全党同志严厉指责，但张国焘时常采取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态度，时而承认错误，时而重复错误。对于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表示怀疑和不了解；到西安事变时，更坚决主张继续内战方针，因而极力反对党中央联合全国一致对外的政策。中央为教育干部起见，特再三帮助他改正错误，并仍给以负责工作，希望他能在工作中学习和改正错误；不料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和反党积习既深，势难挽回，因而有此次擅离工作自动脱党之举。

此次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以至被开除出党的事实简单经过如下：四月四日，因为张国焘在边区政府工作，他要求去中部参加祭黄陵，可是祭陵完毕后，张国焘不通知我党中央即自行到西安，到西安后，住西京招待所两天，没有与驻陕办事处发生关系，只在火车快要开动前，用电话约林祖涵同志在车上略谈几句，即自动来武汉。到武汉后又不肯来驻汉办事处，经我们三人屡加责劝才勉强搬住办事处，当时他曾电告中央谓：“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我们看到他这种态度，表示还有回党工作可能，即来武汉，他是边区政府负责人之一，当然应当晋謁中央政府领袖，报告边区工状况，于是由恩来同志陪同他晋謁蒋先生。不意在见蒋先生后，渡江至江汉关码头时，乘恩来同志与另一同行朋友谈话之际，抽身疾驰而逃，始在汉口继在武昌各大街小巷乱跑乱撞数小时，然后始在武昌寓住一个事先与别人约好的旅馆中。

我们见国焘深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比得知他所往旅馆后，即又于深夜渡江劝其返汉，当他不得已返汉时，坚不愿再回办事处住，于是遂转寓于一个朋友家中。在我们与他几次谈话中，他在政治上再三表示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的。”因此，他再三提出意见说：“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南老家去作老百姓，我家里饭还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同时，他却又私自去找看陈独秀等人。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说什么他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并未绝望等，完全系一种欺人自欺的昧心之谈。

张国焘的政治观点既如此悲观，而个人行动又如此反常，我们知对他已无从迁就可能，遂正式向他提出三点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希望）；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他的回答认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并允两日内闭门考虑后答复。不料谈话后不及一小时，即十七日晚，张国焘竟跑到太平洋饭店，乘一有三人保护的汽车而出，临行前，用书而写交我们三人的信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清不必派人找，至要。”从此，张国焘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党中央于十八日正式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于二十二日才将开除他的决议公布，因为中央还希望他在脱离党后或尚有考虑。

只在开除党籍的决定公布后，张国焘才又派人将他写明廿一和廿二日两信同时送到，在廿二日的信上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突阅报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由此可见此次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首先由于他不

能遵守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遵守的起码的党的纪律，由于擅自离开工作而至自动脱离党。

由此可见，确如来信所说：“共产党中央对每个党员党籍问题，素持慎重态度”，而对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真是仁至义尽。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假装声势地说，好像他正在拿诚恳的态度与我们三人谈判政治问题时，中央忽而开除了他的党籍，是一个完全抹杀事实的欺人自欺之谈。当然，外面不知此事底细之人，初见张国焘声明，或不免有以为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似嫌过急，但凡是知道张国焘的为人及此次事实经过者，相反地均恰恰异口同声地说党中央对张国焘太宽大了，其实，张国焘早应开除党籍。的确过去两年中，有不少同志再三要求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以维党纪，中央始终希望以教育方法改正一个较老同志的错误，但是，张国焘既已不能再留存于共产党的队伍之内，共产党为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党的政治纯洁起见，只有将张国焘这类自甘暴弃于革命队伍之人驱除出党。

对你所提两个问题的答复，暂止于此，以后遇有问题，望不时来信，我们当尽可能地抽时间答复你。

附：子健同志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的信

绍禹、恩来、博古三同志：

我是一个在学校中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昨天我和两个非党员的同学谈话中，发现了两个问题，我虽然根据我所懂得的见解答复了他们，但我自己不晓得我的意见到底是否全对，所以决定写这封信给你们，请你们抽暇为我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

《纲领》的态度——最近以来因为报纸上发表了张君勱先生代表中国国家社会党致国民党蒋、汪两总裁，以及蒋、汪两先生对他的答复信；同时，张国焘在他的登报声明中，也说到什么他主张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取恳切之响应。因此，有一个同学在谈话中间问我说：中共是不是准备最近也与国家社会党一样致函国民党表明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态度呢？我回答他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抗日救国合作早已建立，在去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宣言，说明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及对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关系；同时，九月二十四日蒋先生代表国民党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自去年九月以后，两党关系日臻亲密，两党负责同志且时相过从，遇事协商。这与国家社会党的情形不同，国家社会党致函国民党领袖，表明他对抗战建国态度及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之关系。同时，蒋、汪两先生公开复函承认他的合法地位，这都是第一次，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这类函件往还，早已见之于去年九月，现在无再行重复一次的必要。至于对这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态度，我说，我曾听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开会前，便曾经有一个建议书给大会，不过到现在我还未见到这个建议书罢了。此外，在大会《宣言》和《纲领》发表后，《新华日报》已有过几次社论说明中共对大会《宣言》和《纲领》的基本精神的赞助和拥护，态度都很恳切；所以对这次大会《宣言》和《纲领》问题，中共也没有专门发表致函国民党函件这类举动的必要。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另一个谈话的同学问我说：据张国焘声明说，好像他不过有些政治意见想找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谈谈，而中共中央似乎在他正在谈

判的过程中，便把他开除党籍了，这是否太急了一点呢？我回答他说：开除张国焘的详细情形，我还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张国焘在党内的确是个著名的老机会主义者和小组织者，党对他屡加教育和纠正，他却屡次承认错误后，又重犯错误，特别是一九三五年的重大反党错误，的确早已应当开除党籍；此次他又破坏党的纪律擅自离开工作，当然应该开除出党。我绝不相信张国焘所说的话。我知道共产党中央对每个党员党籍问题，素持慎重态度，此次开除张国焘党籍经过，绝不会像张国焘在各报上登的声明所说的那样简单。

我不知道，我对于这两个同学问题回答对不对，因此，请三位同志迅速帮助我弄清楚与了解这些问题。匆笔，敬致行礼！

子健上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答复××先生的一封信^{*}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

××先生：

奉读来书，承先生关怀全国团结与国共合作，甚为铭感！关于“从共产党机关报（解放周刊）看共产党的真面目”一传单，在今年一月间已在西安散布，后来时有增补。最近在长沙、常德、广州、武汉、重庆各地均发现此一传单。正因为该传单没有署明何人、何党、何派，哪一机关印发的，所以未置答辩。从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中，也可看出散发这种传单的阴谋何在。在政治斗争中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当然不会获得国人任何的同情。在抗战如此紧急，国内团结正需加强巩固的时候，散发这种传单的行动，无非企图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国共合作关系，不管印发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只能有利于日寇。因此，许多爱国人士常常把散发这种传单的人当作破坏民族团结和破坏抗战事业的败类看待，亦不足怪。据我们所知道，散发这种传单的人，虽然客观上起着帮助日寇的作用，但这些人不一定是直接与日寇有关系，由于这些人之中的一部分人目光短小，行动幼稚，而汉

-
- * 1938年初，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各种反共阴谋活动，散布传单造谣污蔑。5月12日××先生寄给博古等人一封信，揭露了襄阳中学的反共分子在学生中散发传单，攻击中国共产党，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博古与王明、周恩来一起发表答复××先生的一封信，揭露反共阴谋活动。这封信刊登在1938年5月21日的《新华日报》上。

奸托派从中纵恿，使这些人不自觉地走上了他们的圈套。

我们希望这些人能够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有什么问题尽可以公开讨论，共同商量。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但不足以损害共产党的威信，而且恰好激起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不良反感。譬如襄阳中学教员刘幼芝先生散发这种传单的结果，只是降低他自己在学校内的信仰，而促成学生对于他不良的反感。

我们希望政府对这些人深加劝责，同时希望全国人士当发现这些人的这种幼稚行动时，亦须当面批评，善意规劝，使其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附：××先生给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的信

绍禹、恩来、邦宪三位先生：

抗日战争正万分紧张，全国各阶级各党派，主要是国共两党正亲密合作，共同抵抗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际，此地襄阳中学里面，突发现一种惊人传单，标题为“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周刊）看共产党的真面目”，后面注明“欢迎传阅”等字样，但没有下款。这种传单究竟何人，何党，何派，哪一机关印发的？完全没有人负责。不过，这种传单的散发，并不是秘密的，而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据我调查的结果，在襄阳中学内面，是由该校教员兼级训导刘幼芝在该校学生尤其是在该校初中学生中间，普遍的公开的散发，特别是在由他一手造成的“襄中恢宏读书会（初中学生一部分）”里面散发。他并嘱咐该会会员在校内外广为传阅。及细看传单内容，完全是破坏统一，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公开违抗抗日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对外国记者所称“国内已无党派之争”的声明，完全是替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张目。刘

幼芝既身为该校教员，且兼任级训导，竟公开散发此种传单，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淆乱一般纯正青年学子的观念，使之对于国共合作及各党各派各阶级大联合大团结减少了信任，而陷于怀疑惶惑态度，影响所及是削弱了抗战的力量，搅乱了抗战的阵营，破坏了全民族为了争取生存实行坚决抗战的伟大的事业，而直接是与日本强盗遥相呼应。兹将襄阳中学教员刘幼芝所负责散发的传单，寄给三位先生一阅，并要求将此信在报端披露，将此种破坏阴谋，在全国各界同胞，全体抗战将士，全国各政党，各团体，各机关的面前，公开揭破，以遏乱萌。专此谨致抗日敬礼！

× ×

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抗 战 一 年*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一年了！从卢沟桥的炮声激动了中国军民，投袂奋起，以无比的英勇与空前的团结，抵抗日本法西斯军阀残暴的侵略。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国家，为着民族的生存与独立，已经进行了一年岁月的血战了。这一年，日本强盗以匪贼般的残暴炸毁了无数的中国的城市和区镇，毁灭了成千累万的中国的工厂、学校、医院、文化机关，屠杀了成千累万的中国和平居民，我们成千累万的妇女被污辱，我们十几省的土地惨遭蹂躏轰炸，我们几千万的人民失去田园家舍，痛苦和灾难是空前的非人的难以描述的。可是，黄帝子孙并不因此而害怕，而胆怯。因为，我们知道从这痛苦和灾难将培植出民族胜利之花，将养育成独立自由幸福之果！请看一看一年来我们的进步吧：久为分崩离析所苦的国家，今天亲密的团结了起来像一座新的长城！久为人们诟病的军队，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独立，个个人都像斯巴达的勇士，四万万五千万都一条心地英勇奋起，睡着的东方巨人醒了！我们有如此广大的山河，如此众多的人民，如此雄伟的民族觉醒，足够使我们获得一个光辉的胜利。虽然我们不知道胜利是不容易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还在危急的关头，我们将坚决地奋战，战到最后的胜利！我

* 这是博古在抗战一周年之际，应美国合众社之请，写的一篇纪念短文，后刊在1938年7月7日《新华日报》上。

们正在采取一切方法，改善军队装备，改变战略战术，加强在日本占领区域的游击战争，大量的创立现代机械化军队等等来加速我们胜利的到来！

外国的朋友和兄弟！请你们注意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因为我们的战争不仅是为中华民国自己之生存，而且是为着保卫国际和平的事业。抵制日货！不卖军火及军需原料给日本，不给日本军阀一分钱，抗议日本的暴行！给中国以借款，给中国以现代化的武器军火，救济中国被难人民，帮助中国医药，派志愿队到中国来！这些我们的请求，在危难中援助中国，中国人民将永恒地感谢你们！

世界和平力量团结起来！ 中止法西斯野兽的屠杀！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当我们想着婴孩的尸体时，已经不再存在有任何的学说，任何的原则，不再存在有任何思想，只有一个思想：这思想就是杀人的凶手应该被惩罚，应该烙上耻辱的火印，而无辜者至少应该被保护”。——法文 L'ordre 报。

这是一切稍有人性的人，对于法西斯屠夫的凶残杀戮所有的共同的呼声和反抗！全世界的舆论，全世界人民的公意，在全世界报纸上的反映起来的正是这同样的观点，这同样的对日德意法西斯屠夫们的裁判。我们受难的中国人民谨向着这国际的人类同情深致感谢，感谢英美法比瑞的各大城市市长的抗议广州轰炸，感谢美国国务卿霍尔，仗义执言，感谢法国人权保障同盟，法国社会党大会，法国共产主义学生大学，英国国会及各团体会议，美国各政治宗教团体对于法西斯轰炸无辜人民之关怀与抗议；感谢巴黎及其他地方反轰炸示威游行的群众，感谢一切申张正义之声的记者与报纸，感谢一切侨华外人之呼号，感谢一切对于热心被难人民救济事业的国际友人，最后，我们特别地感谢国际反侵略

* 1938年7月23日，国际反侵略总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国际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强盗滥炸不设防城市，屠杀和平居民，声援正在英勇抵抗侵略者的中国和西班牙人民。博古为了祝贺大会的召开，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刊登在1938年7月23日《新华日报》上。

大会所特别召开的反轰炸大会！

但是轰炸是仍然继续着！每天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至少有十个城市和繁盛市镇被残酷地轰炸着，每天有整千的无罪的人民被屠杀，几百几千幢房屋被毁灭。在机声和炸弹的狂叫中，血肉飞扬，肢体破裂，房舍倒塌，器皿粉碎。从白发苍苍的老妪到不及出生的婴孩同遭浩劫。人间惨境，天天地在反覆地重演着。当我们目击这种惨状时，我们亦一样的不再存有任何思想，除掉加强我们的团结，更坚决抗战到底以外，只有扑灭法西斯的野兽，才能根除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只有积极的斗争，只有全国军民积极的抗战行动，才能够消灭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野蛮屠杀。只有英勇奋战，我们才能保卫自己的天真的孩童的性命，才能保护老父慈母，才能保卫土地财产！日本军阀想以惨酷的轰炸来消灭中国人民的斗志！毋容幻想！中国军民不是没有脊骨的动物。一切惨酷的残暴只会激起我们的同仇敌忾，只有更激起我们的勇气和斗志。

但是法西斯凶手的残杀与野蛮，是不能听其自然的；单单抗议和责备是不够的；道德与人道主义的说教是不能阻止野兽们的兽行的。今天中国和西班牙人民所遭受的惨痛^⑧，明天不难会降临于任何一个欧美的和平的人民身上的。不，不是明天，今天已经开始了。法国边境已被轰炸，几十支英法船只已沉没在地中海；圣虫和巴鸟号炸毁了，英国驻华大使一样受到了日机的伤害！再迟延，是来不及了！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时候了，把一切力量拿起形成广大的和平与人道的战线，这个战线将有充分的力量，造成一具强固的铁龙把法西斯的残暴的野兽禁锢起来！一切和平力量的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的结合，已经充分地足够阻止这些屠夫们的屠杀，已经充分地足够拯救中国和西班牙的无罪的婴孩，可

怜的老人。让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吧！让强固铁笼建立起来吧！让世界反侵略大会所召集的反轰炸会议成为这个团结的更进一步的重要步骤吧！我们谨以此祝大会成功！我们深盼着大会将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制裁来审判法西斯屠夫！来中止对于和平的居民老幼妇孺的惨杀！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困难及其前途*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日)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将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一年前，当华北、淞沪炮火正烈之时，中共中央以这样热忱的庆祝的语调宣布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建立。虽然，这个宣言和蒋先生的谈话，仅仅是把在西安事变后逐渐发展起来，而在卢沟桥

-
- *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在报告中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博古在会议期间，于10月17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进一步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遇到的困难与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特别强调指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各政党应相互尊重其他党派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观点。

抗战后实际存在的情况加以巩固，加以公布，加以合法化。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当时所指出的，这个宣言和蒋先生的谈话：“宣布了两党统一战线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方针。”因而，这个宣言有着“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的伟大的政治意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的国共合作是正式地确定地建立起来了！

岁月易逝，从这个划时代意义的宣言发布以来已经一年了。伟大的一年啊！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的一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发展的一年！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一年的历史是充满着这样的丰富新颖宝贵的内容，值得我们加以多方面的深思熟虑，尤其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一年来的经验，生动的活的实际，不仅给了我们的政策以实际上的考查，证实了我们从“八一”宣言起所主张的政策之正确，而且它更推动着这个政策更深刻更完满之向前发展。

九月宣言的周年正当着武汉危急，巩固和发展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比任何时候更来得重要和迫切。因此研究这一年来的宝贵丰富的经验，深刻地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实质，它的优点和困难，指明克服困难，巩固和发展它的方法；并一般地指明其今后发展之前途，是十分需要的了。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优点

首先，根据一年来的经验，我们来观察一下：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较之西欧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较之法国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以及较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前一次民族统一战线有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优点呢？

一年以上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给我们民族的一切生动力

量以巨大的锻炼；战争的烈火烧毁着破坏着旧的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分裂我们国家的阻碍与屏障。“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真理，在战争的烈火的考验中，愈益显示其确切不移。团结我们民族内部的一切力量造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民族的伟大过程，正在完成着。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战争的过程中产生起来，发展起来，巩固起来。为着抗战，在抗战中产生发展和巩固，抗战中的合作造成抗战后的坚固团结，这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显著的优点。卢沟桥及淞沪的炮火，扫清了障碍着国共合作之枝节，前线将士的血汗交流，凝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一般地说来，在前线、在沦陷区，在一切敌人铁蹄所践踏、敌人炮火所波动的地区，一切的历史残迹，内部摩擦，都消逝了，大家只一条心——抗日，枪口只有一个方向——向着敌人。甘苦同尝，生死与共。在这些区域内，民族的团结为战争的风雨所培养而更加发展巩固。且在战争的环境中，前线的动态对于整个的国内生活给着决定的影响，前线处在先头的引导的地位。其他地区，虽然，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与巩固的程度有所不同；然而不同的仅是程度，而且，必定将向着前线的程度、情况发展起来的。战争如强有力的凝质一样，把我们坚固地紧密的团结起来，战争的巨火烧毁着一切阻碍和破坏团结的因素。战争促进了我们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战争的持久决定了合作的长期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个优点就在：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共同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反抗异族之侵入国土；而统一战线的政治旗帜则是反映出全国人民最迫切要求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最简单最基本的内容就在团结我们民族中一切生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的侵略。而日

寇侵略是以残暴的战争出现的，所以我们的抵抗亦不能不出之以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因之，共同进行民族自卫战争便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基础。值得我们全民族庆幸的就是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的发展中，产生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正似列宁所说它是“代表了伟大民族的伟大思想，这个民族不仅会为着自己奴隶地位而悲泣，而且善于组织斗争去反对这种奴隶的命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映出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个基本口号确实实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需。胜利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这是民族主义的实现；而要求得抗战之胜利则不能不要求我们国家制度之民主化与劳动人民生活之改善。正因为如此，三民主义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九月宣言上中共中央诚恳地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这当然不是像一些恶意的挑拨者所说是一种虚伪的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地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工作，因为我们不仅懂得尊重和接受我们民族一切优良传统与优良学说之必要，而且我们深切地了解，诚意地实行三民主义是继续向前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政治条件。有着能够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旗帜的三民主义的存在，是我们中国统一战线之重大的优点和特点，每一个真正爱国的人，都应该爱护尊重三民主义，应该为三民主义的实行而努力。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既不是国会内推翻或拥护内阁之一时的党派联合，亦不是以推翻现存政府为目的的在野党派之结合；而是国内一切抗日党派及一切抗日力量之大团结用以战胜侵人国土的日寇；它在对政府的关系上，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坚决抗战的，是在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因而它是和政

府完全一致的，赞助和拥护政府的。在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党派之中，既不应有在朝在野之划分与界限，更不应有争夺政权之企图与防范。尽管事实上国民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并不因此而不积极地赞助国民政府一切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办法。相反地，我们赞助和拥护国民政府，采取一切必要办法，以便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我们诚恳地拥护抗战领袖蒋先生去反对日寇的军事的进攻，反对日寇及其走狗的政治阴谋和诡计。我们期望政府，建议政府，经过政府去自上而下地实现为着抗战胜利的利益而必须采取的许多办法。有时，对于政府某些设施有所批评，这亦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批评是站在总的赞助政府立场上的友谊的批评，这是完全从抗战的利益出发的。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致的立场上共同的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府的抗战政策为全国人民所热忱拥护，这是我们抗战中无比的强处，亦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比的强处。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第四个特点是它的包括着全民族一切无例外的生动力量之广泛性。正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共同进行反对异族侵入国土之自卫战争为基础，正因为日寇之侵略威胁着中国社会的一切阶级，一切阶层，因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把我们民族的一切活拨生动的力量（除掉那极少数腐朽的民族败类——汉奸之外）都包含起来，团结起来。这在世界革命史上较之十月革命与苏联国内战争时代优越得许多；较之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亦更加广大而有利的；较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亦更广泛更有力。最广泛地吸引着国内一切阶级阶层，各种不同的民族、信仰、党派、职业不分男女老幼之无比宽大的包容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大的优点之一。

这些特殊的优点的综合表明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生命

力，它的不可摇撼性，它的远大的前途，它对中华民族的无上的贡献。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遇到的困难及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有着特殊卓越的优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在其巩固与发展的途中，就不会和没有遇见任何困难。一年的经验指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遭遇着许多艰难困苦的历史的，而且只有在征服困难和障碍的过程中，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和壮大起来。这些困难在哪里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的包容性，因而在其内部参加者之间的阶级的距离相当地悬殊。从这里必然会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某些具体方法上，在如何在抗战过程中实现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必要和步骤上，产生某些意见的分歧，这便造成了某些内部摩擦之根源，这便妨害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广泛。克服这种困难的道路，只有使我们国内一切阶级，有产者和劳动者都深刻了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无完卵”^⑨的古训，而警惕地以民族利益，抗战利益高于一切，为着珍重和宝贵民族的统一团结而相忍、相让、相安。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劳动群众首先领会民族团结统一之可贵，而不惜为着它，作惊人的自我牺牲。中国的农民虽处在耕地缺乏田租苛重的情况下，但是为着求得国内的统一团结以期战胜日寇争取民族之独立解放；他们还是英勇的应征赴前线，增加农业生产，安定后方秩序。中国的工人，虽然生活条件是世界闻名的困苦和难受，然而为着巩固国内的团结，为着抗战胜利的利益，他们还是以空前的热忱努力生产以应战时的需要。同样，值得庆幸的是一部分有产者首先是沦陷区中的有产者，目睹敌人的残暴，国亡家财之不可保，能够自动地起来向劳动群众让步，如河北、山

西的一部分地主的自动的减租减息。我们希望的是在还没有遭受沦陷痛苦的有产者，能够以沦陷区域的惨景为殷鉴，以晋冀有产者之举动为楷模，而远见地采取“相忍为国”之必要步骤。这样，悬殊的距离可以接近些，而磨擦亦可多少地加以正本清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遭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作为它的基础的合作的国共两党，在过去不仅有过一度合作的经历，而且有着十年的互相敌对的历史。十年的斗争到今天还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它使得两党中的一部分人还保存过去的猜忌、歧视、戒备及不信任；它妨碍了两党同志的友谊亲爱的接近；它造成着某些足为敌人及其走狗可以利用之间隙。而且这种情形，固不仅存在国共两党之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之间，在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党之间，都存在相似的情况。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侦探——特别是托派分子，经常企图利用各个政党间及中央与地方政权间，某些还不完全协调的残余，以挑拨内部的斗争，以分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以华制华”的诡计。克服这个困难，必须：

第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各政党，相互尊重其他党派之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和不应该有限制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的独立性之目的。这无论是对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抗日党派来说，都是如此。任何这种企图都足以引起和尖化内部的冲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互相尊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基本最初步的必要条件。坦白地忠实地尊重别的政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便能够大大的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扫除一切敌人汉奸可以利用之间隙。

第二，培养抗日各党派之间的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来共同

工作，共同努力，共同发展，共同胜利。战争改变一切，在抗战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内各个党派的关系已经根本地变化了。在今天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既不是互相仇视的仇敌，亦不是互相竞争的竞争者，而是最亲密的甘苦同受生死与共的战友。敌人的侵略是如此猖狂，民族的命运是如此危殆，我们民族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党，每一个派别的命运是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覆巢之下无完卵，谁也不能离开民族的总的胜负，而单个的成功或失败。胜则俱胜，败则俱亡，这已经是冷静明白的真理。我们前方的将士为保卫祖国而流的鲜血，英勇地汇流在一起，谁也不分辨哪是国民党人的血，哪是共产党人的血，哪是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的血。我们为抗战的努力，亦不应该分辨彼此。今天结合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是确实确实的患难之交，正因为是患难之交，所以更应有风雨同舟之感，唇亡齿寒之痛。正因为是患难之交，所以应该更能够“够朋友”，更应该以赤忱、坦白、共患难共生死的精神互相对待，互相信任，更应该视朋友的发展成就如同自己的一样，更应该以己饥己溺之心来援助朋友，帮助其发展与成功。我们共产党人并不束缚于狭隘的党的利益的范围中，我们期望赞助国民党之进步与巩固，认为他与共产党的进步与巩固一样。我们认为：共产党之巩固和发展不是我们党的狭隘的利益，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之团结，战斗力之增强，这不仅是我们的而且是全中华民族的最可宝贵的资本。我们教育自己的党员：每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上的主要成绩，不是以发展多少共产党自己的力量来考查，而是以怎样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来考查。只有这种共患难共生死，以友党成败为自己的成败之精神，才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由过去十年的斗争所遗留下来的互不协调的残迹。

第三，忠实不二的信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三民主义，及共同拥护的抗战建国纲领，这种信守当然同时包括着反对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和污辱（如托派刊物之污辱三民主义为法西斯主义），对抗战建国纲领之蔑视和搁置。信守就是积极地为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及其发展而奋斗。

第四，以适当的组织形式来巩固各党派之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指出：没有适当的组织形式，不仅有关各个党派之共同事业及彼此关系的问题没有经常讨论及解决之机关，而且亦减少了各党派的人士相互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减少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增进。现在更迫切地感觉得民族统一战线必须要有适当的组织形式来巩固它。至于以什么形式为最适当，自然，应该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各党派之共同商量来决定。只要有利于民族统一战线之巩固，任何形式均无不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遇到的第三个困难，就是民主制度之缺乏和民众组织性的不足。这便阻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广泛与深入。更加上民族统一战线参加者之中，某些顽固保守的倾向，这种倾向惧怕民主政治之实施，恐怕群众之有组织；更阻碍了它的发展，更增涨了它内部的摩擦。克服这种困难，需要：

第一，确认民权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执行，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之发展，是战胜日寇侵略的事业所极端必需和有利的。民权制度之实施，就能够保证更广大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使之更积极地参加抗战，投身军队，供给资材，实行自卫。民众运动在今天较之过去在性质上已经是根本地变更了，今天的民众组织和运动是以积极拥护政府帮助军队参加抗战为其目的的，而动员工作之尺度，是以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的发展为标准 and 枢纽。因而，民众组织与运动之展开，乃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从新的立

场，以新的目光去观察民众运动并求得对它的一致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切实的推广民权主义的实行（如参政会^⑧制度之普及，人民权利之保障等等）和广泛的发动和组织民众。

第二，提倡和实现民众运动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决主张和赞助民众运动的统一的。所谓民众运动的统一，当然，不是指只准许某一种定型的团体之存在而禁止其他一切团体，亦不是指强迫地使各个民众团体合并起来；而是指各个民众团体应该不分党派，不分帮口，在共同的目的下，民主的基础上联合和统一起来。民众运动的统一，不仅能够减少民众团体间的摩擦，集中民众团体的力量，而且能够促进与改善各党派之间的互相关系。

第三，不在有组织的群众中互相争夺，而艰苦地去组织广大的无组织群众。各党派按照各自的所长所近，在地域上，不同的对象上，实行相当的分工合作。

第四，我们热烈的赞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发展，希望他的团章能适合于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一切抗日党派的青年的、有民主生活的统一的青年组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遇到的第四个困难，日寇及其走狗——首先托派奸细之挑拨、离间、破坏之阴谋诡计。可惜的更是这些日寇奸细以甜言蜜语、奉承拍马的两面派的手段，有时竟能得售其挑拨的奸计，甚至还能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一部分顽固和保守的分子互相结纳，互相利用。这便时常造成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与不安，威胁着国内团结的巩固。克服这个困难，只有：

第一，一切抗日的党派极大高度的提高警惕性，严厉地防范敌人的侦探奸细之恶毒阴险的挑拨，共同一致地反对一切分裂中国内部团结之企图。

第二，特别警惕国际间谍贩子托派的两面派的阴险的活动，

反对这些出卖祖国为日寇服务的奸细，反对托派的斗争，不是什么共产党内之争，而是全中国爱国志士们反对汉奸斗争之一个重要部分。某些想利用托派为反共警犬的人们，应该明白这是危险的弄火，不戢将自焚。不反对这个破坏统一战线的专家魔师，不断绝他施展挑拨阴谋一切可能，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必然地受到他们的危害。必须把这些狡猾的敌人的狠毒的秘密走狗迅速的加以揭破，坚决的加以消灭。

第三，抗日的各党派必须用一切方法揭露敌人挑拨的阴谋，取消一切挑拨者藉以拨弄是非的间隙。

我们深信，中国共产党的从一切方面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帮助我们去克服一切大小的困难和阻碍，会保证我们的内部团结的日益强固，会保证我们去彻底打败日本强盗。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将有什么样的前途呢？有许多经历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风暴的人们也常常栗栗危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不能持久。我们却相反地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必然地长期的存在发展巩固，他有无限广大的发展的前途；他将给中华民族以至高的贡献。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期性的坚信是建立在以下的根据之上的：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战争中产生起来的，是以争取战争胜利为目的；因之，抗战的持久性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持久性，而抗战中的长期合作和胜利的合作便决定了抗战后合作的必然继续。

（二）崭新的国际形势亦帮助我们合作的长期性。当前国际形势之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之伟大的确定的胜利；苏联对于中国抗战的无限的同情及援助，另一方面便是世界资本主

义营垒的分裂为极端侵略主义的法西斯同盟，和民主的和平的阵线。我们的战胜日寇与维持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国内的团结统一又是战胜日寇之前提。所以，我们的国际的友人都是期望我们的团结是持久与巩固的，这大大的有异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时的情况。

（三）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亲身受过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两党和全国人民要尊重爱护团结统一，要坚持统一战线之长期性与持久性。

（四）虽然今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过程中还有部分的顿挫和逆流，虽然今天在统一战线的参加者之中还有一些保守和顽固的倾向，但战争的洪流将冲荡涤净一切，抗战是长期和残酷的战争，动摇和中间地位是不能久持的。因之，逆流和顽固守旧的倾向是必然会被克服的，而这个克服便保证了合作之长期和持久。

（五）国民党及抗战领袖蒋先生对团结统一的珍重和保护更给统一战线以可靠的保证。同时共产党的正确的从一切方面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两者是合作之长期性的最重要保证之一。

有着以上的根据，使我们深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短时期的事情而是持久的长期的性质。自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长期的发展将要更加丰富它的内容而提高到新的阶段，这便是从争取抗战胜利的合作，继续发展为完成建国的合作。抗日战争的胜利显然不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终点，而只会是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更高阶段之起点。由团结合作，由民族统一战线而取得了抗战的共同胜利，它的经验必然会教训参加统一战线之一切党派及全国人民为真正的复兴民族，建设新中国必须要继续地团结合作，继

续地实行以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来实行完成建国。尤其是因为抗战后我们的国家必然将走向新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这是不能跳过的必经的阶段。这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其特点是在对外的关系上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国家，在内部的政治生活上，则人民将有真正民权自由，参加抗战的各党派都合法的存在，和衷共济的合作，在地方和中央都有着真正能代表民意的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机关，一切官吏都由人民选举由人民监督并在其失职时人民可以加以罢免；换言之真正民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在经济生活上它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的要求，（这种满足是用和平合法的方法达到的）真正使耕者有其田，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法权地位将大大的提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及一切福利劳工的办法；而一切国家的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私人资本是被节制着的。总之将是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即是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我们有一切的根据和基础来推想：要实现这样的新中国，必须要我们全国民族异常巩固的团结和极度紧张的努力才能达到的；而且可以相信：我们伟大的民族必然会继续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器，来创造出这样崭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其光明远大的前途的，他不仅能够成为我们战胜日寇的工具，而且能够成为我们完成建国的武器。珍贵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每一个分子的当前的与将来的伟大的职责。

五 四 运 动

——中国现代史研究之一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一

一九一四年秋，爆发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德奥匈同盟与英法俄协约——重新瓜分已经瓜分完结的世界而起的强盗战争，参战国家的双方的目的都是为着掠夺别人的土地，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夺取投资场所与原料资源。因此，这次战争不论参战的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的非正义的侵略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

帝国主义的两大基本集团既进入了互相间的拼死斗争，也就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来继续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这便减轻了中国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而使中国最后地走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同样，亦是由于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觉醒起来，使中国加入到全世界的革命的巨流中去，列宁说过：“同时，许多国家，东方、印度、中国等等，正是因为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完全走出了自己的常轨。它们的发展，最后地走上了普通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的轨道。普通欧洲式的酝酿在他们中间开始了，……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东方各国最终地加

•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博古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1939年5月4日《新华日报》上，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参考。

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地被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五四运动就是大战后中华民族自求解放斗争的第一个雄伟的巨浪，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伟大的民族觉醒的最初的勃起，亦就是中国卷入于世界革命运动总漩涡的开端。

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给了革命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一九一七年十月，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成功了。正如斯大林所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根本的转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上的一个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上的一个根本转变，是他们风俗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个根本转变。”

十月革命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影响亦正如斯大林所说：“十月革命展开了一个新时代，殖民地革命的时代，而这种殖民地革命，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里，是在与无产阶级联盟中，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平安无事的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及附属国的纪元，已经过去了。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解放革命的纪元，无产阶级觉醒的纪元，无产阶级领导的纪元已经到来了。”（均见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无疑的，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民族觉醒给了极大的推动，它使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开始了一个新纪元——群众的觉悟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它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方法上和组织形式上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中国的风俗传统文化和思想上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五四运动就是这个根本转变的伟大的发端。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同时亦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吞并整个中国的企

图第一次暴露的时期，是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之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与加剧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欧洲帝国主义无暇与无力东顾的机会，猛烈地全线地展开它的对华侵略行动，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的殖民地。在这个全线展开的侵略中，日本帝国主义使用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军事占领和外交恫吓，强迫签订亡国条约，财政的奴役，内战的发动与挑起，在“防共”的名义实现灭亡中国等等。所有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爱用的惯技，在当时已经开始使用了，直到现在还在更加熟练的基础上扩大地使用着。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利用英日同盟的名义，宣布对德宣战。派遣海军封锁胶州湾，陆军大举进攻青岛，当时中国政府要求共同出兵，为日本所拒绝。日本在占领青岛及胶州湾并且破坏作战区的规定，日本于十月初直达济南，占领了胶济铁路的全线。事实上，山东半岛处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军事占领部分的中国领土为满足，而企图实行沦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以武士这所特有的无赖与蛮横，反噬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撤兵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为侮辱日本，突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中国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①。所谓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其原文如下：

第一号

一、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政府、德国政府协定，关于德国在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之处分，概行承认。

二、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三、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四、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一、两缔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改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业工业等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至拟开各矿，另行规定。

五、中国政府，应允下开各项，先经日本政府同意，然后办理。（甲）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许他国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款时；（乙）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之时。

六、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先向日本政府商量。

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划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一、两缔约国互相约定，候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政府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

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二、中国政府，允将所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或间接，对于该公司有影响，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一、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之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五号

一、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

二、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向来中日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纠葛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如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日本的材料。

五、允将接连武昌到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杭州间，南昌、湖州间各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六、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理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允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宣教之权。

这二十一条是实实在在的亡国条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于

中华民族头颈上的绞索。提出了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使用外交的恫吓（禁止袁世凯政府对外对内泄露内容不然要素赔偿）。

军事的威胁（增兵山东、南满、调集舰队于福州、厦门、吴淞、大沽，提出最后通牒），以及利诱卖国的统治当局（允许赞助袁世凯称帝），来达到迫使中国签订卖身契约。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签订了这个卖国条约——除第五号以容后协商，暂行搁止外。这个卖国条约的签订是中华民国的最大耻辱，是我们民族生存的重大的威胁。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廉价地取得了二十一条的签订，但是它深刻地知道：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有五千余年历史的民族，是不容易轻易地宰割的，它深刻地知道：我们民族中蓄储无限强大的反对异族压迫的伟大力量；而我们的团结与统一，将能使这个蕴蓄着的力量发挥起来，创造出令人惊异的奇迹。因而，为着能够消灭中国的抵抗，为着能够确立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它不得不设法使中国分裂，使中国互相残杀，使中国在内战中削弱。因而，日本帝国主义者用尽一切方法分裂中国统一与团结，资助中国的最黑暗与反动的力量，挑拨和煽起中国的内战。签订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就竭力赞助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它深知道，经过了辛亥革命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帝制制度的，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将会分裂。果然，袁世凯十二月十一日宣布称帝，二星期后，云南便宣布了讨袁起义⁸⁹，展开了护国之役。以后的张勋复辟⁹⁰，南北战争及直皖不断的战争，都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手，而且它永远是站在中国的最黑暗反动的势力方面的。为着促进与延长中国的内战，为着财政的奴役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大批地供给了中国反动政府借款，在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两年间日本政府供给了北京政府差不多将近五万万万元的借款。(请参阅钱亦石：《中国外交史》一〇五——一五二页)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手段的最新一着的就是以共同“防共”的名义与中国签订军事协定，而实际上用来灭亡中国。一九一八年三——五月间由中日双方好几个公文和协约，订立了所谓共同防俄的中日军事协定。在这个协定之中，日本取得了日本军队进驻吉林、黑龙江与外蒙古等地的自由，中国军用地图交给日本查阅；在中国军队中请日本军官作教官等等。所谓“共同防共”原来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二十年来唱滥了的滥调，像欢迎与日本共同防共反共的健将汪精卫之流，其卖国也不过是安福系老卖〈国〉贼的小学生。

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帝国主义大战的机会，展开了对中国的全线的侵略，它假参战之名出兵占领了山东半岛，使用威胁利诱的办法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亡国的二十一条；它以巨额的借款供给中国的最黑暗反动的力量，挑起了中国内部的分裂，制造了连绵不断的内战。二十一条如绞索一样，紧扣了中华民族的颈项，而中日共同防共的军事协定则如锁链一样，束缚了中华民族的手足。中华民族的命运已处在十分危急之中。这不能不引起中华民族热血的儿女们的满怀义愤与热烈的反抗，这不能不使中华民族的广大的群众的民族觉醒以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这不能不使中国的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锐锋首先指着处心积虑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这样，五四运动就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的姿态出现了。这样，五四运动就成了今天的神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直接的序幕。

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的疯

狂侵略——这是五四运动前夜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最主要的标志。

二

至于国内的环境，则最可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是国内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地发展的时期。据统计，这个时期纺织工业之发展如下表：

年代	厂数	纱锭	布机
1915	22	544010	2254
1919	29	609721	2650
1920	37	858894	4540
1921	51	1288903	6650
1922	64	1593034	7817

面粉工业的发展如下：一九〇〇年时中国只有二所面粉厂，一九一六年已增加到六十七所。一九二五年则已增加了一百二十余所。缫丝业方面则在上海一地从一九一二——一九二七年新设了工厂六十三家，其他轻工业如火柴、水泥亦开始了发展。银行的数目从一九一一年的七家，增加到一九二三年的一百余家了。这是这个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概的描述。（所用数字均引自中国现代史委员会编：《中国时代革命运动史》第四讲八二——八四页）

用什么来解释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在中国比较迅速地发展呢？它的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在：第一，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减少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如列宁所说：“东方印度、中国等等正是因为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它们的发展，最终地走上了普通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的轨道。”第二，不能不归功于

辛亥革命——这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周期的第一个浪潮；这第一个浪潮虽然没有消除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没有消灭引起革命的客观基础，但是这个浪潮打击了旧制度，推翻了满清专制主义的统治，这样，它便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相当的领域。第三，就是五九、五四这一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首先是抵货运动亦便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这个发展仍然是片面的病态的。比较地有发展的还只是轻工业部门，为国家独立生存所必须的国防基础的重工业，则仍然停滞着，而且原有的一些可怜的企业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染指所觊觎。就是速度上说，则比较先进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速度来，则仍然是极其可怜的。这里的原因同样是在：第一，帝国主义战争虽然一时地使欧洲帝国主义减轻对中国的侵略，但是并没有根本地改变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根本地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只有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能达到这种根本地改变，因此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和束缚。第二，辛亥革命虽然打击了旧制度，但是没有根本地打破它，虽然推倒了满清专制，但是没有消灭引起革命的基础，虽然替生产力的发展多少开抓〔辟〕一些领域，但是旧的生产关系依然严重地阻碍着它的发展。第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它与中国的黑暗反动势力的结合，更加阻碍了生产力之发展。中国社会生产之多少重大的发展，也必得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斗争中才能获得。

由此可见：只有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才能开辟生产力向前有力发展的基础。

在国内政治方面五四前后是一个内战连绵的时期。辛亥革命

虽然推翻帝制，但是终以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袁世凯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着着的实行反动政策，建立独裁制度，解散了国民党，解散了各省省议会，停止了国会的开会等等，到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赞助之下，企图最终地颠覆共和制度，而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称帝改号为“洪宪”，在称帝之前，袁世凯曾经实行制造民意，制造舆论来赞助帝制，组织筹委会，出版报纸，鼓吹帝制，压迫反对帝制的舆论，阴令各省党羽响应所谓君主立宪制，以及组织公民团向袁氏御用的国民代表大会请愿，然后再由参议院更呈递推戴书，袁氏更惺惺作态，表示不敢承受，直到第二次呈递推戴书才“登极”。袁世凯及其党羽这样费力伪造之后，似乎是万民所归，一致拥戴。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不容虚造的，亦不是任何摧残压迫所能屈服的。一手包办的伪造舆论，其结果只会使伪造者自己受其麻醉，得其应得的处罚。至多再欺骗一些政治上的色盲：以为真的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如陈独秀之流）果然，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起义及以后轰轰烈烈的护国之役，洪宪不及百日而亡。护国之役的成功，显然指明：经过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和君主制度调和，指明了：任何伪造民意，任何压迫民意，决不能援救反动派的命运。

袁氏死后，由黎元洪代摄大总统职权，段祺瑞为总理，至一九一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发生了黎段的冲突，因国会反对宣战及要求罢免段，段乃利用督军团强迫大总统解散国会；黎召张勋入京调处，张勋即迫黎解散了国会，并且实行政变，拥戴宣统复辟。但是经过讨逆军的十多天的战斗，复辟军击溃了，复辟运动亦扑灭了。

但是国会之解散，引起国民党之愤懑，中山先生召集非常会

议于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这样形成了南北的对峙。在日本帝国主义援助下，北方的段祺瑞政府采取武力政策，爆发了南北战争，激战于湖南。

同时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已分裂为皖直二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之），皖系以段祺瑞为首。前者依靠着英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后者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其主人。互相争夺，至一九二〇年爆发了直皖战争，皖系失败。皖系失败后，日本又利用张作霖的奉军为工具于一九二二年又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更后一些又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⑤

在南方亦发生了分裂，爆发着粤桂战争。^⑥

这样，中国是处在循环不息的内战中了，这些战争之幕后的策动者为日本帝国主义者——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日〔时〕，也是军阀争夺地盘扩张势力的斗争。

经济上，资本主义比较迅速的发展，政治上却处于黑暗与混战的局面中，这里暴露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触目的不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起来，同时，使得无产阶级亦日益壮大。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必然与当时旧制度旧的政治统治发生剧烈的冲突。中国正在等待一个新的革命，这个革命真的出现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而五四运动却是这次大革命的前奏曲，是这次大革命的思想上的准备。

三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一九一九年各帝国主义举行巴黎和会，^⑦这一和会当然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当时中国政府亦企图在和会中捞回一些权利，在和会中提出下边的希望条件：一、希望列强放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二、撤退各国驻华军队；三、撤

销各国在华的邮政电报；四、取消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界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主。此外，并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陈述书及请求归还欧战时在山东被日本夺去的各种权利。当然帝国主义是不会答应这些要求的，所以和平会议也异常滑稽来解决中国提出的要求。帝国主义的强盗们说，二十一条不在和平会议的讨论范围内；至于希望条件呢？现在不是希望时期，将来再说。对山东问题则在和平条约一五六条说：“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的中德条约及其它关于山东省一切协约，所获一切权利特权，胶州之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于日本”。“德国所有胶济铁路权及其他支线权，及关于此项铁路一切财产、车站、店铺、车辆，不动产及矿山与开矿材料和附属一切权利利益让与日本。”“自青岛至台湾之海底电线及其附属一切财产无报偿让与日本。”结果中国的要求，都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和平会议所给与中国的利益，便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夺取的天文仪器。中国参战（参加世界大战）的代价，便是无用的天文仪器。巴黎和会中中国完全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就掀动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五四运动就如火山的爆裂开始了。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民众怒吼了！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民众广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来临了。首先是中国留法学生起来反对巴黎和约的签字，接着北京的学生也动员起来了。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等行动口号下，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首先以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任交通总长）、陆宗輿（币制局总裁）章宗祥（驻日公使）为目标，示威洪流拥至赵家楼，放火焚毁曹汝霖住宅，并痛殴章宗祥。当日反动政府立即派大批

军警镇压；拘捕大批学生，由此便引起了北京学生的总罢课，以示反抗。这一运动开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两广、山西、浙江、江西，以及东三省等地学生动员起来了！全国学生都卷入反帝的怒潮中去了。全国学生及爱国人民首先是北京学生发出通电，散发传单，并组织无数的讲演团四处讲演。讲演的学生都充满了爱国的情，讲演时“垂泪而道”而听众则都“掩面而泣”。激发了广大人民对运动的同情援助与对卖国贼、卖国政府的切齿。这一五四运动就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了。

当然卖国政府，对于五四运动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首先在北京除五四那天拘捕大批学生外，六月二日、六月三日更大肆逮捕讲演学生达数千人，牢狱为满。被捕学生毫无惧色，在被押送的途中，更发出“中华民族万岁”等等悲壮激昂的呼声，在当时道旁行人为之洒同情热泪！此外，当局更派大批军警监视学校，不准学生外出讲演，而学生依然冲出校门进行救国运动。反动政府不仅在北京，同时在其他各地，亦对救国运动施行镇压。在南京，警察刺伤学生二十八人；在武汉，学生亦大批遭逮捕，并被军警毆死一人；在福建，被杀学生为数不少。这些说明当时的卖国政府，正努力替帝国主义者来镇压中国的救国运动。

当局的压迫，丝毫不能遏止开展着的爱国潮流，相反的，使学生更加团结组织起来了。于是在北京五四爆发后两天，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领导着当时的北京学生救国运动。至六月，北京、天津、南京等处学生代表因情势恶劣，集中上海，会商互相联络与援助等事，感到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之需要，乃通电全国各地学生联合会，各派代表来沪举行成立大会，并进行筹备工作，六月十六日开成立大会，这样全国学生联合会便诞

生了。

至六月初，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学生的罢课转到商人的罢市、工人的罢工。上海商人于六月五日罢市，其他各商埠也陆续罢市。资产阶级开始卷入到运动中来了，工人的罢工，首先是上海铜铁业机器工人罢工，接着印刷、纺织、火车、电车工人亦举行罢工，其中以沪宁铁路工人的罢工影响最大。这说明无产阶级也进入到战斗中来了。这使五四运动成为工商学联合的广大群众运动。

在广大群众运动的压力下，统治阶级不得不让步了。六月九日，反动政府不得已乃罢免曹、陆、章的职，并答应拒绝巴黎和约的签字。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约中国拒绝签字的电讯传到全世界，也给了世界一个大震动。在帝国主义者心目中，弱小无能的中国这种举动是太惊人了，而这个惊人的举动，正是中国人民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

从这里，首先可以看到：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雄伟的革命斗争，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侵略的第一个强有力回答，斗争的锐锋不论在运动的口号上，“废除二十一条”、“争回山东权力”、“拒绝和约订〔签〕字”、“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斗争的行动上（抵制日货、焚毁日货、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等等）都是直接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卖国贼的。可以说，五四运动是目前抗日战争的英勇的前奏，而今天的神圣战争乃是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之继续与辉煌的发扬。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大规模地采用了新的革命斗争的方法与组织形式。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国的革命者在进行革命斗争常用的手段是：集合志士，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实行起义。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了中国人民使用新的斗争方法：罢

课、罢工、罢市、街头演讲、群众示威、抵货等等。中国革命者的组织形式则直到辛亥革命为止没有越出带着浓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结社之外，辛亥革命时则在中山先生的领导开始创建了政党。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中国人民使用新的群众组织形式：工会、学生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等。自然，这种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经局部的出现过。但是使这些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全国规模的运动中在千百万群众亲身的经历中来大规模的成功的使用，则自五四运动开始。因之，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与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意义。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倡导与先进战士的作用。中国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驱者。中国青年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异常深刻，因为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绪亦异常热烈，他们是发动工农群众的桥梁与力量。五四的经验指明了这点。五四以后许多次运动的经验指导了中国青年学生珍重地宝贵着这个光荣的传统，并且在新的条件之下发扬光大了它。

第四，但是五四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青年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看到一个全民族的运动，不仅以地域的意味上来说而且从参加的阶级成份上来说。在后面一点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自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它与今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极大的质的差异。当时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想在无产阶级及农民中寻找自己的支持。工人阶级方是开始出现政治舞台，开始表现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自我觉醒的时期到来了。但是，显然，他不能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运动的领导权一般地说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手中。

他们对国家的危急感觉深刻的悲愤，对于旧制度热烈的憎恨，对于劳苦群众极大的同情。对于社会主义的憧憬，这些人以后分化了，其中一部分成了资产阶级自由派，一部分成了革命的暂时的同路人，而终于离开了他，另一部分直接投身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成为其优秀的干部。

五四运动的爆发指明新的革命在中国成熟着，社会阶级力量正在重新结合之中，新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发展了起来。无产阶级开始觉醒起出现运动中，这必然将引导到新的革命——而这个革命的性质较之辛亥革命将有重要的变化。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整个周期中的第二个革命已经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列宁于一九二二年指出：“而印度与中国沸腾着。……那样迫近着。不可遏止的迫近着一九〇五年，不过有着如下的重要与重大的差别；即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还能够（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单独过去，是不把别的国家立刻吸收到革命中来。而在印度与中国日益发展着的革命现在已经参加到革命斗争中，革命运动中，世界革命中去了。（见《真理报十周年纪念》一文）。

真的，迫近着的一九〇五年到来了，这便是一九二五年大革命。

四

五四运动还有它另一方面，这就是伴随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而进的新文化运动。^⑥这个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就开始了，它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基础，并在群众斗争的烈焰中激发和扩大起来。这个运动开始了中国人民风俗、传统、文化与思想上的更大转变——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面的转变，并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之发展开辟了道路。他同时在思想上准备了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孙中山先生对于五四运动曾以热烈同情的笔调，着重指出了这方面的意义。他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撻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致海内外国民党同志书）。

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思想空前的大变动无疑地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他反映着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与旧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试看作为新文化运动纲领，新青年办法〔杂志〕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了两大任务：拥护德谟克拉西（民主）和拥护赛因斯（科学）并说：“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两个要求却正是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的要求，科学是资本主义还在向上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所需求的，恩格斯已经指出：“资产阶级为发展工业生产起见，需要科学，以研究物理上物体的属性和自然力的表现形式。”（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六页）至于民主却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之一，亦是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为取得自己的统治的最主要的要求。

五四运动之为资本主义文化运动更可由他提倡个人主义，人格独立等上看得明白，陈独秀以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立场，提倡个

人人格独立，他公开地写着：“现代论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并且认为“个人独立财产为个人独立人格之根本”。这里不仅暴露了五四运动的社会意义，而且亦指明了陈独秀为什么在后来虽然一时候参加了无产阶级运动而终于背叛了他。二十年前陈独秀自己写道：“我预料二十年后，陈独秀也要做一部‘翼〔翼〕教再续编’来骂他人。哈哈！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不知那日叶德辉、康有为、陈独秀三人作何等感想。不要二十年，陈独秀已经与叶德辉、康有为鼎足而三了，可谓宿愿已偿。

不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的狭隘和有限制性，但是它不失为一个思想界之空前剧变，它震动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古旧的风俗、传统、文化与思想，它勇敢地和他们作战，它培养了民主和科学，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大传播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功绩，首先就在民主主义的提倡。——“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能解脱千百年来的奴隶制，因为，这种高涨激动劳苦群众并使之能完成奇特的事业。”（列宁）五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壮烈，正是由于民主主义的提倡而造成的群众的爱国主义的热潮，其结果才能达到拒签和约及撕破二十一条约后并且复能够使全国思想蓬蓬勃勃扬葩吐艳，而成为对收效既伟大又久远之思想界空前大变动。当今天神圣抗战的时候尤其在精神动员中，五四这个光荣传统值得极大的发扬。

第二，在于科学精神之提倡。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之重大作用是不吝〔容〕忽视的，任何有着光明前途的人们和阶级，是勇敢地提倡科学，忠诚于科学。而现在在抗战建国之中，科学的重要尤其不吝〔容〕忽视。但是科学要求得真正的远大的发展，它必须依靠于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把五四文化运动这个特点发

扬起来并于中国科学的发展提高到新的阶级〔段〕上，这是纪念五四的重要的任务之一。

第三，就是文学的革新，白话文的提倡。正因文学是思想表达的形式，所以这一改革对于新思想之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第四，在于向旧礼数、旧制度、旧习惯——首先是孔教勇敢的宣战。五四运动的思想的领导者如吴虞先生鲁迅先生都曾有过极精的反对孔教的言论，这里文字如吴虞《绿》及鲁迅当时的小说杂感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极珍贵的文献，由于这个斗争才使中国青年不再受孔教独断的束缚，不再为旧礼教可〔多〕余的牺牲品，亦正由于这个斗争才能使现代化的科学思想和思想主义思想得到发展。

第五，就在这个运动中已经发现了社会主义斗争思潮——这里不能纪念我们伟大的先驱战士——李大钊同志，他在当时完全与陈独秀、胡适之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相反，他是中国无产阶级天才的最初的代表者出现于运动中。当着陈独秀跟人叫喊“庆祝战胜”（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却认为是“庶民的胜利”，即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并且大声疾呼：“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在纪念五四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忘记这位革命伟大〔人〕对青年的号召：“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抗战二周年纪念献词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伟大的民族神圣抗战，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两年侵略战争的结果，使日本帝国主义，遭遇着日益增长的困难与危机。军事上巨大的伤亡和消耗，辽远连绵的战线，占领区域民众游击战的广大展开，使最狂妄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亦不能不感觉到兵力的处处薄弱，持久战争中胜利结局之渺茫。在国内社会经济生活上，战争已经把日本的经济，推到了国力枯竭的危机的边上。骇人听闻的战争重荷，人民生活状况灾难般的恶化，正酝酿、集合和促进着人民的愤怒。世界大战中沙俄与威廉德国的命运，已经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前的严重的危险的先例。

结束战争，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当前的课题，诱降乃是其最狠毒的手段。为达到诱降之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利用国际间法西斯轴心投降妥协的反动力量，企图藉助于他们以达到压迫中国降服，(远东慕尼黑)^⑨另一方面，利用中国的民族败类，汪精卫之流，来煽惑人心，破坏抗战，出卖祖国。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字码不明)。团结统一的中国，是决不能成为远东慕尼黑中任人宰割的羔羊。不破坏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可能宰割和吞噬中国。要破坏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破坏作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的国共合作。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尽力鼓励、挑拨、加深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执、磨擦和冲突，利用中国内部一切黑暗势力(从汪派托派到一切隐藏的民族

危害分子与反共死硬派)，造成国共两党间的不信任和仇视的空气。日寇以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之程度，看作是诱降政策成功的尺度，而汪派托派及一切心怀投降妥协的分子，亦以反共工作，作为自己准备的实际步骤。可惜的是我们不能说他们的阴谋与黑暗行为，没有丝毫成就。可惜的是我们在抗战第三个年头，还不能不指出中途妥协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是抗战的一个严重的危机。抗战领袖曾指出，“中途妥协，就是亡国”。“共同防共，就是灭亡中国”。这明确的真理，在抗战二周年纪念时，尤其值得着重提出来，以供某些人士之猛醒。

今天中途妥协的危险，仍然严重地威胁着国人，这威胁是经日寇诱降政策方面来的，是从国际帝国主义最反动派方面来的，是从国贼汪精卫及其尚未揭露的隐藏走卒方面来的，是从心怀叵测的反共顽固派方面来的，今天要反对中途妥协的斗争，就要反对与揭破日寇诱降政策，慕尼黑罪人的阴谋，汪精卫及其走卒们的投降活动，反共顽固派之荒谬言行。只有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企图和阴谋，只有坚固的民族团结，才能达到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

加强敌后游击活动以 粉碎敌寇以战养战之阴谋案*

(一九三九年九月)

案由：

抗战以来，沦陷地区日广，而其重要性亦日甚。沦陷地区有广大之领土，众多之人口，丰富之物产。我得之可以支持长期的抗战，敌得之可以支持长期侵略。敌寇从攻占武汉广州以后，便在其兴亚院领导之下，用全力来经营占领区。年来，敌人在军事上倾其主力于扫荡敌后之游击区域，在政治上力图建立其殖民地之统治，在经济上夺取关盐税收，倾销商品，发行伪钞，掠取资源，实行所谓以战养战政策。自汪逆精卫叛变以后，更助敌为虐，欺骗沦陷区域之同胞为敌寇以华制华政策作虎伥，因此与敌争取沦陷区，粉碎敌人以战养战阴谋，是我胜敌寇的重要关键。去年南岳会议曾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前方等口号，足见军事当局对于开展游击战争，与敌争取沦陷区，已加注意。可是，一年来执行的程度，除个别区域外，一般的颇为微弱，还不能把敌人以战养战企图予以有力打击和粉碎。在有些区域，因所派部队不习游击战术，或因某些部队首长或党政人员心怀成见专事磨

*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于1939年9月9日至18日，在重庆召开。博古作为中共参政员，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以战养战的阴谋提出这个提案，得到不少参政员的支持。

擦，以致或则部队遭受损失，或则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反而使当地之游击运动遭受困难和阻碍。此种现象必须加以纠正，对敌后游击运动务必加强，务必真正实现“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之口号，以粉碎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而奠定我争取最后胜利之基础。

办法：

一、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及各游击区域之具体情况，规定和实行游击地区之施政纲领；

二、选派有坚持在敌后作战之决心、有游击战术之素养的部队，增强敌后军力。但派往游击区域之部队，不是求其数量众多，而应求其质量之精悍，而能为当地游击运动发动之领导与团结之核心；

三、资助在敌后自动生长起来之游击队与民众武装，给以必要之武装补充及经费；

四、游击区域之军政权力必须求得统一，统一于各该地区中勋劳卓著之部队长官；

五、选拔确能以团结胜敌、忠诚为国之有志之士深入敌后，担负游击区域之工作，对于现在游击区中之某些专事内部磨擦破坏抗战之份子加以撤换与惩处；

六、游击区域中必须实行民主主义，其行政机关应由民选产生，各省县应设立真能代表民意之省县参议会；

七、对游击区域应豁免田赋及捐税，增拨巨款，救济灾黎，资助游击区域发展农工合作事业，以裕民生，以团结广大之人民，借以摧毁伪组织，瓦解伪军，粉碎敌寇利用我之人力物力进行灭亡我国之阴谋。

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祝新华二周年*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

热烈的祝贺《新华日报》出版的两周年纪念！祝贺我们党——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的两周年！祝贺这个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的鼓励前进的号角。

两年在历史上是短短的一瞬间。可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挚爱着的浴血战斗中的祖国，我们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可歌可泣的史迹，丰富与充实了这两年的史实，使它这样的活泼，这样的紧张，这样的生动。超越了平静无事的十年廿载！而《新华日报》在这两年中却正是在我们民族自卫战争怒潮中生长和发育起来的，分尝着民族的苦难和喜悦，而成了它的指标和里程碑。

首先是我们民族底死敌——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放松这个年青而有力的民族号角。——《新升隆》被反复轰炸^①，夺去了我们的优秀战士李密林、潘美年、项泰等同志，炸沉了武汉总馆的全部资材；五三五四的轰炸^②，新华发行部被炸而编辑部亦在危险圈中，但是它没有一分钟暂止自己的活动；在重庆继续出刊的《新华日报》以顽强坚挺的姿态答复着敌人的暴行，纪念我们的死难的同志；五四被轰炸后，五五街上《新华日报》一早就出现着；以后奉令参加联合版时，《新华日报》除积极参加联合版外并以几百

* 这是博古为《新华日报》创刊二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刊登在1940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上。

份壁报和重庆的读者相见，当伟大的七七二周年并发行了特刊。这就以行动告诉了我们的敌人：《新华日报》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代言人，它正是和它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样，绝不是威武所能屈的，绝不是横暴所能慑的；它对威武和横暴是不甘逆来顺受的；它将以英勇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回答；而且我们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新华日报》所拥护的是真理和正义的事业，这个事业最终是必然会胜利的。

虽然在今天因为《新华日报》要拥护真理和正义的事业，不能不“对于一切阻碍抗日事业之缺陷及弱点”“勇敢地尽其报急的警钟的功用”，因而，在国内亦不能见谅于某些人士。（被略）因此，在两年之中在它的出版发行及编辑上都受着重大的影响，以致在许多地方辜负着读者期望的热忱；甚至使得它只能“一片冰心”无言默对读者！然而我们相信：始终以真理和正义为指导的《新华日报》，必然会本其发刊的宗旨，坚持地致力于促进抗战的胜利和国家建设方面的一切光明和进步！“使《新华日报》能与我们光明灿烂的新中华同时生长发育与同垂永久”！

亦正因为《新华日报》是抗战的号角，人民的喉舌，因而它获得了无数读者的爱戴，成为他们机器旁、田垣上、战壕中、自修室里、办公桌上的不忍释手的伴侣。读者们的爱护，首先就因为它忠实地实行它在创刊号所宣布的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事迹之事实的报导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痛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之原则下，本报将尽其棉薄提倡与赞助一切有利于抗战之办法，设施方针；力

求其迅速确实的实现，而对于一切阻碍抗日事业之缺陷及弱点，本报亦将“勇敢地尽其报急的警钟的功用”，尤其是因为《新华日报》坚决一贯地贯彻着“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加强内部团结；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力求进步，反对落后”的方针。

《新华日报》的两周年纪念正值抗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进入了相持的阶段；我全民族首先是前方数十万将士的流血牺牲已经开辟着到光荣胜利的大道。但是国难仍殷，寇贼未灭；正是要我们以加倍努力艰苦奋斗的时候，（略）我们的狡猾的敌人正施用着各种阴谋，利用着汪精卫及其汉奸敌探实施挑拨离间破坏我国内团结以达其灭我亡我的目的。国际局势正多变幻，国内种种亦还有很多和抗战胜利的需要背道而驰的，——尤其是不能不令人严重的关怀怎样增进珍贵的全民族的精诚团结。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形下尤其需要《新华日报》更坚强更雄伟地鼓其正义之声，更圆满地更有力地完成其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的任务！

战斗吧！我们年青的民族抗战的号角！吹起你雄壮奋发的前进的战歌，激励我们全民族的男女老幼去勇敢地战斗，战胜我们的民族的死敌日本强盗和建立起光明灿烂的新中华。

党报工作者对党报重要性的认识^{*}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

党报工作者对党报重要性要有认识。我们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以党的立场来分析认识世界，这是方向。办好报纸，首先应随时注意敌、我、友的态度。其次，应注意与群众的联系，反映群众的生活情形。因为党中央是运用党报来组织群众、团结群众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在政治上把握马列主义立场，以此来分析事变的演化；其次我们要有充分的国际国内知识。我们不管是写社论、通讯或文艺作品，都是一样要注意我们的立场。各位编辑都应认识我们的报纸是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馆的工作是很苦的，每个人对自己的专门工作（尤其是编辑）应下更大的苦功，提高自己的业务技术。对国际国内的情形，编辑们应有清楚的认识，深刻的了解。

我们办报、写文章要能引起广大人民的关注，有兴趣来看，必须在文字上特别注意。文字要生动，要让读者不感到枯燥无味，消息、通讯不能公式化，既可以写得无一人要看，也可以写得人人非看不可。这就要求党报工作者不管在工作上、生活上都要作模范，发扬自我批评精神，表扬好的，揭露坏的（不论写文章或反映边区情况都应如此），有朴实的作风。只有这样做才能树立起我们党报的威信。

* 这是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解放日报》、新华总社编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谣言与烟幕*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造谣惑众是市井无赖的惯技，而政治流氓就把这种卑劣的手段用之于政治斗争中，竟自称曰：“散布合理的流言”。

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政党，它们手中握着正义和真理之旗，不害怕公开和坦白的向着广大的群众宣布自己的政纲、目的，表明自己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行动的方向，进行公开和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他们用不着玩阴谋、耍手段、造谣言之类的下流无耻的办法，因为他们有自信：真理是在他们方面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他们的行动，光明磊落，坦白严肃。而那些政治流氓们，因为要维护其违反真理和正义的私利，而自知他们主张、纲领、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所以不敢堂堂正正的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谋、耍手段、造谣言之类，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造谣——或者“散布合理流言”，就为他们所偏爱，因为在公开坦白的政治斗争中既斗不过对手们，那么只好乞援于造谣了。何况，古书上说过，“曾参杀人、慈母投杼”^①、诗人亦唱过，“三人成市虎，^②浸渍能胶漆”，其效力不是很大么？

* 1941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皖南事变，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报刊上对中共进行造谣中伤，为了揭穿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污蔑，博古写了这篇文章，以社论形式刊登在1941年5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

不仅如此，谣言也还有别的作用，就是遮眼罩和烟幕弹的作用。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么？当一个小偷偷了东西之后，被人发觉，大呼捉贼。此君急中生智，亦高叫：“贼在那边、那边”，竟得脱身。政治上的没落人物在做亏心事的时候，亦常常藉谣言来转移视线，来隐身的。

这种“造谣术”的最近例子，就是所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不与友军协同作战”的广泛地有计划地发布的流言。这个谣言最初散布者乃是专长此道的个中老手——同盟社。日寇于本月初发动了一个小规模的军事攻势，而同时却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谣言攻势。同盟社的广播连篇累牍地散布各种谣言，尤以八路军决不与中央军协同作战，八路军集中陕北准备乘机向西安出动，八路军乘机扩张势力收缴中央军枪械之类为特多。日寇这种军事攻势和谣言攻势的目的地是很明显的，一个字足以尽之，曰：吓！或者说吓降！军事攻势在炫耀其兵力，其意若曰，你若不降，我将占你的故乡，占你的一切海口，歼灭你在中条山的几万军队，进占你的洛阳、西安、昆明、重庆，你怎么办？谣言攻势在挑拨国共关系，描画一幅黯淡的画图来吓你说，你看国共关系恶劣至此，自力更生，还有什么希望呢？快降吧！“八路军不打日本”之类的谣言是烟幕，吓降诱降是目的，其技至浅，其理至明。

奇怪的是某些中国人，不是汪精卫之类双料的汉奸，而是抗战营垒中统治阶层里的某些风云人物，居然亦一字一句地抄写同盟社的广播来代替它作一次义务的转播。像《大公报》和中央社这类新闻机关，居然一方面说：“敌方所传大部出乎捏造自不能信”，另一方面又重述着“敌方所传”，称“八路军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为事实”。日本人一个钱不花，就有中国人义务地替他的谎言当留声机和见证人。宁非怪事！

可是，“怪事”实际上是没有的。只要懂得我们上述故事中的贼的急智，就可以理解这次谣言唱和中的“机”了。重庆军委会发言人在本月二十三日就多少泄露了这个“机”的一部分，他说：“上周寇军全面发动，总计达三十万人之多，其结果不过如此，以此种方式而侈谈解决‘中国事变’，不但世无相信之人，即敌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这不就是说，此种（军事进攻）方式是不能解决的，换种方式吧！果然，同盟社接着就纷纷报告日各战线军事当局均称第一期作战已结束。谣言唱和，这次竟完成了红叶题诗式的媒介作用。可惜的是，香港的一部分参政员竟为这个小小手法所迷惑。

我们认为在这里无须再事“辟谣”了，因为八路军、共产党人对于抗战的坚持，对民族的忠忱，是决非谣言所能摇撼的事实，是不怕火烧的真金。尽管新四军被宣布为叛军，八路军两年没有领到一颗子弹，五个月没有领到半文制钱的饷项，然而新四军、八路军的将士们，没有一分钟停止过和敌人苦战，而为着策应晋南作战，八路军在华北正在全线出动浴血酣战。这是连造谣的人和传布谣言的人心里都深知的事。其所以造谣和传谣，都是别有怀抱的。

其怀抱为何？在造谣者为诱降，在传谣者为投降，而都想在共产党身上做文章，共产党成了他们题诗的红叶。日本人当春兴大发时，题诗一首于其上，从长江飘将上来，这边的人儿得了诗，果然打动春心，跃跃欲试，拾起红叶，转题一首，又从长江飘将下去，这就是同盟社与中央社近日抓着共产党问题一唱一和的由来。还有德国的海通社，美国的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将双方的情诗到处传播，其目的均在“催装”，不过英美是为着反共反苏反德，德国是为着反英美，这个不同而已。

“你们赶快结婚罢，好去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就是德国的目的。
“你们赶快结婚罢，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慕尼黑”——这就是英美的目的。我们不能不忠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员们，这种结婚乃是“劫婚”，将来是不好过日子的，理应拒婚为上。从共产党身上做文章，也是做不出好文章的，不信，你们瞧罢！

全中国的同胞们，注意在这种谣言烟幕遮盖下的投降危机呀！远东新慕尼黑的极大危险在一天天的增长。以“吓蒋投降”为目的的这次“军事攻势”，现在是暂时的过去了，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这虽是日本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把戏，但却包含着新意义，因为正在一九四一年五——十月的时机中。全国同胞起来揭破他、粉碎他，乃是民族生死所关的巨大任务！

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四时，国际局势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变，疯狂的德国法西斯蒂开始了向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罪恶滔天的强盗的军事进攻。法西斯的猪嘴不自量力地侵入了伟大的光荣、和平、幸福、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的乐园。

不论法西斯蒂的盗魁在自己的宣言中怎样地企图以“苏联首先破坏国境”之类的卑鄙无耻的谎语来欺骗世界人民和蒙蔽世界舆论。可是正直的冷酷的铁的事实告诉全世界一切人士：背信毁约燃起战争之火的乃是疯狂的法西斯暴徒。不管德苏协定存在，不管德国政府对于苏联政府之履行条约义务无辞可借、无口可借，不管事先法西（斯）德国根本未尝亦不能提出任何口实，更不管未经宣战，乃竟野蛮地向苏联攻击，侵入苏联国境，出动空军轰炸苏联城市。德国法西斯像小偷一样地开始了反革命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人类历史上最卑污的罪恶行为。

无疑地，德国法西斯蒂这种罪恶行为必然将得到其应得的惩处，这种自掘墓的疯狂举动将永远埋葬掉法西斯制度。德国的法西斯将德国变成为人间地狱，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无数德国的优秀的儿女丧身在法西斯的苦刑下和集中营里；他们残酷

*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博古写了这篇文章，以社论形式发表在1941年6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

无情地驱使人民走入战争的灾祸，蹂躏着欧洲的许多民族，使他们陷于饥饿、流浪、贫困、死亡的深渊中；在广大的欧洲领土上正酝酿着反对法西斯反动和残暴的烈火。这个置身火山之上的法西斯竟向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动疯狂的冒险，其前途若何当不待龟卜。不仅二万万万的苏联公民将像一个人一样亲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周围，在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保卫光荣自由的祖国，不仅苏联的红军红海军及空军神鹰将以高贵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热忱，英勇地无敌地以二倍三倍的打击来教训那疯狂的侵略者，不仅苏联人民和军队有英明的无产阶级战略家——斯大林同志为其领袖和许多久经锻炼的布尔什维克指挥者，而且全世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将完全地站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共同努力粉碎和葬送现代的中世纪式的野蛮暴君制度，而且德国人民亦将一定在真理和正义的旗帜下与苏联人民站在一起，来恢复那为法西斯暴君统治所污染了的美丽山河，来挽救那产生过康德与黑格尔、歌德和席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而为那希特勒和戈林^④等流氓推上毁灭之途的德意志！

我们——在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坚持地进行了四年民族战争的中国人民，在这抗战的四年中，深切地体会到苏联人民及政府给予我们的伟大同情和雄厚的援助的中国人民，当此德国侵苏战争开始之时，即毫不迟疑地，寄无限的同情于伟大的苏联，并愿追随苏联援华的光辉范例来援助苏联人民的祖国战争，诚恳地预祝他的正义战争的胜利，我们深信，为正义、为自由、为社会主义面战的苏联，必然能完全粉碎纳粹暴徒的狂妄的冒险，胜利是苏联的。

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斗争^{*}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不仅只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是野蛮残忍的民族侵略主义。这是强盗政治的政体，它诬害和拷打工人阶级以及革命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是中世纪的暴虐无道的野蛮制度，这是逞性侵略其他民族及国家的制度。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急先锋，是挑拨帝国主义战争的祸首，是——向全世界劳动者伟大祖国——苏联进攻的罪魁。”

——季米特洛夫。

疯狂残暴、穷兵黩武的纳粹统治正如邱吉尔所云：“除有狭隘的种族观念外，别无所有，对于人间罪恶，则无不俱备，残暴及侵略为其拿手好戏”。在纳粹短短的几年统治中，它在国内建立最黑暗的残暴政治，任意蹂躏人民，屠杀民众，摧残艺术，迫害科学；在对外关系上，发动侵略战争，攫取他国领土，奴役其他民族，使世界陷于血腥的战争漩涡中。由于张伯伦的慕尼黑政策，摧毁了和平底最后一道防线，以致法西斯恶魔能够把人类驱入帝国主义大战的深渊，使战争猖獗于欧非亚三洲的大陆和海洋上，使战争每天吞噬着如山如海的牺牲者。由于被占领国家的资产阶级

-
- 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必须形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博古就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并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1941年6月25日的《解放日报》上。

统治分子之叛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使这些国家和人民逐一的沦于纳粹的残暴统治下，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身受着悲惨的亡国的痛苦。由于这种廉价的胜利，法西斯战争纵火者，就愈益放纵和傲慢，愈益失去理性和判断力，最后竟发动了对于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背信弃义的进攻。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这种滔天罪行，不仅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而且是反对着全世界一切民族底自由独立的。因为强大雄伟的苏联乃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独立自由的屏障，是全世界一切人民的理想和希望的灯塔，更是四年来援助中国抗战的好友。所以，苏联人民和工农红军之抵抗法西斯德国的强盗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国土的祖国战争，而且是保卫自由、保卫民主、保卫全人类的正义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而且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之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对于中国，这个战争才真正是“成败荣辱莫不休戚与共，几无东西彼此之分”的。因为不仅是“德国对于居住中国之四五万万人民及居住印度之三万万五千万人民，亦绝未放弃其侵略野心，务欲将其陷人无底之深渊”（邱吉尔语），而且蹂躏我们国土屠杀我们人民的正是那个依仗希特勒为盟主的日本法西斯军阀！因之保卫中国和保卫苏联是分不开的，保卫苏联即援助中国，保卫中国亦即援助苏联！在今天任何反苏的言行都是有损于中华民族切身利益的行为！我们需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坚持联合苏联及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国家和人民来战胜共同敌人，来驱逐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出中国去，亦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现在法西斯恶魔是愈益猖獗了，如夜行的僵尸一样，吞噬着人类，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民族独立，和平和康乐及一切

人类最高尚和美丽的事业和理想，都在这个恶魔的血口的威胁下，不扑灭它，人类将陷入悲惨黑暗的深渊中。同时现在亦是扑灭这个恶魔的最好时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英勇善战的工农红军出动了，欧洲十四个被奴役民族底人民正挟着民族的深仇大恨而酝酿着反抗；二十五年来“反共最烈之一人”——邱吉尔亦领受了经验教训，认识了“苏联之危难，即吾人之危难，亦即美国之危难”，重申着对德作战到底的决心；更不必说，全世界工人阶级及先进人士更必然地将站在苏联方面为毁灭希特勒主义而血战；今天是实行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受法西斯奴役的民族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时候了！

法西斯已经走到绝路上了，动员全世界的一切力量在反对法西斯奴役的口号下，让我们来替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虐政唱它的葬曲吧！

苏德大战第一个月*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苏德大战，及今一月。无耻的纳粹，差不多每天在喧嚷着：“一切依照原定计划进行”。开战之初，纳粹即狂呼一个星期要占领斯摩林斯克，一个月要占领莫斯科。其暗鸣叱咤，睥睨傲慢，颇有不可一世之慨。然而苏德大战，刚及一月，铁的红军，已给了纳粹一百万以上的杀伤，给希特勒闪击企图以致命的打击。

根据日本法西斯御用的同盟社十八日电：“十八日德苏两军之激战，已达白热化，德苏两军，在波罗的海至比萨拉比亚，绵延二千数百公里之战线上，反覆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自十七日以来，德军作战，受相当之阻碍；更由于红军之顽强抵抗，战线没有大规模的移动。……在上述战斗中，德军深入苏联领土者，乃斯摩林斯克地区，德军深入苏联旧国境九十五公里，该方面之德军，暂时停止前进，静观其他方面作战之进展。”

另据苏联七月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的情报：“苏德两军仍在普斯科夫、波洛茨克、列菲尔、斯摩棱斯克及诺夫格拉得——伏伦斯克方向，继续激战，战线无变动。”

* 法西斯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已经一个月了，德国侵略军深入苏联领土已近百里。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博古在文章中做出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决定胜负的战争，不在希特勒所希望的开端，而在希特勒用来决战的力量被消耗以后”，“时间的因素，应该看成为决定的东西”。为此，写了这篇文章，以社论形式刊登在1941年7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实践证明博古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从上述两种情况，加以对照，人们不难看出当德军开始突击，其势甚锐；但是经过红军顽强抗击以后，其势渐馁，战线一般的稳住了。如果将德军一个月来前进的里程，做个统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开战的第一、第二两周，德军每天前进里程，平均为二十三公里，到第三、第四两周，则减少为八公里，约减少三分之二。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足够证明：法西斯德国的猛兽，虽然尚未撒开血手，停止进攻，可是希特勒曾经成功的使用在西欧战场上的闪击战，事实上在苏联已告失败了。这正如罗佐夫斯基所说：“德国国内较有头脑之人，开始了解空谈闪击战是一回事，打闪击战又是一回事了。”

希特勒所进行的反苏战争，是以纳粹全体性战争的思想来领导的。所谓全体性战争的具体表现，便是闪击战。希特勒闪击战的指导原则：劈头就决战，顶点在开端，一切努力，要获得时间上的效果。这就（是）所谓“时效战”。

由于纳粹德国在进行疯狂的法西斯侵略战争时所掌握的经济上的自然资源与军事上的高度技术不相称，因此，对于速决战的要求，在希特勒看来，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仿佛是闪击成功则生，闪击不成则死。可是一个月的苏德大战的事实，证明了希特勒闪击的失败，已经有其事实的根据。这是有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德国军事家，早就预见到这一问题，例如德国的库尔将军早就说道：“由于我们敌人的无限资源，由于我们自己的孤立，消耗战的战略，必然要引到长期战争，要引到我们精疲力尽，时间是反对我们的。”

作为一个战争观察家来看苏德战争，对于时间的因素，应该看成为决定的东西。因为希特勒的闪击战是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

量，进行孤注一掷的战争，纳粹匪军速决战的概念，以为在未来战争中，决战将在劈头就开始，战争发展的曲线运动，其顶点就在开端。其对于所有作战军队是要求以最高可能的速度，来进行闪击。因此，人们对于纳粹闪击战的批评，认为这是独幕剧似的战争，有冲力，没有韧性，在时间上说来是脆弱的。要战胜纳粹德国，不仅要在空间上战胜他，而且主要的在时间上战胜他，苏联是具备了战胜纳粹的各种条件的。他们有数量上质量上都超过纳粹的红军；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争潜在力：他们占有世界六分之一的广大的国土，他们有二万万的全民人民，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他们被坚强而有工作经验的党——联共党所领导，他们有举国一致所拥护的领袖。苏联是不可被战胜的。

但是由于苏联采取和平政策的立场，及红军战略原则是采取时效的反攻。“而德国的军队，是开始战争国家的军队，早就完全动员好了。一百七十个师，推进到国境线上，完全准备好了，只等待进攻的信号，而苏联的军队，则需要动员与开进到国境线的时间。”——斯大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此方是尚有待于动员和开进，他方则完全动员好准备好了；此方是无数的社会主义的新少年，自觉地献身祖国的新军队，他方是曾经被迫作战两年的老军队；此方是采取时效的反攻，他方是采取时效的闪击。因此，当战争发展的初期，希特勒要占些便宜，是很自然的。然而决定胜负的战争，不在希特勒所希望的开端，而在希特勒用来决战的力量被消耗以后；就是说，决战不在希特勒的攻势，向顶点上升的时机，而在希特勒的力量，由顶点向下发展的当儿，列宁说得好：谁笑得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让希特勒在梦中狂笑吧！古人说过的：“梦为欢笑，起而哭泣。”

如何写文章*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

今天我来谈谈如何写文章。写文章，第一步要有丰富的材料；第二步要对客观事物从各方面加以认识，找出客观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但不能是材料堆积，不做研究和分析，若明若暗。写文章有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搭架子；三、充实内容。

如何写？要下苦功。先要有个结构，但不能太平淡。每篇文章总要有几句警句。据我们自己写东西的经验，开头难，转折也难，有时泛泛而谈收不回来。写好后，最少要看三遍。要写自己的思想，不要说别人说过的话。不同的文章，采用不同的体裁。

* 这是1942年1月13日，博古在《解放日报》、新华总社编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致 读 者^{*}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形态呈献在读者面前，我们愿乘此机会来总结一下过去十个月来的工作及提出今后本报的方向。

什么是党报？一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必然会想起“报纸不仅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组织者”（列宁）、“报纸是我们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斯大林）这一类名言。但是试问报纸到底如何才能成为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集体组织者呢？究竟怎样才能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呢？那么，必须：第一、贯彻着坚强的党性。这里不仅要“在估计任何事变的时候必须公开地和直接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观点上”（列宁），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其〔为〕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是〔使〕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第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底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

* 1942年《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工作，这是改版后第一张报纸上刊登的社论，是由博古执笔，经过毛泽东等人修改后，发表在1942年4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

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第三、洋溢着战斗性。党报必须是为着党的革命方针和路线而奋斗的战士；报纸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事变而进行热忱的鼓动，而鼓动的成功，则极有赖于明朗锐利的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团结的阴谋和企图。尤其在思想战线上，报纸应该进行经常的坚持的思想斗争，宣传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思潮，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同时，报纸亦应该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摘，帮助其克服和改正。

第四、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的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底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

如果从这样的观点去检查我们十个月的工作，实在是惶恐得很，应该说《解放日报》是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的，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对于敌对思想缺乏应有的批评，对于我们工作的缺点，没有严格的揭露和帮助其改正，对于边区中所进行的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总之，我们还没有

具备党报所必需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该的责任。一方面，党报在这个时期中没有能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底鼓手和先锋；另一方面，在党报本身还未能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余毒。我们在党报上未能对于整顿三风加以应有重视与地位，蔚成风气，形成潮流，重要的党的新闻消息放在极不显著的地位，有些解释的论文评述，或则浮泛空洞，辞严意宽，或则挂一陋〔漏〕万，损害原意，或则夸夸其谈，以八股反八股。同时，要成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先锋，本身首先应该成为模范者，唯有模范者方能成为先锋。而在我们篇幅上，主观主义（如对苏德战争前夜苏土协定的估计等）、宗派主义（如对某些稿件的取舍，未能免除狭隘的观点等）及党八股（如某些社论、专论和副刊）都是俯拾即是。因此，亦就不能在思想革命改造全党工作中起其应有的功能。

在检讨我们过去的工作之后，我们认为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是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我们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别的利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报纸变成全国抗日人民和抗日党派的共同的论坛，我们欢迎一切抗日人士和党派利用

我们的篇幅来倡导一切有利抗日团结的主张办法，消灭一切阻害抗建大业的障碍。

十个月来，我们在工作中，曾受到读者的许多鼓励和批评。鼓励增加我们的勇气，批评促使我们反省，我们统致无限的感谢！当此改革之始，我们愿引一句联共第八次大会关于党报的决议，以为自励。

“没有办得很好的报纸，则健全的坚强的党和国家的建设是不能设想的。”

并且愿意，模仿地添一句：

“没有广大的读者的赞助和鞭策，则报纸要办得好，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诚恳地期望着，读者们给我们一切援助和批评，使我们的报纸能够成为真正的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和集体组织者。

论领导与检查^{*}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

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是由两个东西合起来的。一是在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次大会上的讲话；二是一九三七年论党的工作缺点。在这里面关于什么是领导讲了三方面，这就是出主意、用人与总结经验。这三方面都强调了与群众联系。如边区政府去年征收公粮二十万石，在上面认为是绝对需要的，但在下面却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因此正确的决定必须上下配合。报纸联系群众不仅是几个编辑，主要是联系读者，所以在做决定时必须仔细，要有具体的措施。这样在检查时才会看出决定、指示的正确与否。另外还要让工作人员知道如何执行、怎样检查。检查一要定期；二不能把事与人分开，因为事是由人做的。其次，还要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但不要流于机械与敷衍。以前我们在检查中有许多形式主义。关于检查方法，斯大林已经指出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工作成绩，二者不可缺少。

关于如何打破上下隔膜，中间有思想上的不一致，看法上不同，经验有多有少，生活环境也有差别。另外，领导者有臭架子，下面仇视上司的残余仍然存在。消除上下隔膜，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要在整顿三风中求得思想一致，用实际工作的经验，并采取具体的办法沟通上下关系，倾听群众意见，从各方面接近群众，

* 这是1942年5月15日，博古在《解放日报》、新华总社编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帮助群众。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自己要有做领导的知识。

我们要倾听读者、通讯员的意见，不要只听几个工作人员的意见。

反对党八股，建设新文风^{*}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怎样反对党八股，建设新的文风是个重要的问题，因此要在各方面创造新的风格。通讯部是报纸的第一关。改版以来有进步，但缺点还很大，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要创立一种新的作风。党报的历史虽短，经验有限，可以吸收外国资产阶级报纸的经验，但我们办报与他们有原则的区别。同时也不能机械地搬用苏联的东西，要自己创造经验。这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新闻通讯写作不只是解决组织问题，而是要研究怎样写，写什么内容。对于这个问题，同志们应看看列宁对我们的报纸性质的论述。过去报纸上官样文章太多，刻板的概念太多，群众活动与具体行动太少，发扬好的批评坏的做得不够。怎样批评？××同志写的通讯写了一个坏例子，但是很有教育意义。写通讯要有中心，要从不同的侧面写，从别人认为平凡的事情中发现特殊的东西。我们写的通讯八股味很浓，单调枯燥无味。怎样写得好呢？第一要熟悉全面及各个侧面的历史发展及现状；第二材料要有取舍，只写一个侧面，有开始，有结尾；第三要明确写给什么人看；第四要用自己的意思来写，不用别人说过的，不写别人写过的；第五要写得快，迅速反映，有新闻性。

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对边区的情况要熟悉，懂得党的政策，

* 这是1942年7月31日，博古在《解放日报》、新华总社编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还要讲求写作技巧，除了学习新闻理论和别的通讯社的新闻，还要经常地搞调查研究。

本报记者要给各县的通讯员作必要的提示，要对通讯员的工作订一些条例。在整风后开一次通讯员大会。

党外人士与我们在方向问题上有根本不同的我们不登；社会新闻照例不登，有教育意义才登。

党与党报^{*}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九月九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通过的《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载九月十四日本报),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趁着这个决定发表的机会,趁着各地党的组织讨论这个决定的机会,我们愿就党与党报的关系的问题,有所阐述,来贡献给边区以及各地的党,并贡献给各地党报工作者。

我们常说:报纸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这句名言我们已经背得烂熟。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我们各地党的组织和党报工作者,真正照这句话去做了没有?如果仔细的一检查,就会知道,我们多少还有些以背诵名言为满足,多少还有些言行不一致。

所谓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这个“集体”是个什么意思?报馆的同人,也算一个“集体”。如果说这个“集体”就是指报馆同人而言,指几个在报馆里工作的人员而言,那末,报纸就不成其为党报,而成为报馆几个工作人员的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报馆同人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好恶、兴趣,来选择稿件,依照自己的

* 9月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通过了《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解放日报》接受中央与中央西北局的双重领导。博古借此机会就报纸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这一重要问题,做了比较明确的分析。并指出党报工作人员不要做“无冕之王”,而要做人民的“公仆”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文章以社论形式,发表在1942年9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

意见来写社论、专论；总而言之，一切依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及党的意志，一切依照自己的高兴不高兴办事，不必顾及党的影响。办报办到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所以，所谓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决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党经过报纸来宣传，经过报纸来组织广大人民进行各种活动。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报馆的同人应该知道，自己是掌握党的新闻政策的人，自己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标的题目，直到排字和校对，都对全党负了责任。如果自己的工作发生了疏忽或错误，那并不是仅仅有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有关于整个党的工作和影响的问题。

党报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时时警惕，看重自己的责任。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这是办好党报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报馆工作人员一方而的事情。

但是要办好党报，要使党报成为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光有上述的一方而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另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是，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党报也同样不会成为真正的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

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要看重报纸，给报纸以宣传方针，而且对于每一个新的重要的问题，都要随时指导党报如何进行宣传。党的领导机关与党报的关系，也应当是很密切的、呼吸相关的、息

息相通的。我们各地党的领导者，对于自己的机关报，要非常关心，要如像毛泽东同志对于《解放日报》那样，密切地注意领导和培养党的机关报。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大的政党，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党建立了各种机关来掌握各方面的政策，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各方面的工作，党的领导机关，依靠了这许多机构，来领导和施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社会各种政策。党的这些机关，既然对党负责研究和施行各种政策，就有完全的必要来利用党报，宣传解释各种政策，推动工作，和检查工作的进行，因此，同时也就有严重的责任来向党报供给消息，供给文章，提供意见等等。党报的工作范围是很广泛的，党报的工作人员负责掌握党的新闻政策，但没有可能要求党报的工作人员像上述那些机关一样精通每一个具体政策，精通每一件事情。党报的工作人员，不仅应当尊重党的领导机关，而且应当尊重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的意见。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同时，党的一切工作部门，都有责任，使党报充分地反映党的该部门的工作情形，使用报纸给该项工作以正确的指导，并且尊重报馆的要求与意见，

不但党的上级机关，因为党报是自己的机关报，有责任与报纸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供给党报以各种指导、材料、文章和意见等，而且党的各级机关，各级组织，以至于每个党员，都对党报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就是：不要对党报漠不关心，而要阅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文章、消息与谈话，推销党报，向党报通讯等等。党报是经过许多积极的党员，来反映群众的生活，和组织群众的行动的。

这样，党报才真正能成为党的喉舌，成为集体的宣传者与集体的组织者。

反之，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不动员全党来办报，其结果，党报还是不能成为党的报纸，而会多多少少成为报馆同人的报纸。报纸办不好，乃是全党的损失，这种损失，不仅党报的工作人员要负责任，而且每个党员都要负责的。所以西北中央局的决定中，把参加党报的工作作为党性问题提出来，是完全正确的。西北中央局决定中说：“对党报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党性不好的一种具体表现，而经常看党报，帮助党报的发行及组织党报的通讯工作，则是每个党员所应当努力的责任。”

依照上述各点，来检查我们的党报工作，我们可以看见，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不论在党报工作人员方面，或者在党的其他部分方面，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对于“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这个有名定义的了解，多少还不够深刻。

究竟什么东西障碍着我们把党报办得更好？除了上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言行不一致的余毒以外，还有手工业工作方式的落后习惯。

报纸是影响人们的思想的“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天天出版，数量最多，读者最广的一种刊物，没有任何其他出版物可以与之比拟。我们的同志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手工业工作方式的落后习惯，使我们有些同志醉心于油印机，醉心于“个人谈话方式”，醉心于“办个独立刊物”，宁愿选择影响比较小的工具来传播他所要传播的东西，却不愿去使用“最有力的工具”。要把任何工作做好，就总有些话要对大家说的，既要说话，就总要用些什么工具。当然，在没有报纸的时候，油印机也是好的。但我们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党报，这时候再去留恋落后的方式，就是不

很聪明的事，客观上等于不想充分传播党的影响，不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了。在有党报的地方，改正这种落后的习惯，积极使用报纸，是一个大问题，是改进工作的重要一环，这是我们全党都要注意的问题。

如何开展宣传战*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

边区周围的形势突然紧张，内战危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民党从六月起开始对边区采取武装进攻的准备。西安军事机关将所有后方部队撤下，向边区开动。他们以前思想上即有准备，如《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

我们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统一战线。但对任何对边区的武装进攻，是要给予应有的回击，并依照战争应用进攻或防御来保卫边区，否则抗战就无法坚持下去。

目前，我们做宣传工作的要加强自己的责任。我们担负笔杆子的“纸弹”战争，不论在战争未打响前，或打响后，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是在对内战派、投降分子作战，各个部门须时刻不停地工作，进入战斗动员时期。

另外，我们要更加了解党的政策，了解敌人，注意宣传战线上的动向，我们绝不打第一枪。他要先打，我们就回击。因此要很好地研究，一条新闻，一个标题，都应细心、负责，要代表党

* 1943年3月，国民党发表了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5月份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包围解放区的胡宗南所属几十万军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在进行武装反击的同时，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这是1943年7月8日，博古在《解放日报》、新华总社编委会会议上的发言，部署如何开展这次宣传战。

的立场。

宣传战已经开始，我们已还击了。我们要立即使工作转入战时轨道，各部工作要改变，仔细研究宣传战中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到“正确”、“迅速”、“确实”，文章按时交稿。新华社要有值班的人。

边区的报道转入边区人民军队制止内战，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从明天召开大会起，各分区要开大会。报道要注意适合党的政策，做到不左不右，以表示我们的决心。军事动作之前要以防御的姿态出现，打击的重点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及法西斯分子。

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报导*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

【本报特讯】因雨延期之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于昨日下午四时举行于文化沟体育广场，到会群众共达三万余人。这是一个严肃热烈紧张愤激的大会，是一个全延安民众，不，全边区民众紧急动员，反对国民党调动河防军队进攻边区，誓死保卫边区之战斗的动员大会，也是向一切挑拨内战之日寇第五纵队之壮烈的群众示威。延安及全边区军民，在艰难困苦之六年抗战中，坚守河防，抗击日寇，输财输力，支援前线，至今年，目睹国际形势，空前有利，抗敌大业，成功在望；并于发展生产，努力建设，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情况下，准备以最热忱之胸怀庆祝此伟大爱国战争之节日。可是，晴天霹雳，消息传来，日寇第五纵队，包围军事长官，竟调动河防军队，来进攻边区。群情愤激，不可名状。八日《解放日报》头条新闻——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像凄厉的警报一样，唤醒了全延安民众的警觉；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是每一个人的坚定的决心和战斗的口号。前昨两日延安民众已在热血沸腾义愤填膺的情绪中，紧急的动员了起来，准备用每个人所能够用的力量，必要时用每一个人的热血和头颅来保

* 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密谋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9日延安召开了三万余人的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这是博古为《解放日报》写的大会特讯，刊登在1943年7月10日的《解放日报》上。

卫我们像父母一样热爱着的中国共产党，艰苦缔造的丰衣足食的陕甘宁边区，大功垂成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南线国民党军队已开炮轰击边区的消息，火上加油，使燃烧着的人民义愤，要求以行动来表示。行动！行动！行动！动员！动员！动员！打击日寇第五纵队挑动内战的阴谋，保卫八路军、新四军唯一后方——陕甘宁边区！这个行动、这个动员的第一声，就是昨天的大会！

大会虽定下午四时开会，但上午就有无数的像开赴前线的军队一样的，整齐严肃洋溢战斗精神的各种队伍，在光辉的国旗领导下，在狮吼般的愤激雄壮的口号声中，从东，从南，从北，向会场分途齐进。当边区子弟兵，我们的英勇八路军健儿，带着全副武装，步入会场时，为响彻云霄的口号所欢迎、拥护，军民一体如鱼水般的融洽密切，得到了生动的形象的表达。在浩浩荡荡的人流中，有朱总司令，叶参谋长，有从前线策马归来的贺师长、董主任，有陕甘宁边区创造者的高岗同志，有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林主席、吴玉章同志，有短衣草帽从田园锄草回来的劳动英雄吴满有，有边区广大民众所爱戴的抗联会主任崔田夫同志，有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同志，有被日寇第五纵队诬为‘叛军’而至今仍英勇苦斗于华中，屹然若中华民族的长城，去年一年内歼灭敌伪四万余人的新四军代表刘少奇同志……无数的人，无数的枪，无数的旌旗，沸腾的心，沸腾的血，沸腾的口号，一齐向着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

没有几天以前我们庆祝了我们党的英勇奋斗的二十二周年。这二十二年奋斗的历史总结正如中共中央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所说：

“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机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二十二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

二十二年的中国历史及中共党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将没

•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进行武装反击准备的同时，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博古写了这篇文章，刊登在1943年7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

有这二十二年的英勇壮烈的民族解放斗争；没有中国共产党将没有这六年坚持的爱国战争，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中国的命运，将是悲惨的耻辱的殖民地奴隶的命运。如果不相信，请翻一翻历史。拿最重要的关节来说吧：如果没有民国十年中国共产党之组成及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决心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那末，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奋斗，将继续局处一隅，而不会面目一新，蔚成雄伟澎湃的近代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之奋不顾身的奋斗，则杨刘不能除^⑤，北伐不能成，曹吴不得倒；^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之坚决反对，则九一八时汪精卫这汉奸早已在不抵抗主义之下断送了全中国，则九一八以后，尚不知会有多少个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公忠体国，则西安事变决不会有和平的解决，蒋介石先生决不会自由；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的主张，发动爱国战争的主张（你喜欢说“催战”也罢！）则最后关头之关不知究在何处何时；七七之变能否引起伟大的抗战，实属疑问；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辛苦支持，牵制敌人半数兵力，则今日抗战局面如何，西南西北半壁山河能否支撑，不敢悬测。二十二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没有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有抗战的胜利，不会有独立自由强盛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这是二十二年历史的铁案。因之，每一个真正愿意献身中华民族解放，献身中国工人阶级及劳苦群众解放的人，应该自愿自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我们共产党决不把人党规定为国民的义务！也决不强迫别人加入！）至少也应该爱护这个忠于民族，勇于奋斗，不谋私利，尽瘁人民福利的组织。然而，不然，竟有人提出“溶共”于先，诬蔑为“奸党”于后，挑衅磨擦、阴谋破坏、阴险毒辣，淋漓尽致，一若共党不除，死不瞑目者！驯至

今日，竟嗾使走狗鹰犬，叫嚣解散共产党，尽撤河防大兵，准备实行内战；大有不惜牺牲垂成之抗战大业，以中国之命运为孤注，发动剿共战争，以求得死而瞑目的模样！真是咄咄怪事！

事之更为卑鄙无耻者，乃是以堂堂的执政政党之国民党，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正大地进行政治斗争，而学鼠窃狗盗，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密令各地特务机关散布谣言，不曰，“共产国际解散乃因中共封建割据，引起盟国间不睦，为避拖累计而出此。”即曰：“国际解散后，共党内部分裂，某某某某，坚主解散共党组织，不日将就中枢某项要职”云云，无耻下流，真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然而，这种白昼见鬼的造谣，是值不得一驳的。国际解散，其原因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文件中阐明甚详，勿庸赘述。中国共产党之团结，二十二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提高了责任感上更提高了这种团结的程度。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士敏土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虫豸之造谣所能损伤其毫发的。即就造谣手段说，也拙劣得惊人；前者不过是套用讣文滥调：“中共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国际……”而已；后者更是照自己的尊容替别人画像的荒唐手法；老实说，只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流氓集团中，才会出通敌叛党、为虎作伥的汪精卫之流。虽然，政治流氓们对于造谣这类市井无赖的惯技是颇为熟习的，可是，依此看来，未见高妙，实在是值得向戈培尔、八获报导班长之流再请教一番的，如果你一定要跟吃人生番希特勒和匪首东条走的话。

可是，听不听由你，我们还是诚恳地奉劝，不要走这条路的好。法西斯的路是走不通的！法西斯已成了人类公敌，凡有血气，莫不想寝其皮、食其肉。斯大林格勒、北非二役全军覆灭后，希特勒灭亡的命运已定，且为期不出一年。希特勒一倒，东条亦决

无自救之路。既有前车之鉴，又何必重寻覆辙呢？共产党是消灭不得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一天有工人阶级，一天就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长城，国家柱石，消灭共产党就是自坏长城，自掘坟墓。共产党之能否合法存在，是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鲜明区别之一，你要消灭共产党吗？那末就将失去四强之一的地位，而甘心作匈牙利、罗马尼亚、泰国之类三四等轴心喽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十年内战，殷鉴不远！不错，“剿共是无期徒刑”，当此民族爱国战争的时代，堂堂军人不在抗日战场去立功建业，而甘受这种特殊的铁窗风味，又何苦来。内战是打不得的，暴寇深入，山河破碎；幸赖国内团结，方能支持六年。一日启衅，兵连祸结；汪逆坐大，日寇乘隙，宋明惨祸，^①必将重现。以吴三桂^②之功，尚不免受戮，以洪承畴^③之忠，尚不免列入贰臣传，即令不为子孙万代计，也该替自己的前途打算打算！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实行三民主义，始终不渝的。并且直到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还是“为了克服今后抗战中的更大困难与准备配合盟国实行对敌反攻起见，我们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亲密团结，携手合作，共同来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繁荣的、和平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岂非妙事！悬崖勒马，犹未为晚！化戾气为祥和，易干戈为团结，这是我们恳切希望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动刀枪的话，一定要发动罪恶的反共战争的话，那末，我们每个共产党人一定将和人民一道为保卫民族，保卫人民，保卫我们的党而奋斗！

我们有值得保卫的东西：有二十年英勇奋斗历史的伟大的党，给全国人民指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光明大道的党，为全国人民

民所热爱的党，唯一能救中国的党；我们有从游击队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强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有亲手在艰难困苦中缔造的而今天已经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边区；有在血战中从敌人手中得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由我们流血牺牲而获得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底已经奠定的胜利基础，还有我中华民族的前途及万世子孙的命运。

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余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坚强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

军事威胁，不足以慑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本报创刊一千期^{*}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

本报从民国三十年五月十六日发刊以来，现在已经出版到一千期了。在本报的发刊词上，我们曾开宗明义地说过：“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将近三年以来，虽然国际与国内形势经过了许多变化，本报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对于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信守不渝。这是本报可以告慰于国人的。

在新闻事业的业务方面，一千期来，我们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在创造的过程中。我国现代报纸的历史，虽较欧美各国为短，亦已百数十年，然而属于人民大众的报纸，则仍寥寥可数，其中大半未到成熟即遭夭折，或则横被摧残，或则中途变质。广大的中国人民大众，要建立作为自己喉舌的报纸，报导自己的活动，畅

-
- * 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出刊一千期了，报纸经过了曲折的历程通过改版，有了重大的进展，为此博古写了这篇文章，以社论的形式刊登在1944年2月16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提出了“全党办报”这个重要的指导方针，对目前的报刊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谈自己的意见，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求之而不可多得。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当然义不容辞，要坚持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即是，使本报成为抗日人民大众的报纸，成为鼓吹抗战，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我们要把人民大众的生活，人民大众的抗战活动，人民大众的意见，在报纸上反映出来。

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这是我们这个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我们的记者，要为抗日的人民大众做事，首先为工农兵做事。这就是说，我们与有些报纸不同，不是为着少数人的利益，或者为着他们的趣味，而去卑躬屈节。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容许对工农兵和抗日人民大众有所蔑视，对他们的行动有所曲解，我们要求很真实的报导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意见。

我们是在农村里办报，这与在大城市里办报又大不相同，这是我们报纸的第二个特点。因为有这一个特点，所以大城市里适用的有些方法，在我们这里不能照抄来用。

在三十一年四月本报改版以前，由于报纸初创，缺点甚多。改版时本报曾发表社论，指出这些缺点：

“检查我们十个月的工作，实在是惶恐得很，应该说，《解放日报》是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的，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策略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我们以最大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我们以巨大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对于敌对思想缺乏应有的批评，对于我们工作的

缺点，没有严格的揭露和帮助其改正，对于边区中所进行的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总之，我们还没有具备党报所必备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党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该的责任。一方面，党报在这个时期中没有能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的鼓手和先锋；另一方面，在党报本身还未能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余毒。”

改版之后，本报依照中央方针，实行改革。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一年又十个月了。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报纸就能经过党的组织组成了在边区的包含六百余人的广大的通讯网，并能改革了文风，改进了技术。对于农村的环境，我们也渐渐学会了怎样去适应。这些进步，都是由于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全党的努力，以及全体工作人员与通讯员的努力所造成的。

现在本报已经创刊一千期了，回顾过去，瞻望将来，我们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怎样来求得更加改进呢？

如果在两年以前，我们的问题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的问题，那末，我们今天的问题还是这些问题，不过揭法是略为不同了，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例如通讯工作问题，过去是着重在发动，发动在职的工作干部与工农通讯员来为党报写稿。今天，光光发动已经不够了，今天的工作，是要把已有的通讯员统统组织起来，给

以具体的领导。过去的经验，有组织和有具体指导的通讯员，写来的稿子就好。无组织的和无具体指导的通讯员，写来的稿子往往千篇一律。今后要把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通讯员统统组织起来，党的各级宣传部，不但分区与县委要学会具体指导自己的通讯员，而且通讯员较多的区和支部也要学会这种具体指导。这种精密的组织和具体指导，会大大提高通讯的质量。

第二个例子，例如知识分子问题。在整风以前，他们中间有许多尚未真正在思想上与工农兵结合起来，有时则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讨厌工农兵，那时候，许多知识分子的通讯员与工作人员，成了报纸与工农兵之间的障碍。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他们中间有很大部分，经过了伟大的整风，教育过来了，在思想上与工农兵结合起来了，这时候，从前成为障碍的，现在要成为报纸与工农兵之间的良好的媒介了。经过思想改造之后知识分子的这种作用，我们必须注意到把它发挥起来。

第三个例子，例如新闻的内容与形式问题。过去新闻的毛病，在于没有内容或内容贫乏，那时不去讲充实内容，而去讲技巧，去讲文艺性等等，是很错误的，有些政治上很坏的东西，和很不真实的东西，就混进来了。现在的情形又不同了，现在我们报纸上充满了内容丰富的新闻，而且都是很真实可靠的，政治上也是很好的。因此，现在我们要来讲技巧，要来讲文艺性，要来讲求新闻的表现形式，以便把很丰富的内容，表现得更好些，更简洁明了些，更突出些，更引人注意些，更能影响别人些。慢慢地我们要学会把平铺直叙的形式提到更高些的形式上去。

以上我们举了三个例子，当然还有许多例子可举，这里且不去多说它。总而言之，我们要努力来进一步提高报纸的质。要办到这件事，一定要全党来努力，万万不可以只有少数人努力，万

万不可以回到改版以前那种“记者办报”的情况中去。

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我们在这方面，历史很短，经验很少，我们要好好学习。让我们大家来学习吧。

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一九四四年)

同志们，我们通采科同志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说，我们是党的机关报，在工作上有很大的责任，作党的喉舌，党每天经过报纸向群众讲话，没有别的工具能和报纸这样更紧密的和群众联系；另一方面党报又是党的眼睛、耳朵，经过它了解下面的情形，应该说报纸比其他的线索更快更生动。

党报是党的领导工作上重要一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我们两方面都担负：一、我们收集，分析，批判，提出意见，供给党采用；二、党决议了的事情，又要报纸宣传下去。但也因为它是党的日常的耳目，如果报道不正确，会影响党的政策。

我们要成为党的喉舌，必须要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

一、党性——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每一则新闻评论、编排都围绕着它。

二、群众性——我们是群众的报纸，要把群众的观点反映到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的报纸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与工作，我们要依靠广大的通讯员。外面的报纸靠少数吃报饭的人办，就以大公报论，最多有二百个通讯员，而我们的党报则需要职业记者及广大的非职业的通讯员。我们通采科的同志要依靠这些，培养这些，

* 这是博古1944年秋在延安《解放日报》社的谈话，是根据洪流同志记录整理的。

把这一批人团结在我们的周围。

三、组织性——不单反映现实，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指导一定工作。看到我们生活里新的东西来赞扬，看出旧的给批评，起组织领导作用；但所有这些都是党的方针路线下的，配合党委去开展运动。

四、战斗性——要贯彻党的立场，要有斗争性，自己的力量怎样团结，反对的力量怎样去斗争。我们党的报纸很明显的是无产阶级性的；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斗争性要在不同的工作中来贯彻。党报记者的一言、一行、写东西等均要时时反省自己是否站稳立场，有群众性没有，给群众有什么好处，起什么作用？党报的采访通讯工作者，应注意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新闻记者，要首先是好党员，熟悉党的路线、政策，要有共产党员所有的一切品质。对党的路线、政策不研究熟悉，你便无法去发现问题和真实报道问题。而你要别人了解得更深刻，就首先要自己在对党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了解得更深刻；否则，会困难。如参加合作社会议，就要事先对有关合作社的党的政策及党内有关于它的文件先有研究，报纸上以前发表有关于它的重要文章都仔细研究了；如参加工会会议，就要对现在边区工厂有些什么问题，我党对工厂政策，工会政策都细心研究。到那个地区去，并须先对那个地区有些了解；如到陇东去，要先了解陇东分区有些什么特殊问题。要熟悉党的一般政策，更需了解你去地区的特殊问题。既是党报的新闻记者，除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外，还要有新闻记者的品质：（一）要能接近人，要和群众搞得来，谈得来话；（二）要有冷静批判的能力，作报告、作调查、写新闻、写通讯，目的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样一个合作社，一样一个文化卫生教育，在他那个地区总一定有它的特点和优缺点。首先要好好采访，加以研究调查，

到要怎样表达时，这才是写的问题，要写好当前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就要组织材料把重点表达出来，这就要求记者练习写作能力。这里，要谈到新闻工作上最重要的要快，要有时间性，我们要锻炼自己写稿迅速。最后，要谈到，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使本身的业务也更钻研，这是我对大家的希望。

注 释

①剑平君 即安剑平，上海大学社会系学生，中国孤星社委员长，锡社社员。

②启周君 即王启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系学生，锡社负责人。

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左传：僖公十四年》“冬，秦饥，使乞糒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晋国大夫）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指贪图货利），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晋国大夫）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意思是说皮都没有了，毛怎么附呢？

④姜长麟君 时为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秘书。

⑤天侠 即安剑平。

⑥友石君 即安友石，苏州惠寒小学教员，中国孤星社社员。

⑦大侠魂精神 又说侠魂主义，其含义较模糊，大意是济贫扶弱，锄强、讲义气。由安剑平极力提倡与宣传，秦邦宪也多次提到。

⑧锡社 进步团体，详见本书文选部分《我们应当觉悟的》。

⑨祖宏君 即孙祖宏，上海东吴大学法学系学生，锡社社员。

⑩吴寿彭 交通大学学生，锡社社员。

⑪朱熙 民国初年苏常镇守使。

⑫丁慕韩君 江苏无锡人，曾任陆军次长，航空署长。1925年7月13日，在无锡演讲国民自卫等问题。

⑬此指无锡《锡报》的《邑评》。

⑭王蒋诸君 即无锡商会会长王克循，无锡工商界知名人士蒋香卿。

⑮土贩 即鸦片贩子。

⑯王敬轩 系钱玄同化名。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师事章太炎。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后，任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教授。1918年任《新青年》编辑。同年3月，以王敬轩的化名在《新青年》发表通讯，用文言文并以封建文人的口气，把反对新文学的主张一一罗列出来，当即引起热烈的争论。文中提及的林琴南（林纾）、曹慕管均为当时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反对派。

⑰吴稚晖（1865—1953）又名吴敬恒，江苏武进人。1905年加入同盟

会，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4年起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赴上海任国语师范学校校长，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逃亡台湾，1953年病死台北。

⑮庚子拳乱 即1900年义和团运动。五卅，即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

⑯指1925年初第二次江浙战争。

⑰薛南溟 近代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之子，无锡实业家、绅士。

⑱段氏 即段祺瑞。

⑳民国初年，无锡有所谓“模范县”的称誉。

㉑段老 即段祺瑞。

㉒杨天骥 名千里，江苏吴江人，1925年10月至翌年2月任无锡县知事。

㉓林干才 名桢，广西维容人。1924年12月至翌年10月任无锡县知事。

㉔原文如此。

㉕字林西报 英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纸。1850年创办于北华捷报馆，由于商业性材料增多，1864年改名为《字林西报》。《字林西报》得到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支持，被认为是工部局和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该报对中国革命一直采取敌视态度，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客观的报道。上海解放后，因造谣破坏，受到上海市军管会的严重警告，1951年3月31日自动停刊。

㉖国际联盟 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国联盟约》，1920年1月正式成立。它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但实际上是保护帝国主义利益，以推进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自行瓦解。

㉗查田运动 为了清查土地分配是否恰当，1933年在中央苏区开展了群众性的查田运动，进一步打击了封建势力，群众积极性更加高涨，但由于“左”倾思潮影响，查田运动出现了一些缺点与错误。

㉘东黄陂惨败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了50万大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向中央苏区根据地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我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采用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2月27日首先在宜黄县黄陂地区向来犯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发起猛攻，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身负重伤，被俘后不久死去，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俘。接着又在东黄陂歼敌王牌军第十一师，师长肖乾负伤逃跑。

黄陂地区伏击战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它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而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⑳杨杏佛（1893—1933）名铨，江西玉山人。武昌起义爆发后，入同盟会，1914年与其他同学一起组织了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并出版《科学》杂志。1926年与恽代英等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后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兼土地局长。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任总干事。1932年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民权保障同盟”，还成立了“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杨的一系列活动为蒋介石所不满，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㉑第二国际 1889年7月14—20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正式宣告第二国际成立。第二国际创建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推动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恩格斯去世后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占据了统治地位，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使第二国际蜕化变质。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党公开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拥护帝国主义的战争，第二国际终告破产。

㉒国家主义派 1923年12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主要由地主、资本家、政客和知识分子组成，委员长曾琦。主张内求统一和外交独立的国家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也叫“国家主义派”。1929年在沈阳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命名为“中国青年党”。1946年参加伪国大，成为国民党的附庸，1949年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逃往台湾。

㉓新月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在北京创办新月社，它是五四运动以后新诗发展中的重要团体。1927年该社迁移上海开办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和诗刊，成为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文学派别，亦称新月派。新月派对新诗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特点。文学上主张“艺术至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鲁迅领导的革命文学阵营，曾深刻揭露批判新月派的错误观点。1933年6月，新月派随《新月》终刊而结束了活动。

㉔托陈取消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少数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从而取消革命运动。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因此，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⑤蒋光鼐 (1887—1967) 广东东莞人。1930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闸北地区发动进攻,他率部抵抗,使日本侵略军遭受重大损失。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1933年11月,与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政府,失败后逃至香港。1946年与李济深等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反对蒋介石的内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1967年6月在北京病逝。

⑥蔡廷锴 (1892—1968) 字贤初,广东罗源县人。曾任十一军副军长、十九路军军长。参加第二、三次对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围剿”,损失惨重。后驻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进犯,他率部奋起抵抗,终因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被迫撤离上海,驻守福建。

1933年1月与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失败后出国。日本投降后,与李济深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4月在北京病逝。

⑦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1933年11月18日,陈铭枢、李济深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召开秘密会议,20日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会议权利宣言》,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党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并“于最短时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22日福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震怒,自任“讨伐军”总司令,派兵入闽进行镇压,由于军力悬殊,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

⑧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唆使汉奸发动叛乱,成立冀东、内蒙伪政权。而国民党政府却推行不抵抗政策,一味妥协退让,并于12月18日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汉奸亲日派的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曹汝霖等为委员,实质上已将冀察两省置于中国版图之外,因此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抗日战争爆发后解体。

⑨有田大使 即有田八郎(1884—1965)1923年来华任日本驻华公使参赞,1927年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1936年任驻华大使,以后任日本内阁外务大臣。解放后50年代从事中日友好活动,1957年曾来华访问,1935年病故。

⑩土肥原中将 (1883—1948) 即土肥原贤二,日本侵华战犯。1913年以外交武官身份在中国各地从事特务活动,1931年8月任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积极策划九一八事变。后又到华北各地从事阴谋活动。1935年6月迫

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进一步控制察哈尔东部。1935年11月制造冀东事变，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七七事变后任日军第十四师团长，率部进攻河北、河南等地，烧杀抢劫，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后又任第五军司令官，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④溥仪（1906—1967）姓爱新觉罗。3岁登位年号宣统，是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被驱除出宫，1931年1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潜往东北，1932年宣布“独立”，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苏联红军俘获。1950年移交我国政府，1959年特赦释放，1964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逝世。

⑤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曾任二十九军军长。九一八事变第二天，通电呼吁团结御侮，誓雪国耻。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山海关，二十九军在长城喜峰口与日寇展开激战，取得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胜利。但宋也认识到只有依靠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因此采取屈辱妥协的态度，后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镇压北平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七七事变，他决心抗战守土，后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4月5日在四川绵阳逝世。

⑥广田三原则 广田即广田弘毅（1878—1948）日本侵华战争。1933年9月起先后任斋藤内阁、冈田内阁的外务大臣。1935年10月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即：1. 中国取缔一切抗日活动；2. 建立中日满经济合作；3. 中日满共同防共。为此国民党派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中国大使有吉、有田、川越茂进行了长达1年之久的谈判，但毫无结果。广田是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⑦俄蒙协定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多次在中蒙、苏蒙边境挑起争端，制造纠纷，1936年3月12日，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其目的是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⑧淞沪协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反抗，这就是一二八事变。后经英美等国的“调停”，双方宣布停战。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协定，即淞沪协定。协定规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昆山、苏州一带驻军，同时承诺取缔抗日活动，移防十九路军等。

⑨塘沽协定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长城沿线，同年5月，国民

党政府派熊斌和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的协定，即塘沽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香河、宁河连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等地的占领。

④⑧何梅协定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北，以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为借口，自东北调日本军队入关，以武力相威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中国军队在河北的党政机关要取消，中国驻河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一律撤退，取消一切抗日团体，禁止一切抗日活动。何应钦全部同意日军无理要求，使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平津一带战略要地。

④⑨鲁宾孙 是英国18世纪著名小说家，但尼尔·笛福的名作《鲁宾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宾孙从英国离家到巴西，以后在去几内亚的途中迁到了大风浪漂流到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他靠着坚强不屈的毅力和勤奋的劳动，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岛上生活了28年，创造了不平凡的事迹，最后回到英国。

④⑩密勒氏评论 即密勒氏评论报。美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1917年由密勒创办的，后由约翰·贝·鲍威尔接办。报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刊，曾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等暴行。由于美国政府禁止该刊入境，1953年自行停刊。

④⑪川樾茂 (1881—1956) 1912年后历任日本驻哈尔滨等地总领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伪满洲国，1936年4月出任日本驻华大使，为日本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七七事变后策划成立伪政权。1938年回国，1956年病死。

④⑫阿Q式自卫 阿Q指鲁迅所著短篇小说《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阿Q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因而仇恨地主阶级，但由于他十分落后、愚昧，要求反抗又无力反抗，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为自己是胜利者，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成为“自卫”的一种方式。

④⑬王克敏 (1873—1945) 字叔鲁，浙江杭州人。1935年12月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七七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新民会长，国立新民学院院长。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因汉奸罪10月被捕入狱，12月25日在狱内畏罪自杀。

④⑭曹汝霖 (1877—1966) 1913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1915年奉袁世凯

命与外交总长陆徵祥一起参与同日本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7年受段祺瑞的指示与日本的西原密谋，以中国的银行、矿山、交通事业作抵押向日本借债达1亿元之多。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愤怒烧毁了其私宅赵家楼，6月被免职。1966年死于美国。

⑤石友三（1891—1940）1936年任国民党冀北保安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一八一师师长。六十九军军长，1938年10月后任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联合日本侵略军进攻八路军，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由于他投降活动日益昭著，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1940年12月被蒋介石处死。

⑥韩复榘（1890—1938）字向方，河北霸县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集团军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不战而逃，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大部分土地。后又与刘湘密谋阻止蒋介石入川，1938年1月被蒋处死。

⑦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 为了推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1935年北平文化界马叙伦、许德珩等149人组成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并发表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宣言号召：“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

⑧平教促进会 全称是平民教育促进会。30年代初，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经济日趋破产，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掀起了一场“乡村建设”、“农村复兴”运动。晏阳春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派别。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是“愚、贫、弱、私，根源在于教育不能普及”，所以主张用教育手段来改造农村，复兴农村。但他们否定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矛盾，否认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反对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张通过教育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良，生产技术的改进来恢复农村，使中国走上民族自救的道路。

⑨政学系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旧国会重开，国民党议员与部分进步党人士组成宪政商榷会，后又分化成为政学系、益友社等四派。1917年政学系骨干分子张耀曾、李根源等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称为政学系。后他们又勾结滇、桂军阀操纵非常国会排挤孙中山。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该派成员杨永泰、黄郛、张群等积极支持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反动派别，称新政学系。

⑩CC系 是国民党的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统治的反革命工具，CC系首领是陈果夫、陈立夫。但是这个组织中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是

被迫或被骗加入的。

⑥续范亭 (1893—1947) 名培模, 山西崞县人。1932年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 新编第一军中将军参议等职。1935年12月, 趁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赴南京呼吁团结抗日。由于蒋介石拒不“纳谏”, 遂于12月26日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 留下著名的《告民众书》及绝命诗5首, 遇救未死。后与中共合作, 任晋西北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日本投降后, 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会议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1947年9月12日, 在山西临县病逝。

⑦北美的独立战争 英国统治者为了加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掠夺, 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北美经济发展的法令, 因此北美殖民地人民不断进行斗争。1775年5月1日在费城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 大会通过了“必须采用武力”的宣言, 宣布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 并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并发表《独立宣言》, 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直到1783年9月3日, 英美最后签订了《巴黎和约》, 英国才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

⑧土耳其的解放运动 1865年6月, 以拉来克·凯末尔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于建立了“新兵斯曼克”的秘密政治组织, 提倡立宪运动。1876年他们发动宫廷政变, 另立穆拉德三世为素丹, 因病改立其弟, 并公布土耳其第一部宪法。次年凯末尔等被放逐, 立宪宣告失败。1889年伊卜拉欣·坦默为首建立了秘密团体“兵斯曼同盟”。1908年第三军团发动政变, 揭开土耳其革命的序幕, 素丹被迫宣布恢复1876年的宪法。

⑨阿比西尼亚抗战 1934年12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 在阿比西尼亚人民的顽强抗击下, 意军被迫撤离。1935年10月3日, 意大利30万大军, 再度入侵, 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 还使用灭绝人性的化学战, 40万无辜居民惨遭杀害, 国王流亡英国, 1936年5月9日墨索里尼宣布吞并阿比西尼亚。

⑩三中全会 1937年2月15日, 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议虽然没有确定坚定的抗日方针, 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污蔑, 但其内外政策都作了某些改变。在会议的《宣言》中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任务”, 根据这一原则“以适应国防, 以冀长治久安之局。在对日问题上提出如果让步“超过忍耐之限度”只有“出了抗战”。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⑪儿玉考察团 日本日华贸易协会应中国中日贸易协会的邀请, 组成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日本经济考察团, 1937年3月到达上海, 两国贸易协会的

会谈中，由于在日本的压力下强行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走私的严重等原因，经济合作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⑥佐藤 即佐藤尚武。1915年任驻我国哈尔滨总领事，1937年3月任日本林銑十郎内阁外相，虽然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一再提出“调整邦交”的外交词令，但没有根本改变侵略外交的本质。6月31日林内阁倒台后下台。

⑧税警团 1937年5月2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为了充实缉私力量，将在山东驻防的税警一营调回海州，另派税警第五团二营填防，这本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日本驻青岛总领事竟向青岛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将该团撤走。同时青岛日文报纸一面捏造税警团压迫朝鲜人的谣言，另一面对山东、青岛省、市两府进行攻击和挑拨，以求制造事端。

⑨津石路建筑与龙烟铁矿 自《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日提携”的口号下，加紧从经济上对华北的控制与掠夺。1936年10月强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将龙烟铁矿以收为国有的名义，为日本军方所控制，由于人才之聘用与经费的困难，开发的要求暂停。早在1929年7月日本华昌公司擅自与沧石路工程局私订合同，修筑从石家庄经沧县至大沽海岸的津石路，当时铁道部认为此项合同不合法，奉命将该合同撤销，但日方不肯罢休，遭到我有关部门的反对而停止。

⑩汕头案 1937年5月22日日本领事馆馆员青山清偕日人数名迁居汕头居住，并且拒报户口。我方警务人员进行交涉，反被打伤，因此将青山清偕带至警察局，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强行要我交出凶犯，经交涉警察局交出了凶犯，此举破坏了我国的法令主权，因此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而日本外务省竟电令驻广州总领事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同时派3艘军舰开抵汕头，施加压力。在调查中青山清直认不讳，而日方反认为是正当自卫，我方予以拒绝。

⑪海河浮尸 1937年6月23日，在海河发现青年男女尸体各1具，相对拥抱用绳捆绑，而2人尸体皆无伤痕。经查对死者马俊兴，在日租界大河街大东商行工作曾担任该行驻大阪采办员，女尸系其妻，但死因不明，疑为日方人员所害。

⑫“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的，不久公开发表。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全国同胞、各党派、各阶层应团结起来，停止内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⑬中共中央宣言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

会谈中，由于在日本的压力下强行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走私的严重等原因，经济合作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⑥佐藤 即佐藤尚武。1915年任驻我国哈尔滨总领事，1937年3月任日本林銑十郎内阁外相，虽然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一再提出“调整邦交”的外交词令，但没有根本改变侵略外交的本质。6月31日林内阁倒台后下台。

⑧税警团 1937年5月2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为了充实缉私力量，将在山东驻防的税警一营调回海州，另派税警第五团二营填防，这本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日本驻青岛总领事竟向青岛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将该团撤走。同时青岛日文报纸一面捏造税警团压迫朝鲜人的谣言，另一面对山东、青岛省、市两府进行攻击和挑拨，以求制造事端。

⑨津石路建筑与龙烟铁矿 自《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日提携”的口号下，加紧从经济上对华北的控制与掠夺。1936年10月强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将龙烟铁矿以收为国有的名义，为日本军方所控制，由于人才之聘用与经费的困难，开发的要求暂停。早在1929年7月日本华昌公司擅自与沧石路工程局私订合同，修筑从石家庄经沧县至大沽海岸的津石路，当时铁道部认为此项合同不合法，奉命将该合同撤销，但日方不肯罢休，遭到我有关部门的反对而停止。

⑩汕头案 1937年5月22日日本领事馆馆员青山清偕日人数名迁居汕头居住，并且拒报户口。我方警务人员进行交涉，反被打伤，因此将青山清偕带至警察局，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强行要我交出凶犯，经交涉警察局交出了凶犯，此举破坏了我国的法令主权，因此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而日本外务省竟电令驻广州总领事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同时派3艘军舰开抵汕头，施加压力。在调查中青山清直认不讳，而日方反认为是正当自卫，我方予以拒绝。

⑪海河浮尸 1937年6月23日，在海河发现青年男女尸体各1具，相对拥抱用绳捆绑，而2人尸体皆无伤痕。经查对死者马俊兴，在日租界大河街大东商行工作曾担任该行驻大阪采办员，女尸系其妻，但死因不明，疑为日方人员所害。

⑫“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的，不久公开发表。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全国同胞、各党派、各阶层应团结起来，停止内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⑬中共中央宣言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

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提出：希望“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并提出以这一宣言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几经周折，反复磋商，9月21日，博古、叶剑英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取得一致意见，于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简称《中共中央宣言》。

⑭蒋先生九月二十四日谈话 指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9月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又发表了蒋介石在庐山《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⑮国家社会党 是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主要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是张君勱和张东荪。1932年4月16日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正式宣告成立，他们主张“绝对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观念是深入于人心而较阶级为强”，因此反对阶级观念与阶级斗争观点。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1946年8月国社党与民宪党合并组成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并参加了伪国大。

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于1938年3月29日—4月1日，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大会宣言表示“抗日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对推动国民党抗战，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大会继续鼓吹“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对共产党进行攻击污蔑。

⑰《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确定了当时国民党“抗战”与“建国”的总方针。纲领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以蒋介石为全国抗战力量之领导。在对外方针中规定：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外之行动。《抗战建国纲领》体现了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进步的政治主张，无论是对抗日战争还是国内政治开放都有一定进步作用，但它始终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主张，则是其错误消极的一面。

⑱西班牙抗击法西斯 1936年2月西班牙举行大选，结果由共产党、社会党、左翼共和党、工人同盟及其他一些左派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引起西班牙右翼法西斯势力的严重不安，他们在长枪党领袖佛朗哥的策动下，于7月17日发动了武装叛乱，8月德意法西斯公然对西班牙进行

了武装干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奋起反抗，马德里人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马德里保卫战。1938年3月28日马德里陷落，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了独裁政权。

⑦⑨覆巢无完卵 《世说新语·占语》：“孔融被收（被捕入狱），中外惶恐。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依然）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希望）罪止于身（自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原意是指灭门之祸家人亦不得幸免。以后用来比喻事物的整体被毁灭，其中的个体也不可能保全下来。

⑧⑩参政会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在非常时期应设一国民参政会。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立初期，国民参政会对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中共参政员利用国民参政会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争取团结广大中间势力也起到积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参政会成为蒋介石推行反共政策的御用工具，国民参政会日益不得人心，只得草草收场。

⑪⑫二十一条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1915年1月向袁世凯贷款时提出的秘密条款，原文见本文。

⑬⑭汉冶萍公司 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煤铁联合企业。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1890年张之洞兴建，1908年成立汉冶萍公司。抗战期间部分设备迁往重庆建大渡口钢铁厂，萍乡煤矿部分设备迁往江西，后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掠夺，解放后回到人民手中。

⑮⑯云南起义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群众的反对。12月25日，蔡谔、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组织护国军，通电反袁，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忧虑而终。

⑰⑱张勋复辟 1917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发生了府院之争。6月长江巡阅使张勋应黎元洪电召，以“调停”为名，率定武军五千北上。张勋入京后强迫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拥立废帝溥仪复辟，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反复辟”为名，组成“讨逆军”入京讨伐，张勋失败逃窜，复辟失败。

⑲⑳直奉战争 1922年4月与1924年9月，直奉两军在华北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的两次战争。1922年2月，亲日派政客梁士诒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推出组阁，他推行亲日政策，直接影响了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的利益，因而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军阀战败而告终。1924年9月，直系军阀

与皖系军阀爆发了战争，张作霖借援皖为名，派兵入关这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直系军阀以失败告终。

⑧粤桂战争 1920年7月桂系军阀陆荣廷以讨伐福州北军为名进攻粤军，从而爆发了第一次粤桂战争，桂军战败，被逐出广东。1921年，孙中山准备讨桂，6月，陆荣廷集中重兵进攻广东，从而爆发了第二次粤桂战争，桂军战败，陆荣廷通电下野，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

⑨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6月2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27国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拟订对德和约，但实质是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格局，并策划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会议签订了《凡尔赛和约》，通过了《国际盟约》。会议无视中国是战胜国的地位，非法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造成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⑩新文化运动 是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标帜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当时主要的倡导者是陈独秀、李大钊，主要参加者有鲁迅、胡适等人。主要内容是树立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它给予封建专制主义与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以沉重打击，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⑪远东慕尼黑 亦称“东方慕尼黑”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进行劝降活动，英美帝国主义惧怕损害他们在南洋的利益，阴谋牺牲中国，换取日本的北进，劝蒋对日议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揭发和反对下，这个阴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破灭。

⑫新升降轮被炸 1938年10月，《新华日报》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一部分工作人员于22日乘新升降轮船撤退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和扫射，25位工作人员壮烈牺牲，难民数十人亦被炸死。

⑬五三五四轰炸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空军侵入重庆上空，对市区入口密集区进行惨无人道的狂轰乱炸，仅五四1天轰炸中，和平居民死3318人，伤者无数，炸毁建筑物3803栋，《新华日报》、《大公报》、《新蜀报》等都受到一定损失。

⑭曾参杀人，慈母投杼 曾参（公元前505—公元前436）春秋鲁国武城人，孔子弟子。曾在费地做过事，这地方发生了1件人命案，是1个与曾参同名的人所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他儿子杀了人，起初她并不相信。又有人来告诉她，她将信将疑。再有人对她说时，她不得不相信，害怕起来，投

杼（指织布用的梭子）而走。意思是说谗言可畏。

⑳三人成市虎 城镇上本来没有老虎，先后3个人都谎称街上有老虎，听的人就信以为真。意即谣言传播多了，就容易让人上当受骗。

㉑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部长。1922年参加国社党，成为“冲锋队”的头子，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任命为不管部长和航空部长、普鲁士总理兼内政部长。建立了法西斯恐怖组织“盖世太保”。1933年2月参与策划国会纵火案，以此来迫害德国共产党。1935年升为空军元帅，任空军部长。德国战败后，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服刑前两小时服毒自杀。

㉒杨刘不能除 杨即杨希闵，刘即刘震寰。在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担任革命军左翼进攻滇军的杨希闵与中路桂军刘震寰暗中与陈炯明和云南唐继尧相勾结迟不进兵，反而占领广东省行署、财政部等机关。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命令东征的黄埔学校学生军等部回师平叛。在广东工人、农民的密切配合下，全歼滇、桂军两万多人，杨、刘的叛乱遂平。

㉓曹吴不得倒 曹指曹锟，吴指吴佩孚，皆直系军阀。

㉔宋明惨祸 宋指赵匡胤所建立的宋朝，明指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皆因国力薄弱，宋为辽金所迫，迁都南方，后为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所灭。明为北方满族所迫，并为满族建立的清朝所灭。

㉕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江苏高邮人。明崇祯时任辽宁总兵，封平西伯，镇守山海关。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吴爱妾陈圆圆为其所得，遂引清兵入关。1664年清吴联军败李自成于山海关，封平西王。进陕西，入四川，残酷镇压农民军。后留镇云南，为清初“四藩”之一。寻清廷议撤藩，1673年举兵反清，后称帝于衡州，国号大周，不久病死。

㉖洪承畴（1593—1665）字彦浣，福建南安人。崇祯初官至兵部尚书，残酷镇压农民军，后总督蓟辽军务，与清兵战于松山，兵败降清。从多尔衮入关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及抗清势力，官至内阁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因曾事二主，故被史家列入贰臣传。

博·古·年·谱

1907年 诞生

6月24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世居江苏省无锡城内耆英里（今中市桥巷）。出身望族，世代书香。

父亲秦肇煌，字雨农，生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曾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考中秀才。为浙江省候补县丞。是位仪表堂堂，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性情豪爽的文人。平生嗜好饮酒赋诗。早年研究法律，宣统年间出任浙江省温州府地方审判厅刑事庭长。1911年以后，曾在上海当律师。1914年考取县知事，仍发浙江省补用。翌年7月委任浙江省鄞县统捐局长，后调长兴县统捐局长。因仗义疏财，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1916年因患肺病辞职，返故里闲居，同年11月病逝。其先娶陶氏为妻。陶氏婚后10年没生子女，于1897年病歿，后又娶朱氏为妻，生子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秦邦礼（乳名松林，字正民），女秦邦范（乳名惠英，字淑民），朱氏稍有文化，善良温厚，家教有方，支撑家庭，抚育子女成长。

1914年 七岁

在秦氏公学中接受启蒙教育。

1915年 八岁

考进无锡第二高等小学（即今东林小学）学习，不久又转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附小（即无锡师范附小）。

1916年 九岁

上半年 父秦肇煌辞职返家后，家境日趋没落，只得将祖传房屋出售，寄寓在无锡城中大河上既翕堂秦琢如家（今崇宁路112号）。

1919年 十二岁

冬 家庭搬至无锡城中观前街吴干卿家（今人民路121号）居住。

1921年 十四岁

7月 高小毕业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

8月15日 报考无锡荣巷公益工商中学商科，被录取为备取生，未能入学。

9月上旬 考取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后定名江苏公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简称“二工”、“苏工专”）预科，进入该校读书。

在校期间，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思想有了长足的进步。

1924年 十七岁

夏 1924年1月1日，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安剑平、糜文浩等学生发起组织的上海大学孤星社（后改名为中国孤星社）宣告成立。该社倡导“大侠魂”精神，口号是“救急地宣传三民主义，须热情地走入民间；彻底地鼓吹世界革命，必勇敢地身先向导”，并创办《孤星》旬刊。同年夏，秦邦宪参加了该社。

7月15日 1924年1月29日，无锡旅沪学生王启周、许广圻、顾谷宜、陆定一等人，为“提高邑民常识，促进无锡社会生活”而组建的锡社正式成立。4月1日，由该社编印的《无锡评论》创刊出版。锡社行政委员会开会，通过秦邦宪等人为社员。

8月15日 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六期发表《随感》。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秦邦宪最早发表的文章。文中初露锋芒，对无锡社会的保守思想、庸俗世态、败坏风气、封建礼教进行剖析与斥责。

8月17日 中国孤星社无锡社员举行第一次常会，安剑平、秦邦宪等20余人出席。会上决定“中国孤星社无锡社员全体加入锡社”，以加强两社合作，并推定秦邦宪为中国孤星社苏州委员会委员。

8月25日 出席锡社第三次社员大会。会上推定秦邦宪、华立为查帐员，检查该社帐册。

9月1日 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七期发表《在今日什么是小学教员的最大任务》。文中指出“教育不只是教书，教书不就是教育”，“所以教育一个儿童，成一个能够适应进取的环境而进取着，才是小学教师最大的任务。”

10月1日 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八期上，继续发表文章《随感》，批评无锡社会中一些人对青年人革命行动的错误认识，指出“我们青年人的血是热烈的，行为是光明的。”

10月22日 在《锡报》上，署名则民发表诗《夜醒》。这是目前所见秦邦宪的第一首诗歌。诗中揭示了旧世界剥夺人的快乐，给人灵魂上的痛苦，并勉励人要奋起向上，努力追求幸福。

11月1日 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九期发表《为妇女问题告青年男子们》。文中指出要承认女子是个有人格的人，实行男女

平等,用“己饥”、“己溺”的精神去援助她们,使她们解放自由。

本月 在锡社出版的《锡钟》第四期上,署名则民,发表《告为灾区募捐》指出救灾赈济不应仅在一时,而要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本月 在锡社出版的《锡钟》第四期上,署名则民发表《绅阀与军阀》,指出绅阀为军阀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绅阀和军阀是一丘之貉,均应打倒它。

11月25日 自即日至翌年1月6日,署名则民在《锡报》副刊《锡声》发表《前尘》,回忆父亲病逝后家庭悲伤,萧条的情景;从与同学游览,欣赏自然风光,联想到目前前程的暗淡、渺茫;又触景生情,借海的宏大、伟壮,对未来充满希望。

12月30日 在《锡报》上署名则民发表诗歌《秋意》。通过描写秋天的景色,触动了对自己前途的向往。

本月 在锡报出版的《锡钟》第五期上,署名则民,发表《杂感——闻何夔被绑架后》一文,指出在当时社会上“盗风日炽的原因”在于分配不公。

1925年 十八岁

1月6日 署名则民,在《锡报》上发表诗歌《亲爱的士兵们呀!》,指出军阀混战中的士兵们并不了解自己是为为什么而战,应当从盲从中解脱出来。

1月10日 为关注无锡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疾苦,与许广圻、安剑平等社员就本邑水利建设问题,提出改革的意见。

3月22日 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无锡进步团体有关人士积极筹备举行追悼中山先生大会。在第二次筹备会上,秦邦宪被推为大会交际股工作人员。

3月29日 出席中国孤星社无锡支部假无锡县教育会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并在会上演说。

4月4日 参加苏州各界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大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与会者3000多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恽代英（中共党员）到会演讲。会后在各主要街道进行游行。

4月5日 陪同恽代英参加无锡各进步团体、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省立第三师范礼堂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恽代英在会上演讲孙中山的历史及政绩，宣传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会后在无锡引起强烈反响。

4月11日 在《无锡评论》第十三期上，署名则民发表《我们应当觉悟的》一文。文中指出锡社内部反省改善、革新的必要性，唤醒社员应当觉悟的是：锡社内部不容存在党团、派别，锡社的最终目的是在改造国家，社员不宜与绅士和时代的落伍者接近和结合，强调社员主义信仰的结合和注视法治精神，不宜干涉社员在宗旨信条范围外的私事。

本月 在《妇女杂志》（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举办的《鸟的歌唱》乙种征文中，荣获刊用，并排名首位，显露了很高的写作水平。

春 随着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由“苏工专”同学周演行（即周学熙）介绍，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生涯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5月1日 针对去年10月江浙军阀混战后无锡青年的实际状况，在《无锡评论》第十四期，署名则民发表《劫后青年应尽的责任》，指出青年要反对一切侵略者，打倒一切腐绅恶官僚，提高民众常识、引导青年，抨击社会上一切种种鬼魅的行为。并在同期社员意见栏中提出“第一要打倒一切侵掠、压迫的大小侵略

者”，“要放大眼光，做民族解放的工作，不仅止于家乡改造。”

本月 在“苏工专”可园图书馆，与周演行发起组织报告会，在会上演讲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同日 介绍颇具革命精神的无锡树滋小学教员冯耕庸加入锡社。

5月30日 晚上，咯血，病卧床席，忽然得到上海发生英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同胞惨案的消息，“热血如沸，披衣起坐，欲拔剑起舞，然身过衰弱，颓然复倒。”

5月31日 上午，赴苏州出席国民党区分部成立会议的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秘书姜长麟向秦邦宪叙述了上海五卅惨案的情况。秦邦宪激昂慷慨，毅然投身于爱国运动，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他时为“苏工专”、苏州学联负责人，立即派人告诉各校。下午，参加假北局青年会召开的学生联席会。会上议定采取多种形式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

6月1日 上午，遵照苏州学生联席会议定。与同学赴桃坞、显道、萃英中学联系，动员学生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下午，参加在青年会召开的学生联席会，会上决定明日举行集会游行。

6月2日 上午，抱病参加苏州20余校3000多学生汇集公共体育场举行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并激动地说：“民气的激昂，青年的热血，中国的复兴，其赖于是！”

6月4日 参加苏州学生联合会、苏州外交后援会在青年会召开的会议。会上通过有关募捐等数项议案。决议致电沪日报工会为沪学生会呼吁，电请外交部为五卅惨案向英国提出抗议。

6月5日 参加苏州学生联合会邀集各业公决团代表在青年会召开的会议。

6月6日 下午，往青年会参加苏州学生联席会。会上决定明

日举行各界民众联合示威大游行。

6月7日下午，扶病往青年会主持苏州学生联合会募捐开罐（剖开竹筒）事宜。学界第一次募捐结束，计得6000元。

同日晚上，天下暴雨，在中国孤星社社员安友石住处与前来苏州活动的上海大学学生、中国孤星社委员长安剑平就五卅惨案等问题促膝谈心。秦邦宪回顾此事说：“青年热血的大侠魂精神，不图于此惨风苦雨之夜，湫隘昏暗之室中见之。”

6月10日前后因疾病困身，遂束装旋里，但即又带病投入无锡声援沪案活动。

6月12日在反帝斗争中，为提高民众的爱国热情，鼓动民众投入斗争，锡社和中国孤星社于6月9日出版了《血泪潮》小报。秦邦宪署名民发表《尾声训诂》，批驳社会上轻蔑青年学生反帝斗争的奇谈怪论。

6月13日自即日起至19日，署名宪、邦宪在《血泪潮》发表《病榻琐记——五卅案苏州运动中之几节片断回忆》，详细记述了苏州声援沪案运动初期的情况，抒发了自己反帝爱国的情感。在同日报上还署名则民发表《狗与华人》短文，指出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断定了华人不如狗，狗高于华人”。

6月17日署名则民在《血泪潮》发表《上海惨杀之最后决胜点》，明确指出：“我们要晓得英国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罢了！它若一有什么举动，它的殖民地便会纷起扰乱。”并断言：“只要我们自己努力，自己不懈，最后胜利可操左券。”

还署名则民在同期发表文章《我们将不要教育》及《越俎代谋？》

6月21日锡社召开紧急会议。因五卅惨案交涉停顿，需重掀运动高潮，大造声势，该社决定立即发表宣言，表明态度，推

定秦邦宪、安剑平等 4 人起草宣言。

6 月 22 日 出席英日外人惨杀我国同胞无锡后援会（简称无锡后援会）紧急会议，并在会上说明召开无锡市民大会的旨趣和必要性。会议决定在 6 月 25 日全国总示威日举行无锡市民大会。

同日 以民为署名在《血泪潮》上发表文章《冷血者言》指出“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悔而后人悔之。”

6 月 24 日 参加无锡后援会会议，被推选为无锡市民大会口号指导员，并就大会庶务事宜与无锡图书馆、通俗教育馆接洽。

6 月 25 日 出席由无锡各界民众万余人在城中公园举行的市民大会。在会上，代表中国孤星社作了简短有力的演讲，主张对英日经济绝交，设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速谋民众团结，并提议撤换办理沪案交涉之蔡廷干、曾宗鑑，言词慷慨激昂，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掌声。还领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散会后，继续与无锡救国五七团徐萼芳（时为中共党员）等人登台演讲。

7 月 1 日 通过锡社成立以来的社务情况和社员言行，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十六期发表《什么是锡社主义》提出“锡社的主义的确是：‘扶弱锄强’的‘侠魂’主义；‘除旧布新’的‘革新’主义”，并作了全面的阐述，勉励社员努力实现锡社的主义。

同日 在同期《无锡评论》发表《五卅惨案中的无锡舆论界》，针对《无锡新闻》在轰轰烈烈的声援沪案运动中，哼哼老调，奄然无气，散播荒谬的倾向，提出严正的批评。

同日 还署名则民，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文章《无锡新闻》。

7 月 5 日 出席无锡后援会议，在会上提议三案：一、将所查英、日货一律充公拍卖，所得银价作救济失业工人的捐款；二、声援沙面惨案，实行通电，救济香港工人，出发演讲等；三、举行

第二次募捐。会议通过前两案，保留第三提案。

7月7日 出席无锡后援会会议在会上就应否改推代表赴南京慰问、调查仇货委员会成员任免，个人加入后援会需交会费等问题发表了较好的意见。

7月10日 代表中国孤星社出席无锡后援会代表大会，商讨改组后援会，应以锡社、辅仁中学等8个团体为基本会员，推定王启周为委员长。

同日 在抵制英日货物活动中，锡社与王克循（无锡县商会会长）等商界头目、乡绅发生冲突、笔战。为坚持斗争，维护合法地位，秦邦宪在锡社招待新闻记者会上重申锡社之主义（宗旨）是革命、维新，以大无畏、大侠魂的精神贯彻之，指斥对方对“赤化过激”的曲解、诬蔑。

7月上旬 不顾患病疲劳，与无锡后援会执行委员诸祖荫等人在晚上手提桅灯，到无锡通运桥下，登上自沪来锡的货船，爬人货舱，检查英日货物。还在通运路地段百货商店中进行检查。通过查禁活动，取得查禁正广和汽水和大英牌香烟事件的胜利，提高了民众的反帝情绪，打击了好商的气焰。

7月11日 锡社召开第二次暑假大会。在广泛吸收社员的基础上，制订新的社章，组织体制改变为委员制。秦邦宪参加了这次大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

7月13日 参加无锡后援会与调查仇货委员会联席会议，在会上就调处汽水经过情况，设法抵制大英牌香烟等事宜发表意见。

同日 鉴于五卅惨案发生后，有些人激于义愤，提倡加强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用武力对抗帝国主义，署名则民在当日和16日的《血泪潮》发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不可有，惟须有主义的训练》（分上、下两节）。该文强调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

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有主义武装头脑，才可持之以恒。但未明确指出用什么主义，原因是“因为我受主义洗礼的人，说了出来，未免像牧师播道、店伙叫卖一样索然寡趣，还不如留给大家去体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者虽不能明确地意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作用，但已经看到了武装到了牙齿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不光是任何批判所能打倒的。

同日 还署名宪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文章《唉，五分钟了！》

7月14日 出席无锡后援会会议，在会上对处理利源祥商号出售英商正广和汽水事发表意见，还与许广圻等人被推为代表再至县警察所商讨处理办法。

7月15日 参加无锡后援会会议，与许广圻、安剑平在会上汇报与县警察所代表协商处罚利源祥商号85元爱国捐的情况。

7月19日 署名民在《血泪潮》上发表文章《亦足为无锡生色！》讽刺无锡的几位绅士装模作样的为五卅运动制造舆论。

本月 在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预科毕业。

8月1日 针对魁庵在《锡报》：《邑评》非难无锡后援会和无锡商会会长王克循向报界发表对于爱国运动的谬论，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十七期发表《爱国与互爱》。文中指出：“不过爱而称互，必须有两面的，而不是一面的。”强调商人首先要爱国，国不存，何以惜民？“总不能拿互爱招牌来保护奸商，私运仇货。”

同日 任锡社编辑部主任后，《无锡评论》自十七期起由其主持编辑业务，在所写的《编辑部启事》中宣布：“《无锡评论》将本着无畏精神，不避险阻，不怕强暴，不惜牺牲，不知势利地去做去，材料上注重实的批评，为避空洞之言论，态度上务究理性的批评，不涉感情的喜怒。”

8月8日 出席无锡后援会会议。会上与安剑平、王启周、诸

祖荫等人被推为查帐员，检查赤心社（系无锡后援会成员）在举办赈工游艺会时的帐目。

8月15日 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十八期发表《国民会议筹备初选》。文中首先表明其是三民主义的拥护者，在揭露段祺瑞的国民会议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根本区别时说：“就是孙先生主张，把全国已有的各种国民团体——如学生会、工会、商会、农会等——中推举代表起来，共谋国事，促进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段执政的国民会议呢？他的用意与安福国会毫无差异”，“实在不过有给自己遮遮自己的狐尾”。“我们欲求真正的国事，解决统一与和平，非彻底的改造不可。”

同日 署名上林，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文章《一九二五年的王敬轩》及短文《奇谈》。

8月18日 出席无锡后援会在县议事会召开的委员会议，商讨该会即将结束事宜。

9月1日 鉴于《锡报》刊载无锡绅士薛南溟给无锡县商会的公开信，指责无锡后援会检查英日货物的行为“不知凭何法律而敢如此妄作妄为”，不是爱国而是“祸国”。为此，秦邦宪署名则民，不顾势孤力单，在《无锡评论》第十九期发表《读薛南溟致商会书以后》，批驳薛南溟说：“孙中山的倡共和，蔡松坡的讨袁逆，岂具挟法律而行！”

9月15日 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二十期发表文章《盗匪遍地声中国民应有的觉悟和治标治本两方法》指出：“我们要专靠老爷们的发施仁政，昭苏民困，是靠不住的”，“只有起来自己执枪自卫，方可自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治本“一定要打破奴隶海关制而求海关自主”，“使我国国内工业得日就发达，而使兵匪盗贼亦可有职业可谋，不致常为民害”。

在同期刊物上，署名则民发表短文《短兵》。

9月下旬 秦邦宪被录取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这是他革命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上海大学是二十年代初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骨干，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

10月1日 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二十一期上发表文章《选举活剧中邑中舆论界》。

10月15日 同年10月初，一位自喻能整治劣绅的“清官”杨千里接任无锡县知事，天真的人们希望出现真的清官。为之，秦邦宪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二十二期发表《杨千里先生来锡后之感想——官僚果能铲除绅阀么》，敏锐地揭露其本质，指出：“也只有呆子会说出或想着官僚会来铲除绅阀”，我们认定官僚和绅士是狼狈为奸的，官僚和官僚又都是一丘之貉，官官相护的。所以阿毛罢，阿狗罢！张三罢，李四罢，都是换汤勿换药。”

在同期刊物上署名上林，发表文章《吃人礼教下之“杀子理论”》。

本月 通过在上海大学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秦邦宪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列主义者转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划分在该校党支部所属政治觉悟较高的小组。奠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理想和信念。

11月15日 署名上林，在《无锡评论》第二十四期上发表两篇短文《无锡人真有本领》及《模范二字之不祥》。

12月1日 同年11月下旬，无锡小学教师因生活困难所迫，发起加薪运动，要求提高待遇，惊动城乡。秦邦宪同情和支持穷困的知识分子，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二十五期发表《为加薪运动敬告全邑小学教师》。文中说：教师生活不安定的原因“就是在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军阀之专横，绅阀之剥削”。又指

出：“怎样可以达到真正成功的区域？就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取消一切赔款和外债，取回海关权）打倒军阀！！（严定教育经费之独立）打倒绅阀！！（清查及革除积弊）换句话说就是走国民革命的大道。”

同日 在同期《无锡评论》署名则民，还发表《奇哉，投笔从戎之怪剧》，指出：“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政治，打倒军阀为第一着。要打倒军阀，必须投身革命群众之内，靠群众的力量去铲除、打倒它”，“我们的共同奋斗才可以解除我们的困难”！

在同期刊物上，还以上林署名发表文章《人力车夫罢工风潮》。以则民署名发表《关于无锡评论的来鸿去雁》。

12月20日 在上海大学“中山主义研究会”出版的《中山主义》周刊第一期和第二期（2月27日）上发表了瞿秋白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和恽代英的《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上述文章为瞿秋白和恽代英在上海大学的演讲辞，均由秦邦宪记录。

12月22日 因劣绅彭鼎勋向江苏省政府诬告，指控锡社为“共党机关”，《无锡评论》宣传“过激主义”，由此，锡社和《无锡评论》遭到省政府勒令查封。在这危难之际，锡社召开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秦邦宪在会上就锡社面临处境、对策等问题发表意见。

12月25日 针对无锡农民关注的水利经费征收问题，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二十六期发表《评顾宝琛氏致县议会之请议案——水利经费停征问题》，同情贫困农民，向当局呼喊：“我在这里代表小农们的血泪之声向诸位先生请求，减其可减之税！勿欲以备大帅不时之需，而横征暴敛！”

1926年 十九岁

1月5日 署名上林，在《无锡评论》第二十七期上，发表文章《足以妨碍新无锡进程的黄埠墩重建》。

初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于同年1月1日在上海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选举恽代英、沈雁冰、杨贤江等人为委员，与西山会议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久，秦邦宪调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

2月15日 秦邦宪返无锡，出席锡社全体社员大会，讨论社务事宜。

3月15日 无锡万安市（相当于今区）进步青年学生在1925年底成立万安协进会，并创办《协进月刊》，秦邦宪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二十九期发表《评万安市〈协进月刊〉创刊号》，欣慰地说：“仅仅是这个创刊号，也已经使我深深信仰春的曙光已经来到了”，是一本水平线以上的刊物。我们革命的生力军，是在民间。“到民间去啊！同志们！到民间去呵！”“我希望，每个市乡团体都像万安协进社一样努力。”

在同期刊物上，署名上林，还发表文章《大出丧与免捐做寿》。

6月14日 代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出席上海国民党第四区第十一分部常会，在会上报告最近政事。

6月25日 代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出席上海国民党第四区第十一分部常会，在会上报告近来的政治形势和北伐军出发胜利情况。

7月1日 署名则民在《无锡评论》第三十五期发表《世界中国与无锡》，表明其已接受了唯物史观，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去认识社会。文中指出：“经济的变动，必然引起上层产物（政治、学术、文化、风习……等）的变动；世界潮流，一定要促动中国的变动；中国的变动，一定要影响到其所包含的各处（无锡当然在内）。八十年来的历史，便是其最好的例证。”文中还肯定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生力军。

7月11日 下午，出席在无锡召开的锡社年会，会上继续当选为锡社执行委员。

同日 晚上，出席锡社执行委员会会议，被推定为宣讲委员，主管学术部、通俗部。

7月25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召开的党员援助北伐临时代表大会，代表宣传部作政治形势报告：希望同志们加倍关注此事，努力援助北伐军，取得胜利。

8月10日 代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出席上海国民党第四区十一分部第九次常会，在会上报告最近政治形势。

8月18日 代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参加上海国民党第四区十一分部第十次常会，在会上报告西北军和北伐军军事状况。

8月21日 代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出席上海国民党第四区十四分部成立会，在会上报告国民党组织法及最近政治形势。

本月 与锡社委员长王启周就《无锡评论》办刊方针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为之，至第三十七期出版后，停止了该刊物的编辑工作。

9月13日 代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参加上海国民党第四区十一分部第十四次常会，在会上报告帝国主义暗助军阀，助长内战及奉军南下的种种情形；上海两周来形势和北伐军攻克武汉的详情。

10月6日 淞沪警察厅奉联军总司令部“对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为赤化张目、从严查究”的密令，将秦邦宪等30余人逮捕。后因未搜查出证物，翌日即获释。

本月 在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锻炼，将自己的革命热情逐步变成实际的革命行动。

本月 通过考试，经中共中央批准，乘船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1月 秦邦宪到达莫斯科，开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

1927年 二十岁

3月22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秦邦宪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一起参加了庆祝上海解放大会，会后参加了莫斯科市部分工人、市民的游行活动。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其他各地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四一二反革命暴行传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秦邦宪与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对蒋介石罪行的声讨大会，并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通过一封致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报。

5月13日 斯大林到中山大学做报告，秦邦宪参加了这次报告大会。

6月底 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学期总结会，“教务派”和“支部派”由于观点不同，公开相互指责，会议开了7天7夜，秦邦宪倾向于“支部派”的观点。

11月7日 秦邦宪参加莫斯科举行的盛大游行，庆祝十月革

命10周年。当中山大学的学生队伍来到红场时，少数学生却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使苏共领导人感到十分震惊。

11月14日 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党籍。斯大林指示米夫要对中山大学少数学生在游行中的行动进行彻底的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报告给苏共中央。这次调查工作持续了几个月之久，虽然调查出了少数托派学生，但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秦邦宪积极参加了这一反托洛茨基的斗争。

年底 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从中山大学找几个俄语水平比较好的学生去大会担任翻译工作。秦邦宪也被选中参加了大会，在会议期间，认识了无锡纺织女工刘群先。

1928年 二十一岁

5月初 莫斯科中山大学流传着有一个“江浙同乡会”的组织，米夫接受王明的建议，让支部局进行调查。王明将调查不确切的材料提供给来校作报告的向忠发（当时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在大会上公开指责“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在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部分留学生向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进行申诉，要求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彻底查明事实真相，经查明并不存在这一组织。在这一场斗争中，秦邦宪是支持支部局的。

5月 秦邦宪与刘群先在莫斯科正式结婚。

秋 支部局召开党员大会，批判所谓西门——高小集团，并定性为“先锋主义”。秦邦宪也参加了对小集团的批判。

1929年 二十二岁

夏 中山大学召开党员大会，还邀请了中山大学所在地区区

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来校讲话，秦邦宪担任翻译工作，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派张国焘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十天会议期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秦邦宪在会上也发了言。大会最后进行表决，拥护秦邦宪支持的支部局约有 90 多人，反对的 20 多人，有二三百人表示怀疑。

10 月 在苏联开展了大规模清党运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不例外。秦邦宪因为是支部局的成员，又积极支持米夫，所以顺利的通过这一关。但这次清党运动，也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1930 年 二十三岁

5 月 秦邦宪离开莫斯科回国，被分配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担任总工会宣传干事，同时参加编辑《劳动报》等工人报纸。此后，秦邦宪在署名时，较多地使用博古。

7 月初 与王明、王稼祥、何子述一起议论形势，对李立三的工作不满。当了解到共产国际对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决议》的态度时，便决计在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7 月 9 日 李立三召开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商议如何贯彻中共中央 6 月 11 日的《决议》，博古等在会上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李立三对批评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向忠发在会上宣布撤销王明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职务。

7 月 10 日 王明写信给党中央，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李立三以中央名义给予王明 6 个月留党察看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 3 人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0 月 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后，很不满意，经过研究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

线问题的信》，指责李立三“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

下旬，米夫让王盛荣等人回国后，将共产国际10月来信的精神告诉了王明等人。王明与博古商议，准备联名上书中央，指责党的三中全会对李立三路线没有充分揭露其实质进行更严肃的斗争。

11月13日 王明和博古以《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为标题，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批评三中全会没有正确的政策去粉碎敌人的“围剿”。信中提出“立三同志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

11月17日 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声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的混合物”，“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共产国际路线”的，要求党中央给予平反。

11月下旬 王明、博古等人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并与罗章龙等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12月1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做报告，传达中央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情况，肯定了王明、博古有正确观点的同时，批评了他们有小组织倾向的错误。

1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即王明）、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12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中央局工作。

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1931年 二十四岁

1月7日 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博古也列席参加，并在会上发言支持召开四中全会，反对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2月17日 张闻天、杨尚昆从苏联回到上海，几天后博古去旅馆看望他们。

3月 团中央书记温裕成因贪污被撤职。4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职务。

6月22日 向忠发叛变，供出中共中央的组织状况和人员名单及中央机关所在地，还供出博古的住址及开会地点，博古因事先得到通知，幸免于难。

这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纷纷离开上海。

9月中旬 王明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确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明确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为常委，由博古负总责。

10月18日 王明乘船去莫斯科，博古直接挑起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重担。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共产国际领导，并得到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直接指导。

10月中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对不能随方面军行动。中央局应在苏区建立经常工作，指导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任弼时仍任中央局组织部长。

10月21日 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1月7日开幕，“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10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宣告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将在江西召开，这次大会将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劳动法、土地法以及其他法令；将成立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一革命临时政府将要成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与组织者。

10月2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等复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红一方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训练、补充、筹款、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开全苏大会，所以难以立即向外发展。

10月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央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人选，“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贺信，祝贺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1月1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中央苏区中央局信》批评中央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

12月1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指出：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动员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用民众的铁锤去打击这一崩溃着的、动摇着的反革命统治，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

同日 博古在《红旗周报》附刊撰写文章《在转变中》。指出：“目前学生运动的特点，是在从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转变到

坚决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上去，是在从和平请愿等方式转变到直接地坚决地向反动统治堡垒作总的进攻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党在学生群众间需要进行长期地艰苦宣传”，“组织和开展工人阶级的斗争，总能够影响和推进学生群众的转变，转变到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斗争上来。”

12月17日 在《红旗周报》二十七期刊登文章《论学生运动目前的形势》，文章指出：“党必须深刻地抓住日益革命化的学生群众积极地努力地在学生中间工作，猛烈地开展学生群众反帝斗争，组织他们的罢课与示威，同时必须以最大力量注意到怎样在组织上巩固我们的领导，怎样在组织上巩固日益开展着的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

12月18日 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讨论关于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时，做当前形势，中国的问题，我们的策略的报告。

12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批评某些地区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指出：“在实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中农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对于那些利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去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企图，必须给以最严厉的与坚决的打击。”

12月25日 在《红旗周报》第二十九期上发表文章《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指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

1932年 二十五岁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

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条件，占取一二个主要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

1月上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决议后，致电临时中央，提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时指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打。

2月26日 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指出：“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

3月6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帝问题致鄂豫中央分局的信》。批评鄂豫皖中央分局对满洲事变及国内形势发展估计的错误。

3月11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研究苏区问题。

3月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第四次反“围剿”问题。

3月18日 中共临时中央给江苏省委的信，批评江苏省委“目前是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中间，设〔如〕不及早设法补救，江苏党决不能完成国际与中央所给与它的中心任务！”

3月3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给《各级党部的一封信》。

4月4日 在《斗争》上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文中指出：“在许多地方障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这种思想主要的表现在对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即表现在对于

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

4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自从占领哈尔滨之后，现在更沿着中东路，向着苏联的边界进攻，……以引起反苏联的战争”，同时“预备以新的武装的行动，占领新的城市，来更进一步地瓜分中国！”告民众书号召“只有全中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义勇军，创造民众自己的武装队伍工农红军，在民众自己的政府的指挥之下，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我们才能保护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我们才能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4月11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讨论中央苏区的工作。

4月14日 中共临时中央下达《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信》。指出：“掠夺中国，瓜分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帝国主义直接的武力进攻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危险是异常地紧张起来了！……所有这些证明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同时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真正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4月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的来信。

5月8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江苏、五一总结等问题。

5月14日 在《红旗周报》上发表《我们应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必须千百倍的加紧宣传苏维

埃与红军。……最普遍的告诉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动群众，正在中国内地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血战着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目前反帝国主义最强有力与伟大的先锋力量。”

“红军的光荣的历史意义的胜利，不仅引起了帝国主义与其走狗们的恐怖、惊惶、憎恨与新的进攻的组织，而且也最大限度地兴奋、激励，推进了中国工人、农民、兵士与一切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成了全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柱石。他们以自己的光荣的胜利给全国劳苦群众指出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革命的道路上。”

因之，非苏区党的组织的任务，应该是千百倍地加紧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最广泛地解释中国工农红军及他们的最近的胜利的作用与意义，用一切力量来开展工人、农民的斗争，组织响应红军行动的革命斗争的浪潮，与动员工人群众到红军去及组织他们对于红军的切实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

5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指出：苏区党代表大会“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形〕势估计不足，”“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地肯定地指出，”“虽然当时中央屡次去电指示，但是没有为中区的领导同志所严重注意。”

5月3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五卅纪念宣言》。指出：“1925年的五卅是英日帝国主义者惨杀中国工人学生的日子，是全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日子。今年我们纪念五卅，就要继续扩大我们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6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布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

6月8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

6月中旬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总司令，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6月21日 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失败之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在进攻中得到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同时分析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大大削弱与工农民众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首先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清楚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之后，我们可以断定不但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四次‘围剿’，而且将从新的胜利中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并提出了完成这一目标的十项任务。

7月10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武装示威的决议》。提出了“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7月21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批评他们“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

8月上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兴国会议决定的红一方面军行动计划。

8月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必须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面前，表示张皇失措，对此无疑是对于革

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还提出要更响亮的“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9月25日 中共临时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对苏维埃工作、关于肃反问题、白区群众工作问题以及加紧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与红军中的领导工作上提出了批评。

9月28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给中央苏区的信。

10月6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李顿的报告书，并讨论中央苏区问题。由于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上“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在政治局的讨论中，博古表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做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

11月1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临时中央，电文提出：“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11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到中共临时中央致电周恩来，询问执行进攻路线的情况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是否团结一致。复电谓：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未深

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

1933年 二十六岁

年初 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地区难以立足，不得已进入中央苏区。博古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

1月7日 中共临时中央与共青团中央发布《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强盗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将山海关轰成一片焦土，随着东三省的占领，日本军阀正在侵入热河，”“所有这些，都是完全瓜分中国的步骤，是镇压中国劳苦群众生长着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步骤，是将中国变为反苏联战争的作战根据地，并使中国人民成为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牺牲的步骤。”并号召“建立群众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

1月 博古路经上杭见到了闽粤赣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很不投机。

1月19日 博古平安抵达瑞金。

1月27日 中共临时中央与江苏省委发出《给上海工厂支部的一封信》。提出了6点具体指示，并进一步阐明中国苏维埃临时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在下列的条件之下，红军准备同任何的部队，作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的作战协定”的三项条件。

2月4日 在《斗争》第二期上发表文章《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国民党投降卖国》。指出：日本“正在准备大规模地侵入华北，席卷热河与占领平津的军事行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般的进攻与新的进攻准备之下，国民党政府更加无耻更加露骨地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战争是在我们面前开展着！只有动员千百万的劳苦群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才能获得中国的民族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而推翻国

民党的投降卖国的罪恶统治，才能保证民族战争的胜利。”因此“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结起来，应该成为我们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口号。”

2月7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广泛地宣传三八妇女节的意义，特别要具体的介绍苏联与中国苏维埃区域妇女生活的情形，把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的妇女生活情形对照起来，揭穿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武断宣传与造谣污蔑。”“动员女工与农妇及一切劳动妇女参加整个的革命斗争与一切政治运动，”“在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去吸引女工入党入团。”

2月10日 在《红色中华》上以社论形式发表文章《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指出：“生产战线上的胜利，是前方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我们的党团和一切群众组织紧急地动员起来，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

2月15日 由于闽粤赣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写了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被认为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要求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同时撤销了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2月16日 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作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路线”，“但是正在这时候，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路线。”“这个机会主义的退

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

2月17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决议》。号召全党“切勿一般地、抽象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宣传，要将这一思想和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联系起来。”“在目前加紧在思想和理论斗争的战线上，向一切假冒的马克思主义，和公开仇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攻。这一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同时“责成各级党部于马克思逝世日在各地组织群众的纪念大会”，并“筹备出版纪念马克思及讨论党内教育问题专号”，同时责成中央宣委立即编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理论基础》等各种小册子。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和北京惨案七周年纪念宣言》。指出：“巴黎公社教训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破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而代以自己的新的国家。”“非有自己的强固政党，不能争取自己的革命胜利。”“非有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联合，则不能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时指出：“必须明白的认识，代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的，便是国民党的刽子手政权”，“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到底的！为千百万劳苦群众所拥护的苏维埃政权是战无不胜的！”

2月18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号召全国的工农劳动群众“一切还在三民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别所欺骗与影响之下的革命分子，团结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2月 博古找罗明谈话，对罗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要罗明回到福建省人代会上进行检查。

2月23日 博古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的报告《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一文，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

3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与北京三一八惨案七周年纪念的决定》。要求“动员党、团、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到广大的群众中，经过各种集会、演讲和刊物宣传巴黎公社的意义与教训，并使这一宣传与拥护中国苏维埃，揭穿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紧密的联系起来。”

3月31日 2月下旬出版的《斗争》上发表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点名批评了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所谓“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后，江西省委发出对会寻安三县委指示信中指出：会寻安的党所犯的纯粹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

因此，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积极分子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决议》提出：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召开三县各级代表会议，以开展“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3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临时中央接电后，立即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4月8日 在《红色中华》第六十七期上发表文章《把勃发着的群众劳动热忱组织起来》。指出：“春耕运动是在沸腾着，这时候正是迫切的需要对于这个运动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用我们一切力量以有计划有组织地努力来完成开垦五十万担荒田增加二成收获，以保证常胜的工农红军的供给与更进的提高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

4月15日 在《斗争》第八期上发表文章《论目前阶段上苏

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指出：“在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设施与政策（经济政策包括在内）应该从严格的估计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出发，从苏维埃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阶级实质出发，从巩固无产阶级与基本农民群众在反对帝国主义土地革命中的革命联盟及巩固与加强在这个联盟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出发。”

“在工农民主专政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一，无情的镇压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绝望的反抗，扑灭一切必然产生的他们的复辟的企图；二，武装工农，在新的阶级基础上创造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红军”；“三，坚决的肃清一切国内生活中的封建残余，进行土地革命到底。”

“为着正确的实行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政策（包括一切经济政策在内），我们必须最冷静与清晰地来分析今天苏维埃政权所处的内外环境，今天苏维埃区域的特点。”“应该成为我们一切政策出发点的事实，是苏维埃革命已经胜利的地方，还只是中国一部分地方。”

4月16—22日 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中共江西省委召开江西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展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4月下旬 代表临时中央，到前线慰问红军时，周恩来问博古毛泽东是否已回瑞金，博古回答毛泽东已回，在政府工作。

5月5日 临时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二次申明的决议》，继续对这些同志进行批判和斗争。

5月8日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提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议，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由项英代理主席。同时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员，周

恩来为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6月2日 召开中央局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和胡海的汇报，会议作出《中央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同时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

6月上旬 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局会议。会议肯定了前一段苏区的工作，决定扩大红军100万。会上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意见，博古在最后结论中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认为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6月13日 中共临时中央局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驻中共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夏季作战的计划。同时对红一军前段作战进行批评，并提出从红一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组成东方军团，进行分离作战，中共临时中央局强调要“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

6月14日 周恩来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局，对批评进行了申述。

6月18日 朱德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局根据夏季作战计划，作出了具体部署。同时对计划提出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团目前决不能分开”。并指出东方军入闽作战是“酷暑远征”。

同时电复博古、项英，对他们的批评进行申述。

6月25日 在《斗争》十六期上发表文章《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指出：“为着使我们能够正确的决定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政策与措施（经济政策包括在内），我们须得还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的阶级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目前苏区经济的结构及其发展的趋势”。并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6月30日 中革军委决定以举行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7月5日 在《斗争》第十七期上，继续发表文章《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二续)

7月10日 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周恩来，改变原东方军作战计划。

7月11日 朱德、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刘伯承，再次申诉不同意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并恳请说：“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太忌。”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委会，批准中革军委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同日 在《红色中华》第九十三期发表文章《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指出：“在庆祝今年红军纪念日的前夜，不论在前方和后方，我们必须尽量地提高我们完成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布尔什维克工作”，“在后方我们必须完成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的创立”，“在前方我们必须以学会现代各种军事技术来纪念红军的六周年纪念。”

7月16日 朱德、周恩来，电复项英、博古、刘伯承汇报困难，并督促火速解决东方军的粮食问题。

7月中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连电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连续发来的对红一方面军改变其拟定的夏季作战计划的意见。共产国际表示：我们仍然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对于军事策略的建议，绝不能当作军事行动中纯粹采取防卫路线的提议。

7月24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指出：“中央认为更加迫切的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下列的紧急的战斗任务”，在苏区的党组织“必须立即战斗的动员群众，在‘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等口号的周围……号召全苏区的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开展苏区周围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红军各部之间必须在整个的战略意志之下，进行战斗的任务”，“加强与改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等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党组织，“必须立即进行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的进攻苏区的广大煽动”，“开展与加强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去执行中央最近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信及致满洲省委的信”，“在受资本主义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领导成千成万失业工人、农民、灾民、难民、士兵、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日常利益而斗争”，“引导他们走向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

8月4日 在《红色中华》第九十九期发表文章《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指出：“现在在中国面前放着两条绝对相反的道路：一条是帝国主义企图经过国民党而实现的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跳出民族危机和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苏维埃的道路。或者是贫困的被压迫的奴隶的殖民地中国，或者是解放的自由的独立的苏维埃中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8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中国的民众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必须用更大的努

力开展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战争，进行群众集会、罢工、示威、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拍卖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开展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从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8月13日 在《红星报》第二期发表文章《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指出：“阶级敌人是在疯狂般的准备着新的第五次的绝望的进攻，这就是新的五次‘围剿’，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动摇，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来粉碎这个新的‘围剿’”，但是“我们今天还存在着弱点”，“技术上的落后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弱点之一”，因此，“第一，我们应该最好地来使用我们现在的武器”，“必须使得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发扬到最高限度”。“第二，我们必须最好的来防御一切敌人的新式武器与夺取他们来武装自己”。“第三，对于指挥员应该是更大的加深战术与战略的研究，要最灵活地运用我们在国内战争中丰富的经验与最新战略与战术的原则”。

9月 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受到博古等的热烈欢迎，博古为他专门开了一个欢迎会。博古在会上讲了话，说明李德将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

9月12日 中共临时中央局致电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以临时中央名义从上海发来的指示电提议延长东方军在福建作战时间。

9月13日 周恩来再电博古、项英，并转上海，强调实行沪电的关键在“求得胜利的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

9月24日 东方军团围攻将乐、顺昌一月未克，而北线敌情日益紧张。周恩来致电项英转中央局，提出：必须“迅速结束东

方战斗，否则将失去剪除赣敌左翼良机。”

9月25日 周恩来再电项英转中央局，提出：东北军必须最大限度集中兵力，以最大机动求得胜利地结束东方战斗。

同日 在《斗争》第二十七期发表文章《献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指出：“不仅因为江西的党的组织是我们苏区党的组织中最强大与工作上最先进的一个，因而全苏区以及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都在热烈地注视着江西工作之成绩与经验，而且因为大会开幕时江西苏区所处的紧张的政治的环境更加重了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意义与重要性。”

10月2日 在9月底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

10月初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商议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赴瑞金谈判，临时中央政府派周恩来负责这次谈判工作，潘健行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进行会谈。

10月18日 在《斗争》第三十三期发表文章《答杨幼麟同志》。就杨幼麟提出的：革命形势的存在与大革命是否有分别及米夫同志做的文章对富农的策略是准许他可以买卖和租佃及雇用劳动，这与我们目前策略是否有不同的地方？做了回答。

10月26日 与十九路军代表正式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不久 福建人民政府派尹时中为代表，驻往瑞金。临时中央也派张云逸为代表驻福州进行联络。

11月20日 李济深等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权利宣言》，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党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国民

党政府为中心的法西斯系统。

当晚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1月24日 周恩来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朱德报告福建事变后的敌情，建议早做决定，红三、红五军团是否要参加侧击国民党入闽部队。

11月27日 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朱德报告闽赣方面敌情变化，提议组成新独立团，并令闽北独立团移往邵、光以北活动。令陈毅尽力迟阻敌之进扰。

12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指责福建人民政府除了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这一个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

12月12日 红三军团在黎川城东的团村与国民党12个团作战，由于按照博古、李德的部署，红一军团分兵作战，大部分国民党军得以逃脱。

12月16日 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对中革委下达给前方的命令屡次变更一事提出意见，再次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

12月20日 李德以统一前方指挥为名，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中革军委直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司令部撤回瑞金。

冬 出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并作了报告，核心是反对红军中以肖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

1934年 二十七岁

1月6日 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等将责任归咎于肖劲光，召开了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公审大会，肖劲光被判5年监禁，开除党籍、军籍。

1月15—18日 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形势部分包括：一，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对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二，中国正处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中，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影响到民族生命之一切形态。三，中国的经济状况是一幅崩溃、破产、失业、饥饿的悲惨图画，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更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极度的恶化起来。四，暴风雨般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正燃烧着。五，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标帜就是苏维埃运动之茁长、胜利与成功，它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雄大。六，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之破产，国民党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七，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愈益明显地显示了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八，尖锐的革命形势的存在要求党千百万倍的加强自己的革命群众工作。并根据形势发展的情况，提出了苏区党组织与国民党统治区中党的工作任务。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等。

最后，博古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总结》。指出：“民族危机的深刻已经牵动了民族生命的一切形态，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走上了新的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以强盗的侵略战争，在国民党的投降与不抵抗主义的帮助之下，占领东北四省及造成了自己在华北的实际统治”，“国民经济

的崩溃已经到了总的浩劫的程度”，“群众的革命斗争是暴风疾雨一般的开展着”，“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的最明显的标帜，即是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与成功”，五中全会后“决定党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千百倍的加强自己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之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发展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领导他们为着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出路而斗争。”

在会上，博古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的总负责人。

1月21—3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21日上午，博古出席了阅兵式。在这次大会上博古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月26日 福建事变失败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指责福建人民政府“聚集了一切中国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集团与派别”，他们的目的“是要阻止民众革命事业的发展，麻醉与欺骗群众，使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

2月3日 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博古、毛泽东等17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被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2月7—12日 出席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五中全会的报告。

2月 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4月上旬集中11个师向广昌进逼。

4月中旬 中共中央决定集中红军9个师的兵力保卫广昌。博古与李德亲赴前线指挥，博古为政治委员，李德实际上是司

令员。

4月21日 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军委主席朱德、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联合签署下达保卫广昌的命令。

4月28日 历时18日苦战的广昌战役，由于自己伤亡很大，无法固守，红军不得不撤离广昌。

当晚 博古打电话给彭德怀约他谈话，彭到达后，对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严肃批评，李德听不得不同意见，勃然大怒，谈话在不欢的气氛中结束。

4月30日 周恩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在广昌战役后，急需有把握胜利和极大机动。

5月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张闻天公开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博古听了进行反驳，结果不欢而散。

同月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已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精神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5月15日 在《红星报》第四十二期发表文章《我们一定要完成两万七千的数目》。指出：“五六七八这几个月，正处在五次战役决定胜负的关头，正是解决敌我间‘死亡或者胜利’的关头。动员最广大的工农群众上前线，对于争取这一决战的胜利，有决定的意义”。提出“在红五月扩大红军两万七千的战斗号召”，“这是最低限度的数目，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数目”。

5月24日 《红星报》发表博古在总政治部召集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连队的政治工作》。指出：“一，连指导员如何进行政治工作”，“主要是依靠党的组织来进行”，“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更要求连的指导员、支书以身作则，为全连的模范，以

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战斗员。”“二，目前战斗中，对部队基本的教育是什么？”“1 运用政治课、读报等方式，来坚强全体战士的胜利信心”，“2 防止与克服对于敌人的技术兵种——飞机大炮、毒瓦斯等的任何的恐惧现象”，“3 要使每一个战斗员”“都能懂得新的战术动作”，“我们亦应学会新的现代战术”，“政治工作应该适合于战斗的情况”。并分别叙述在不同情况下提出不同的口号与工作方式。

夏 准备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方面由博古负责。

6月9日 在《斗争》第六十三期发表文章《给×××同志》。同期还发表另一篇文章《追悼顾作霖同志》。指出：“要继承他的遗志，为粉碎五次‘围剿’，为着苏维埃，奋斗到底。他的生平有三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是党的路线最坚决的拥护者，是机会主义最无情的敌人；第二，对于党所给他的任务，无论如何困难，从来没有推却和躲避过；第三，是非常青年化的。”

7月8日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发表演说《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演说阐述了“党在反帝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口号和战略原则”，指出：“党的基本方针，即在于尽量发展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群众斗争，把全国的革命斗争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适时地配合起来，率领他们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的统治，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这就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

“我们党不仅有了上述的方针，并且定出了动员群众的三个基本口号：

一，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二，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胜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三，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彻底进行与领导最广大的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并达到完全的民族解放。”

还在演说中透露：“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迫近，我们的全体红色的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率领着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7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

7月23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布训令，要他们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

夏 王稼祥与博古联系要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工作，博古同意将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

7—8月间 博古找李维汉，要他通知各省委做好转移的准备工作，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

8月1日 出席瑞金大浦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典礼和授奖大会。

8月30日 在《红星报》发表文章《跌落的垃圾——孔荷宠》。

9月 决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并找各方征求

意见。

9月 总参谋长刘伯承主动找李德，建议改变当前的处境，“否则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听不得不同意见，反而训斥刘伯承，为这事两人争吵起来。博古知道后，立即找刘伯承谈话，要他尊重共产国际顾问的意见。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在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10月10日晚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博古编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

10月12日 博古和周恩来致电凯丰，命令他到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

10月18日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围西进，命令陈济棠、何健、白崇禧分别在粤赣、湘南、桂北进行阻击，命令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进行追击。

10月21日 红军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防线。

10月22日 博古与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命令他到红八军团，任中共中央代表。

11月2日 红军通过国民党第二道防线。

11月13-15日 红军通过国民党第三道防线，继续西进。

12月1日 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今日战斗关系重大，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红军将被敌层层切断，要不顾一切牺牲，保证红军全部通过封锁线。

渡过湘江后，红军损失惨重，长征出发时有86000多人，到目前只剩下3万多人。

12月12日 在湖南边境上的通道县城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博古开始同意李德坚持去湘西的主张，但多数人赞同毛泽东进军贵州的意见，博古最后同意进军贵州，但并没有放弃去湘西的计划。

12月16日 驻洪州司，博古约陈云、刘伯承见面，并告诉他们，红军改向贵州进军。

12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的会议，讨论红军今后行动的路线问题。博古认为：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已经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完全可以沿过去六军团的旧路入黔，然后东转进入湘西，实现与二、六军团的会师计划。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1935年 二十八岁

1月1日 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和李德仍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师。毛泽东再一次阐明他在黎明会议上的主张，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月15-17日 出席在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先做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主要分析了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强大等客观原因。周恩来做副报告，他认为红军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所致。毛泽东在会上不同意博古的分析，张闻天作了系统的发言，批评了博古的总结报告。王稼祥、朱德、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相继发言，用具体事例指出主要原因是军事上指挥错误。会议认为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

书记处应负更多的责任，但军事上领导的错误应当由博古、李德、周恩来3人负责，而博古、李德应负主要责任。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做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次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的军事指挥权，树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2月5日 红军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职务，在中央负总责，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5月12日 出席在会理城郊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行动方针。博古在会议上支持周恩来、朱德的看法，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

5月31日 渡过大渡河后，在兴隆坝宿营，召开了少数民族会议。博古在会上说：一，夷民尚未形成民族；二，须在阶级上侧重联络白夷。同时主张：一，民族自治；二，区域自治。

6月2日 由博古负责的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渡

过大渡河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央红军进到预定创建新根据地的地区，政治工作之中心为用一切办法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及战斗力，加强瓦解白军工作，把地方工作提到实现战略任务的高度。

6月10日 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后，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前进报》。博古写了《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刊登在创刊号上。文章分析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灭在大渡河的原因后，指出：“渡河的胜利是完成我们战略任务之一步，使我们更接近更便利于我们整个的战略任务，而要完成这整个的战略任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大块的苏区，须要我们更大的努力。”并对这一作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了详细的分析。

6月25日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博古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在两河口与张国焘相见，并参加了会师大会。晚上，在关帝庙举行晚宴欢迎张国焘。

6月26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的扩大会议，研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建立苏区的问题。

晚上，与张国焘一起交换对红军政治工作的意见，由于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6月28日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6月29日 出席中央常委会，会上决定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军委委员。并决定组成一个慰问团去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

在会上，博古报告了从北平无线电收听到的消息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向北平发动进攻，向北平永定门打了5炮，但不能断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像过去侵占东北一样攻占北平，但迟早是企图占领北平的，所以应当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红军中间。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宣言或通电；在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派人到白区工作，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

会后，博古将中央慰问四方面军的精神向李维汉作了传达，目的为了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增进友谊。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博古表示原则上没有问题。

7月18日 出席中央在黑水县芦花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研究如何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博古在会上表示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不能让步。会议最后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一人任副主任。

7月20日 徐向前率部到达芦花，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1枚五星金质勋章。

7月21—22日 中央继续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工作问题，博古在会上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张国焘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会上没有出现新的争论。

8月4—6日 在沙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博古在

会上表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我们也要找帮助。会上还通过了决议并决定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8月19日 出席中央常委会，会议研究分工问题。决定：政治部王稼祥，组织部张闻天兼，罗迈副之，宣传部博古，军事毛泽东，少数民族委员会凯丰。会议还决定：中央机关报《干部必读》由张闻天任主编，《斗争》由博古任主编。

8月20日 出席在毛儿盖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的计划报告。博古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29日 出席中央常委会，讨论宣传教育问题。会上决定：分配审查宣传材料，红军建设方面由王稼祥负责，党的建设方面由李维汉负责，战略战术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地方工作方面由博古负责，民族问题方面由凯丰负责。会上还决定组成宣传委员会由凯丰、杨尚昆、罗迈3人负责。

9月2日 出席在毛尔盖县巴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

9月8日 由于张国焘坚持反对北上方针，博古与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一起在周恩来居室开会，毛泽东草拟一份要张国焘北进的电文，除陈昌浩外，大家坚持北上的方案。

9月9日 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密电陈昌浩“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叶剑英得到密电后，亲自赶到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稳住陈昌浩后，立刻找到张闻天和博古商议，博古气愤地说：“谁

也没想到张国焘坏到这种程度。”由于情况紧急，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博古等一致认为再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没可能，而且会招致为严重的后果，所以果断作出决定，率领一、三军团立即北上。

9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红军开始出发，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张闻天和博古马上通知叶剑英赶快离开，叶剑英听从博古的劝告，立即离开，直奔俄界。

同日 中共中央在阿西向陈昌浩、徐向前发出指令，指出：“目前战略方针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8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的决定，将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9月11日 在俄界博古碰到了叶剑英，高兴地说：“老叶，好危险呀！你昨天走后不久，路上有4个带驳壳枪的到处找你”，“他们杀气腾腾地说：‘把他打死再说！’”叶剑英紧紧握住博古的手说：“谢谢你昨天提醒了我，是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9月12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的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报告今后行动的方针后，博古认为：与张国焘的分歧，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整个路线的分歧。

会议批准北上的决定，并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

的决定》。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组织部的工作。会议作出决定：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还对纵队的干部问题作出决议。

9月22日 出席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一次全军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明确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指定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

9月27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的常委会议，研究当前的斗争形势和今后的战略任务。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9月28日 为了贯彻中央这一新的战略部署，博古在《红星报》第三期上发表文章《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指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深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根源，他是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剧烈的矛盾所生长起来的。”“苏维埃运动在陕西长足发展的根源与基因，亦正与其他地区一样”还有其“局部的特殊因素”，即：一，长期的连续不断的灾荒，使农村经济完全破产；二，灾荒的结果，农民急剧的破产，土地加速度的集中；三，小军阀的统治与敌人武装力量比较的单薄；四，陕西党及其党员之英勇斗争。

同时指出“陕甘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及支队的任务。

10月5日 张国焘在卓木碉自立“中央”，并非法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

10月18日 出席中央常委会，讨论入陕作战方针问题。

10月19日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受到苏区军民热烈欢迎。

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到达陕北

苏区后的任务，会议还提出将保卫苏区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

10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会师，以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会议还确定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1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情况的汇报。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博古为办事处主席；成立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为办事处主任。会议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会合红十五军团，以粉碎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博古等人率中央机关到瓦窑堡。

以后成立在博古指导下的审查错误肃反5人常务委员会，负责审查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

1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陕甘特委范向真的汇报。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

11月7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向张闻天、博古等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情况和季米特洛夫所做报告，及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11月10日 博古等到达陕西省苏维埃所在地瓦窑堡，受到

陕北人民的热烈欢迎。

到了瓦窑堡后正式宣布西北办事处成立，并公布办事处主席博古及其他负责干部名单。后因工作需要又成立了外交部，部长由博古兼任。

下午 出席西北中央局会议，由郭洪涛报告陕北地区工作情况。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部队，“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11月16日 公开发布博古与林伯渠签署的第一号训令关于财政问题。

11月18日 出席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游击战争问题。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的肃反工作，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11月20日 出席政治局会议，讨论土地问题。

11月底 中央组织部召集一次平反大会，张闻天、博古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宣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为刘志丹等平了反，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

11月30日 中央西北中央局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

12月6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富农问题。

12月17--25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

问题的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始博古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一些问题想不通，经过大家讨论，统一了思想。

12月21日 在第二百四十五期《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博古的谈话《白区学生的反日斗争》。谈话指出：“此次平津沪粤各地十数万学生举行的壮烈的罢课示威游行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本土，蒋介石无耻卖国所激起的中国人民救国图存的爱国运动”，“苏维埃政府准备用一切方法给各地的爱国学生以精神的、物质的、实力的援助。”“使这一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唤起与组织全国各界同胞实行武装起来，组织学生义勇军及人民革命军等来进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1936年 二十九岁

1月2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形势下党的组织工作任务。

1月9日 博古、林伯渠、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彭德怀、杨尚昆：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的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下进行。

1月10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到山西作战的方针等问题。

1月17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等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在后方

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

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1月31日 与周恩来一起，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提出当前形势应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现在军事行动应该是巩固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

2月3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形势及策略问题的决议》。

同日 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周恩来、博古、邓发：“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请周速布置清涧封锁，免走漏消息。”

2月28日 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与中共中央谈判的密函来到瓦窑堡，受到博古的热烈欢迎，并详细听取了董健吾的汇报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张闻天。

3月1日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等并告周恩来、博古及刘志丹等，部署关上、水头胜利后的行动。

同日 毛泽东、彭德怀电周恩来、刘志丹等并告博古、李维汉等，通报敌军动态和红军争取打第二个胜仗的问题。

3月2日 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博古，要他和林伯渠、高福源、周继吾、程子华来石楼讨论外交、对日作战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

同日 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博古等，提出对蒋介石、张学良

的外交工作应分别进行。对张工作仍应经过王以哲；与蒋谈判，以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条件。

3月4日 收到毛泽东的回函，并转董健吾，提出谈判的意见。并要李克农将上述意见通报王以哲，并由王转达张学良。

同日 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博古、李维汉、林伯渠、张云逸，我军与王以哲军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业已订立，请通知陕甘省委、省苏、军区对富县、甘泉、延安、洛川等县，凡属王以哲军，务以友军相待。对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欢迎和招待。

3月5日 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陕甘各省负责人说明李克农与王以哲订立的口头协定，今日开始实行。

3月中旬 张子华与董健吾一起到达瓦窑堡，博古单独接见了张子华，听取张子华详细汇报了国民党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及陈立夫找共产党谈判的动向。

3月中旬 与周恩来来到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与毛泽东等见面，分别听取王世英、张子华的汇报。

3月20—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统一战线问题及战略方向问题。博古在23日做了发言。

3月27日 和周恩来、邓发、李克农离开石楼，途中检查中共延川、延长县委工作，并作社会调查，4月初回到瓦窑堡。

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会上介绍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情况，决定加强做好这两支部队的工作。会议还决定取消中央局。

4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介绍了东征以来

所取得的胜利。由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北上进攻苏区，会议作出了军事部署。

4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继续谈判，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

4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苏区财政问题。

4月20日 在《斗争》上发表文章《红军在山西》，指出：“伟大的东征，像疾雷闪电一样，震惊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群，使他们丧魂落魄，使他们胆战心惊，使他们张皇失措，使他们原形毕露。”中国工农红军“正抱着这样的坚决的信念而勇敢的、义无反顾地负担起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火车头和发动机的光荣历史的任务。对日作战的时机迫近了，伟大的日子快来临了，让我们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弟兄们紧紧的握手吧！”

4月24日 出席在瓦窑堡召开有二三千人参加的刘志丹同志追悼大会，博古在大会致悼词。

4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军事问题

4月29日 在《斗争》上发表文章《“协同剿共”还是一致抗日》，揭露所谓“协同剿共”的实质。文章指出：“防共剿共已经成为敌人向中华民族进攻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敌人想扑灭中华民族生命所寄托的中国共产党和在他领导下的人民红军！在这个旗帜下，敌人想最后地占领中国，奴役中国。在这个旗帜下，敌人想团集一切中国内部的汉奸卖国贼的内应力量和取得帝国主义世界之缄默。”

“每一个不甘心为亡国奴的人民，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要为民族留一息生机，要为中国民族的生存尽一点力。那么第一件事就应该反对‘防共’、‘剿共’。或者中日满联合剿共反俄，或者联共联俄反日讨逆。二者之间已不容我们再犹疑的时〔间〕和盘旋

的余地。”

5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陕甘问题及东北军问题。

5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陕南工作。

5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关系和我党的外交政策问题。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研究当前军事形势及人事安排等。

5月18日 在《斗争》上发表文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文章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掠夺和榨取愈来愈（愈）狠毒，愈来愈狰狞凶残，愈来愈肆无忌惮。”“汉奸卖国贼的投降出卖，愈益无耻，愈益卑鄙龌龊，愈益俯首听命。四年间断送了八百余万（平）方里土地”，而“另一方面，则伟大的千百万群众崛起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在几个月来汹涌澎湃的群众民族解放斗争的怒潮中，愈益明显地表示出：‘组织国内的统一战线去反对外来的侵略者’是其中心的最高的观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最普遍最广大的流传着”。

文章最后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健儿们，更勇敢些，更坚决些！起来，响应全国舆论一致呼号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苏维埃和红军准备欢迎我们民族英雄和战士，一共携手前进。”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富春的汇报。肯定了东征期间地方工作的成绩。

5月20日 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等，告诉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

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欢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

5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听取周恩来汇报争取东北军的情况，并于6月20日发布《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5月25日 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人，指出：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的时机北上。

5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研究军事行动问题。会议认为现在是全国大革命前的准备阶段，当前要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

6月5日 在《斗争》上发表文章《苏蒙协定和南京政府的抗议》。驳斥国民党南京政府对苏蒙协定的抗议，指出：“中国人民将坚决地为着实现中苏蒙互助协定的订立而奋斗，因为他能帮助和保障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和解放。”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研究西南事变（即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问题。会议决定中共的策略是：支持两广提出的北上抗日，反对蒋派兵南下；用召开救国会议来反对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实现西北大联合。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由于东北军分3路向瓦窑堡推进，会议决定中央撤离瓦窑堡，由周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军队抗击敌人的进攻。

6月19日 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提出二、四方面军宜出甘南不宜向夏洮地区，以免引起回汉的冲突。7月22日，再次致电，希望他们迅速出至甘南。

6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仅不妨碍你们抗日，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

6月 红军占领盐池、定边一带，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给二十八军宋时轮、宋任穷下达命令，一定要认真保护盐池。

7月1日 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电贺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7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土地政策问题。

同日 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致电宋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目前陕甘宁有150余团兵力在蒋命令压迫之下向我进攻，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用苏区人民以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

7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统战联络工作和上海党组织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王稼祥、李维汉、杨尚昆、张浩、吴亮平、博古、张闻天为委员，王稼祥负责。

同日 博古和林伯渠联名给二十八军转毛泽民，指出：“现时蒙汉合组公司不能实现，张司令（指张学良）亦一时不能出面”，所以“对于产销方面不应采取垄断式之国家公司”，“为此，必须利用定边之商人及商会，利用其经验及产业。”后来发现有人仍想组织垄断性的盐业公司，因此与林伯渠再电毛泽民，指出：这样做“目前无可能且不应该”。过去“均系失败之经验，应拒绝继续采用这种办法。”

7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

会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白区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派张浩去庆阳方面，负责西线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行动。

7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白区工作问题。

7月底 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斯诺来陕甘宁边区，与博古见了面。

8月2日 《红色中华报》发表《博古主席谈西南事件之教训》。指出：一，西南发动前后，始终没有提出彻底的、明确的政治纲领；二，没有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三，没有彻底的抗日行动；四，由于是地主、资产阶级集团领导。但他有其革命意义：一，它的性质是完全与民众的救亡阵线的原则相一致；二，这一行动给予日本侵略中国以有力的回答，更加推动了中国军队抗日，走上抗日的道路。

8月3日 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8月9日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致函张学良，建议立即配合红军，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

8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等问题，决定公开发表宣言，专门写一封信给蒋介石。

8月12日 张闻天、张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对今后战略方针作了初步的建议。

8月25日 出席中央会议，博古在会上作关于肃反斗争与肃反斗争路线的报告。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日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王明，从战略考虑“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希望苏联能提供飞机大炮。

同日 博古与林伯渠联名发出《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指示》。对省一级财政机构，收支范围及与县一级财政的关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8月30日 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一，迫蒋抗日，达到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二，联合东北军及西北其他各部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巩固、发展陕南苏区；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9月1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可能。我们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9月8日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

9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等，同意李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明日开始，第一次寄10本，以后一星期或10天寄1次。

9月14日 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你们应准备12月渡河占领宁夏。

9月15—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夺取宁夏问题。

9月21日 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等人，提出统一指挥是很必要的。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6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

9月24日 张浩、张闻天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电告任弼时：“中央内部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同日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等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表明内部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胡宗南部已进入西北，我们应集中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及其南北，给他们以相当打击。

9月26日 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致电任弼时、贺龙等：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之计划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

同日 张国焘、朱德等致电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红四方面军

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次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连续三次致电张国焘、朱德，指出：“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还指出：“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张国焘等致电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和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决仍按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宁）、静（宁）会合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部队）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28日 在《斗争》上发表文章《论民主共和国口号》第一部分“一年来日本侵略之变化及其现阶段”，指出：“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崛起，给了日寇的华北国阴谋以当头一棒”，“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的面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统一战线政策遭受了失败”，但是“寇深矣！中华民族热血的男女们！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只要我们伟大的民族能够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我们必然地能战胜日寇，必然地保存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求得民族的完全解放和独立！”

10月8日 在《斗争》上继续发表文章《论民主共和国口号》第二部分，“国民党的分化和动摇”，指出：“自满洲事变之后，国民党不是由于恐怖，而是出于自愿的，担任了为日寇侵略的清道夫的责任”，因而“日寇的侵略，为投降屈服政策所鼓励，愈益凶残，愈益贪得无厌，中国——首先是华北——直接处在行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命运的面前”，“在亡国灭种面前，国

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民族资产阶级之分化，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急剧的转变，工农群众反日斗争之高涨，所有这些，不能不反映于南京统治阶层之内部”，使“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内部的分化和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南京政府政策的动摇”，因此“我们要争取民族的力量一点一滴都汇合到抗日巨潮中来”，“扩大，扩大，更扩大，我们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阵容，加强，加强，更加强，我们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10月9日 博古与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博古向他介绍了第一个苏维埃建立的情况等问题。

10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工作。

10月14日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复电彭德怀，指出：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之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

10月15日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等，指出：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

10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

10月18日 在《斗争》上，继续发表文章《论民主共和国口号》第三部分，“民主共和国——当前的战斗口号”。指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从目前中国国内外的整个政治环境中产生起来的，是从目前时机的具体的特点中产生起来的，是从目前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中产生起来的，是从我们一年来为着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斗争的成功和错误的经验中产生起来。”因为“民主共和国的

口号是最能动员一切抗日和民主的力量去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防止中国人民遭受亡国奴的惨祸的口号。”

“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是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最有利的国家形势。”“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中国内部生活绝对必须的那些改革之彻底实现的总口号”，“自然，我们——共产主义者，当着提出民主共和国和普选的国会的口号时，我们十分明白的了解，它的历史的限制性，它的弱点和短处，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因此“而把它看在今天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时的有利的国家形式，看做实现真正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过度，看做为实行达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10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陕西省委汇报哥老会开山堂的情况。

1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青团工作。

11月8日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浩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因胡宗南等部北进，宁夏战役已无执行可能，并告以中央新的作战计划。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苏区红军面临“围剿”的形势。中共中央考虑到要利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所以同意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条件，但要坚持党的领导。

11月22日 中国文艺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博古在大会上致词，会议选举了丁玲、成仿吾等16人为干事。

12月初 在保安主持召开了红中社（红色中华社简称）工作会议，确定由廖承志负责国外电评部分，（翻译全部外电），向仲华负责国内报导，同时负责编辑《红色中华报》，李柱国负责中文译电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中社在西安成立分社，向西安各报社、各社会团体印发西安红军办事处抄收的红中社的新闻和党的文告、宣言，扩大舆论影响。

12月6日 在子丹城举行欢迎朱德、张国焘大会，博古在大会上讲了话。

12月13日 由于蒋介石来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张、杨向蒋苦谏无效，于12日凌晨，将蒋介石扣留，同时拘留了陈诚等高级官员，并向全国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

西安事变发生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上发言，认为：西安事变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共同心愿，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蒋介石被扣的机会在南京另立傀儡政府，以图掀起新的反共高潮，我们必须有所警惕，因此我们应积极争取国民党内的抗日分子，反对和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

并对张国焘的发言进行了批评，认为：西安事变是抗日的旗帜，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西安不应与南京采取对立形式，否则对抗日的大局是不利的。

会议肯定了这次事件的性质是进步性质，并且在政治上、军事上给张、杨以支持，同时考虑到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党的方针应该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会议决定：

- 一，电张学良，赞扬其行动。
- 二，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团飞赴西安。
- 三，派彭德怀等率军赴延安地区，并与友军密切联系。
- 四，周等到西安以前，驻西安联络处避免发表具体意见。
- 五，周等在西安作具体声明之前，应等候莫斯科的答复。

10月18日 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刻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承认红军、东北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全国的形势。会后发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12月22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等：我来此四日，中心在抓紧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巩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联合。建议中央对蒋过去误国政策，尤其最近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互消的计划，尽情宣布以影响全国发动。

12月23日 博古、叶剑英等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博古传达了中央最近研究的意见，并具体分了工。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团体工作，博古负责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工作。

12月24日 上午，博古在谢家华家中开会，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陕西省委。

与周恩来商议后，将谈判情况，打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同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

晚上，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

12月25日 博古与徐彬如一起到杨明轩家去做杨的工作，杨是博古的老师，一直谈了一个上午。下午与一些东北人士开会。

同日 蒋介石准备离开西安，周恩来与博古都认为蒋介石走前必须在一分政治文件表示他的态度，并且不同意张学良随蒋介石同去南京。但在当天下午3时左右，张学良不听劝告，没通知周、博，就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西安。

12月26日 由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以为和平局面已经形成，要求红军停止南下。因此，周恩来与博古电告毛泽东，我军驻地问题待张学良回来后再商量解决，目前可在原地驻守待命。中共中央下令要求红军不要越过泾水，不要打土豪。

12月29日 周恩来与博古一起研究西安和平解决后的国内形势，认为国内的政治生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内统一战线的局面已初步形成。当前抗日力量不断增强，中间派开始向左靠拢，亲日派受到了致命打击。研究后致电中央，建议采取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的左派，影响与吸收中间派的方针。而且党的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主导者。并恢复党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使各地零散的游击队成为农民运动的策源地。

12月30日 与杨虎城、何柱国商议红军驻地问题，杨、何认为目前红军主力暂驻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地待命，不要太逼近西兰公路的枸邑、淳化、耀县。周恩来表示，在非苏区不会侵犯原行政系统，不打土豪分田地。事后博古将会议情况电告毛泽东。

同日 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开庭审理。第二天宣布判处张学良10年徒刑。几天后国民政府宣布“特赦”，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面对蒋介石的压力，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经常昼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12月31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与杨虎城商谈中共中央迁移延安后红军驻地问题。指出：“中央十日内迁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进，但二马（马步芳、马步青）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

同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博古：请自12月12日起的整个西安《解放日报》、《申报》、天津《大公报》送来延安。

1937年 三十岁

1月1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南京内部斗争十分激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作最后挣扎，扣留了张学良，有进攻西安的危险。请立做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知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御防亲日派之进攻。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

同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注意张、杨部下右派之活动，注意你们的安全，注意与张、杨左派密切联系，准备万一的事变。”

1月2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向有利方面。”

1月5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南京报复派目前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把杨虎城、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硬一下，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应向张冲表示：

(甲)“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

同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博古：“向张冲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仍处于调人地位。”

1月6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乙)顾来则张、杨全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可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大当。”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西安报纸宣传中心，应在揭破亲日派汉奸制造内战阴谋上面。

1月7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要求野战军全部10日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后，应于12日前完成扩红、筹款等各项工作。并准备以主力出商、洛，控制陕豫鄂边境，留一部在渭北，从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平汉、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迫蒋就范。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占领高台、临泽，令其在该地暂停。因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望派飞机设法运送10万发。

1月8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解放社昨日广播过于尖锐，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

1月9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客观上徒利日本大损中国；（乙）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丙）撤兵组府请蒋另主持；（丁）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戊）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全力助蒋。

1月10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

1月 党中央由保安迁往延安后，为了便于中央指示各地的斗争，扩大陕甘宁边区对全国舆论的影响，博古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

1月16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甲）杨于即日通电就职。（乙）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丙）条件中主要者为：（一）张回陕，顾驻洛。（二）华县以西属张、杨军。（丁）携赴奉化以速为妙。

同日 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开三方会议，会议坚持和平方针，同时要联络川、桂、粤、晋、绥及南京抗日派，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共同指出改变国策，改组政府，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等事宜。会后周恩来、博古将会议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且建议中央电告津、沪转晋、绥、直、鲁、川、桂，向三中全会提出方案。同时报告中央东北军中少壮派坚决主战。态度十分强硬，但缺少具体办法，对军事又少了解。

1月18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甲）对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策动一个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应注意策动宁、绥、川、桂。（乙）南京宣传陕变即可告一段落，内战对蒋已处不利，和平解决趋势渐明显。杨、于、孙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

1月21日 周恩来和博古电告毛泽东、张闻天，今日阎锡山致电杨虎城主张接受甲案，并表示愿代向蒋介石斡旋，杨回电提出甘肃境内胡宗南部全部撤出，请南京发600万及预发3个月军饷，并派人来陕宣抚。

同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解决西安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会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的局面，则不能让步。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20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攻破，董振堂牺牲。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派部接应。

1月23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已于21日向东急进，10天到达黄河边。甲，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乙，于学忠能否策应；丙，至低清查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作战计划，并致电毛泽东。

1月25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指出：（甲）目前谈判要求在陕甘不多驻兵，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乙）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来说服，我们不宜说得过多；（丙）洛甫本日出生来西安。

1月27日 张闻天秘密抵达西安，与周恩来、博古共同商讨解决内战危机问题。

同日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甲）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主要从

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乙）全力说服左派撤兵；（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发生的新战争。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

当晚，东北军主战派为了不惜与南京一战，竟包围了中共代表团，要求红军帮助他们，否则就不是朋友。并得知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不少主和派和共产党员。博古赶到张闻天住处，报告了紧急情况，不久送走了张闻天。

1月28日 毛泽东连发两电致周恩来、博古并告诉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罗、宋所部可出平凉，西路军东进沙河堡，在该地周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请与王以哲交涉，罗、宋部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策应西路军。

1月30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的自信心，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奋斗。

同日 由于东北军少壮派坚决主战，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到三原镇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要求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会上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两个朋友坚持要打，多次解释无效，而且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形势，本来是不应该打的仗，但是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所以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

们一起打。

会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说明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

同日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任意失去张杨，同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和平。

当日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返回西安，将情况转告杨虎城：“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将军，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1月31日 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5人在王以哲家中开会研究和战问题，会上决定派代表李志刚去潼关谈判，并准备签字。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指出：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

2月2日晨 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枪杀东北军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甚至闯进中共代表所在地。博古与周恩来一起一方面积极做东北军及广大群众的工作，另一方面向中央请示应变的意见。

同日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乙）十五军团亦望周、博令其注意。”

2月3日 与周恩来一起，将西安情况电告彭德怀、任弼时，并建议请毛泽东下令，从4日起，各军团向预定地区转移。

同日 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代表团大部分人员撤到三原红军驻地。

2月1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并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在会上作《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会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

2月21日 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转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桂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粤活动。各方面均以巩固和平，促成抗战为目标。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和特区组织机构。会议决定博古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洪涛任组织部副部长；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张浩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长；李见珍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邓颖超参加工作。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博古在作结论时说，西安事变正如毛主席所说是暴风雨的突变。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

3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财政问题。

3月23—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31日通

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3月27日 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西路军情况万分紧急，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对两马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西路军过黄河西岸，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青年工作。

4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通知》。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

4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联盟问题。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在会上作了即将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

5月2—14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博古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在讨论博古报告时，大家认为“博古同志报告有很大发展，都是很好的。”

5月5日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复电周恩来，指出：“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向张、顾说明“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拒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5月8日 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就如何答复华北救国联合会关于召开各种力量代表会议的提议。

5月9日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复电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关系解决的步骤是：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四，我们实行军队改编，南京实行释放政治犯；五，目前为免除张、顾等疑虑，可由周发表一谈话。

5月23日 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提议：边区政府由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高岗、郭洪涛（或马明方）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张冲、杜斌丞组成；红军编为四个师，分别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师长。

5月25日 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提出同蒋介石谈判内容。

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复电周恩来，特区政府力争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九人；红军设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至少设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周工

作。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位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负责北方局工作。

6月22日 《解放》第七期发表了博古文章《国内时事杂谈》，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形势，指出：在全国人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气氛中，国民党政府在自己对日政策上不能不变换过去的屈辱让步的方针，改变到较强硬的政策上去，但这些步骤是十分不够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用尽一切军事的、经济的、政治阴谋的方法来攫取华北，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华北已经成为最迫切的任务。我们主张，动员我们民族的一切力量来保卫华北。在保卫华北的立场上，团结起我们民族每一分子的力量，把抗日军队和民众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大好河山千里沃野。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问题。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闽西南、鄂豫皖工作与国民党谈判问题。

7月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从延安飞抵西安。

7月5日 与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

7月7日 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飞抵上海。

夜 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国卢沟桥守军，二十九军奋起抵抗，这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

7月上旬 博古和周恩来、林伯渠一起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

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

7月13日 博古和周恩来、林伯渠一起，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

7月13日（或14日） 和周恩来、林伯渠到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7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平时不设指挥机关，只设政训处指挥，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机关。

与周恩来、林伯渠一起，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希望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谈判中，博古力争使陕西省的党组织合法化，最后蒋介石被迫不得不承认中共陕西省委。

7月21日 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电告张闻天、毛泽东：因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不管形势变化如何，应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7月25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红军各首长已集云阳讨论改编，现令他们等你们回来讨论决定。”

7月28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甲）请你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彭、林、贺、肖、刘、张、徐诸将意见告蒋鼎文以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副主任；（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劲光为副；（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7月底 与周恩来同赴云阳镇，出席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

7月31日 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中共应派人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并建议周恩来、叶剑英出席。

8月1日 张闻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红军作战，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

8月3日 与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并转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对华北联络局和河北各地联络局的工作作出安排。

同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并转告叶剑英：此次赴宁，需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8月4日 与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击抗战的意见》。

8月5日 毛泽东、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须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以及陕甘是我们惟一可靠的后方等问题。

同日 毛泽东、张闻天电复朱德、周恩来、博古等：“我们以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为有利。”

8月6日 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又回到西安。

8月9日 博古因事又重返延安。

8月18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它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我们的政策见中央给周、叶训令。此事关系重大，需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8月22—24日 参加在陕西洛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议程为（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等11人组成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8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8月31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周恩来宜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好八路军入山西后各事，即活动的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

9月1日 博古、叶剑英电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林伯渠，9月分八路军经费已补领32万元。

9月6日 博古率领齐光、康一民、吴志坚、李白等自西安乘火车抵南京。

9月初 博古到达南京后，立即与叶剑英、李克农以及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共同商议开展工作。

9月初 博古与叶剑英同刚被营救出狱的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交谈。

9月间 接到中共湘鄂赣省委来信，汇报他们与武汉行营进行谈判的情况，并说已达成协议。博古深感不安，他立即回信，重

申中共中央政策，并提醒省委注意防止国民党的阴谋活动。

9月7日 国民党司法行政部批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关于《临时处置监犯办法》，同意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人犯可以交保开释，但对判刑5年以上的政治犯仍准备编为输送队，送一战区服役。博古闻讯后，给军政部何应钦写信，要求将一些判刑较长的犯政治调往八路军“服役”。在博古的坚持下，国民党不得不将绝大部分判5年以上的政治犯释放出狱。

9月8日 博古、叶剑英找到了北平学委负责人蒋南翔，蒋南翔向他汇报了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情况。博古指示要他们先成立一个特别支部，以后在南京秘密学联的优秀分子中发展一批党员。

9月10日 博古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建议董必武在武汉建立一个公开的办事处，以便南京派出的中共秘密组织开展工作。

9月11日 博古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真心找党之人事未拒绝，且正在南京建立各地党的关系。”

9月间 根据博古的意见，成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委。

9月13日 博古、叶剑英电告毛泽东等，南京当局已批准领取大衣、皮帽3万件，每件9元五角，共发大洋28万5千元，日内可领下。棉衣3万件，毯子3万5千床，在太原领取。

9月中旬 博古又找了平津学生流亡团特支负责人李华进行谈话，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并指定李华为书记、方珂德等为委员，领导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党的组织。

9月 博古布置北平流亡学生中共党员杨学诚，成立中共武汉工委。

9月14日 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等，严肃批评了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中的错误，坚持国民党不得派一个人进游击队，特别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人右倾机会主义。”

并要求主持工作的郑位三要按上述原则办事。

9月中旬 一天晚上，博古找康泽商议宣言的修改问题，康泽态度十分骄横。为了坚持原则，博古与他进行了激烈争辩，最后只得各自将《宣言》稿拿回去，研究后再开会协商。

经请示中央，博古将《宣言》稿的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但保留了十大纲领的基本精神。康泽看后不得不表示同意，但在个别词句上又作文章，博古据理力争，双方坚持不下，只好把问题留在与蒋介石会谈后再说。双方分别在自己的《宣言》稿上签了字。

9月21日 博古、叶剑英在孔祥熙公馆同蒋介石直接会谈，经过争论，在博古与叶剑英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只好同意了《宣言》的发表。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宣告：“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同时还向全国人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奋斗之总目标。

同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指出：《宣言》发表后，目前主要谈判是发布共同纲领，解决边区问题和解放报在全国发行三件事。电报中强调了边区问题谈判作为重点！即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行政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不要国民党派人来任职；边区首长官不叫主任，边区机构设厅不设处；边区需包括廊县、洛川、淳化等14县在内；经费每月15万元，外加遣散费60万元；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内部事务。

根据中央的指示，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的谈判。

同日 博古、叶剑英会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谈

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名义在南方办《新华日报》，并附设周刊，邵力子表示同意。

9月23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的说话》中表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所举诸项，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

9月下旬 国共合作初步达成协议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谣言，说什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苏维埃政府改了名，共产党投降了”。对此，博古、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南京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澄清共产党投降的错误认识。严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抗日合作，并不是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原则。相反马列主义的原则，正是要求我们这样做。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但在抗日时可以合作，就是将来抗战胜利以后进行国家建设，也可以合作。

9月28日 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突然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博古与叶剑英考虑到中共中央对叶挺出山的过程不太了解，立即致电中央说明情况。中共中央为慎重起见，要求叶挺赴延安一趟共同商议有关问题。此后叶挺来办事处，与博古、叶剑英见了面。

根据中央精神，博古与叶剑英又多次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主要内容：（一）将“漳浦事件”中何鸣、吴金两部人枪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南方游击队由八路军节制；（三）叶挺需返延安到八路军总部谈一次话。最后，国民党不得不同意新四军隶属八路军建制及叶挺去延安一次。

9月下旬 接到项英从南昌来电，通报他与江西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情况，并要博古派人去江西取得联系。博古担心他由

于不了解中央政策，会受到国民党的欺骗，所以连发两电要项英来南京一趟。

9月29日 中共闽浙书记、闽浙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刘英派吴毓、龙跃去南京以便与中央取得联系。当他们到达南京时，博古热情地接待他们，并详细了解闽浙边斗争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了中央的政策。还亲自写了一封长信，请他们转给刘英。信中介绍了当前形势与党的方针政策，特别强调同国民党谈判必须坚持的五项原则：（一）游击区实行自主制度；（二）各部队不让国民党派一个人来；（三）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要求国民党给充足的时间，等中央派人来传达新政策；（四）要求国民党供给薪饷、冬服、军火；（五）重要领袖均务轻离部队。

9月下旬 《新华日报》筹备处开始工作。

9月30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南方游击队改编原则：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一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任何人来；集中五分之三为1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需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9月 博古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蒋介石同意我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

10月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博古、叶剑英等，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我们应采取措施保存这些支点。

项英在南昌做法很危险，要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

10月2日 毛泽东急电博古、叶剑英，再次强调：“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英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并要博、叶

“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

博古接电后，立即给项英、陈毅写了一封长信，介绍情况，转达中央意见，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队伍可以变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或其他名义，只受最高机关之节制。为保持军队的独立性及我党的绝对领导，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物资、军火与经济上的补充接济，各地队伍不脱离根据地，不要离开大后方，这是为得不受骗。

另派与项英相识的顾玉良赴赣送信，临走前博古又口头交代了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必须注意的四个问题，即：（一）负责人下山谈判可以进行，但部队绝不能下山；（二）要提高警惕，部队靠山驻扎，占取有利地形，如有来犯者，坚决击退，不要犹豫；（三）在谈判过程中，要努力扩大部队，筹集给养，不要放松；（四）谈判成功，部队给养得到政府供给后，就应停止继续以红军名义公开募饷，但扩大部队的工作应当继续。

10月3日 朱德、彭德怀致电博古、叶剑英并转呈何应钦，决定派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驻京办事处主任。

10月4日 博古、叶剑英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浙南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情况，以及对该部改编的原则意见。

同日 吴毓、龙跃2人要回闽浙边游击队根据地。博古再三嘱咐他们部队集中后不要下山成住在山边，防止国民党军突然袭击。

10月6日 博古与叶剑英、董必武一起商议组建湖北省委的问题，决定派陶铸、钱瑛去武汉与中央派去的郭述申共同组成湖北省工委。

10月上旬 与叶剑英、董必武一起研究鄂豫皖边区的工作，决定组建中共鄂豫皖特委，派郑位三任特委书记。

10月7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于9月25日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

10月8日 博古、叶剑英、董必武致电中央，提出对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的建议。

10月12日 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10月间 毛泽东派遣张爱萍等五位抗大的学生去上海参加江苏省委的筹建工作。张爱萍等到南京后，博古等向他们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介绍他们去上海找刘晓联系。

10月中 国民党同意原定边区公署主任改称行政长官，并打算由丁惟汾来担任，林伯渠为副行政长官。由于博古等坚决反对，国民党只得作了一些让步，提出在丁惟汾未到任之前由林伯渠代理。

10月13日 博古、叶剑英向中共中央转报项英关于改编游击队的情况。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叶剑英，指出：“需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叶剑英，指出：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仍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

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而应实行的具体部署。

10月15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转告博古、叶剑英表示：国民党同意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国民党不干涉内部人事；张鼎丞、刘英两部在闽粤边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作战，不移往他处；其他地区游击队待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承认错误后再谈判等条件下，叶挺可以指挥张、何两部。

10月18日 毛泽东致电博古等谈有关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

10月19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与何应钦商谈能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10月21日 博古与叶剑英、董必武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叶挺同意接受党的领导，并愿赴延安面陈，已得何应钦同意，并准备一二日起程赴延安。

同日 博古电告张闻天，现已组建了江苏、湖北两省委，浙江、广东、福建已派人去，南京已建立市委，现在准备建立皖、赣两省组织。

10月23日 项英与顾玉良一同回到南京，受到博古与叶剑英的热情接待，并向项英详细介绍了长征到达陕北等详细情况与当前中央的政策。

10月24日 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电告朱德、彭德怀：为领款顺利请电告南京，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克农为办事处主任，以后领取军需军械由李克农签署。

10月间 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

副书记兼工委书记，张爱萍任军委书记。不久博古又派刘顺元、刘宁一到上海参加江苏省委工作。博古为了加强外县工作，指示以江苏省委军委为主建立外县工作委员会，张爱萍为书记，吴仲超为副书记。

10月26日 博古、叶剑英致电中央，建议项英到中央后，似以留中央为妥；并请调邵式平赴闽、浙，张子意赴湘，罗梓铭赴赣。

10月30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等人，正式确定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集中五分之三改编为新四军，从此，新四军正式成立。

11月2日 毛泽东、张闻天电复林伯渠，并转周恩来、博古等：我们决坚持山西抗战，即使太原失守，日军也不能安枕，国民党各军也不得不和我军一道作战。不致轻易退回黄河以南。

11月9日 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致电博古、叶剑英：向国民党提出并力争解决边区的范围和目前急需的经费问题。

11月10日 博古、李克农致电周恩来等：办事处将八路军11月经费11万元及其他经费1.5万元由银行汇往西安。

11月11日 南京办事处向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拒绝希特勒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11月12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等谈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因此应重新分配党的与非党的干部。除一部分去战区，一部分环境较好的仍留下外，应以一部分去武汉。

11月15日 博古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国民党政府迁都四川已决定，并准备调四川的一个军拱卫首都南京。军委会移南昌，铁道、交通部移长沙，本日均已开始秘密移动。

11月 经博古同意，成立浙江临时工委，徐洁身任书记，张三扬、张崇文等任委员。

11月 派李世农去安徽组建中共皖中工委，李世农任书记，张恺帆、桂蓬任委员。

11月 派方毅去武汉，参加湖北工委工作。

11月中旬 博古与章汉夫离南京，经武汉，赴陕北。因战局紧张，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着手撤离的准备工作。

11月21日 叶剑英、李克农致电林伯渠、博古谈叶剑英、叶挺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

11月29日 王明、康生、陈云、曾山等一行10人，从莫斯科，途经新疆迪化到达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亲自到机场欢迎。

12月4日 叶剑英、李克农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进攻南京之敌已近句容，蒋已派四十八师增援前线；刘湘军部守南京，又调陈布雷、李仲公、张振球等先后回京，表示坚决守城；德大使奉希特勒命见蒋，提出妥协条件；蒋原拟11月30日左右离京，今见南京危急，坚决守城，乃是外交原因，不是军事原因；汪、孔、阎、张群等离京前包围蒋，劝蒋讲和。

12月9—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报告与洛川会议精神是不一致的。但受到与会相当一部分人员的赞同。但报告在会上没有形成决议。

13日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

议》及《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 25 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和秘书处成员。会议补选了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与蒋介石谈判。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工作。

12 月 10 日 和周恩来一起致电任弼时转叶剑英等，就发展江浙地区游击战争问题提出意见。

12 月 18 日 博古与周恩来、王明、邓颖超、孟庆树等人从延安来到武汉。

同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项英早日来汉口。

12 月 20 日 博古与周恩来、王明与陈立夫进行交谈，为与蒋介石谈判做好准备工作。

12 月 21 日晚 周恩来、王明、博古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周恩来提出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工业机关、军事工业部，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军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谋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并作了说明。

王明就当前抗战的局势，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国际活动情况与国际共运的某些提议做了说明。

博古主要谈了陕甘宁边区，联络参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

蒋介石表示：“所提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亦不过如此。”并表示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与你们共商。

这次会议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参加人员，中共方面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有陈立夫、康

泽、刘健群、张冲。

蒋介石还提出要留王明在武汉协助工作。

同日 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将会谈情况做了汇报。

12月23日 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并作了如下决定：

（一）鉴于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了方便工作，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代表团，对内叫长江局。

（二）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组成。

（三）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需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

（四）代表团（长江局）下设5个机构：1. 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2. 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3. 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4. 组织部博古兼部长。5. 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

中共中央对以上决定，虽未明确批示，但长江局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展开。

同日，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派新四军的干部来武汉。

12月24日 出席长江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这宣言是中共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由中共代表团起草的，后由王明执笔。

同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派人来武汉领导工人运动。

12月26日 与王明、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会上推选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

同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将两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讨论广东、广西工作问题，会议指出两广工作中心应移至广州，香港只能作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会议决定转变广东、广西党组织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决定派黄文杰赴两广视查工作，并决定在武汉开办短期职工运动训练班。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会议对三个游击区的全体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斗争给与肯定，并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项英负责对三个游击区的工作提出具体方案。

12月30日 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

同日 与王明、周恩来参加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请中共帮助促使苏联出兵援华的问题。同日，将会议情况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

同日 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两次致电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对当前敌情做出了判断，并向蒋介石提议：八路军3个师主力，1师开平凉，1师开固原，1师开条西。中央军派二师增防宁夏以南；新疆一部增防西安、肃州。

12月3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情况，同时提出：据消息，日寇经德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加入防共协定，肃清反日、反满运动；撤出中国某些城市、地区的军队；中、日、满经济合作，用日顾问；赔款。

1938年 三十一岁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去年12月的电示，长江局确定：要用一切力量和方法阻滞敌人对郑州、武汉的占领，争取3—6个月的时间以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因此，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草拟书面建议送蒋介石，提出目前抗战的危机及支持抗战局面的办法；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去发动与武装广大民众。会议还讨论了国民政府和军委会以下各部改组及国防参议会扩大的问题，决定一般采取赞助的立场，应与国民党开诚合作。

1月2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致电中共中央，请对长江局关于我党对国民党政府与军委各部队及国防参议会上扩大问题做出的四项决定，给予答复。

1月初 博古、凯丰、潘梓年、华西园在普海春西菜社与陆诒洽谈。欢迎陆诒来《新华日报》工作，并要陆诒担任编委兼采访科主任，并说：“我们通过党组织来领导报纸工作，具体地讲，党组织领导编辑委员会的工作，编委会是报社内部的集体领导机构，每个编委都是集体成员之一，不论党内同志或非党同志参加了报社工作，都是报社的主人翁。”“办报靠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集体努力，还要依靠广大读者和通讯员的支持，就是这一点与其他各报有所区别。”“要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当然大家都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不要紧，经验从实践中来，我们可以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们共产党人，对不懂的事就是要学习，在实践中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1月 博古去《新华日报》编辑部，对大家说：“人少不要紧，只要大家团结协作，把工作中的每个环节事先计划好，再把人力

组织好，我们仍然可以打胜仗的。

他还规定一条，只要是报社工作的同志，不论是总编辑、经理、社长、编辑和校对，凡是在外边参加会议或其他社会活动，都有为报纸采访并写消息的义务。

1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讨论分析了河南、湖南两省的工作。会议确定河南以“武装保卫湖南”为总的政治任务，以准备发动湖南抗日游击战争为总的工作方针。同时指出湖南党的任务是建议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发展党的力量，动员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去开展农村中的群众运动。

1月9日 出席为《新华日报》出版，在普海春餐馆举行的招待会。

1月11日 武汉《新华日报》正式出刊。

同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告以蒋介石要以陈诚为政治部长，并要周恩来担任副部长，请中央考虑具体意见。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讨论湖北党的工作和长江中央局的妇女工作。会议肯定了中共湖北省临委的工作，并要求省临委制定出最近的工作计划交长江中央局。会议还确定要注意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并争取大多数妇女团体的赞助，以建立全国妇女工作的总机关。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林凯关于鄂豫边区工作的报告。决定河南省委须以鄂豫边区为中心发展工作，中共鄂豫边区特委要加强对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领导。会议还决定第八团队行动由长江中央局参谋处指挥，开出作战时由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

1月1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要求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来，否则将坐失时机，许多工作开展不起来。

1月16日 项英关于新四军整编及东南地方工作情况给王明、周恩来、博古来信并转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1月17日 国民党中的反共分子纠集数十名歹徒闯进《新华日报》社营业部和印刷厂，捣毁了营业什物和排字设备，企图使《新华日报》停刊。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会议，作出《新华日报》馆被捣问题的决议。指出：日寇正加紧地利用其走狗、汉奸进行挑拨国共两党合作，《新华日报》馆事件，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决议要求蒋介石设法制止，同时要求国民党武汉党政军当局，采取有效方法，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南方情况及洛阳会议的报告和罗世农关于四川工作的报告。会议认为四川已成为国统区最后的根据地，我党要用最大力量去布置工作，特别是要进行公开的与下层群众联络的活动。

1月2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交涉关于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政府组织等情况。

同日 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周恩来可以担任国防政治部副部长职务。

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听取郑位三等关于鄂豫皖边区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边区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加紧培养干部，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工作，尽可能在最近期间集中队

伍训练并参加抗战，同时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保障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及训练干部工作的开展。

1月23日 出席两党关系委员会，康泽、刘健群在会上宣扬“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还“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

同日 中央书记处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就边区问题，设法争取增款、增地，丁（惟汾）正林（伯渠）副可以，但不须派人。

同日 出席汉口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

1月24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两党委员会会议情况，并提议以八路军在敌后争取新的、较大的胜利，新四军迅速出动抗日前线，并在长江南北创造新的军事力量来进行回击。

1月28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向全国发出通电一事提出意见：八路军在华北驻区应该遵守政治局过去形式上维持原有政权形态，实际上政权在民众手上的原则。这次采取造成既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对全国统战工作将造成不良影响。

2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会议，决定在武汉开展为陕北“抗大”、“鲁艺”、“陕北”的招生工作。会议还讨论了东南分局和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工作问题。

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研究国民党中有人拟取消国民党、共产党，另成立新党。决定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国民党企图限制信仰自由，并提议成立民族革命联盟以巩固统一战线。

2月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最近时局发生了许多严重问题，提议在2月20日

前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

2月8日 在《解放》第三十期上发表文章《抗战形势与抗战前途》，分析了中国民族自卫战争进行了五个月的情况，指出：“这次抗战以其规模之大，动员之众，战线之长来说，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不仅如此，而且它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上的重要的转变关键”，并分析了抗战初期失利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后指出：“敌不足畏，国际的形势不必忧，一城一地之失不足惧，只要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坚固团结，长期艰苦的抗战，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

2月10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汇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的情况。蒋表示：一，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二，对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三，对一党政权不赞成；四，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及他个人；五，对边区，借口各县主席、各县长并存，有拖延意；六，对前方增米金5万元即批准；七，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并综合蒋意即一，对一党思想仍旧；二，对八路军态度尚好；三，对边区想拖延。

2月13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才能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党的力量。

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1个军区，下设4个军分区，建议由彭雪枫领导这个军区的军事工作。

会议还通过了博古关于党的工作重新区分问题的报告，决定准备向下列四个方向布置工作及分散人员：一，准备在武汉不守时，转移一部分人员到高敬亭处，建立长江、黄河间的党的统……

领导；二，加强东南分局对东南地区党的工作的领导；三，建立广东、广西及闽南的党的统一领导；四，准备建立川黔地区党的统一的领导，并预先派人布置重庆的机关。

同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当前形势与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问题。

2月16日 项英关于江西政局、各方情形及工作写信给王明、周恩来、博古，汇报工作。

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行动问题，确定应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

2月21日 武汉召开追悼在空战中牺牲的烈士大会。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亲送挽联。

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听取了项英的工作报告，肯定了东南分局的工作成绩，指出新四军应继续集中部队争取开到前方。会议还决定由王明、周恩来代表长江中央局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

同日 毛泽东、任弼时电朱德、彭德怀等及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关于敌情判断、战略计划及八路军将来之行动。

3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听取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报告，会议希望第四支队迅速成为政治、军事上的有力部队，争取及早参加抗日战争。会议还决定由王明起草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建议。

3月13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会议的议程、报告及要求。会议还讨论了长江局领导成员分工的问题，决定博古负责指导组织部、妇委、招生委员会。

同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

3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青年工作问题。决定由凯丰、宋一平、王明负责，起草青年工作决议案，同时改组长江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由宋一平负责。

3月20日 由于武汉各家报纸刊登了傅斯年、张西曼等九位知名人士在《武汉日报》发表的公开信，明确表示陈独秀不是汉奸、匪徒。《新华日报》从3月17—20日连续发表4篇短评，中心思想是陈独秀是否是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来判断。为了结束对陈独秀问题的争论，《新华日报》刊登了博古、叶剑英、董必武3人的联名信，信中说明他们与陈独秀、罗汉会面的情况，“藉明真相，而杜招摇”。

3月24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发出《关于恢复党组织关系的通知》和《关于转移党组织关系的通知》，对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党员和失掉关系的党员恢复党组织关系的具体办法。

4月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为即将回国的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纯举行告别宴会，并合影留念。

4月3日 张国焘以参加祭祀黄陵活动为名，于4日祭陵完毕后，未与中央请假搭车5日来到西安，7日又乘胡宗南专列11日到达武汉。周恩来、王明、博古派李克农等接他来八路军办事处，张执意不肯，住进了饭店。

当日晚 周恩来与博古亲自赶到饭店对他进行教育，劝他回党工作。

4月1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就张国焘抵汉情况致电毛泽东。

4月1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再给张国焘一电致电王明、

周恩来、博古、凯丰，劝他回党工作。

4月16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教育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人负责，对红四方面军干部应表示亲密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事做好准备。同时，不要因为张国焘叛逃增加红一军、红四军的隔阂，而应当更加团结。

同日 周恩来陪同张国焘去见蒋介石，在回办事处的途中张乘机逃跑，找回回来后，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一起找他谈话，张国焘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很糟，愿意暂时脱离政治生涯。

4月17日 鉴于张国焘的表现，向中央汇报处理办法。根据中央指示，向张国焘提出三条意见。谈话1小时后，张竟跑到太平洋饭店与特务一起逃跑，并留信给王、周、博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我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

4月18日 鉴于张国焘的叛变行为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向全党进行解释，应利用这一机会对全党进行教育，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同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关于我方参政员名单的提议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潘汉年及陕北一同志（郭洪涛或高岗），如能争取党的领导公开，则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刘少奇也可加入。

4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向全党说明张国焘叛逃经过。22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在武汉《新华日报》正式发表。

4月2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指出：今天全国

政治总方向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的基本精神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我们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

同日 出席在普海春餐厅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法国名记者色斯的茶话会。

4月28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书写了一封《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4月29日在《新华日报》发表，就国共两党关系和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作了回答。

4—5月间 长江中央局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博古是委员之一。

5月1日 在《解放》第三十六期上发表文章《国际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从理论上驳斥所谓国际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不相兼容的错误观点，指出：“不论从国际主义的立场来看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民族主义也好，不论从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立场来看国际主义也好，两者都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者，如果他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就不能不同时是最坚决的最彻底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同样：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他是真正的革命民族主义者，他就不能不同情和赞助国际主义。”

正是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之一致，是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的花冈石般坚固的基石之一。正是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之士敏土一般的结合，是我们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5月3日 博古、周恩来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前往医院慰问5名负伤的空军战士。

5月6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关于三青团问题致电中

共中央书记处，认为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蒋曾数次催周（恩来）与二陈（立夫）谈商办法，蒋的中心思想虽然欲借此溶化我们及孤立我们，但因无我方赞助亦不愿冒昧组织。我们对三青团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并提出具体建议。

5月12日 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三青团问题电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指出：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是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而我们的目的是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并对其宗旨、会员、组织同国民党商谈做了具体指示。

5月13日 毛泽东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对《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速决战的论调认为不妥，指出：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不应当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分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电请蒋介石不惜任何牺牲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8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给××先生的一封信，5月2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信中指出：“最近长沙、常德、广州、武汉、重庆各地发现所谓《从共产党机关报〈解放周刊〉看共产党的真面目》的传单，是企图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国共合作关系，客观上只能有利于日寇，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不足以损坏共产党的威信，而且恰恰激起人民对他自己的不良反感。“此信的发表，给这种挑衅行为以打击。

5月22日 《解放周刊》发表毛泽东、朱德、王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项英、陈云等人致美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

5月23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就三青团问题，再次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认为三青团肯定是国民党的团体，既不能成为改造国民党之各阶级联盟，也不能成为统一青年运动的团体，并提出具体建议。

5月25日 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在江春餐厅举行茶会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博古在会上题了词。

同日 陆诒从徐州突围归来，博古拉着他的手热情地说：“徐州失守，我们许多人为你担心……现在你回来了，真叫人高兴！这次报社将要请一次客，慰劳慰劳，以鼓士气。”还掏出一支手枪塞到陆的手中，诚恳地说：“这支自卫手枪，是一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同志送给我的，我现在特转赠给你，一个战地记者应当携带自卫武器，否则你在战场上，如果和部队失去联系，遭遇到敌人，那你怎么办？”

5月27日 《新华日报》社在普海春西菜社举行宴会，遍邀徐州突围的战地记者。博古致词说：“在这次徐州突围途中，同业之间能互相支持，共同协作，充分表现团结战斗的精神，这是极可珍贵的。希望今后继续发扬这种精神，进一步加强团结，作好抗战新闻工作。”

6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三青团问题再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指出：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但不是唯一的，我们还有经过它改造国民党的目的。你们可以向蒋提出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最高要求：即各党派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集中制的青年群众的独立的团体，以试探蒋的真正意图，然后再做具体决定。

6月4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提出拟向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增编3个师，共6个师。

6月5日 武汉三镇民众公祭张效贤、杨慎贤、陈怀民、孙金舰4位空军烈士，博古等送的挽帐是“捐躯报国”四个大字。

6月7日 根据叶挺建议，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共设7名委员。

6月9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等6人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

6月12日 安徽工委书记彭定康关于安徽工作的情况，向博古送去了书面报告。

6月15日 《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王明、周恩来、博古三人合写的文章《我们对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文章说：“问题的中心，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保卫武汉的一般可能条件，而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怎样实际上去进行保卫武汉的工作。”文章强调：“保卫武汉不应该看成只是武汉卫戍区的防御问题，而应该看成是与整个第三期抗战中的军事和政治有关问题，是整个第三期抗战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心环节。”

“对于武汉及武汉卫戍区需要采取的主要办法”，文章提出了：对于第三期抗战的军事问题底一般意见；我们对第三期抗战的军事问题底一般意见；我们对第三期抗战的政治问题底意见；我们对第三期抗战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生活底意见以及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枢纽等5个部分，这篇文章以后印成了小册子公开发行。

6月6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自4月中旬开始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商议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名单，本日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将中共参政员定为7名，即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6月17日正式公布。

6月1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徐州失守后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应是保卫大武汉。

夏 博古与周恩来、叶剑英分别会见了国际友人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莱特，还有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人，感谢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7月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关于我党担任参政起草工作的情况致电向毛泽东等进行汇报。

7月3日 彭定康关于安徽党的组织和武装工作等情况再给博古送来一分报告。

7月5日 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等7人名义，在汉口《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正式决定我们七人接受政府聘请加入国民参政会……特共同发表如左之申明”，“国民参政会之召开，虽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虽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目前我们认为最紧急而待于迅速提出方案以求解决的，大约有下列各问题：怎样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来保卫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及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

同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电复项英，指出东南分局主要工作区域应放在赣北、赣南等处，仍应注意秘密工作。

7月6—15日 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同日 收到张闻天、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毛泽东

联名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电，说明中共中央保卫武汉的方针：重在发动群众，军事侧重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之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7月7日 博古应美国合众社之请，写了一篇短文《抗战一年》，同时也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文章指出：“从卢沟桥的炮声激动了中国的军民，投袂奋起，以无比地英勇与空前的团结，抵抗日本法西斯军阀残暴的侵略。”“久为分崩离析所苦的国家，今天亲密的团结了起来像一座新的长城！久为人们诟病的军队，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独立，每个人都像斯巴达的勇士，四万万五千万都一条心地英勇奋起，睡着的东方巨人醒了！我们有如此广大的河山，如此众多的人民，如此雄伟的民族觉醒，足够使我们获得一个光辉的胜利。”

同日 博古等6名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致函武汉各界，提出将本月所得参政员薪金，除已在参政会内委托秘书处献百元外，其余全部献作救助抗战军人家属及受伤将士和被难同胞之用。

7月13日 博古、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关于建军实施方案的提案。

7月21日 博古等6名中共参政员在《新华日报》发表献金启事，将8月分参政员薪金除交党费外，全部捐助抗大、陕公、党校及延安托儿所。

7月23日 国际反轰炸大会在巴黎举行，博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世界和平力量团结起来！中止法西斯野兽的屠杀！》文中指出：“我们受难的中国人民谨向着国际的人类同情深致感谢，感谢英美比瑞的各大城市市长的抗议广州轰炸。”“但是轰炸是仍然继续着，每天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至少有10个城市和

繁盛市镇被残酷地轰炸着，每天有数千的无辜的人民被屠杀，几百几千幢房屋被毁灭。”“我们目击这种惨状时，我们亦一样的不再存有任何思想，除掉加强我们的团结，更坚决抗战到底以外。只有扑灭法西斯的野兽，才能根除这惨无人道的兽行，只有积极的斗争，只有全国军民积极的抗战行动，才能消灭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野蛮屠杀。”

7月23—24日 博古与斯诺进行了长谈，回答了斯诺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的问题。

8月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建议中央抽调200名军事干部到武汉。

同日 在武汉青年会大礼堂举行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共产党员陈柱天同志追悼会。博古送了花圈。陈柱天同志是7月12日，遭敌机轰炸而牺牲的。

8月3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会见蒋介石，对国共两党团结、保卫武汉问题交换了意见。蒋介石答应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湖北省代表团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及动员委员会。

8月4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关于武汉危急我工作人员撤退情况致电毛泽东等。日军已越过黄梅，武汉更危急。我们的机关干部及同志已开始有计划地分批逐渐退西安、宝庆、竹沟、鄂豫皖区、重庆等。各地领导同志及必要工作人员在迫不得已时再撤退。

8月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请求中央派王稼祥速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如王万一不能来时，情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内容迅速电告。

8月10日 毛泽东、张闻天等复电说：王稼祥不能来汉，决议原文尚未到达，为有充分时间研究共产国际指示内容起见，请

长江局负责人在政治局会议前早几天回延安。

同日 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刘少奇、王稼祥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后，召集青委扩大会议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

8月22日 由于收到新四军叶挺与项英不和而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后，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叶挺表示挽留。

8月29日 为了出席在延安举行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开会。

9月10日前后 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一行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9月14—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会议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重新调整各地组织机构，设立四个中央分局。

9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主要文件。会议宣布撤销长江局，成立了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和西南局。

本月 在周恩来、博古的鼓励和帮助下，由艾黎、斯诺等筹建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一个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组织。不久，工业合作协会在西北、西南建立办事处，在香港成立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马尼拉、纽约、伦敦成立推进委员会。

10月2日 新四军建军一周年，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叶挺表示祝贺。指出：出师抗战一年以来，我全体同志本民族先锋之立场、模范艰苦之作风，与日本强盗作战于江南、皖北，大

旗飘处，日寇胆寒，胜利频传，全国鼓舞。尚希我新四军全体同志加倍努力杀敌，取得更大之胜利与更多之胜利与更大之成功。

10月初 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王明、林伯渠、吴玉章速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以免为亲日派所乘。

10月17-18日 博古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及前途》，指出：“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战争的过程中产生起来，发展起来，巩固起来，为着抗战，在抗战中产生发展和巩固，抗战中的合作造成抗战后的坚固团结，这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个显著的优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个优点就在：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共同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反抗异族之侵入国土，……因之，共同进行民族自卫战争，便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基础。”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既不是国会内推翻或拥护内阁之一时的党派联合，亦不是以推翻现成政府为目的的在野党派之结合，而是国内一切抗日党派及一切抗日力量之大团结用以战胜侵入国土之日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四个特点是它的包括着全民族一切无例外的生动力量之广泛性。”“这些特殊的优点的综合表明了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生命力。”

他在文章中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遇到的困难及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包容性，因而在其内部参加者之间的阶级的距离相当地悬殊，”必然会“产生某些意见的分歧，这便造成了某些内部摩擦之根源，这便防害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做为它的基础

的合作的国共两党，在过去不仅有过一度合作的经历，而且有着十年的互相敌对的历史，……它使得两党中的一部分人还保存着过去的猜忌、歧视、戒备及不信任。”他指出“克服这个困难，必须：第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各政党，相互尊重其他党派之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和不应该有限制参加统一战线的党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目的。”

最后，他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这篇文章以后印成小册子发行。

10月19日 武汉文化人士，在青年会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等出席了纪念会。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重要讲话。

10月20日 出席在武汉青年会召开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纪念鲁迅先生，因为（一）他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二）他是坚决的民族革命者；（三）他是劳苦群众的同情者；而且（四）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热忱的赞助者。”

他指出：“在抗战中阿Q精神在我们民族中日渐死去，而鲁迅精神正在茁壮发展，这种精神引导我们在艰难的战斗中取得最后胜利。”

10月21日 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进逼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中共驻武汉代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总馆决定西迁重庆。

本月 博古与邓颖超为出席28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从武汉乘飞机飞抵重庆。

10月28日—11月6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毛泽东请假外，博古等6位中共参政员参加了大会。

在会上博古等6人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提案指出：“在抗战严重困难的关头，我国一切抗战的各党派各阶层，更加深精诚团结，为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而亲密友爱地共同奋斗。凡妨碍和危害抗战各党派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受全民族的谴责和纠正。”“日寇汉奸所散布的一切关于我国妥协投降的造谣，是对我全中华民族的莫大污蔑。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

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董必武、吴玉章等25人被选为驻会委员会委员。

11月11日 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1月26日 出席《新华日报》在重庆举行的招待会。

12月4日 毛泽东电告博古、叶剑英、朱德、杨尚昆、林伯渠等，要八路军总部和驻重庆办事处、驻西安办事处，迅速设法打消蒋介石调高桂滋部队到陕北的企图。

12月5日 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悼念在武汉撤退时，遭日机轰炸壮烈牺牲的同志。

同日 在重庆举行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追悼会，博古与毛泽东、王明、吴玉章、董必武等人送了挽联。

12月12日 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吴玉章等，拒绝了我党提出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成为一个大党，蒋介石还表示，跨党办法绝对不行，他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

委，由李群杰任书记。

1月16日 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南方局分工情况。

甲、南方局已遵电示开会，组织分工为博古组织，凯丰宣传及党报，周统战，叶联络，克坚报馆，邓妇女，缺青年请派南翔来。

乙、南方局设重庆、桂林两办事处，联络赣粤桂及香港运输。

丙、川省委暂分川康及川东两特委。川东特委务请派一书记来。沪工作极便利发展，刘晓以不调为宜。

丁、鄂北及鄂西北仍请划入中原局，归豫西省委管理，鄂省委则管鄂西、湘西北。

戊、粤湘均开扩大会，博、叶分别出席，博今飞桂转粤。

己、江西区分待与东南局商定再议。

同日 博古离开重庆赴广东出席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

1月 广东省委召开了第四次执委扩大会，会议由省委书记张文彬主持，博古代表南方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广东省委前一段的工作情况，认真分析了广州沦陷后国内面临的新形势。会议认为党应该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及时由城市转向农村及全省范围发展，在战争中积极培养发展党的力量，使之成为华南地区抗日的主要力量。

2月12—21日 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6名参政员在会上提出《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并促使大会通过了《抗战既定方针，必须坚持到底》的决议。会议选出博古、董必武等为休会期间驻会委员。

2月下旬 南方局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由邓颖超任书记。不久，湖南省委成立，高文华为书记。

春 南方局青年委员会成立，由蒋南翔任书记。

春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

3月 西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蒋南翔，委员何礼、杨述、郑代庀、袁汝鏞等。

4月7日 出席南方局会议，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瑛向南方局报告了武汉失守5个多月后，党在湖北地区工作的情况。从整顿健全党的组织，建立武装力量，发展群众组织，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

4月10日 博古、董必武在重庆会见李济深，就两党军队摩擦问题提出4点要求：（一）鹿仲麟应辞职，河北省主席从朱德、彭德怀中择一兼任；（二）八路军应照三军五师及直属队编制给饷；（三）游击队的饷由国民政府发给；（四）与我军摩擦之部队应调开，如果将来反攻增兵时，亦宜调与我军关系较好之部队前往。

4月 在重庆机房街70号和红岩嘴13号，举办了党员训练班，集训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主要内容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当前形势与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包括组织建设、宣传工作和秘密工作等）。分别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邓颖超、蒋南翔、黄文杰等同志专门为学员讲课。与此同时，南方局也要求各省特委分别在各地举办党员训练班，培训各地党员。这些训练班的开办，为提高干部、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提高国统区党的工作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为投入隐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4月底 鄂湘西区党委在宜昌成立，由钱瑛任书记。

5月4—5日 博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五四运动》一文，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反对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雄伟的革命斗争；是中国人民大规模地采用了新的革命斗争的方法与组织形式；是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倡导与先进战士的作用；是一个自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四运动的爆发指明新的革命在中国已经成熟，社会阶级力量正在重新结合，无产阶级开始觉醒。同时指出五四运动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伸延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而进行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功绩首先在于民主主义的提倡；其次在于科学精神之提倡；第三就是文学的革新，白话文的提倡；第四在于向旧礼教旧制度旧习惯勇敢地宣战；第五就在这个运动中已经发现了社会主义斗争的新思潮。

5月18日 南方局发出了秘密工作的决定，其中就领导干部及党员所必须遵守的事项及领导机关的文件处理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5月 出席南方局会议，刘晓、刘长胜汇报工作。南方局对上海工作提出要注意开展统战工作，要利用合法方式，争取得到社会合法地位；要大力培养工人领袖，加强党对工会党组织的领导；要保护和发展已经建立的武装力量。

6月18日 周恩来回延安报告工作，7月10日应邀去中央党校作报告，因为延河水涨，周只好骑马前往，途中周恩来所骑的马突然受惊，把周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卫生处的几个大夫赶来，做了简易包扎。由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治疗。8月27日周离延安去苏联，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

6月23日 刘晓致电南方局并中共中央，报告上海党组织隐

蔽干部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等十多条工作要点。

6月29日 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指出：“鉴于日寇对我抗战营垒的分化政策，汪精卫卖国贼及其仍然混在抗战队伍中的信徒的反共阴谋，以及防止我们活动的通令及其放任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放肆进攻等等”，为“避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的反共阴谋的打击，以利抗战建国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起见，南方局认为必须立即坚决改变我们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现在各地党的组织应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秘密）的形式，及与此相应的工作方法。”“最近时期中组织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巩固和改造党的组织上面。”

7月7日 博古在《新华日报》特刊发表文章《抗战二周年纪念献词》，文章指出：“伟大的民族神圣抗战，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使日本帝国主义遭遇着日益增长的困难与危机”，“劝降乃是其最狠毒的手段，为达到劝降的目的，一方面利用国际法西斯轴心投降妥协的反动力量”，“另一方面，利用中国民族败类汪精卫之流，来破坏人心，破坏抗战，出卖祖国”，“今天中途妥协的危险仍然严重地威胁着国人”，“只有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企图和阴谋，只有坚固的民族团结，才能达到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

7月 经南方局同意，广西省工委撤销，建立桂林、南宁、梧州三个特别支部。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

8月4—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工作路线、陕甘宁边区等问题。

8月18—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在会议上作《南方工作》报告，对南方工作的条件，南方党的状况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说明。

8月21—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张鼎丞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局的工作报告。

8月22—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与博古的报告。

8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对周恩来及博古的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恩来、博古等的报告都有很多新经验，和政治局6月决议在原则上是相同的，我都同意。”他还对南方局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作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他从六个方面指出南方局所取得的成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发展了党的组织；（三）推进了战争动员；（四）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始了农工运动；（六）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

同时也指出了南方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一）党不够巩固；（二）深入群众工作不够；（三）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这是南方局的严重任务。

9月1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会见了正在重庆访问的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双方就（一）中国抗战情形；（二）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三）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的情形；（四）苏德协定与对欧洲和远东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9月4日 下午2时，尼赫鲁又特约王明、博古进行会谈，双方就（一）印度民族在此次欧战中间采取的态度问题；（二）中印

两大民族共同求解放问题；（三）加强中印两大民族联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同日 4时博古陪同尼赫鲁，在红岩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参加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茶会，宾主双方都发表了讲话。

9月8日 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发出《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9月9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9月9日 回答记者就第二次参政会召开时的感想时指出：“在目前这个严重时期，我们所应特别注意的：第一要打击一切妥协动摇的错误倾向；第二要研究抗战15个多月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并且要进而实践我们所有宝贵的教训，纠正我们所不应该犯的的错误；第三就是各党各派应该怎样更加紧密地团结的问题。”

9月9—18日 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除毛泽东请假外，博古等6位中共参政员都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上，博古等提出《加强敌后游击活动以粉碎敌寇以战养战之阴谋》的提案。提案指出：“年来，敌人在军事上倾其主力于扫荡敌后之游击区域，在政治上力图建立其殖民地之统治，在经济上夺取关盐税收，倾销商品，发行伪钞，掠取资源，实行所谓以战养战政策。自汪逆精卫叛变以后，更助敌为虐，欺骗沦陷区域之同胞为敌寇以华制华政策作虎伥，因此与敌争取沦陷区，粉碎敌人以战养战阴谋，是我胜敌寇的重要关键。”提案着重强调：“对敌后游击运动务必加强，务必真正实现‘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之口号，以粉碎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同时提出了七点具体的建议。

9月12日 博古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这次参政会议的情况。

同日 毛泽东、博古等7名中共参政员致函为反对汪精卫派

汉奸而举行罢工的香港工人，向他们表示慰问，并捐助 350 元。

10月6日 王明、博古、董必武等 8 人写文章《哀悼吴志坚同志》刊载在当日《新华日报》上。

同日 举行了吴志坚同志追悼会，博古在会上报告了吴志坚同志的事绩。

10月9日 博古在重庆又见到老朋友斯诺，他们就目前国际形势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10月 出席川东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川东党立即转入巩固党的工作，着手审查干部，把公开和秘密工作分开，切实改变工作作风。

10月 贵州省工委接到南方局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党的指示，立即停止发展党员，开始审查干部。

10月 闽西南潮梅特委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立即整顿党的队伍，撤退已暴露的干部，从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上都实行向秘密工作转变。

10月19日 出席重庆文化界发起的“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

10月 出席川东特区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严格将公开和秘密工作分开，立即着手审查干部，切实改变工作作风。

11月7日 出席苏联大使馆举行的茶会，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节。

11月24日 中共参政员毛泽东、博古等协同全国各界同胞、各党、各派进步人士，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促成国民政府实施宪政，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

11月30日 宪政促进会筹委会在重庆巴蜀小学举行首次会议，到会 50 多人，会议推举孔庚、张申府、董必武、博古、刘清

扬等 25 人组成常委会，下设秘书处及宣传、联络、研究三个委员会。

11 月 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第五次执委会议，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的精神，面对国民党反共逆流，决定以巩固党的组织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还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密措施，以及“实行组织的转变，群众工作的转变和严密党组织”等方针和斗争策略。还决定加强琼崖、东江两地区的武装力量。

1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就关于国民大会问题指示南方局：关于国民大会代表产生的临时折中办法，我们可以表示不拒绝商量，但我党代表至少应占全数的四分之一。

12 月 21 日 为了庆祝斯大林 60 寿辰，《新华日报》发表尤琴著，博古译《马列主义哲学不可估价底贡献》一文。（原文刊自《真理报》1939 年 9 月 10 日）

1940 年 三十三岁

1 月 10 日 由于胡宗南部队侵占了边区几个县，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指示要以严正的态度向国民党提出：中共边区应为 23 个县，在这 23 个县内，中共和八路军有权治理；并委任朱德为冀察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八路军扩充至 3 个军 9 个师，共 20 万人；新四军应为 3 个师 5 万人。

1 月 11 日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目前先解决边区与扩军问题，边区坚持要 23 个县、边区主席由林伯渠担任，名称定为“陕甘宁边区”。扩军及其他问题照前电办理。

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博古、叶剑英同国民党方面几次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立场，谈判没有收获。

博古、叶剑英及时将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

1月11日 《新华日报》发表博古的代社论《祝新华二周年》。社论指出：“祝贺这个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的鼓励前进的号角。”“新华日报在这两年中却正是我们民族自卫战争怒潮中生长和发育起来的，分尝着民族的苦难和喜悦，而成了它的指标和里程碑。首先是我们民族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放松这个年青而有力的民族号角。‘新升隆’被反复轰炸，……五三、五四的轰炸，新华发行部被炸，而编辑部亦在危险中，但是它没有一分钟停止自己的活动，在重庆继续出刊的《新华日报》以顽强坚挺的姿态答复着敌人的暴行，纪念我们死难的同志。”“这就以行动告诉了人们的敌人，《新华日报》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代言人，它正是和它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一样，绝不是威武所能屈的，绝不是横暴所能慑的，它对威武和横暴是不甘逆来顺受的，它将以英勇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回答。”“因为《新华日报》所拥护的是真理和正义的事业，这个事业最终是必然会胜利的。”社论最后号召：“战斗吧！我们年青的民族抗战的号角，吹起你雄壮奋发的前进战歌，激动我们全民族的男女老幼之勇敢地战斗，战胜我们民族的死敌日本强盗和建立起光明灿烂的新中华。”

同日出席《新华日报》在化龙桥报馆举行创刊两周年纪念会。

1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南方局：中央已通过南汉宸写给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的复函，提出六点意见。南方局以此六条精神向高崇民及其他东总负责人做解释。南方局根据中央精神，做了安排。

1月2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南方局，指示在重庆加强翻印和发行延安出版的党报党刊，应采取过去白色恐怖之下的一切经

验和手段进行散发。南方局经研究后立继组织力量将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共产党人》等报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印成单本小册子，进行散发。

1月27日 在南方局支持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动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

1月 恢复建立中共重庆市委。

2月9日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现在同国民党谈判重点是全面停止摩擦的问题。

2月10日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不同意国民党在谈判中提出的4个县换我区4个县。

2月 湖南省委召开会议，讨论秘密工作问题，制订秘密工作条例。同时决定紧缩领导机关。

2月27日 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在《新华日报》发表《悼于鸣同志》一文。悼念《新华日报》外勤记者郭于鸣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3月14日 国民党顽固派军、警、特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并嫁祸共产党。国民党当局乘机查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分销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郭秉彝、朱亚凡、洪希宗等10多人。事件发生后，叶剑英、潘梓年立即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潘梓年并去成都交涉。南方局以成都市委名义发表《成都抢米事件告成都及四川同胞书》，揭露了抢米事件的全部经过。指出“此系奸人、匪徒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暴行，其目的在于破坏团结抗战，为压迫共产党和抗日救亡进步分子，为准备投降分子分裂制造口实。”

经过反复斗争，国民党反动当局被迫同意《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恢复营业，却拒绝释放被捕人员。

南方局及时采取措施，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的同时，紧急撤退已暴露人员。

3月15日 川康特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抢米事件”，并作出决定，立即通知成都地下党全部戒严，保护党的组织和秘密文件，暂停会议，实行个别接头，紧缩机关，撤销和转移干部，并向南方局报告事件详细经过。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国共两关系的报告，他说：半年来两党关系总的情况是日益恶化、尖锐化，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主要问题是反汪精卫和反共产党，南方局主张至少要派董必武出席，以影响中间力量。会议通过由博古、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4人出席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还决定，滕代远调前方工作，由王若飞继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3月 考虑到成都时局恶化，决定改组川康特委，将比较暴露的干部撤回延安。由程子健等组成新的川康特委，程子健任书记。

3月 南方局决定撤销贵州省工委，建立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邓止戈任书记。

3月31日 中共中央关于成都事件致电南方局：

重庆：

(甲)3月14日成都事件，明显地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分裂的有计划阴谋之一部分，应该引起整个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

(乙)除成都市委发表宣言外，必须动员广大社会舆论及四川地方有关方面，广泛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

(丙)必须立即将成都、重庆及其他地方之已暴露或可能已被反共分子注意之党的干部和党员调动和隐蔽，以避免破获。

(丁)立即严令成都、重庆等地各级党部，将一切秘密文件焚

毁，成都方面与世文直接联系之特委同志及其他同志，必须暂时隐蔽至安全区域，并尽量减少活动。

4月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成都事件经过，再电南方局：“成都事件的发生，华中顽固分子对新四军大规模进攻”，“袭我兵站，杀我人员，劫我资财，并节节向我逼进。”

“中央军九十军李文部，蒋介石批准特务机关在六个月内逮捕所有暴露之共产党的计划，所以一切都说明时局正处在严重关头。”“必须利用每个发生的反共阴谋事件，在党内外作广泛深入的教育和动员，以提高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戒心，以暴露、孤立和打击反共投降分子。在国民党及敌伪政权统治下的党的组织，必须立即根据保存干部积蓄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关，调整和隐蔽干部，焚毁秘密文件，准备被捕口供，”“以避免损失，而为此原因即损失一部分工作，亦须决心去作。”

博古根据中央两次指示的精神，在南方局作了安排。

4月1—10日 国民党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除毛泽东请假外，博古等6名中共参政员都参加了会议。

4月7日 李克农致电南方局并中央，就广州当局和地方绅士筹组中间集团一事，请中央和南方局给予指示。并建议派入进入其内部，争取他成为倾向我党的中间集团。

5月10日 周恩来病愈回国，由延安返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工作。

5月31日 周恩来到达重庆。

6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决定指出：今后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学生运动的基本方针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工作重心由校外的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南方局青委坚决贯彻中共中

央这一方针，使青年工作以适应目前急剧发展的形势。

6月5日 出席南方局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召开的干部会，周恩来回国后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与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作了报告。

6月 决定将广东省委划为粤北和粤南省委。李大林任粤北省委书记，梁广任粤南省委书记。

6月15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关于新四军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后，周恩来强调要实行针锋相对的方针，要保护军队，在沦陷区要发展党员。

6月16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钱瑛关于鄂湘西的工作报告，董必武在会上总结。会议决定鄂湘西成立两个特委，由西南工委领导。

6月17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周恩来对新四军工作，作了总结发言。

6月22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李克农关于桂林办事处的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总结时指出，办事处不要搞公开活动，奉公守法，无声无息，各部加紧训练通讯、交通人员。

6月26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听取廖承志关于香港及南洋工作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香港及南洋工作的重要性及已取得的成绩，建议中央成立华侨工作委员会。

6、7月间 与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同叶挺、袁国平、饶漱石谈话，明确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是在长江以北，今后有关新四军的谈判都在重庆进行，并由周恩来负责。

7月1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

7月2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听取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关于川东工作情况的报告。

7月6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周恩来就川东工作作总结发言。

7月10日 参加南方局研究讨论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严重局势，并决定加强重庆至延安的交通工作。

7月19日 出席南方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问题。指出：当前投降危机是空前的，困难也是空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扩大统一战线和加紧巩固党的组织。

8月2日 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新华日报》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是德意日、英法美和苏联三个阵线的斗争，所以应该与中间派报纸某些正确观点采取统一战线的态度，不采取对立的态度，以便更有利的打击投降派。

8月3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对国民党统治区内公务人员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级党委必须注意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层各级行政机构公务员之地位，这对于党和革命都是有严重的作用和意义的。

8、9月间 孔原遵照南方局指示，到重庆巴县木洞镇建立中共西南工委，孔原任书记。但很快被特务发现，南方局立即通知孔原等撤回红岩嘴。

9月8日 出席南方局会议，会议听取高文华汇报湖南工作情况。周恩来在总结时强调地方党的工作要和全国形势结合起来，争取时局的好转，但要准备向坏的方向发展，地方党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党组织的任务仍是巩固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

9月14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听取了《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关于《新华日报》社工作的汇报。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敌后城市工作，中央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进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周恩来总负责，康生副之，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有专门人员负责进行研究工作，并搜集、培养、派遣到敌后工作之干部。根据这一精神，南方局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主任。

同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钱瑛在会上汇报了鄂西工作的情况，最后周恩来指出，鄂西应派干部埋藏在农村工作，特别是江汉之间，北靠武当，南靠巴山，由归、宜昌向北，无论如何应派干部去埋藏。

9月27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刘晓关于上海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上海应改变工作作风，建立巩固的组织基础。并决定刘晓10月初回沪，继续领导上海工作。

9、10月间 南方局将一部分省委、特委负责人调回重庆，由周恩来、博古等南方局领导分别进行谈话，讨论如何进行审干及改变领导方式问题。

10月4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南方局内部工作，确定各部委人员组成及负责人。会上确定：南方局机关分别设立组织、宣传、社会3个部及国际问题研究室、叶剑英工作组、南洋工作、敌后工作、秘书处共10个部门。

组织部博古任部长，石磊（曹瑛）秘书，工作人员3人；宣传部凯丰为部长，许涤新秘书，有工作人员3人；统委董必武为书记，叶剑英副书记，王梓木秘书，委员6人；下设军政、党派、社会、妇女、青年5个组，妇委邓颖超书记，青委蒋南翔书记；文委凯丰书记，周恩来副书记，徐冰秘书，委员5人；国际问题研

究室由博古领导，章汉夫具体负责；叶剑英组叶剑英负责；南洋工作组博古负责；敌后工作周恩来负责；社会部部长博古，吴克坚、李涛为委员，李涛兼秘书；秘书组童小鹏任秘书。22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报告了南方局各部门人事安排。

10月6、9日 出席南方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时局、军事自卫、干部疏散及闽粤赣工作问题。会议还确定办事处缩小，工作分散，西南工委转移等问题。

10月16日 南方局致电中央，报告省、特委的人事安排和工作布置。报告重点说明各地工作已开始转变、工作重点在深入社会和肃清内奸。

10月中旬蒋介石下令，秘密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准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也密谋逮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的办法。

10月18日 与周恩来一起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的密令，同时建议董必武暂缓来渝。

10月28日 南方局致电党中央，就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形势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人员撤退问题作紧急报告。报告说高文华回湘，钱瑛去蓉，贵州党地下组织又被破坏，工作暂停。

同日 中央指示要加强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和敌后大城市的电台工作。

南方局接到通知后，进行了新的部署，进行技术培训，严格机密工作纪律，并抽调技术较强的同志到一些地方上加强工作，所以南方局领导下的电台很少被破坏。

10月29日 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准备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各地办事处问题，提出后方党转入地方，公开反击国民党反共宣传等几项对策。

10月31日 周恩来、博古与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邹韬奋、张申府等民主党派人士讨论当前局势，并听取他们对国内情况的意见。

10月 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福建西南、香港等地区地下党的工作。

同日 听取了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和中共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的汇报，与他们一起研究了当前形势和今后工作。

11月1日 周恩来两次致电中央、毛泽东，告知重庆各方大多希望我党采取缓和缓转的政策，千万不要造成国共分裂，并提出南方局对目前危机的几点看法。

电报说：南方局建议中央考虑下列办法：（一）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公开答复何应钦、白崇禧并转蒋介石，要求解决悬案。并表示在充分保障扩军、弹饷之下，可将新四军调至江北。使能延缓一两个月时间，以便做应付事变的布置。（二）一切照旧，准备打了再说。但也需要先电何、白，说明不能移动之苦衷。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指出：“对何、白‘皓电’则尚须迟几天拟复，因‘皓电’是哀的美敦书，我们的态度须恰当，并无置之不理之说。”“根本问题是此次决裂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上与军事上同时进攻。

同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发出《关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指示》。南方局积极地执行这一指示，使南方局统战工作得到广泛的开展。

11月2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

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会议，讨论你东日（一日）来电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让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须看一看日苏谈判与美国大选后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

同日 博古与周恩来研究中央的指示后，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东电刚到，根据中央判断，决策即定，我们即遵照电示，向一切紧张布置。惟既准备决裂，即需顾及外间疏散隐蔽需时，中央宣言及回何、白复电，均请缓发，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避免的袭击，同时我们并争取最后可能。先派博古、凯丰乘飞机到兰州转延安，一切如何，请立复。”

同日 得悉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被捕，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地致电慰问。

11月3日 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甲）冬酉电悉，所见甚是，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乙）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缓发，待时机成熟时发，并先得你的同意。复何、白电，亦推至十号左右，惟此电内容决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遵照中央的指示，博古和凯丰返回延安。

1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在会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南方工作的报告。

1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当前

形势后，提出：共产党打破反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政策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局部战斗，针锋相对。”

1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

12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12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1年 三十四岁

1月18日 由于新四军奉命北移，在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血战7昼夜，除2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人员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此，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1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皖南事变提出十二条善后处理办法。

2月15日 国民政府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博古等7人再次被聘为参政员。他们接到通知后，联名打电报给参政会秘书处表示，因皖南事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因而拒绝参加会议以示抗议，并提出十二条要求：（一）制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日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五）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战士；（七）撤退华中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教；（十二）逮捕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等项，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采纳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特此通知，敬

希鉴察！

3月1日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致毛泽东等7参政员鱼电，以“本会为国民参政机关，于法于理，自不能对任何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条件，以为本会造成不良之先例”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等7人的来电。

3月8日 毛泽东、博古等7名参政员再次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指出：“惟独本届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尤以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突变，其对国内团结有创巨痛深之影响。”“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泽东等接受政府之聘请，为团结抗战也，皖南事变以来，加于国共之间之恶痕实甚深重，苛恶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

3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由博古负责。

5月 博古见到了丁玲，希望她到《解放日报》来办副刊，并鼓励她要克服困难，丁玲同意了博古的意见，14日搬上了清凉山。

5月14日 召开《解放日报》第一次编辑部会议，参加有博古、杨松、丁玲、张映吾等。总编辑杨松报告了办报计划后，博古指出党报工作者对党报重要性要有认识，我们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以党的立场来分析认识世界，这是方向。办好报纸，首先应随时注意敌、我、友的态度。其次应该注意与群众的联系，反映群众的生活情形，因为党中央是运用党报来组织群众、团结群众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在政治上把握马列主义立场，以此来分析事变的演化；其次我们要有充分的国际国内知识。我们不管是写

社论、通讯或文艺作品，都是一样要注意我们的立场。

我们办报，写文章要能引起广大人民的关注，有兴趣来看，必须在文字上特别注意。文字要生动，要让读者不感到枯燥无味，消息、通讯不能公式化，既可以写得无一人要看，也可以写得人人非看不可。他还要求15日试刊一日，16日一定要正式出版。

5月15日 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一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宣达。

5月16日 《解放日报》正式出版，上面除有毛泽东写的报头外，还刊登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创刊所写的发刊词。这时，新华社由杨家岭迁至清凉山，由博古为首的编委会统一领导。

5月25日 中央发出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指示规定“各地方报纸以下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

5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关于时局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对外宣传工作由博古负责。

5月28日 《解放日报》发表博古写的社论《谣言与烟幕》，指出：“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政党，它手中握着正义和真理之旗，不害怕公开和坦白的向着广大群众宣布自己的政纲、目的，表明自己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行动的方向，进行公开和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他们用不着玩阴谋、耍手段、造谣言之类下流无耻的办法，因为他们有自信，真理是在他们方面的。”“而那些政治流氓们，因为要维护其违反真理和正义的私利，而自知他们主张、纲领、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所

以不敢堂堂正正的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谋，耍手段、造谣之类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6月23日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进攻，博古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指出：“德国法西斯蒂——这种罪恶行为必然将得到其应得的惩处，这种自掘墓坟的疯狂举动将永远埋葬掉法西斯制度。”“我们深信，为正义、为自由、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苏联，必然能完全粉碎纳粹暴徒的狂妄的冒险，胜利是苏联的。”

6月25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而斗争》提出：“动员全世界的一切力量在反对法西斯奴役的口号下，让我们来替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虐政唱他的葬曲吧！”

7月4日 中宣部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指出：“政治报纸需设立健全的通讯社和无线电收发报机关，特别注意延安新华社的广播。”

7月22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苏德大战第一个月》，指出：“决定胜负的战争，不在希特勒所希望的开端，而在希特勒用来决战的力量被消耗以后，……列宁说得好：谁笑得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9月10日—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为全党开展整风进行准备。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领导的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

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流毒，并且提出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

博古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过去许多党的决议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9月14日 《解放日报》已办了4个月，报纸由对开半张两个版改为对开一张四个版。

9月18日 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电唁《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员张季鸾逝世。

11月11日 主持《解放日报》编辑部会议，讨论学习和贯彻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提高编辑部工作效率。博古在会上说：今后应注意什么呢？每天能按时出报就是最大的成绩，但不能满足现状，应有更高的要求。因此要进行调查研究，既要研究自己的业务工作，更要研究世界大事，注重分析，注意世界的政治动向。

我们的工作要从点滴做起，不怕麻烦，还应丢掉教条主义的东西，从客观事实出发来研究问题。为此，我们要收集材料，不能靠现成的陈旧的东西，应用点滴的研究充实自己，用辩证方法研究问题。

11月15日 出席编委会，研究参加边区参议会的记者工作中犯错误的问题。博古指出：我们的新闻记者要有党性。今天大家还年青，要好好锻炼。要别人看得起，靠自己去争取，拿工作成绩去争取。

11月下旬 博古找吴文焘谈话，告诉他向仲华要调动工作，向所担任的新华通讯社社长职务，中央决定由博古兼任，吴任副社长主持日常工作。看到吴有畏难情绪，博古鼓励他下决心克服困难与大家一道，努力使新华社成为解放区的新闻总汇，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12月8日 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9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同日 国民政府对日、德、意三国宣战。

1942年 三十五岁

1月 师哲对《解放日报》版面有意见，写信给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公布了师哲的信，博古震动很大。

1月13日 出席编辑部会议，杨松报告国内外形势以及1941年10—12月报纸的检查情况和问题。博古指出，今天我来说说如何写文章。写文章，第一步，要有丰富的材料；第二步要对客观事物从各方面加以认识，找出客观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但不能是材料堆积，不做研究和分析，若明若暗。写文章有三个阶段，1. 收集材料；2. 搭架子；3. 充实内容。

2月8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重要演说。

2月9日 出席编委会，为向仲华调走作鉴定。

2月10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出

版局召集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党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最后残余施以挞伐。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过去《红色中华》是以苏区建设为中心，《新华日报》受了限制。他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根据会议的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

会议还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材料。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党八股的死刑》。

2月13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宣传工作上的新阵容》。

2月17日 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党务广播问题的通知》指出，“除公开材料由新华社负责（由博古同志负责）外，党内材料由办公厅负责。”

3月8日 毛泽东给《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

3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博古提出的

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八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国内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毛泽东还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报社的同志要学习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

3月13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报社组织分工，并宣布社论委员会名单：林哲、叶剑英、王稼祥、凯丰、任弼时、胡乔木、陆定一、康生、贾拓夫、彭真。还决定舒群去文艺栏工作，廖冰去通讯科。

3月16日 出席编委会，研究决定报纸各版人事变动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

3月17日 博古在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主动检查了《解放日报》办报10个月来的主要缺点，即：贯彻党性和群众性不够，联系实际不够，缺乏党报应有的战斗性，并且提出了今后办报的方针。

3月 为了加强《解放日报》记者采访与通讯员工作，报社编委会决定在边区各专区陆续设立通讯处，并派出特派记者。

3月31日 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及作家座谈会，征求对《解放日报》的意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博古在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批评。

4月1日 《解放日报》改版后，在头版刊出《致读者》的社论，指出：什么是党报，第一贯彻坚强的党性。第二密切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第三洋溢着战斗性。第四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指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开展，具体的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在分析了报纸存在的问题后指出：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最后指出：“没有办得很好的报纸，则健全的坚强的党和国家的建设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广大的读者的赞助和鞭策，则报纸要办得好，是不能设想的”。

4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诽谤的态度。

4月3日 陆定一接办《解放日报》《学习》副刊。

4月4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报纸改版后的问题。博古指出：报纸改版尚未彻底，有的标题不当，反映群众确乎不够。当然有些客观困难，但要贯彻反映群众的方针。

5月15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领导与检查。博古指出：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是由两个东西合起来的。一是在1934年苏共十七次大会上的讲话；二是1937年论党的工作缺点。在这里面关于什么是领导讲了三方面，这就是出主意、用人与总结经验。这三方面都强调了与群众联系。

报纸联系群众不仅是几个编辑，主要是联系读者，所以在做

决定时必须仔细，要有具体的措施。这样在检查时才会看出决定、指示的正确与否。

检查一要定期；二不能把事与人分开，因为事是由人做的。其次，还要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但不要流于机械与敷衍。

关于如何打破上下隔膜，中间有思想上的不一致，看法上不同，经验有多有少，生活环境也有差别。另外领导者有臭架子，下面仇视上司的残余仍然存在。消除上下隔膜，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5月29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新华社工作。博古指出：新华社工作有了改进，人员安心工作，建立了校对制度，但是做为真正的通讯社，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发稿系统和通讯网，指导分社也不够。现在应向正规方面努力，要统一指导敌后各分社工作。

广播科工作值得研究，主要对象还是供给敌后，我们的广播要有充实的政治内容，文字与口头要严格划分。

6月1日 在编辑部讲话：根据四月一日社论来检查报纸工作。一，党性；二，群众性；三，战斗性；四，组织性。从以上这些方面来检查我们的报纸，改版后比前有了进步。但总的来说还是弱的，如反映群众的报导、互相配合，有计划地进行、组织自动性都还比较弱。

6月20日 出席编委会议，博古指出：宣传方面不是宣传坏的，而是要发扬好的，影响坏的。

7月24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通讯部工作。

7月31日 出席编委会，继续上次会议。博古指出：怎样反对党八股，建设新的文风是个重要问题，因此要在各方面创造新的风格。

党报的历史虽短，经验有限，可以吸收外国资产阶级报纸的

经验，但我们办报与他们有原则的区别。同时不能机械地搬用苏联的东西，要自己创造经验。这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新闻通讯写作不只是解决组织问题，而且要研究怎样写，写什么内容，对于这个问题，同志们应看看列宁对我们报纸性质的论述。

怎样写好呢？第一，要熟悉全面及各个侧面的历史发展及现状；第二，材料要有取舍，只写一个侧面，有开始，有结尾；第三，要明确写给什么人看；第四，用自己的意思来写，不用别人说过的，不写别人写过的；第五，要写得快，迅速反映，有新闻性。

8月4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

8月15日 博古在《解放日报》编委会上宣布，由陆定一接替杨松总编辑的工作，余光生副总编辑。杨松同志因病离任。

8月27日 出席编委会，陆定一报告他与博古参加西北局会议经过。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向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要作很大努力。会议决定委托博古、陆定一协同王稼祥、陈正人起草党报工作条例与报馆管理规则，交中央讨论。

9月5日 出席编委会议，博古在会上传达党中央决定：报纸自四月改版以来，有很大进步。但有些问题事先未与中央取得联系，今后应建立审稿制度。并承担了责任，在编委会上作了检查：

一，关于印度问题、七七宣言等社论，主要应由我和光生同志负责，不必对下面叫喊，如果违背我们意志则当别论。凡责任不明的，须先责备自己。党报未完全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主要是指我，对于其他同志则是鼓励与教育。我们报纸的每条消息，每个字句都是代表党的，每个字都不能闹独立性。二，我们的国际新闻很马虎，这一点要着重指出。三，讨论在学习小组内进行。四，制度必须建立，各部门自己先起草。

9月7日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同日 《解放日报》第二版发表了穆青、张铁夫写的文章《人们在谈论着赵占魁》。8日又报道了农具厂号召学习工人赵占魁的消息。11日又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13日刊登了文章《赵占魁同志》。29日刊载了《恭喜赵占魁》。一个轰轰烈烈学习赵占魁的运动在边区工业战线上迅速展开。

9月9日 中共西北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定做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解放日报》不仅是中央机关报，同时又是西北中央局机关报，必须加强对党报工作的领导。14日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

9月11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报纸第四版的问题。博古指出：四版比改版前的“文艺”栏有很大进步，缺点是未超出文艺的圈子，文章太长，不能吸引广大读者，仅仅是供给知识分子读的。应刊登短小的、大众化的文章，以启蒙通俗为主。

9月15日 博古将编委会讨论的情况及研究确定的一些制度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表示满意。并在当天给中宣部代理部长何凯丰写信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

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进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

9月18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工作制度的决定草案及人事变动。

9月20日 在报社欢送一批同志到各地区加强采访工作和健全通讯网的会议上，博古作了报告。他强调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我们不是无冕之王，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还要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他指出，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上去采访，千万不要像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应像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

9月22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党与党报》。这是博古起草的。

10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是在博古提供的外电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当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了国际形势。

10月18日 博古与毛泽东、王明、林伯渠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闻参政会定本月22日开会，弟等因事不克到会特此请假。”

10月19日 出席编委会，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的局势。

10月26日 出席编委会，研究新华社工作问题。指出：新华社在对外宣传上比《解放日报》还要广泛，它对党的宣传指导是

很重要的。我们党办通讯社是从延安开始新的创业的。不久前才正式统一了广播，由总社统一领导，这是通讯社的一大进步，是通讯社的雏形。今后要高质量，使内容生动精确。今后新华社的作用及影响，在传达党的意志上占很重要的地位。目前的任务是：一，真正管理好各分社，了解分社情况；二，指导分社工作；三，广播出去；四，电务科尽量多收电讯，提高工作情绪；五，翻译部要高质量。

10月28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报纸通讯工作的指示，指出：“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11月2日 出席编委会，在会上介绍了时局的情况。

11月17日 为了鼓励通讯员工作的顺利开展，《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给党记者和通讯员》。

11月26日 出席编委会，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并报告了边区高级干部会的情况。

12月1日 由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合编的《参考消息》（铅印）第一号出版。

12月7日 出席编委会，通过关于加强在《解放日报》上反映党的和国际政策的决定。重点讨论了社论问题。博古提出：报纸总要有些论断，指导方向，了解动态。社论内容包括时事评论、阐明政策、思想领导、工作指导、执行结果等等，社论最好每天有，没有是例外。

12月10日 中宣部发出对各地出版报纸刊物的指示：“新华分社与当地报社在组织上可以合一，分社即以报社之材料择要供给总社，分社应以收听总社广播为主，环境较好的地区可兼收中央社的消息。”

1943年 三十六岁

1月 博古提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1943年工作概要。

年初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电话传达中央意见：最近一个时期《解放日报》发表了10多篇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新华社没有进行广播，是错误的，应该早日补播出去。博古转告吴文焘，吴写了一份检讨报告。博古阅后，在报告后批了一行字“这责任应由我负责”，并签上名字，上报中央办公厅。

1月8日 《解放日报》发表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先进事迹。11日又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3月15日又发表编辑部的文章《关于吴满有的方向》。这样，一个学习吴满有的运动在边区迅速开展起来。

在大报上将普通农民的先进事迹放在头版头条，而为他专门发表了社论，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破天荒的事。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并决定举行庆祝活动。会议还决定调艾思奇担任《解放日报》第四版编辑主任，并增印1000份《解放日报》。会议还讨论了整风和审干问题。

2月1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生产计划。决定：一，成立总的生产委员会，由博古等9人组成。二，各部门也要成立生产委员会。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四，计划在纸上，还要落实到地上。五，要征求人才和资本。

2月9日 出席编委会，在会上作时事报告。

2月11日 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中各种英雄人物问题的指示，要求把各种英雄事迹“编成生动通讯，电告延安新华社。”

2月16日 由于2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发布的两条消息，16日又重复刊出。博古知道后，立即召开编委会，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严肃地进行了处理。

2月18日 出席编委会，研究报纸和新华社工作以及实行奖励制度等问题。博古指出：总的说来在进步，有些部门刚开步走，有的尚未动。奖惩是必要的，奖励有不同的标准，一种是有特别贡献，一种是业务上能完成任务。惩的方面一种是有重大过失的，一种是业务上荒废的。奖励要讲民主，但也要有集中。

2月22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奖惩问题。博古指出：党报上可以展开争论，看是什么问题，但立场要对头，不要相互攻击。另外，争论的问题要有相当的意义。

3月1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报纸工作。

3月9日 出席编委会，指出：国内新闻还存在研究不够，提不出见解的弱点。报纸对边区生产竞赛的宣传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组织性和创导性，宣传还应继续抓紧。

3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会议还决定在中央政治局下面设立宣传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等机构。中央宣传委员会统管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新华社、中央党校等机构，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博古、凯丰为委员。同时设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博古，兼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

3月22日 出席编委会，检查工作。博古在会上报告了时局情况。

3月29日 出席编委会，通过表扬金刚、黎辛等7位同志。

3月31日 出席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做检查工作的动员报告，陆定一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5月2日 刘志丹灵柩在志丹县举行公葬，博古在纪念碑上题词。

5月4日 出席编委会，指出：国民党在思想上展开进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曲解历史，宣传法西斯，反对共产主义，我们要加以研究，宣传唯物史观，反对法西斯主义。

5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3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指出：“题目由新华总社另行通知。”

6月9日 出席编委会，指出：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宣传共产国际路线错误，要取消中共，会有宣传战，我们要正面解释这个问题。

6月10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6月21日 出席编委会，研究工作。博古指出：新闻部研究敌伪消息，研究战报取得一定成绩，今后仍要这样做。下一步可以研究边区的消息。不进行研究，要统一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

7月1日 《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穆青写的采访劳动英雄杨朝臣如何领导群众做好抗击敌人的准备工作，受到了好评。博古对此事进行了表扬，一是消息写得好，二是跑得快写得快。

7月7日 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炮击边区关中分区，使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7月8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进行武装反击准备的同时，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博古开完会后，立刻赶回，召集全体编委会议，

博古说：边区周围形势突然紧张，内战危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民党从六月起开始对边区采取武装进攻的准备。我们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统一战线。但对任何对边区的武装进攻，是要给予应有的回击，并依照战争应用进攻或防御来保卫边区，否则抗战无法坚持下去。

目前，我们做宣传工作的要加强自己的责任。我们担负笔杆子的“纸弹”战争，不论在战争未打响前，或打响后，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是在对内战派、投降分子作战，各个部门须时刻不停的工作，进入战斗动员时期。

另外，我们要更加了解党的政策，了解敌人，注意宣传战线上的动向，我们绝不打第一枪。他们要先打，我们就回击。因此要很好地研究，一条新闻，一个标题，都应仔细、负责，要代表党的立场。

在陆定一发言后博古又说：宣传战已经开始，我们已还击了。我们要立即使工作转入战时轨道，各部工作要改变，仔细研究宣传战中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到“正确”、“迅速”、“确实”，文章按时交稿，新华社要有值班的。

7月9日 在延安文化沟广场上，举行了3万人的保卫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新华社记者分工担负了大会的报道工作，每人写一段，最后综合成一篇报道文章送给博古审查，博古提了意见，改了又送，送了又改，终究还是不大满意。于是博古亲自动手，很快就将一篇报道写好，并念给大家听。他说：似乎你们对边区人民热爱共产党的深厚感情理解不深，你们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的危险认识不足，不觉得这是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哀兵必胜，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就不能取得胜利。你们对边区军民团结一心的威力，似乎有点信心不足，因此没有把群众的激愤、决

心和力量充分表现出来。

7月12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在目前形势下编委会如何工作。博古指出：今天宣传中心是揭露敌人与动员群众。宣传要注意，万方有罪罪在一人。揭露时不要引起军队的愤慨心，也不要引起轻敌心，我们的宣传要巧妙，有理、有事实，不能打倒一切。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7月13日 博古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文章指出：“二十二年的中国历史及中共党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将没有这二十二年的英勇壮烈的民族解放斗争；没有中国共产党将没有这六年坚持的爱国战争，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中国的命运，将是悲惨的耻辱的殖民地奴隶的命运。”“但是，如果一定要动刀枪的话，一定要发动罪恶的反共战争的话，那么，我们每个共产党人一定将和人民一道为保卫民族，保卫人民，保卫我们的党而奋斗！”

7月15日 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所谓“抢救运动”，这股风也同样吹上了清凉山。康生对清凉山开展“抢救运动”不满，直接点名进行批评，使错误的“抢救运动”也在清凉山上开展起来。

8月30日 出席编委会，介绍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九月间宣传战线上的斗争要展开，宣传的重点是丰衣足食、自卫动员、生产等。他指出3个重要问题：一，正确认识英美对中国的态度；二，宣传要注意，不要引起我们的轻敌心，要着重宣传抗日力量的英勇和坚决；三，宣传中要有充实的内容。

9月4日 博古陪同周恩来来到清凉山，周恩来向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人员作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拖住蒋介石、国民党，

不让他投降，一直拖到把他的“积极性”全部发挥完。

9月27日 出席编委会，分析了国际形势。并指出：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是使蒋家王朝更加法西斯化、更加反动的会议。

10月4日 出席编委会，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宣传上要缓和些，但有充分理由的批评照常进行。对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欺骗当然还要揭露，不过语句要注意。

10月5日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同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六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

11月13—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在会上做第二次检查，他首先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他检讨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 and 个人的错误。在检查过程中有人插话并提出批评，共花了两天时间。在批评中出现了一些过激之词，会议气氛比较紧张。政治局整风会议到1943年底至1944年初暂停了一段时间。

12月20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年假、报纸及生产问题。博古指出：一，对两个大会我们没有主动地、有计划地宣传，许多消息没有特点。二，总结性东西少，个别的问题是有的。三，新闻太长了，写长了就把主要的内容忽略了。四，工农通讯要多登，另外则要提高一步。五，国际新闻有些乏味，要减缩些，专论要增加些。六，四版如何办，与二版的差别在何处，是否四版为国际，二、三版为边区、根据地。

1944年 三十七岁

年初 博古抓紧在清凉山开展“抢救运动”的甄别工作，进行赔礼道歉。并专门召开全体人员的平反大会，代表党组织向无错受委屈的同志公开道歉。

1月17日 出席编委会，传达王家坪（中央军委、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座谈会和西北局会议的精神，并指出最近编辑工作有点马虎，写作方面，导语太长。

2月15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报纸方针问题。

3月5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讲话，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发生怀疑是党外问题，现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反省笔记中说到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处于严重白色恐怖，有上海的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没有报告是不好的。四中全会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与中央承认的，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的问题。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中。有人怀疑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还是要思想上要清查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反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很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清楚，过去

未作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这个方针。（四）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议是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的一概否定。（五）对六大的估计。在讨论中有不少同志企图否认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提出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六）党内的宗派是否还有。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的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

4月10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编报问题。

5月21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会议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5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会议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及书记处暂停止行使职权。

会议成立了“历史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7人组成，由任弼时担任召集人。

5月23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政治形势、记者团访延和报纸编辑问题。博古作国际国内形势发言。在余光生发言后，博古说：

华莱士来华放在最后，甘地的消息放两个地方，受人讥笑。华莱士“幸附骥尾”。

7月10日 周恩来写信给博古，信中说：“工厂会议文件原要出一本小册子，现因一时印不及，少奇同志意见，先将这几篇演说登《解放》。我已看过，请你阅后登出。”

7月17日 出席编委会，研究工作方针。博古谈了改进业务、加强团结、消灭隔膜、各部互相尊重等问题。

8月 《解放日报》起草社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送毛泽东阅批。

8月8日 新华社英文文字广播开始试播。

8月31日 毛泽东就《解放日报》《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一文写信给博古，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而言，新民主主义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9月1日 新华社英文广播正式开始。

9月15日 新华社播发《关于分配同盟国援助物资问题，延安有资格人士发表评论》一文，此文经毛泽东修改过。

9月19日 新华社播发延安权威人士就国共谈判经过及国民参政会派遣视察团来延一事发表评论，评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秋 在解放日报社对通讯采访记者发表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讲话，指出：

党报是党领导工作上重要一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我们两方面都担负。

我们要成为党的喉舌，必须要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

一，党性——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

二，群众性——我们是群众的报纸，要把群众的观点反映到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的报纸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与工作，我们要依靠广大的通讯员。

三，组织性——不单反映现实，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指导一定工作。但所有这些都党的方针路线下的，配合党委去开展运动。

四，战斗性——自己的力量怎样团结，反对的力量怎样去斗争，我们党的报纸很明显的是无产阶级性的；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斗争性要在不同的工作中来贯彻。

即是党报的新闻记者，除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外，还要有新闻记者的品质：一，要能接近人，要和群众搞得来，谈得来话；二，要有冷静批判的能力。

10月4日 毛泽东在博古陪同下，来到清凉山西侧山腰上中央印刷厂礼堂，接见了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毛泽东说：党中央对于各地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活动外，大政方针很多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下去的，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你们是一个重要渠道，别的方面来的东西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要靠你们。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办好。

10月11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播发。

11月9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的情况。

12月7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决定：周恩来、董必武不再去重庆谈判，并致函赫尔利说明原因；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陕甘宁边区发起。成立准备委员会，由党内周恩来、林伯渠等14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21人共同组成。

12月9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

12月11日 出席编委会，谈了新闻业务中的一些问题，要求采通部自己掌握政策，要研究怎样编报、搞版样，要标题活泼、文字通俗，并指出副刊文章太长，应注意增加知识性文章。

12月25日 出席编委会，传达中央召开的大后方问题座谈会的精神。

1945年 三十八岁

1月28日 出席编委会，指出：要加强沦陷区的报导，要研究采访，总结经验，研究怎样培养通讯员，研究部门要与报纸相联系。

2月9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并加了编者按语。

2月12日 毛泽东看了9日社论后十分满意。当日写信给博古，“此文写的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新闻谅已广播，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社论，大有进步了。”

2月18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

2月27日 出席编委会，博古在会上说：写新闻，一要真实，

实有其事，不然是造谣。二要生动，光是真实不行，要写得生动，有人看。三生动还不行，还要迅速。但要注意政策。真，首先是不能编造，但要有取舍，有立场，我们不能有闻必录，写得好的新闻，一定要简捷明净，极力避免多余的废字废话。怎样写？一，每一条新闻有一个主题。二，怎样发挥主题，你要怎么讲，怎样使读者更好懂。三，怎样写得更好。

3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

3月3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会议一致通过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会议还决定准备将若干历史问题的议案交七中全会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

4月博古从新华社看电讯后，来到《解放日报》编辑部，用英语激动地喊着，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请他坐下，他冷静下来后，才说：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突然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由于罗斯福的死，以后的政局将发生复杂的变化。

4月20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历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作出了结论。会议还通过七大的议程、主席团及常务主席、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大会议事规则等。

4月2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会议通过六项议案，即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及七大主席团、常务主席、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等。

4月28日—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

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5月3日 博古在大会作了发言，他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批判了“左”倾路线，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44人，博古由于能够认识过去的错误，努力改进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因而也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

5月8日 德国宣布投降。

6月1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会议选出了13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等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选举了中央军事委员会。

6月22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备荒问题。博古指出：边区的灾荒是很严重的，我们思想准备不够，没有转到备荒上来，现在要马上动员，开会讨论。再不能依赖公家了。备荒是大家的事，如果再荒下去的话，报纸只得出半张，一半人上山搞生产。所以大家要很快转变态度。现在的基本方针是备荒，农业第一。关于个人节约，要严格执行。

6月26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备荒问题。

7月24日 出席编委会，博古分析时局，部署工作。

8月9日 《解放日报》刊登美国在日本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消息后，毛泽东约胡乔木、余光生、陈克寒谈话，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同日，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修改以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会议还着重讨论，苏联参战后的时局问题。

8月10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吴文焘接到这消息

后，因博古正开会，立即将这消息报告毛泽东。

8月11日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编辑们集中在博古的窑洞，博古带来中央的指示与朱德的命令，大家听后欣喜若狂。博古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咖啡给大家冲了一杯，以咖啡代酒，共同庆祝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

8月16日 中央在给党报委员会徐冰等人的指示中指出：“应集中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要“配合延安广播坚决地马上予以严斥，以压倒蒋之反动，推动各方。”

8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党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并拟了“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后归纳为六条，即《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8月25日 出席编委会，博古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各自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指出战争转入和平时期要更加注意宣传中的政策。

8月31日 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举行编委扩大会，博古宣布了编委委员名单：博古、余光生、艾思奇等7人。余光生任总编辑，艾思奇任副总编辑，陈克寒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吴文焘任第二副社长，陈健生任秘书长。博古还强调指出今后业务研究要增多，更多研究人家的宣传及自己的宣传，宣传者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威服人。

9月2日 日本天皇、政府及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7日 出席编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汇报各部门讨论日本投降后时局的情况，分析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原因及未来的前景，

博古作了总结。会议决定传达博古的意见并组织讨论，然后检查这个时期的宣传政策执行情况。

9月11日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

9月21日 出席编委会，研究搬家问题。博古指出：一，要维持全国性报纸的地位；二，保证在搬家时出版。要抽人组成先遣队，我们内部应紧缩一下；三，研究部、英文组、日文组应分一部分出去。

9月29日 中宣部关于目前宣传方针致各中央局、区党委电中指出：“注意收集、调查与报告日寇投降以来，国民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特别在军事上对敌伪则联合、利用与放纵、推使，对解放区进攻与屠杀人民”等，“作为新闻或通讯，电告新华社总社。”

10月8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广播问题。博古指出：广播的听众基本上是城市，对我们了解少的，因之要从ABC讲起，内容是国内外的要闻，解放区新闻的播音时间要长一些，时论要分我们的和转别人的。

10月 博古约肖三谈话，并希望肖三给《解放日报》写稿，内容有：“减租减息失败和成功的经验，人民生活的变化，发动群众的情况”等。

10月22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纪念十月革命节，准备口号、社论、文章等。新华社广播11月1日开始。博古指出：口头广播要活泼，可以一问一答，不要太枯燥，要口语化。

11月初 毛泽东、任弼时来到军委三局所在地裴庄，视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毛泽东还亲自通过广播电台与张家口通话。并对通信、广播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作了高度评价。

11月4日 博古在编委会上指出：目前是两个宣传战，一对

蒋介石，一对美国，宣传不仅只顾今天，还要考虑到明天。

11月5日 博古向毛泽东汇报说：前在焦作被迫降落的国民党飞机，内有军委会（蒋署名）给阎锡山的信及剿匪手册两本，此信由太行拍来总社，并已发了广播，揭穿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11月19日 出席编委会，博古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总的宣传方针仍是防御性的。要宣传国民党如何打我们，但不是恳求和平，我们有原则立场，但不说过份的话。对解放区要继续宣传减租、生产、宣传自己的建设。

12月10日 出席编委会，论述了国内形势。

12月13日 《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从五个W说起》，说新闻必须有五个W（即时间、地点、人物、事情、为什么）“缺少一件就会不成样子。”

1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1946年解放区工作方针与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成员；决定成立南方局及宪法研究委员会，博古参加了宪法研究委员会。

12月18日 出席编委会，讨论宣传问题。博古在会上分析了当前时局的状态后，陈克寒作了长篇发言，最后博古指出：一，分社要从现在基础上提高一步，要办训练班是很难的。二，要加强研究。每个人要熟悉自己工作范围内的有关情况。

1946年 三十九岁

1月10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政治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停战与政协问题。

1月30日 博古在编委扩大会上说：宣传由农村转入城市

了，要走到一个新阶段，过去我们的宣传对象多是接近我们的人，今后对怀疑我们的人宣传，向反对我们的人宣传，以说理方式进行宣传战，思想斗争，宣传斗争，今后要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地位。

2月 中共中央决定博古参加宪草的谈判工作。

2月6日 毛泽东起草致重庆中央代表团电，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与何思敬5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会我方人选。

2月10日 出席编委会，博古指出：我去重庆谈判，报社工作暂时由光生代理，根据两年来工作情况看不会发生什么困难。

报纸与新华社目前处于过渡阶段，只能维持现状，要准备将来成为全国的报纸和通讯社。今后中国的新闻有三大系统：一，国民党新闻系统；二，我们的新闻系统。我们在农村中有基础，城市较差。三，中国的新闻系统。培植起我们的新闻系统亦很重要，现在先把地方的报纸搞起来。

形势发展下去是光明的，可能在5、6、7月间下山。现在要做好下山准备，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总结一下在农村中办报的经验，二，好好研究一下与国民党斗争的问题。

毛主席讲，我们的宣传要诚恳，又要很明确，抑之先要扬。学习孟尝君的办法，要说理，我们长于脱了裤子骂娘，今后要改一下作风，这是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大问题。目前，国民党有一个分化，出现民主派与反政协派，我们目前要在宣传上休战，对他们要谨慎、细心。蒋介石与美国都是有政治经验的，目前应稳蒋，以孤立反政协分子。

2月 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与新华印刷厂的同志，召开了一次大会，为博古送行。博古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幻想和平就要到来，急于到大城市去的思想说：“大城市是可以去的，而且迟早总是要去的。但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就是去干什么？是去辛勤工

作，为人民服务，还是去做官当老爷，贪图物质享受？”“我们只能是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

2月13日 博古与董必武、王若飞等人于上午10时乘飞机由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宪草谈判。

2月14日 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会议安排及国民代表大会问题。

2月15日 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的组织、职权、任期、及议会制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坚持政协决定。

2月16日 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集中和讨论中央政治体制问题。

2月18日 出席宪草审议会议，会上就地方制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在会上义正辞严地说：“维持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之原则，制定省宪。”他进一步阐述说这项原则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所确定的原则，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的。

2月22日 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蓄意制造了反苏反共游行。特务、流氓、暴徒乘机捣毁了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两报工作人员多人受伤。

2月23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博古为22日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事，致函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对本报及民盟损失道歉与赔偿，并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3月1—17日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带头发难，反对自己同意的政协决议，会议精神与政协决议

背道而驰。

3月14日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之综合委员会暨宪草审议委员会之协商小组会，展开了维护政协决议与企图修改政协决议的斗争。

3月15日 召开政协综合委员会和宪草审议协商小组联席会议。中共代表团在宪草修改原则上作出三点让步：（一）将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二）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第六项第二条条文取消；（三）省待制定省宪改为省待制定自治法。

3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提出：“15日所决定的修正宪草原则三点，我们仍深感不妥，因为动摇了议会制、内阁制及省之自治地位。”因此“必须迅速加以挽救。”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要求坚持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

同日 博古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博古在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中共代表今午已约国民党代表于明日下午商谈有关诸问题。对记者提出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回答说：正在考虑中。

3月22日 周恩来回延安汇报工作后致电董必武等，告知中共中央决定，政协谈判应以宪草修改为中心，应力争立法、监察两院合为国民大会，而将省自治法改回为省宪，以保证解放区的地位。

3月25日晚 博古接见记者，介绍了政协综合小组争论的原因即：国民党处心积虑地动摇和推翻政协决议，如何想利用“训政时期约法”来否定“共同纲领”的施行，如何想利用骗局把不三不四的所谓改组过的政府，做为一党专政的脂粉。

3月28日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会，就国民大会及宪

草修改原则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1日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会，继续讨论国民大会及宪草问题，会上青年党代表陈启天发言，打算取消地方自治，遭到博古的严厉驳斥。曾琦、陈启天理曲词穷，恼羞成怒，退出综合小组会议。

4月3日 出席政协综合小组会，青年党代表借故拒不参加会议，王若飞在会上指出“如因受不住严正批评而不出席，殊失民主讨论应有的风度。”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以大标题登出“综合小组会议讨论宪草，秦邦宪无理谩骂，青年党拒再出席”为题，进行造谣污蔑，可是报道中却又找不到博古谩骂的字眼。

4月4日 出席中共代表团，又一次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4月 中共代表团和重庆各民主党派人士在特园聚餐，欢送王若飞、博古赴延安请示工作并欢迎叶挺出狱。

4月8日上午 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

因天气十分恶劣，能见度很差，因而迷失方向，误向晋绥边区飞去，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行高度比较低，结果不幸触山，同机17人全部遇难。

草修改原则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1日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会，继续讨论国民大会及宪草问题，会上青年党代表陈启天发言，打算取消地方自治，遭到博古的严厉驳斥。曾琦、陈启天理曲词穷，恼羞成怒，退出综合小组会议。

4月3日 出席政协综合小组会，青年党代表借故拒不参加会议，王若飞在会上指出“如因受不住严正批评而不出席，殊失民主讨论应有的风度。”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以大标题登出“综合小组会议讨论宪草，秦邦宪无理谩骂，青年党拒再出席”为题，进行造谣污蔑，可是报道中却又找不到博古谩骂的字眼。

4月4日 出席中共代表团，又一次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4月 中共代表团和重庆各民主党派人士在特园聚餐，欢送王若飞、博古赴延安请示工作并欢迎叶挺出狱。

4月8日上午 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

因天气十分恶劣，能见度很差，因而迷失方向，误向晋绥边区飞去，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行高度比较低，结果不幸触山，同机17人全部遇难。